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論文

從留台到移民——鍾梅音家/台灣  
的書寫

指導教授：阮美慧  
傅素春

研究生：劉恆吟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審定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劉恆吟 所撰寫之論文

從留台到移民—鍾梅音家/台灣的書寫

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特此證明。

學位考試委員：

唐毓麗

侯如詩

阮美慧

傅素春

指導教授：

傅素春

阮美慧

系主任：

周玟慧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1 日

# 從留台到移民—鍾梅音家/台灣的書寫

## 摘要

本論文欲以 1948 年 3 月期間隨丈夫余伯祺由中國渡海來臺的外省知識女性鍾梅音為研究對象，透過其所寫的大量散文作品來考察當時遷臺女性，在政權轉換、社會動盪不安的大時代裡，如何安頓自身及其家庭，在局勢變化中又如何調整及適應，並探究何以遷臺外省女性作者在五〇年代臺灣文壇上有大量湧現的特殊現象，而且擁有展露頭角的特殊境遇。

本論文研究聚焦在鍾梅音散文中所展現出來的一個身處動亂時代下又飽受宿疾折磨的女性所凝鍊出屬於她個人獨特思維所生成的深刻人生哲理，以及作品書寫出的從原本僅打算暫居臺灣，隨時準備好要返回故土中國，到後來久住此地，在臺安定成家過程中異鄉變故鄉的心境轉折與適應。

研究方式採文本分析法，經由對鍾梅音散文文本閱讀整理分析，從女性書寫的內容，探究其深層的意義，因國共內戰而遷臺的外省族群，在兩岸隔絕的狀態下，被迫中斷了與中國故土及親族的連繫，鍾梅音在這過程中是如何適應，又是怎樣在臺灣重建起自己的家。研究架構則為五章論述，首章緒論，說明本研究的起心動念，以及研究範圍。第二章，嘗試從五〇年代官方文藝政策來看鍾梅音的女性書寫實踐。第三章，針對鍾梅音病史的整理來深入探究她因氣喘宿疾所悟得的人生觀。第四章，研究鍾梅音作品中的在地化書寫。最後，第五章，總結出研究所得，梳理出鍾梅音的生命圖像，透過她的書寫來理解五〇年代的複雜性，及所刻劃出的時代印記。筆者期許本論文能延展學界對於五〇年代遷臺女性作家散文文本研究的關注以及更多元的評價。

關鍵字：鍾梅音、遷臺、五〇年代女性散文、文學場域

# Family Adaptation in Taiwan: Zhong Mei-yin's Prose Writing

## Abstract

By analyzing numerous prose written by Zhong Mei-yin, a female Chinese writer who moved with her husband, Yu Bo-Qi, to Taiwan from China in March 1948,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inese women who relocated to Taiwa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After reviewing the prose written by Zhong,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these women protected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urbulent times and further adapted themselves under regime change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asons and unique context in which the great female writers who moved from the mainland emerged and thrived in Taiwan during the 1950s.

This study first focused on Zhong's unique life philosophies, which were developed in the complexities of her hardships in a turbulent time and her suffering from a chronic lung disease. The second focus is on Zhong's psychological transition and adjustment process regarding her endeavor to adapt to life in Taiwan. Originally, the writer did not plan for a long stay in Taiwan and was eager to return her home in China at any time. However, after living in Taiwa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Zhong finally gave up going back to China and persuaded herself to treat Taiwan as her new home where she would dwell permanently.

This study adopted the textural analysis method to review and analyze Zhong's prose. As one of the Chinese women who relocated to Taiwan with the ROC government following the end of Chinese Civil War, Zhong was forced to leave her hometown and became separated from her family and relatives.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s imparted by her writing revealed how Zhong adapted to a new life in Taiwan and how she rebuilt her home afterwards. This paper comprises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the research rationale.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Zhong'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rt and literature policies enforced by the ROC government in the 1950s. The third chapter summarizes Zhong's medical history to explore the philosophies of life developed out of her chronic asthma. The fourth chapter focuses on the localized writing in Zhong's works. The final chapter concludes the findings that sum up Zhong's life and the complex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ry world in Taiwan during the 1950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draw the attention of literature academics to study the essays written by female writers who relocated from China to Taiwan during the 1950s and thus bring more insightful reviews.

keywords: Zhong Mei-yin, migration to Taiwan, female prose in the 1950s, literary field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7
一、研究現況的考察-----	7
二、相關學位論文-----	12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與目的-----	14
一、研究範圍及出版作品整理-----	14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28
第四節 論文研究架構-----	29
第二章 五〇年代的官方政策與鍾梅音的女性書寫實踐-----	31
第一節 鍾梅音生平及寫作生涯概述-----	31
一、鍾梅音早期作品-----	39
(一)、鍾梅音文體的選擇-----	40
(二)、副刊編者處理稿件的準則-----	42
二、中期作品-----	53

(一)、《海天遊蹤》寫作前的練筆準備-----	56
(二)、旅遊以外的遷徙，鍾梅音的隨夫婿搬遷史-----	56
(三)、遊記的價值及侷限性-----	58
(四)、遊記散文外的兒童文學翻譯-----	59
(五)、作家身分外所展現的編輯能力，抒情寫作外參與文協組織 的身影-----	60
三、鍾梅音寫作後期階段-----	64
第二節 遷臺女作家創作的時代背景-----	66
一、五〇年代官方的語言政策-----	66
二、五〇年代官方的文藝取向-----	70
第三節 五〇年代遷臺女作家的創作空間-----	73
第四節、反共文藝的規訓性-----	83
第三章 個人即政治-----	91
第一節 鍾梅音的病史-----	93
一、從兒時到婚前的病體及其影響-----	94
(一)、小時疾病纏身-----	94
(二)、因病頻繁中斷求學之路-----	94
二、婚後的病體與母職及自我實踐間的難題-----	97

(一)、婚後宿疾再度猛力地侵襲-----	97
(二)、遷臺後所書寫的兩處鄉愁-----	98
(三)、因病阻斷職涯-----	100
(四)、同事友人眼中的鍾梅音-----	102
第二節 病體·家庭·母職——拉扯與調和-----	102
一、子女心智的早熟-----	103
(一)、兒子小灝與大女兒小安-----	103
(二)、小女兒小白羊-----	106
二、丈夫對病妻的愛-----	107
第三節 因病而生成的領悟及智慧-----	108
一、亦戰亦和，與病和平共舞-----	108
二、因病而得到的靈感及啟發-----	110
第四章 家·台灣——在地化書寫-----	115
第一節 在臺紀實-----	115
一、鍾梅音臺灣居所-----	115
(一)、玩具模型——基隆住所-----	115
(二)、我的家——宜蘭蘇澳-----	117
二、颱風初體驗-----	120

三、多年後，面臨颱風，綽有餘裕-----	122
四、夫婦坐擁湖岸美景，憶當年初婚時-----	123
第二節 懷鄉書寫的心境轉折-----	126
第三節 女性文本的生活與日常性及對於時事的觀察-----	132
一、妻職與母職的實踐——女子教育 / 女作家傳統的保守性-----	133
二、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反思——公寓生活擘畫的「現代人」想像-----	144
第五章 結論-----	155
參考書目-----	159
附錄 1-----	165
附錄 2-----	171
附錄 3-----	197
附錄 4-----	198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清朝政府於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與日本訂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便日益加劇。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軍占據瀋陽，史稱「九一八事變」。一九三四年，日本在中國東北成立滿州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正式點燃全面戰火，中國自此展開了八年艱苦的對日抗戰。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戰事當中，不斷遷徙逃難。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然而卻又爆發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戰爭失利，國軍節節敗退，種種弊端浮出，加上各種複雜的原因，包括當時學潮等社會現象，援引齊邦媛在《巨流河》的一段話：

抗戰的勝利，是中國八年血淚堅持奮鬥得來，但由於原子彈而驟然降臨，使政府措手不及，「勝利」二字所帶來的期待未能立即實現，前線後方共患難的日子一去不返。自華北開始，共產黨在戰線後方，以土共和農村宣傳的力量急速擴張，對不滿現狀，充滿改革熱情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滲透與說服魅力。<sup>1</sup>

終至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連同大批軍民，退守來台。而臺灣自此成為國民政府所急欲建構的反共的跳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臺灣文壇亦受到官方文藝政策的支配。

五〇年代在臺灣文學史上應可說是反共意識最為激揚的時期，當時政府為加強推動反共文藝政策，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並提供高額獎金獎勵寫作。在反共、恐共且物質匱乏的年代的確成功動員且收編了許多文人參賽<sup>2</sup>。五〇年代的文學主流作品，在爾後文學評論家的筆下定調為反共懷鄉文學，然而因著複雜的文學史觀，對於五〇年代文學亦出現極為不同的文學評價。反共文藝推動的靈魂人物陳紀澄，對於五〇年代遷台特別是女性作家輩出的現象給予肯定<sup>3</sup>。然而本土評論家葉石濤則認為「五〇年代文學所開的花

<sup>1</sup> 齊邦媛，〈學潮〉，《巨流河》（臺北市：遠見天下，2009年7月），頁234～235。

<sup>2</sup> 應鳳凰，《畫說1950年代台灣文學》（新北市：遠景出版，2017年2月），頁90。

<sup>3</sup> 陳紀澄，〈序「冷泉心影」〉，《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

朵是白色而荒涼的」<sup>4</sup>，當時的文學在他看來只是官方政策的附庸，讀來千篇一律，令人感到厭膩。應鳳凰在《畫說 1950 年代台灣文學》中甚至羅列出對於台灣 1950 年代的三種不同的文學史觀，並提問這十年間的主流作品：

到底像國民黨說的：大部分「取材於事實」，還是如大陸史家認定的，只是「肆意歪曲事實」的文學？反共文學到底是「親身血淚經驗，表現時代精神」，還是如本土史家所言：「作品脫離現實生活，形式僵化，淪為政治附庸？」<sup>5</sup>

應鳳凰統整了這段五〇年代臺灣文學史的定位，在各種各樣的文學史著作中實為「說法不一；不僅各說各話，簡直南轅北轍，評價全然相反。」<sup>6</sup>，簡直讓人摸不著頭緒。

在此筆者認為值得關注的是，五〇年代的反共文藝獎勵文類並不包括當時產量大的散文作品。這得回顧五〇年代的文學場域及各種周邊因素。據應鳳凰的觀察，當時的臺灣文壇上出現一種特殊現象，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所獎勵的文類中並無散文，而：

散文雖沒有社團也沒有專屬刊物，卻廣受讀者歡迎，各副刊、文藝媒體因此都樂於刊登。形成散文作者多，散文產量大，生產與消費的規模要比之其它文類更大。……其中又以女作家及學者散文的成就最為亮眼<sup>7</sup>

張誦聖提醒這現象當中，需要思考的是在產生反共文學的文化氛圍中出現的文化產品，是受到怎樣的、與當時動員文人寫反共文學出自同一來源的力量的制約，以及產生的文學效果。可採用主導文化這個概念來思考<sup>8</sup>。這恐怕也跟當時臺灣社會形態、結構轉型所逐漸發展的中產文學品味，報章媒體漸漸地因應著資本化市場傾向於滿足讀者大眾審美趣味有關。

戰後曾有一群遷臺女作家一度活躍於臺灣文學場域。風姿綽約地現身於中國文藝協會、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等官方文藝組織。筆者注意到一位外省女性——鍾梅音（1922

---

<sup>4</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7年10月20日再版），頁88。

<sup>5</sup> 應鳳凰，〈1950年代文學環境與文學生態〉，《畫說1950年代台灣文學》（新北市：遠景出版，2017年2月），頁23~24。

<sup>6</sup> 應鳳凰，〈1950年代文學環境與文學生態〉，《畫說1950年代台灣文學》（新北市：遠景出版，2017年2月），頁16。

<sup>7</sup> 應鳳凰，〈1950年代台灣散文〉，《畫說1950年代台灣文學》（新北市：遠景出版，2017年2月），頁210。

<sup>8</sup> 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市：麥田出版，2000年10月），349~365頁。

～1984)，1948年自中國大陸隨夫攜子遷移至臺灣，以臺灣為起點，開始從事寫作，以散文為主要書寫文體，活躍於五、六〇年代的臺灣文壇，並在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出版多達18本散文集、1本短篇小說集等，她還寫詩、填詞、作畫、從事兒童文學翻譯等。筆者因而有了進一步了解的興趣，並考察了一些和鍾梅音相關的資料。

翻看女作家們過去所留下來的影像中，尤其是參與文藝聚會活動時她們的合影，天神裕子描述：「女作家都穿著大方的旗袍，臉上掛著充滿氣質的微笑，她們是新時代的職業婦女，或是兼職主婦，又賢慧又能幹，而且頗有牽引新時代的使命感。這可以說是自由中國的新主婦。它與共產中國的婦女意象相比，卻又大有不同」<sup>9</sup>。這是從日本研究者的角度來觀看中華民族中兩種意識形態政治團體所賦予孕育出的婦女形象所做的描述。天神裕子將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婦女形象做了個比較，她認為在不同意識型態環境下所孕育出來的婦女組織有著不同樣貌。天神裕子認為遷臺外省女作家有著這般特殊的氣質，是因為她們的教育背景和受過五四文化影響的關係：

1949年前後遷到臺灣而登臺的一群女作家，包括鍾梅音在內，大部分女作家在大陸時代都受過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以及受到五四文化的薰陶……她們均是1955年政府主導下設立的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會員，鍾梅音也是其中主要成員。<sup>10</sup>

天神裕子研究了五〇年代遷臺女作家鍾梅音的文本，對於鍾梅音散文中展現出的家庭主婦形象，給了三個關鍵字，即「賢慧、智慧、使命感」<sup>11</sup>。

回顧當時五〇年代那個風雨飄搖的大時代裡，在退守來臺的國民黨持續不斷提出反攻大陸的口號下，似乎人人都被激勵成退無可退之路，必須要奮發圖強。鍾梅音筆下的軍公教人員的家庭主婦形象，是無名的「克難英雄」<sup>12</sup>，「有驚人的適應生活能力」<sup>13</sup>，既堅毅又耐勞，是國家基層組織堅實的後盾，身為文藝工作者，應勇於承擔並維護自由中

<sup>9</sup> 天神裕子，〈賢慧·智慧·使命感—鍾梅音散文中的家庭主婦形象〉，《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263。

<sup>10</sup> 天神裕子，〈賢慧·智慧·使命感—鍾梅音散文中的家庭主婦形象〉，《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263。

<sup>11</sup> 天神裕子，〈賢慧·智慧·使命感—鍾梅音散文中的家庭主婦形象〉，《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261。

<sup>12</sup> 鍾梅音，〈祝壽〉，《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民43年11月），頁117。

<sup>13</sup> 同前註，頁117。

國環境裡的正統文化，盡其應盡的責任，執筆化為力量，負起筆隊伍的使命，可以寫自己愛寫的，更要配合官方的反共文藝政策，安撫民心，鼓舞士氣。鍾梅音在《母親的憶念》〈我的手〉中的一段話，同時蘇雪林評此話流露出來的正是鍾梅音對於自己天才的自負<sup>14</sup>。

我的手，原不是留給人欣賞和親吻的，我的手是要拿出來做事的。提起這些，它不值得驕傲嗎？除了鋤頭、糞勺，它不但拿起筆來可以寫文章，而且拿起鍋鏟，它能煮出可口的食品；拿起針線，它能縫出合體的衣裳；它在鋼琴上彈過動人的曲調，也曾在畫板上塗過美麗的山水；它愛撫著丈夫兒女，也愛撫過負傷的戰士；乃至愛撫過一切我所愛的人，使他（她）們快樂與幸福。這寶石鑽戒又怎比得上它的光輝？……，我覺得我的手其實非常之美，它不是用來配樣兒的。它是堅忍與努力的象徵，我當引以為榮。<sup>15</sup>

女性的散文作品，用柔軟細膩的筆調，宣傳著中華民族傳統且正統的思維，醞釀出切合官方想要的效應。事實上，據侯如綺觀察「台灣外省族群以相對少數的流亡人數卻能在台灣建立起威權政府，是相當少見的一個現象。」<sup>16</sup>因此不難想像已失去中國大陸政權的國民政府，對鞏固其主流正統地位是極其重視的。國民黨亦借助這樣抒情的軟性訴求所產生的文藝力量來宣傳其政策及穩固在臺灣正統政權的位置。

1955年5月5日「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的成立，使得五〇年代女作家大量的湧現，陳芳明指出：「女性作家在反共復國的國策動員之下大幅被開發出來。『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的成立，從五〇年代一百多位會員到六〇年代變成三百多位會員的規模，開始改寫台灣文學的版圖」<sup>17</sup>，人數一多也自然生成了一股不容小覷的影響力。陳芳明提醒在台灣文壇上白話文之所以能夠繼續保持「活潑的生命力」<sup>18</sup>，這也得歸功於散文家的努力，但是，反共文學時期，白話文書寫已呈現出疲態，而女性散文家則扭轉了這樣的頹

<sup>14</sup> 蘇雪林，〈寫在「母親的憶念」前面〉，《母親的憶念》（臺北：復興，1954年4月），頁4。

<sup>15</sup> 鍾梅音，〈我的手〉，《母親的憶念》（臺北：復興，1954年4月），頁46~47。

<sup>16</sup>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台北：聯經，2014年6月），頁40。

<sup>17</sup> 陳芳明，〈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局限與突破〉，《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10月初版），頁309。

<sup>18</sup> 陳芳明，〈台灣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10月初版），頁460~461。

勢，陳芳明說：「台灣女性散文作家在一九五〇年代大規模的誕生，對於白話文的試驗與提升具有不容低估的貢獻」<sup>19</sup>。

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所提到的五〇年代文學跟散文方面相關的評論則是：

五〇年代也可以說是散文盛行的時代……然而大多數散文皆為「風花雪月」的作品，懷鄉情緒的憂鬱與傷感充塞於中，只提供民眾茶餘酒後的一時消遣。不以「風花雪月」為題材的散文，主張「戰鬥性」，使散文走上反共八股，千篇一律，令人生厭。<sup>20</sup>

雖然如此，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書中，也將五〇年代散文作家中較有成就的作家人名給羅列出來，有「徐鍾珮、艾雯、張秀亞、潘琦君、鍾梅音、王文漪……等女作家為主。另有梁實秋、鳳兮、茹茵、劉心皇、宣建人、季薇、周君亮、彭歌……等。」<sup>21</sup>，然而，關於鍾梅音僅做了簡介：「鍾梅音，福建上杭人。一九二二年生。一九四八來台。有『母親的懷念』、『冷泉心影』、『小樓聽雨集』等。著作以散文為主共二十多本。」<sup>22</sup>，書中所引的書名「母親的懷念」，應為《母親的憶念》。

隨著時空流轉，經歲月洗鍊汰換，五〇年代戰後遷臺著名散文女作家的文章，除了林海音、琦君等持續有人關注外，其他女作家的作品，逐漸乏人問津，絕版品已破舊不堪，隨時會被圖書館、二手書商給報廢處理。不禁讓人覺得惋惜。張瑞芬所著《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中指出：

鍾梅音在女作家群中，是散文質量俱優，卻較被文學史遺忘的一個。她的寫作完全以台灣經驗為起點（與琦君同），在當時是少數以散文為主要創作文類的女作家。……相當值得重視與再評價。<sup>23</sup>

筆者翻閱鍾梅音的第一部作品《冷泉心影》是由重光文藝出版社於1951年所印行，陳紀瑩寫序。收錄1949年至1951年間發表於各大報的散文作品，其中收錄〈雞的故事〉、

<sup>19</sup> 陳芳明，〈台灣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10月初版），頁461。

<sup>20</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7年10月20日再版），頁100。

<sup>21</sup> 同前註，頁100。

<sup>22</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7年10月20日再版），頁101。

<sup>23</sup> 張瑞芬，〈海天歸來－論鍾梅音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2006年2月），頁88。

〈鄉居閒情〉、〈賣蛋記〉等數篇文章均發表於 1949 年，那年不就是大批軍民隨著國民政府倉皇渡海避難於臺灣嗎？在驚心動魄的大時代中，真誠如同時期文學批評家家劉心皇所評，五〇年代遷臺女作家的散文寫作風格：

她們的優點在於感情豐富、思想細緻，描寫心情和事物。都能入情入理，而且用詞美麗。可惜的是，她們所寫的差不多是身邊瑣事。讀她們的作品，彷彿不知道是在這樣驚心動魄的大時代裡。<sup>24</sup>

劉心皇這樣的負面評價，無非就是他認為女性作家寫作的素材不離身邊瑣事，範圍太過狹隘，無法反映那個關係到國家興亡的緊要關頭。

朱嘉雯在〈「家」的雙重認同〉文中寫道：「渡海初期女作家對身處新環境的體認，顯得怡然恬靜。」<sup>25</sup>，一九五〇年代，當臺灣全島處在備戰狀態中，政府不斷喊著「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這些人人耳熟能詳的口號。然而「戰亂的氣氛似乎並未滲入女性文本。」<sup>26</sup>，朱嘉雯並引用了徐鍾珮於一九五四年，在臺灣重版的《英倫歸來》的書中序文〈寫在前面〉的一段話語：「今日的臺灣，卻好整以暇的一派歌舞昇平氣象。」<sup>27</sup>作為參照點。一般對於五〇年代的歷史認知，不就是隨時要準備反共復國，怎麼會被女性描繪成處在歌舞昇平的氛圍中呢？因此，朱嘉雯進一步解釋說：「女性對時代的詮釋夾雜了在威權下的妥協與個人的感官體驗。對大陸移民來說，時空換置的適應與族群之間的溝通，都需付出相當的代價。而女性文本取向閒適與怡然的情調，則又使我們重新體認女性思維的內涵與本質。」<sup>28</sup>更早意識到此現象的范銘如拋出議題，她提問並試著釐清當時到底真實情況為何<sup>29</sup>？以上這些都引發筆者想再進一步研究五〇年代女作家鍾梅音的興趣。

本篇論文欲以 1948 年 3 月期間，隨丈夫余伯祺由中國渡海來臺的外省知識女性鍾

---

<sup>24</sup> 劉心皇編著，〈導言：自由中國文學三十年〉，《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台北市：天視出版，1981年8月初版），頁70。

<sup>25</sup> 朱嘉雯，〈「家」的雙重認同〉，《追尋，漂泊的靈魂：女作家的離散文學》（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9年2月），頁64。

<sup>26</sup> 同前註，頁64。

<sup>27</sup> 徐鍾珮，〈寫在前面〉，台灣重版的《英倫歸來》（臺北市：重光文藝，1954）。

<sup>28</sup> 朱嘉雯，〈「家」的雙重認同〉，《追尋，漂泊的靈魂：女作家的離散文學》（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9年2月），頁64。

<sup>29</sup>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一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年8月），頁14。

梅音為研究對象，透過其所寫的大量散文作品，從中整理並考察當時知識女性，在政權轉換、社會動盪不安的大時代裡，從原本僅打算暫居臺灣，隨時準備好要回中國大陸，到後來久留此地的過程中，如何安頓自身及其家庭，以及在局勢變化中又如何調整及適應，並探究何以遷臺女性作者在五〇年代文壇上的大量湧現，並擁有展露頭角的特殊境遇，研究女性抒情散文中所展現獨特風格，以及與時代對話的意涵、族群之間的互動關聯，以及女性書寫的性別意識及傾向。

##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 一、研究現況的考察

翻閱臺灣文學史，回顧歷來評論家的論述，評論家常因著自身的性別、身分立場、不同的價值信仰等所形成的意識形態、視野以及所處的整個時代氛圍呈現出似乎較單一片面角度、概括性地來定調五〇年代為反共懷鄉文學。長期以來，文學評論亦有著男性中心史觀的偏向，然而在這些年有所突破，有更多的評論，以不同的角度注入，呈現較多面向的觀察，其中是由於有許多女性學者如范銘如、應鳳凰、邱貴芬、張瑞芬、王鈺婷等長年的筆耕研究的結果。然而針對五〇年代文學探討，集中以林海音、琦君等人研究居多，文體方面也是注重在小說文本的分析探討。對於同時代其他女作家關注不多。尤其是以散文為主要寫作的女作家的研究仍顯不足。

以散文為主要創作文類的鍾梅音就屬其中之一，筆者搜尋僅少許有關鍾梅音的評論，依序整理如下：

主掌中國文藝協會大小事務，堪稱是文協的靈魂人物的陳紀滢，發表多部反共小說。並與文友創辦「重光文藝出版社」。鍾梅音的第一本書《冷泉心影》即是 1951 年由重光文藝出版社所出版的。陳紀滢為之寫序。陳紀滢在〈序「冷泉心影」〉中，是這麼說的：

這本「冷泉心影」包括她創作中的一部份散文，內容雖多屬於身邊瑣事，很少直接「反共抗俄」的描寫，乍看來，似乎都與時代無關，其實則篇篇是現實的反映；這裏面沒有甚麼呻吟吶喊，祇有真實感情的流露；這裏面沒有奇特的故事

供人驚異，祇有一些平凡的生活使人人可以體驗；這裏面沒有甚麼深奧理論絞枯了讀者的腦汁，但有香茶醇酒可以使你回味。<sup>30</sup>

在這篇序文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陳紀澄的第一段的文字，紀錄了關於他對於五〇年代台灣文壇上的看法及女性作家群體出現的現象所做的解釋，擷取如下：

民國三十八九兩年，自由中國文壇由荒蕪一片而達到繁枝茂葉。其中最令人喜悅，多少還不免有點驚奇之感的情況，便是女作家之多，並且個個都很堅實活躍。回想三十年來，中國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每一階段都有幾位女作家出現；然而若以時間來論，以質量來論，再沒有比現階段期間這麼短，發現的女作家這麼多和這麼優秀的了。其中原因很複雜，但最重要的原因乃是自由中國有自由寫作環境；大家都有寫作的高昂情緒。我們的女作家替這時代貢獻了她們特別豐富的情感和思想，燦爛了自由中國文學史篇。<sup>31</sup>

首先他認為國民政府遷臺後，自由中國文壇上本是荒蕪一片，而後達到繁枝茂葉。文壇上荒蕪一片，但此現象有其歷史成因，其中由於國民政府遷台後所制定的語言政策及文藝政策，使得許多原活躍於戰前本土臺灣作者在此雙重的排擠下，因而失去了發表的空間。而陳紀澄所認為文壇上的繁枝茂葉，恰恰是後來葉石濤在 1987 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中所說的「五十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為政策的附庸，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sup>32</sup>，葉石濤更控訴「來台的第一代作家包辦了作家、讀者及評論，在出版界樹立了清一色的需給體制，不容許外人插進。」<sup>33</sup>

國府遷臺初期，文壇上令陳紀澄驚喜，甚至驚奇的是他「發現」女作家「群」體出現。就鍾梅音的《冷泉心影》來說，雖然他亦認為內容多是與時代無關的身邊瑣事，可是對其文還是持正面的評價，他認為因為只有在自由中國的自由寫作環境下，才能有這樣如此多優秀的女作家產生的現象。反觀葉石濤對於五〇年代女作家輩出的原因則是認為：「由於時代空氣險惡，動不動就會捲入政治風暴裏去，所以社會性觀點稀少，以家

<sup>30</sup> 陳紀澄，〈序「冷泉心影」〉，《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2。

<sup>31</sup> 陳紀澄，〈序「冷泉心影」〉，《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

<sup>32</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7年10月20日再版），頁88。

<sup>33</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7年10月20日再版），頁86。



庭、男女關係、倫理等為主題的女作家的作品大行其道。」<sup>34</sup>以上這些說法，就如同應鳳凰所言，對照起來，可真是南轅北轍，全然相反的評價。

1951年7月重光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鍾梅音的第一本散文集《冷泉心影》，而文藝理論家趙友培也於同年的7月9日寫了篇〈談散文〉評論了此散文集，後來〈談散文〉收在他的《文藝書簡》中，而這本《文藝書簡》也是由陳紀滢的重光文藝出版社所發行的。如同葉石濤所指控的作者、評者、出版者等都是來台第一代作家包辦了。

趙友培在〈談散文〉中對於鍾梅音所著《冷泉心影》評語為：「鍾著如一鑑清泉……清泉是明澈的，光彩照人；綜觀鍾著，可說是『情文兼顧』，婉約而含蓄，流露著雅人的深致」<sup>35</sup>，然而，他對於鍾梅音著作中，引用了不少成語及古典有些微言，他認為這使得文章讀起來「有時不無隱晦艱澀之感」<sup>36</sup>，關於這點批評，王文漪替鍾梅音寫了些平反文，她說：「鍾梅音素來才思敏捷，讀她後來的作品，倒也很少隱晦的，更感覺她行文敏速。一看她的散文，就知道是一位聰明人寫的；而且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寫的。」<sup>37</sup>

同為女性，王文漪覺得鍾梅音的文章是「行文敏速」，而司徒衛卻覺得快得令人讀起來有些「應接不暇」了。筆者將司徒衛的評語引文如下：

鍾梅音女士對家庭生活裏的形形色色，真是說得淋漓盡致，繪影繪聲；她說得又多，又快，又傳神；在你的眼中便覺得應接不暇，彷彿由於內容太豐富，你聽了後頭又忘了前面的；無法抓住它的中心。因此作者的筆下不但有時顯得「鬆」與「散」；還不免感到她的主題須要經一度摸索，才能發現。<sup>38</sup>

司徒衛在1979年所出版的《五十年代文學評論》評論鍾梅音所寫的《冷泉心影》，倒是對鍾梅音的初期寫作筆法提供了平實的介紹。

近些年來，臺灣文學的討論逐漸呈現多元面向，有一些女性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於男性視角的評論。豐富了文學史觀的樣貌。也對五〇年代女作家的論調爭取再定位的討論，范銘如在〈「我」行我素 六〇年代台灣文學的「小」女聲〉中提出的問題，提供研

<sup>34</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7年10月20日再版），頁86。

<sup>35</sup> 趙友培，〈談散文〉，《文藝書簡》（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52年3月初版），頁88。

<sup>36</sup> 同前註，頁88。

<sup>37</sup> 王文漪編選，〈導言〉，《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台北市：天視出版，1979年8月初版），頁5。

<sup>38</sup> 司徒衛，〈鍾梅音的「冷泉心影」〉，《五十年代文學評論》（成文出版社，1979年7月），頁67。

究者值得思考的面向及觀察點。她提醒這些跟著政府播遷來臺的女性知識分子身分有其複雜性。

這一代的女性知識分子，是在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的教育中成長，接受大陸婦女解放運動以來的觀念，對性別意識自不同以往。<sup>39</sup>

遷臺女性她們來臺後，接觸到的是「殘存著日治極度父權文化的新環境」<sup>40</sup>，以及國民政府為鞏固其地位，而打出的「復興中華」的口號，這表示要走向傳統保守路線。然而遷移來臺的外省族群是不分性別、身分都擁有優勢的嗎？這些遷臺女性，「她們的身分是曖昧的」<sup>41</sup>。遷臺女性的處境不同於男性，生活中更存在著矛盾和困惑。

摘錄張瑞芬於 2006 年出版的《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對於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價進行爬梳整理的一段觀察說：

論五〇年代外省來台女作家及其文學，從較早劉心皇、尹雪曼的負面評價，到近年來王德威、范銘如所執「傷痕新文學」、「台灣新故鄉」說，已然稍稍擺脫「貧弱、蒼白、缺乏社會意識」的窠臼。楊照論五〇、六〇年代，即持平的說：「相對於「反共」、「現代」雙雙走離現實，反而是女作家作品還保留了一點現實的紀錄。」

42

張瑞芬認為近年來學者對於五〇年代外省女作家，已有了不同的角度來觀看及評價她們的作品，她指出當時的外省女作家文章中所刻畫的世界，也不只是臺灣社會的一小角，並不是楊照所說的只集中在都會外省人的圈圈裡。看她們作品所留下的紀錄，有「鍾梅音的蘇澳、徐鍾珮的台北、張淑茵的新竹、艾雯的岡山，在散文文本勾勒了一個外省人來台後四散遷徙的時代樣貌，也忠實的記下一個亂離時代的感情流亡史。」<sup>43</sup>。張誦聖亦批評楊照指出的「五〇年代是反共文學的年代」、「六〇年代是現代文學當道」，其實為一種很不精確的說法<sup>44</sup>，或許應該要再細緻一點地來研究。

<sup>39</sup> 范銘如，〈「我」行我素 六〇年代台灣文學的「小」女聲〉，《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年8月），頁49。

<sup>40</sup> 同前註，頁49。

<sup>41</sup> 同前註，頁49。

<sup>42</sup> 張瑞芬，〈海天歸來——論鍾梅音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2006），頁88。

<sup>43</sup> 張瑞芬，〈海天歸來——論鍾梅音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2006），頁88。

<sup>44</sup> 張誦聖，〈注釋2〉《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臺北市：麥田出版，2000年10月），366頁。

當時許多外省女性跟隨著丈夫配合國家的工作需要遷徙於臺灣各處，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生活當中也自然與當地居民有所接觸及互動，更需要適應海島氣候，親身體驗到臺灣自然地理上又有地震及颱風的震撼教育，然後一點一滴地、一磚一瓦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在反共懷鄉的高分貝下，不少女作家輕巧地把家的座標挪置於台灣。…當她們檢視大陸移民在新舊空間裏彼此關係的微妙變換時，她們也正視到島上不同族群文化的遭逢與衝突。」<sup>45</sup>、「她們書寫的重點在於思量在此重建家園的困境與方法。」<sup>46</sup>因此遷臺女性作家就書寫了許多她們遭遇到臺灣的颱風、地震的震撼感受等地題材。

這些外省族群雖居於主流位置，縱使握有資源，但他們到底是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而且臺灣當地居民經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語言、生活方式思想行為也非常不同於他們，侯如綺提醒：「更重要的是，在異地的日常生活裡，他們才是不被了解的少數。所以我們必須拋棄那個我們視為毫無問題、不需適應的想法，重新去思考第一代外省小說家的作品。<sup>47</sup>」，尤其是外省女性眷屬，作為一家的主婦，在陌生的環境裡，少了家族庇護，以及親友的幫忙，僅能靠自身的力量，積極地面對新挑戰以適應當時所面對的新環境。而鍾梅音更是因為丈夫余伯祺的工作關係，遷到更具挑戰的偏鄉地帶——宜蘭蘇澳。

對於目前討論五〇年代女作家，特別是鍾梅音相關的文獻研究仍偏少。如同張瑞芬所觀察到的：

鍾梅音在女作家群中，是散文質量俱優，卻較被文學史遺忘的一個。她的寫作完全以台灣經驗為起點（與琦君同），在當時是少數以散文為主要創作文類的女作家。三十年間，從《冷泉心影》到《天堂歲月》近二十本，在旅遊散文、專欄雜文和在地寫作上都有創發，甚至也提出過自己的散文寫作觀，相當值得重視與再評價。<sup>48</sup>

張瑞芬認為在 2005 年國立台灣文學館與《文訊》編成《張秀亞全集》十五本後，或許是可以預期五、六〇年代重要作家有重新評價與整理的契機。而在她整理歷來散文家

<sup>45</sup>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 年 8 月），頁 41。

<sup>46</sup>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 年 8 月），頁 15。

<sup>47</sup>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台北：聯經，2014 年 6 月），頁 21。

<sup>48</sup> 張瑞芬，〈海天歸來——論鍾梅音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2006），頁 88。

的資料時，也指出艾雯與鍾梅音是文本散佚較嚴重的女作家<sup>49</sup>。

所幸艾雯文本已隨著《艾雯全集》的發行而得到了整理及保存。2011年《文訊》接受作家家屬委託進行《艾雯全集》的編輯及印刷工作，並於隔年出版十大鉅冊的《艾雯全集》。或許不久的將來也可期望鍾梅音作品全集的問世。

## 二、相關學位論文

綜合觀察前人研究鍾梅音相關的學位論文，多聚焦於鍾梅音生平研究，散文風格，文學地位再審視，及其遊記散文的分析及對於女性旅遊書寫的影響。舉例如下：

(1)、張詩怡，《反共文學之外的另類書寫——以五、六〇年代三位女作家為分析對象》<sup>50</sup>：

將徐鍾珮、潘人木、鍾梅音三位女作家分別梳理後，而後合併研究，理出三個共同點，包括寫作發表皆起始於臺；將情感投注於當下，寫作在地化，透露出對於本省居民的關懷及冀望族群和諧共處；三人的異地書寫突破反共懷鄉文學的侷限。潘人木以小說創作聞名，但亦在兒童文學界耕耘十多年，為兒童讀物編寫可說貢獻不小。徐鍾珮精煉的文字處理亦表現於她的散文創作上，而鍾梅音的文章將其臺灣生活細節親切地描繪出來。論者關照女作家在反共框架外屬於個人的獨特另類書寫，並試圖以新的角度來賦予女作家的正面時代意義。

(2)、王彥玲，《鍾梅音散文題材研究》<sup>51</sup>：

將鍾梅音生平及寫作題材做各方面的探討，並歸納出其題材內容有對於過去的緬懷、居家生活的有趣記實、抗病精神、對子女之愛及時事的見解等。研究者期待對於鍾梅音以往刻板既定的文學地位能得到修正。

---

<sup>49</sup> 張瑞芬，〈三生花草夢蘇州——論艾雯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2006），頁107。

<sup>50</sup> 張詩怡，《反共文學之外的另類書寫——以五、六〇年代三位女作家為分析對象》（台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sup>51</sup> 王彥玲，《鍾梅音散文題材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6月）。

(3)、邱吉汝，《鍾梅音及其散文之研究》<sup>52</sup>：

研究鍾梅音生平經歷，寫作生涯的整理，探討其散文作品的主題內容並分析散文藝術上的表現。

(4)、李雅情，《徐鍾珮、鍾梅音遊記散文研究》<sup>53</sup>：

探討徐鍾珮和鍾梅音的遊記散文的時代意義和文學地位，將徐鍾珮和鍾梅音的生平背景及創作分別梳理，再將兩作者遊記書寫合併研究，整理出臺灣及海外遊記的書寫差異性，兩人對台灣觀看的角度不同，個性、文風不同。海外遊記中的主張及思維因著身分的不同，觀看的角度亦不同。徐鍾珮以記者敏銳的角度，中心筆調書寫；鍾梅音多是觸景抒懷，遊記中圖文並茂，視覺效果好。而兩人的遊記表現亦不同於男性作者的觀點。將兩人定位為台灣女性文學史上的女性旅遊散文的一個重要源頭。

(5)、許婉婷，《五〇年代女作家的異鄉書寫——林海音、徐鍾珮、鍾梅音、張漱菡與艾雯》<sup>54</sup>：

分析五〇年代遷臺女作家時而呼應官方文藝政策，時而疏離的現象，本以異鄉人的心境觀看臺灣，但隨著時空轉移書寫心態已轉變為在地化的臺灣經驗。

以上學者專家的研究、評論，以及著作，加上研究者的學術論文，對筆者在了解五〇年代的時代背景，作者生平及作品，女性書寫特色，當時官方文藝政策傾向，文學史對於五〇年代的作品定位及翻案研究等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助益，然而，筆者發現過往論者討論的焦點常放在鍾梅音是否為反共文學作者，及題材內容的整理等，多為小篇幅的舉例，作為同時代作家比較性的研究。本論文將以前人研究作為基礎，並嘗試藉由鍾梅音的文本全面閱讀整理來研究觀察，鍾梅音的生命圖像、感情思想、在動蕩不安的年代中，加上飽受宿疾之苦的女性，從原本僅是打算暫居臺灣，而後演變成久住此地，如何重建家庭，從而適應異鄉變為故鄉。在寫作方面，為何女性書寫有著時而回應官方文

<sup>52</sup> 邱吉汝，《鍾梅音及其散文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7月）。

<sup>53</sup> 李雅情，《徐鍾珮、鍾梅音遊記散文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sup>54</sup> 許婉婷，《五〇年代女作家的異鄉寫作——林海音、徐鍾珮、鍾梅音、張漱菡與艾雯》（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12月）。

藝政策，又有時而疏離的現象，並試圖開發鍾梅音在文學史上的不同角度的評價及關注，期能延伸五〇年代女性文學的研究篇幅及增加能見度。

###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與目的

#### 一、研究範圍及出版作品整理

本論文以鍾梅音出版作品中書寫自大陸遷移後在臺灣生活時期的散文集為研究範圍，筆者所關注及探討的焦點為：鍾梅音從大陸遷移而後在臺生活中家庭重建與適應。鍾梅音的海外遊記部分已有研究者聚焦討論過，因此《海天遊蹤》等遊記散文、短篇小說集《遲開的茉莉》及兒童文學、翻譯不在本論文探討處理範圍當中。擬透過已出版的散文集中的文本整理分析，從題材內容探討鍾梅音的生命歷程、感情思想、在戰亂頻繁的年代中，遠離親屬故園的依靠，女性面臨家庭重建的挑戰與調整及適應。而鍾梅音散文集散佚情形，多虧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了關於鍾梅音研究資料彙編的工具書，加上幸在網路科技時代尚得以解決，鍾梅音所出版的作品，除了三民書局版仍有販售之外，從各地圖書館藏書及電子檔案和二手書店中，欣得搜集來 18 本散文集，1 本短篇小說集，共 19 本。

鍾梅音自 1948 年 3 月 1 日來臺，到 1969 年 5 月移居泰國曼谷，在臺灣居住長達 21 年之久，她在《風樓隨筆》正文前的〈前記〉特別做了她在臺灣寫作生涯的回顧，引文如下：

我從未立志做一位作家，但在臺灣的二十年中，最初由於遣興，以後又為現實所迫，先後寫過文章不下百餘萬字，雖然自律甚嚴，不合意的仍然很多。除了「海天遊蹤」、「我從白象王國來」、「黃友棣藝術歌曲選」版權屬我，交大中國圖書公司總發行外，三民書局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已把我在臺灣期間所寫的散文全部搜括了去，「風樓隨筆」是最後一本——已出版的有「摘星文選」、「我祇追求一個圓」、「夢與希望」總共四本，都曾經我親自淘汰，親自校對，我所承認的，也只有這些版本，不敢說全無謬誤，不敢說都值得為它們浪費時間，但已盡了我的力

量。<sup>55</sup>

本論文聚焦在鍾梅音從留台到移民的心境轉折及在臺灣期間種種的適應問題，因此鍾梅音在臺書寫的 10 本散文集為筆者特別關注的所在，而作者第一本創作應是需要留心研究的，筆者將鍾梅音第一本散文集 1951 年 7 月《冷泉心影》各篇篇名、內容概述，以及搜尋關鍵字一覽表，附於本論文的附錄 1，除此之外，《冷泉心影》後，鍾梅音在臺書寫及出版的另 9 本散文集及其各篇名，附於附錄 2，包括：1954 年 4 月《母親的憶念》、1954 年 11 月《海濱隨筆》、1958 年 6 月《小樓聽雨集》、1964 年 2 月《塞上行》、1964 年 4 月《十月小陽春》、1967 年 1 月《摘星文選》、1968 年 2 月《我祇追求一個「圓」》、1969 年 2 月《夢與希望》、1969 年 8 月《風樓隨筆》。

鍾梅音在臺期間 1948 年至 1969 年，出版的唯一短篇小說集 1957 年 12 月《遲開的茉莉》，共收錄 10 篇，各篇篇名附於附錄 3。1964 年，鍾梅音因隨丈夫業務考察，而得以環球旅行 80 日，鍾梅音將此趟旅遊所見、所聞、所得作為寫作的素材，發表刊於《中央日報》、《聯合報》、《徵信新聞報》等副刊，鍾梅音得知她所寫的文章很受歡迎，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期間，有很多海內外讀者來信關心這些遊記散文是否刊行專集，她感到相當振奮及感謝，因而決定由自己刊印長達二十五萬字，附上三十多張全頁的彩色圖片，也作為她與余伯祺先生的銀婚紀念，因此，筆者也將鍾梅音重要代表作之一《海天遊蹤》二集，共收錄 51 篇，各篇篇名附於附錄 4。

以下將參考鍾梅音的作品包括散文集、短篇小說集，以及張瑞芬所著的《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sup>56</sup>，還有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由王鈺婷所編選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sup>57</sup>等資料，依鍾梅音的居所遷移及作品出版時序，將鍾梅音作品集文本大要及其主要版本略述如下：

1948 年 3 月，鍾梅音隨夫婿余伯祺，從大陸渡海遷到臺灣基隆，在基隆住了 1 年後，因余伯祺出任臺灣肥料公司蘇澳廠長，1949 年 3 月隨夫遷居宜蘭蘇澳，在那兒住了 6 年，居住蘇澳期間出版了 3 本散文集，1951 年的《冷泉心影》、以及 1954 年《母親的憶念》和 1954 年出版的《海濱隨筆》。

<sup>55</sup> 鍾梅音，〈前言〉，《風樓隨筆》（臺北市：三民書局，1978 年 7 月三版），頁 2。

<sup>56</sup> 張瑞芬著，《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臺北市：麥田出版，2007 年 4 月初版）

<sup>57</sup> 王鈺婷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 年 12 月）

一、《冷泉心影》：1951年7月由重光文藝出版社印行出版。《冷泉心影》是鍾梅音以臺灣為起點所創作的第一部作品集，以親切細膩地筆法描繪出其在臺灣蘇澳的鄉居恬靜生活，展現出因戰亂流離至臺灣重建起新家園又思故鄉情切的複雜心境。收錄包括1949年於《中央日報》「婦女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散文〈雞的故事〉至1951年間所寫的人物憶往、日常所感等30篇文章，正文前有重光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言〉、陳紀澄先生序〈序「冷泉心影」〉、作者鍾梅音〈自序〉。

1954年重光文藝再版，正文與1951年重光文藝版同。正文前刪去〈出版小言〉、〈自序〉，新增鍾梅音〈再版後記〉。

1962年重光文藝再印行，正文與1951年重光文藝版同。正文前刪去〈出版小言〉。

二、《母親的憶念》：1954年4月由復興書局發行。選錄作者於1950至1953年間，發表於《暢流》半月刊、《中央日報》副刊、《中國一周》、《中華日報》文藝版等報章文藝刊物上的生活感思、遊記及人物憶念等26篇文章。正文前附有蘇雪林先生序〈寫在「母親的憶念」前面〉。正文後有〈作者附記〉。鍾梅音亦參與封面的設計。

三、《海濱隨筆》：1954年11月大華晚報社發行。選輯鍾梅音於1949至1954年間發表於《大華晚報》副刊、《新生報》副刊、《中華日報》副刊、《中央日報》副刊、《藝與文》月刊等96篇文章。正文前附有鍾梅音所寫的詩「怎能忘却，那海濱之夜？窗外是斜風細雨，更捲起晚來潮聲。……」〈海濱之夜（代序）〉。多篇文章如〈女人與高等教育〉、〈統統滾開〉、〈勞軍〉、〈論宣傳〉、〈再論宣傳〉、〈關於喊口號〉、〈我是毛澤東的女秘書〉、〈我看傻常順兒〉、〈談今後的女子教育〉、〈賢妻良母需要智慧〉、〈木瓜之喻〉等作者針對時事提出自身的看法，反應其政治的立場和對於時局的批判。

1955年余伯祺調職到臺北，在臺肥總公司任業務處長，鍾梅音於1955年4月從宜蘭蘇澳遷居至臺北後，1957年出版了她唯一的一本短篇小說集《遲開的茉莉》，以及1958年出版了《小樓聽雨集》。



四、《遲開的茉莉》：1957年12月由三民書局出版。鍾梅音唯一的短篇小說集。全書收錄〈好日子〉、〈路〉、〈湯餅會〉、〈新生南路的憂鬱〉、〈邱比特的箭鏃〉、〈失去的婚禮〉、〈玫瑰的傳奇〉、〈玩具的糾紛〉、〈遲開的茉莉〉、〈完〉共十篇鍾梅音發表於《文藝春秋》、《中華副刊》、《自由中國》、《今日婦女》，以及香港的《祖國周刊》等刊物上的小說作品。正文前有羅家倫以毛筆書寫的〈序言〉。正文後附上作者〈後記〉，提及發表於《文藝春秋》的第一篇小說作品〈路〉是以「令怡」的筆名發表的心路歷程。

1959年8月三民書局再版。正文與1957年三民書局版同。正文後新增鍾梅音〈小說創作話艱辛（再版後記）〉。

2008年1月三民書局再版。正文與1957年三民書局版同。正文前新增三民書局編輯部〈再版說明〉。三民書局編輯部〈再版說明〉內介紹《遲開的茉莉》這本小說貫徹著鍾梅音終生秉持的純善信念，並且在《遲開的茉莉》中寫出人性的不安與弱點，同時也自中淬鍊出世代不移的人性光輝，療癒失望、孤寂的傷口<sup>58</sup>。正文後新增鍾梅音〈小說創作話艱辛（再版後記）〉。

五、《小樓聽雨集》：1958年6月由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發行。選錄作者1954年下半年以來至1958年間發表的讀書心得、藝術鑑賞及若干寫作理論等44篇文章。全書分三輯。第一輯屬於純散文，第二輯屬於隨筆，第三輯則是說理的散文。正文前有鍾梅音〈自序〉，文中細數從1949年發表第一篇〈雞的故事〉之到1958年已將跨入第十個年頭，其間，曾出版三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而《小樓聽雨集》則是第四本散文集，鍾梅音在整理作品的過程中，發現她更愛自己的散文，於是決定將其之後的歲月，完全獻給散文。

在臺北住了四年後，鍾梅音於1959年6月遷居高雄，在高雄大約住了兩年後，1961年又遷回臺北，在臺北期間，於1964年出版了《塞上行》，以及《十月小陽春》兩本散文集。

<sup>58</sup> 三民書局編輯部，〈再版說明〉，《遲開的茉莉》（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1月四版一刷），頁1~2。

六、《塞上行》：1964年2月由光啟出版社出版。大多收錄作者1958年至1963年間的文章，如1959年11月病後所寫的〈送病文〉、以及故事實際發生於〈送病文〉的一年前甚至兩年前於住院期間短短幾天看盡人間冷暖悲歡，鍾梅音述說自己當時連落筆的勇氣都沒有，而一年後才在《文壇》主編穆中南先生的逼稿下<sup>59</sup>，於1960年10月寫的〈啼笑人間〉等，亦收錄早些年的溫馨親子情之作，包括1952年〈小灝的日記〉九篇、1955年〈孩子不會永遠幼小〉一篇。全書分三輯，分別為散文、隨筆、遊記，共35篇。正文目錄前有鍾梅音1961年冬攝於日月潭的彩色獨照。目錄後正文前附四張黑白照，紀錄了鍾梅音於1963年8月18日隨中華合唱團與示範樂隊赴金門，鍾梅音以「金門頌」歌詞作者身份，將該曲呈獻於前方將士並於演唱前致詞之照以及鍾梅音施放心戰汽球的歷史影像。

七、《十月小陽春》：1964年4月由文星書店出版。收錄部分舊作，如〈木瓜之喻〉、〈談今後女子教育〉、〈珍妮畫像〉、〈悔罪女〉等。及幾篇近作、書評、隨筆及憶舊等40篇。其中1964年3月27日發表的〈電視與我〉中交代了鍾梅音參與半年主持兼管製作臺灣電視公司「藝文夜談」節目的工作始末。正文前有鍾梅音所寫的〈自序〉。正文後有蕭孟能〈「文星叢刊」出版緣起〉。

1970年12月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正文與1964年文星書店版同。正文後刪去〈「文星叢刊」出版緣起〉。

1964年6月24日至9月2日，鍾梅音隨丈夫業務出國，而有了環遊世界80日的機會，並因此遊歷得以在1966年出版《海天遊蹤》(二集)，以及1967年出版《摘星文選》。後來，鍾梅音又應三民書局邀請於1968年出版《我祇追求一個圓》、以及1969年的《夢與希望》。

八、《海天遊蹤》(二集)：1966年4月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鍾梅音在〈逆水行舟〉文中提及這段為期八十天的環球旅行「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下旬，我得到機會作環球旅行，

---

<sup>59</sup> 鍾梅音，〈內心的聲音——兼序《啼笑人間》〉，《啼笑人間》(臺北市：皇冠出版社，1977年5月)，頁10。

八十天裏經過二十幾個城市，時間迫促，行色匆忙，沿途只能作簡單的日記，一面搜集資料陸續打包寄回家中。可是對於自己歸來之後能否寫出一些有份量的作品，當時並無信心。」<sup>60</sup>、「我的遊記是倒回去寫的，美國倦遊，心力已成強弩之末，歸來之後的生活又忙忙亂亂，雖然我沒有一篇文章不是用心寫的，可是第一集裏有幾篇文章確比第二集粗疏，結構既成，使後來付印之前的增刪也沒生色。」<sup>61</sup>鍾梅音 1964 年環球旅行 80 日，紀錄其旅途中所見所聞並對照本國文化差異和省思。第一集收錄 24 篇文章，附上 20 張精美圖片。正文前有作者〈序〉。第二集則收錄 27 篇文章，亦附上 20 張精美圖片。正文前有梁容若〈梁容若教授序〉。

1967 年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再版。正文與 1966 年出版同。第一集正文後新增鍾梅音〈再版後記〉。第二集則刪去原正文前〈梁容若教授序〉。

九、《摘星文選》：1967 年 1 月由三民書局出版。鍾梅音在 1966 年 12 月〈逆水行舟〉說明《摘星文選》有小品以及關於藝術欣賞的文章，引文如下：

這裏面有一部份是小品專欄，原以筆名「綠詩」刊於大華晚報，都是千字左右一篇，不長不短，可以談國家大事，但不必道貌岸然，否則就成了社論。（其實依我看社論也不必道貌岸然，才使讀者樂於接受。而這種小品應當更隨便一點，因它又名「隨筆」。）也可以談身旁瑣事，但不能只寫瑣事本身，否則很不得體。因為這種文字是副刊之首，瑣事屬於個人私事，汗衫綴上珍珠也可以成爲很美的藝術品，但幾曾見人把它當禮服穿呢？……「摘星文選」中還有一部份關於藝術欣賞的文字，嚴格說來，藝術欣賞不是文學，正如若干遊記不能稱之爲文學一樣，問題在看你怎麼寫法。事實上構成散文價值的是意境和韻律，風格與文彩，不是內容。……遊記文字由於本身的性質，與「知識性」更是不可分的，問題是也不能把它寫成地理課本。<sup>62</sup>

鍾梅音在此文中提出了她對於散文寫作的看法與價值所在，並且說明她認為刊於大華晚報的小品專欄文章，屬於隨筆，要能言之有物：

<sup>60</sup> 鍾梅音，〈逆水行舟〉，《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02。

<sup>61</sup> 鍾梅音，〈逆水行舟〉，《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02~103。

<sup>62</sup> 鍾梅音，〈逆水行舟〉，《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04~105。

大英百科全書曾為散文與隨筆下定義，關於散文（Prose）是「不理睬韻文規則，書寫而成的平實的人類語言。」關於隨筆（Essay）是「應為經驗與深思的果實，簡短而輕巧。」我想這種專欄應當屬於後者，既然其重點在「經驗與深思的果實」，如能言之有物，雋永有味，像這種短小精悍的文體對於作者倒是很好的磨練。<sup>63</sup>

《摘星文選》收錄鍾梅音於 1964 年至 1966 年間所寫的文章，包括部份刊於大華晚報小品專欄的文章等，以及正文前鍾梅音 1966 年 10 月所寫的一篇〈耳朵、素描、及其他——代序〉，加上 1959 年的舊作〈赴馬祖途中〉，共 40 篇。〈耳朵、素描、及其他——代序〉文中說明其為了寫《海天遊蹤》所要做的準備功夫，即必須先從雕刻小貓小狗練起，像達文西似的，在他成就大作前，也必須先從素描畫耳朵畫胳膊開始，而這本《摘星文選》部分作品就是鍾梅音為了磨練筆尖而做的文章。

1968 年 2 月，鍾梅音攜小白羊余令恬赴泰國曼谷，與丈夫余伯祺共度春節。在泰國曼谷的鍾梅音寫了〈神秘的礦藏——《我祇追求一個圓》代序〉中提到她與女兒的這趟旅程：

臘鼓頻催，學校也接着放了寒假。人到中年，對於春節的興致一年比一年淡漠，偏偏這個春節一家四口分了三處，就更提不起點綴的興致了。然而不點綴又如何呢？我個人倒無所謂，一卷在手，地濶天寬，只是愧對我那正該享受歡樂童年的小女兒，我不知為她做些甚麼是好。臺北的冬季最難將息，風風雨雨地彷彿離別的日子更長了，我忽然想——何不趁寒假帶小女兒去與外子團聚？既可共度佳節，又可避開那又冷又濕的連陰天。<sup>64</sup>

余令恬寒假旅遊曼谷寫下日記，鍾梅音改寫女兒的日記後，與余令恬合著兒童文學《我從白象王國來》，1968 年 5 月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

十、《我祇追求一個圓》：1968 年 2 月由三民書局出版。《我祇追求一個圓》是繼《摘星文選》出版後，應三民書局之邀再整理的一本散文集。鍾梅音在〈神秘的礦藏（代序）〉

<sup>63</sup> 同前註，頁 104~105。

<sup>64</sup> 鍾梅音，〈神秘的礦藏——代序〉，《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 年 2 月），頁 1~2。

文中說明了此散文集書名的意義：

書名「我只追求一個『圓』」，是篇生活小品的題目，也是我對人生哲學所懸的目標。真感謝那些不介意我疏慢的朋友，近年爲了耽於讀書，在我生活裏已經沒有「串門」這回事，可是任何時我需要幫助，她們立即支援，這是非常的器度，非常的友誼。<sup>65</sup>

《我祇追求一個圓》此散文集收錄包括〈禮帽下的兔子〉、〈逆水行舟〉等寫作心得、講稿、遊記、讀書隨筆、繪畫欣賞、以及生活小品等 31 篇文章。正文前有鍾梅音寫於泰國曼谷的〈神秘的礦藏（代序）〉。

十一、《夢與希望》：1969 年 2 月由三民書局印行。此散文集選錄鍾梅音 1949 年至 1968 年間偏重寫景的文字與遊記類的文章，提供給有興趣寫遊記的讀者作為參考，加上幾篇訪問前線的珍貴紀錄，包括〈鄉居閑情〉、〈冷泉〉、〈礁溪半日〉、〈滇西憶舊〉、〈蘇花之旅〉、〈福隆之遊〉、〈南遊瑣憶〉、〈臺灣橫貫公路一瞥〉、〈七寶樓臺棲蘭山〉、〈板橋之春〉、〈接受金門炮火洗禮〉、〈戰雲瀰漫訪馬祖〉、〈塞上行〉、〈金門二度行〉等 28 篇。除了〈夢與希望〉及〈「夢與希望」後記〉，皆為舊作。正文後有鍾梅音〈「夢與希望」後記〉。

鍾梅音於 1948 年 3 月來臺，在臺灣居住了 21 年後，1969 年 5 月又因丈夫余伯祺工作的關係，遷居泰國曼谷，而當時正計畫出版《風樓隨筆》，鍾梅音此散文集的校對工作，則一路由臺北校到曼谷，才於 1969 年 8 月得以出版。鍾梅音居住在泰國期間，仍於《中央日報》副刊專欄「蘭苑隨筆」發表文章，後來在 1971 年 6 月由三民書局出版《蘭苑隨筆》。

十二、《風樓隨筆》：1969 年 8 月三民書局所出版。適逢作者遷居曼谷之際，選輯之前所著的隨筆小品文，包括若干舊作，內容有談藝術，如 1963 年〈歡樂童年——韓國兒童畫展觀後〉；談教育，如 1951 年〈談今後的女子教育〉、1952 年〈漫談健康與教育〉，甚至 1962 年〈談「吃」〉，還有 1960 年到 1963 年期間寫給女兒的十封信，加上 1968 年到 1969

<sup>65</sup> 鍾梅音，〈神秘的礦藏——代序〉，《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 年 2 月），頁 4。

年的幾篇近作，如 1968 年〈戀愛與結婚〉、〈我看婚姻制度〉、〈永恆的目標〉，1969 年〈論華嚴女士「智慧的燈」〉、〈女明星爲甚麼要自殺〉、〈顧曲餘談〉等，舊作加新作，共 25 篇文章。正文前有鍾梅音〈前記〉。

1968 年 9 月，臺灣省教育廳出版了鍾梅音一本兒童文學《到巴黎去玩兒》。1969 年 11 月，臺灣省教育廳出版了鍾梅音的童詩創作《不知名的鳥兒》。1970 年 2 月，臺灣省教育廳再出版了一本鍾梅音的兒童文學《燈》。

十三、《蘭苑隨筆》：1971 年 6 月亦由三民書局出版。本書收錄鍾梅音 1969 年 5 月移居泰國後，於《中央日報》副刊「蘭苑隨筆」等所發表的文章，內容關於作者旅居泰國期間介紹屬於東南亞地區的文化、歷史、風俗民情等，加上作者近期與朋友們所談內容的所思所感文等共 20 篇。

2005 年 1 月三民書局再版，正文前新增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新版說明〉。

在泰國住了兩年多後，1971 年 8 月，再遷居新加坡，在新加坡期間，1971 年 10 月，鍾梅音的兒童文學《泰國見聞》又由臺灣省教育廳出版。這裡筆者想要稍微整理鍾梅音兒童文學相關著作。

1968 年，余伯祺因工作關係，人在泰國，2 月，鍾梅音次女余令恬學校放寒假，她便帶著女兒赴泰國曼谷與丈夫共度春節。余令恬將此趟寒假旅遊曼谷寫下日記，經鍾梅音改寫後，鍾梅音與余令恬合著兒童文學《我從白象王國來》，版權歸鍾梅音所有，1968 年 5 月交由大中國圖書公司總發行。臺灣省教育廳曾於 1965 年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推動「兒童讀物出版計畫」，由臺灣書店出版《中華兒童叢書》，供全國國小學童閱讀。<sup>66</sup>這或許需要提到主編潘人木了，林海音在〈潘人木／筆的兩端〉一文中，是這麼說的：

民國五十四年她受聘爲教育廳中華兒童叢書的主編工作，直到去年才退休。十六年下來，她的筆趨向另一端，爲中華兒童叢書編了四百多本各年級的課外讀物，

---

<sup>66</sup> 謝文瑄，〈搶救中華兒童叢書 盼設典藏館〉，《中時電子報》，2013 年 7 月 30 日。  
網路資料：<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730000553-260107>（查詢日期：2019 年 2 月 10 日）

又籌畫出版中華民國第一套中華兒童百科全書，這是個大計畫，她離開時已經出到第六冊。<sup>67</sup>

林海音在此文說明了以二十萬言長篇小說《蓮漪表妹》作者潘人木，認真投入兒童讀物編輯的另一面貌。1965 年到 1981 年潘人木任職於臺灣省教育廳兒童讀物編纂小組編輯、總編輯，主編的《中華兒童叢書》，事實上鍾梅音也曾貢獻了她的一份心意，1968 年 9 月臺灣省教育廳出版鍾梅音所著的《到巴黎去玩兒》就是《中華兒童叢書·文學類 41053》，而後 1969 年 11 月《不知名的鳥兒》收錄鍾梅音的童詩創作，為《中華兒童叢書·文學類 41073》，1970 年 2 月《路》為《中華兒童叢書·文學類》，還有一本鍾梅音改寫《昨日在湄江》中的部份文章作的《泰國見聞》為《中華兒童叢書·文學類 51082》。據應鳳凰的資料，引用如下：

對於兒童文學的編輯及創作，潘人木以一顆嚴謹的心看待之，從來不敢輕忽怠慢，兒童是未來的棟梁，一位曾經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編寫兒童讀物的孟羅李夫來台演講時曾說：「看一個國家的兒童讀物出版情形，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未來。」因此一本好的兒童讀物是十分重要的<sup>68</sup>

戰後遷臺女性，不但從事創作，如潘人木以小說著名，而鍾梅音則出版了多達 18 本散文集，然而，我們也可以從她們努力從事兒童讀物，不管是編輯或是撰寫，都再再證明女性關心兒童，關心著國家的未來，因此她們努力地為未來主任翁貢獻其力。潘人木以嚴謹的態度來主編《中華兒童叢書》，而鍾梅音則為此套叢書貢獻了 4 本兒童讀物。

接著再回到鍾梅音作品集文本大要及其主要版本略述，1972 年，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了《啼笑人間》。1973 年 3 月又由三民書局出版《春天是你們的》。1973 年 8 月，由大地出版社出版《旅人的故事》。1975 年 8 月，由香港立兩公司發行出版《昨日在湄江》。

十四、《啼笑人間》：1972 年香港小草出版社發行。選自作者 1951 年至 1964 年間舊著新編及 1971 年近作共 36 篇。《啼笑人間》正文前有鍾梅音〈內心的聲音——兼序《啼笑人

<sup>67</sup> 林海音，〈潘人木／筆的兩端〉，《剪影話文壇》（臺北市：遊目族文化出版，2000 年 5 月初版），頁 68～69。

<sup>68</sup> 應鳳凰，〈潘人木—蓮漪哀樂，馬蘭如夢〉，《文學風華—戰後初期 13 著名女作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 5 月一版），頁 86。

間》》，文中提及舊作版權回收的緣由：

直到有一天，也許那就是『聽見了屬於自己內心的聲音』，或是『第六感終於來了』。我忽然想起離開台灣時，曾帶着幾本已經絕版的拙著如『塞上行』、『小樓聽雨集』、『海濱隨筆』、『十月小陽春』等。除了『十月小陽春』是因文星書店倒閉而絕版之外，其餘都是自己收回版權不願再發行的，因我發現有些篇章還要再淘汰一次。當時曾『立志』要把它們重新整理一番，不料在泰國兩年詩一般的歲月裏，竟把這件大事忘了個乾淨。<sup>69</sup>

鍾梅音當時僑居新加坡，接到香港小草叢刊出版社來信邀稿，把自己從台灣帶來的絕版舊作，再整理新編，全書分上下兩輯，上輯選自《中央日報》婦女版與《大華》副刊寫的專欄文章，及若干書評、畫評等，下輯則選了舊作，如1952年〈醫手記〉、1956年〈吾家右鄰〉、1958年〈勝利者〉、1959年〈送病文〉、1963年〈自求多福〉、1960年〈啼笑人間〉、1964年〈電視與我〉，以及近作，如1972年〈『亂世佳人』〉、〈海隅漫筆〉，上輯27篇，加下輯9篇，共36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內心的聲音——兼序《啼笑人間》〉。1975年香港半島書樓再版，正文與1972年小草版同。1977年皇冠出版社再版，正文與1972年小草版同。

十五、《春天是你們的》：1973年3月由三民書局出版。本書選自作者1951年至1972年間作品。整理舊作，選輯親子關係，特別是兒子相關的散文，紀錄兒子童年時期至赴美取得碩士學位使母親感到滿足的驕傲。此散文集的〈序〉文中，鍾梅音自述寫了許多論書評畫，以及生活小品，寫作最方便的題材即是她的丈夫兒女，但隨著兒女長成，她期許自己往後該把眼界放寬，多關心一些如生態、人口政策等大問題。

正文前有鍾梅音1972年12月於新加坡寫的〈序〉，文中提到三民書局出版了她五本散文集，經她仔細讀過後，發現自己寫有關女兒的文章怎麼比寫兒子的多了許多，她說：

我嘗試過許多文體，其中以散文、小品、遊記，寫得較多。除了遊記，前二者幾乎全部交給了三民文庫，已經出版過五本：「摘星文選」「我祇追求一個圓」「夢與

<sup>69</sup> 鍾梅音，〈內心的聲音——兼序《啼笑人間》〉，《啼笑人間》（臺北市：皇冠出版社，1977年5月），頁9。



希望」「風樓隨筆」「蘭苑隨筆」。……散文小品除了論書評畫，其題材不外是生活，所以又有人創了一個新名詞叫「生活小品」。……我最方便的題材也是丈夫兒女，但又如何會有「重女輕男」之嫌？這才想起，我遺忘了一大批舊稿不曾整理，於是又有這第六本「春天是你們的」之印行<sup>70</sup>

鍾梅音便將許多以兒子為題材的舊作整理收錄在這本《春天是你們的》，由三民書局出版的第6本散文集，以兒子小灝為題材的文章如：1968年〈春天是你們的〉寫賀兒子取得碩士學位，以及更早前的舊作包括1952年〈小灝的日記〉、1951年〈某夜〉寫丈夫出差的一個停電的夜晚，鍾梅音給兒子講了個床邊故事1952年〈兒童夏令營〉寫暑假到來，招待兒子小灝的朋友、1953年兒子與鍾梅音的〈養鼠記〉、1953年〈母子之間〉寫管教孩子得導引得當等。

《春天是你們的》全書收錄1951年到1968年間在臺期間所寫的18篇舊作，以及1972年間在新加坡所寫的3篇新作，此散文集舊作加新作，共21篇文章。

在臺期間舊作，包括1968年〈春天是你們的〉、1952年〈小灝的日記〉、1951年〈某夜〉、1952年〈兒童夏令營〉、1953年〈養鼠記〉、1952年〈阿土哥〉、1952年〈年終獎金〉、1951年〈畫像記〉、1952年〈母子之間〉、1954年〈小鎮溫情〉、1956年〈哀瓊尼〉、1956年〈玩具的糾紛〉、1963年〈過河卒子〉、1962年〈我的中學生活〉、1965年〈搬家〉、1965年〈第七次搬家〉、1965年〈新居試筆〉、1967年〈阿玉〉。

在新加坡期間，1972年間3篇新作，包括9月〈早飛的小鳥〉寫17歲的女兒獲得美國一所學校的獎學金，鍾梅音高興之餘，難免捨不得女兒的心情；10月〈生態二題〉寫的則是關心生態平衡、新加坡提倡節育的情況，海水與空氣的污染的問題，有關生態環境以及人口政策方面等重要議題、11月寫的〈看花與種花〉寫的是在新加坡的生活情趣，鍾梅音認為此篇文章恰好表現在孩子長大離開她身邊後，她終於平靜下來的心境，屬言志之作。

<sup>70</sup> 鍾梅音，〈序〉，《春天是你們的》（臺北市：三民書局，1985年10月初版四刷），頁1~2。

十六、《旅人的故事》：1973年8月由大地出版社出版。本書是作者繼《海天遊蹤》後，1972年4月到6月間，再度遊歷歐、美國家歸來後所寫的遊記。全書收錄〈生命是可愛的謎〉、〈萬里浮雲的銀夜〉、〈林肯的身旁瑣事〉、〈另一個愛子基督〉、〈民族音樂拓荒者〉、〈你覺得好些了嗎〉、〈恬淡平凡的偉人〉等56篇，附上精美圖片共33張。正文後有作者於1973年於新加坡為本書所著的〈跋〉文，在〈跋〉文中，鍾梅音書寫了她對祖國的期許，以及她已把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的臺灣視為第二故鄉，她說：

離開臺灣忽已整整四年，在這期間，祖國經過許多驚濤駭浪，在外的遊子也備嘗受人歧視的苦痛。這種痛苦越深，越盼自己的國家能夠有頭有臉地站起來。……願我的祖國能先為下一代謀福利，從政績上去贏得朋友們的尊敬。現在謹以這本小書獻給我住過廿年之久的第二故鄉臺灣，以及曾經培植我的祖國。<sup>71</sup>

1979年大地出版社再版，正文與1973年同。正文前新增作者〈痛苦的昇華——三版綴語〉。

十七、《昨日在湄江》：1975年8月由香港立兩公司出版。本書出版時，鍾梅音已離開泰國將近四年，旅居新加坡。在《昨日在湄江》前文的序文中，交代了此書出版的緣由，鍾梅音表示她很喜愛泰國，雖然她已寫了30篇跟泰國相關的文章，但還期待在好好描繪這微笑的國度，於是離開泰國前，搜集了許多資料，包括民間故事與詩集，以及泰國的古典文學家的一些著作。然而，她遷居新加坡後的頭兩年，她兩度赴美遊歐，又應出版社之邀寫了《旅人的故事》，並刊行了兩本散文集《啼笑人間》及《春天是你們的》，耗盡氣力。本已無心從事原本計畫的寫作，將心思轉往翻譯工作與繪畫上，但小草出版社棄而不捨地向鍾梅音邀稿，感動了她，促使她將原本擱置在一旁有關泰國的資料，又翻了出來，這本《昨日在湄江》才得以出版。鍾梅音參考了那些搜集來的關於東南亞歷史、地理資料等，以及民間故事與詩集來撰寫泰國和新加坡的語言、歷史故事、風土民情以及和華人相關的連結等。鍾梅音並將多篇文章發表於《聯合報》第12版「昨日在湄江」專欄上。全書分兩輯，收錄〈兩首小詩〉、〈從「做工」談起〉、〈「吃」在新加坡〉、〈客家人〉、〈無言之美〉、〈看人受罪〉、〈在曼谷過年〉、〈曼谷的雨和冬天〉、〈王后的微

<sup>71</sup> 鍾梅音，〈跋〉，《旅人的故事》（臺北市：大地出版社，1973年10月再版），頁334～335。

笑〉等 40 篇。正文前有作者〈美的畫像——《昨日在湄江》序〉。

1977 年由皇冠出版社再版，正文與 1975 年立兩版同。

1977 年 7 月，丈夫余伯祺退休，鍾梅音隨夫移居美國，在美國期間，由皇冠出版社於 1978 年出版《這就是春天》，以及 1980 年出版了最後一本散文集《天堂歲月》。

十八、《這就是春天》：1978 年 4 月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本書收錄鍾梅音 1975 年至 1977 年間發表於臺灣及海外如新馬地區、美國等地報刊雜誌上的品文論畫、生活所思、美國民情生活所感、旅遊紀實等文章。全文收錄〈這就是春天〉、〈我與蘭花有約〉等 34 篇。正文前有作者於 1977 年於洛杉磯寫的〈自序〉，文中，鍾梅音表示對於新加坡的簡體字政策她有些感慨，最後仍不忘提起第二故鄉臺灣，她寫道：

簡體字看來容易，其實欲速不達，這使新加坡的孩子們為了要吸收來自香港台灣的精神糧食，又多了一種學習的負擔，最講求效率的新加坡人不想提高華文水準則已，若想提高華文水準，先要恢復正體字。……對於我自己所屬的文化祖國，也就更多一份歸屬感，看來中華民族文化的命脈真的全在台灣手上了，歷史的責任，能不為之凜然！……我雖到處飄泊，心心念念還是已經住過廿載之久的第二故鄉<sup>72</sup>

十九、《天堂歲月》：1980 年 6 月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本書為作者鍾梅音生前最後一部出版作品。選輯作者旅居美國時期的生活紀實、訪友聚會、追憶故友、教堂唱詩紀錄其宗教生活、論畫談詩如〈但願人長久〉、〈百年悲君亦自悲〉、〈接力賽〉、〈我心在台灣〉、〈在美國教堂唱詩〉、〈幕前幕後〉、〈藝術、鄉土與中庸之道〉、〈畫境與禪理〉、〈最美好的時光〉、〈傳統的芬芳〉、〈一清如水的彩筆〉、〈啊，生命，美麗的生命〉、〈天堂歲月〉等 20 篇文章。正文前有鍾梅音〈裹傷而戰（代序）〉。正文後附錄郭淑敏〈宗教·生活·理想——鍾梅音二三事〉。摘錄鍾梅音〈天堂歲月〉文中的一段話作為總結當時她的心境狀態：

不知從幾時開始，我有這麼一個『頓悟』——不想過去，不想未來，今天就是我

<sup>72</sup> 鍾梅音，〈自序〉，《這就是春天》（臺北市：皇冠出版社，1978 年 4 月），頁 6~7。

最好的日子，不會更好了，該努力珍惜，把握每一分鐘。<sup>73</sup>

鍾梅音自 1949 年 6 月 14 日、15 日發表第一篇散文〈雞的故事〉連載於《中央日報》第六版，而後於 1951 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冷泉心影》以來，她始終持續不斷地寫作，直到 1980 年出版最後一本散文集《天堂歲月》，共出版了 18 本散文集，以及 1 本短篇小說集，還寫了童詩、兒童文學，並且作詞，在新加坡期間也翻譯了兒童讀物等，其寫作熱忱及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首先擬從鍾梅音生平著手及其所出版作品整理起，先從觀察其時代背景、作者的個人成長及際遇，包括梳理鍾梅音的病史，嘗試理解鍾梅音的宿疾所帶給她的影響，並且注意知識女性所享有的資本優勢等，透過詳盡閱覽鍾梅音散文作品集，同時並蒐集學者專家研究者關於 1950 年代的研究及評論，試圖建構戰後外省遷臺女性的生命境遇，遠離親族和生長的土地，尤其是始終受喘病之苦的身軀，如何適應異域，又怎樣重組建構屬於她在臺灣的家，在那大時代中，怎麼生存安定下來，又有怎樣的貢獻及投射時代。

採用「文本分析法」來研究鍾梅音的思想，階級右派知識女性的心靈世界，及對時代現象的見解。經由對鍾梅音散文文本的分析，從題材內容，探究其深層的意義。由於離散，被迫中斷了故土親族的聯繫，過去的父權制度下的社會秩序及傳統，或許也能稍為鬆綁，而夫婦子女所組成的核心家庭，也未必不是一個能重新建構自主空間的機會，獲得新舞台及空間能自由發揮其才能，建構起現代新家園。本論文並探討鍾梅音以家為軸心畫出作者理想中的一片園地，她所提出的「兩地鄉愁」呈現出離散人們的身不由己所產生的心理狀態。筆者透過文學作品中的紀錄，嘗試理解五〇年代人們複雜的心境及面貌，以及五〇年代文學歷史評價的多種樣貌，女性散文作家鍾梅音所刻畫紀錄的時代印記。

---

<sup>73</sup> 鍾梅音，〈天堂歲月——我的老師國畫大家陳文希〉，《天堂歲月》（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0 年 6 月第一版），頁 119。

## 第四節 論文研究架構

筆者欲研究觀察戰後遷台大陸女性作家鍾梅音，從留台到移民，散文中如何書寫在臺灣的生活心境轉折，以及家庭的重建與適應，考察五〇年代常被評論家定調為反共懷鄉的文學的緣由，透過鍾梅音的抒情散文中所呈現出屬於那時代遷台知識女性的生命歷程、家庭重組與為適應新環境所做的種種調適，並在台灣文壇上書寫出的時代印記，透過此研究嘗試理解個人生命隨境遇如陀螺般的不斷遷徙之下，遷台人們複雜的心境與時代多樣的面貌。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共分為五章，首章緒論說明研究的起心動念，將研究文本範圍一一整理出，接下來第二章研究鍾梅音生長背景以及當時官方文藝政策對女作家的思想有何滲透性，第三章則是針對鍾梅音宿疾對於她個人的生命歷程怎麼影響其寫作的深度，第四章則聚焦在女作家的在地書寫，最後整理出筆者考察到的各層面的收穫。接著就各章節的論述內容說明如下：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與目的

#### 第四節 論文研究架構

首章緒論，主要說明筆者對五〇年代遷臺女作家鍾梅音研究的起因緣由，以及整理此領域的研究現況、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以及與之相關的學位論文考察，最後加上說明本論文的研究範圍、方法和架構。

### 第二章 五〇年代的官方政策與鍾梅音的女性書寫實踐

#### 第一節 鍾梅音生平概述

#### 第二節 遷臺女作家的創作時代背景

#### 第三節 五〇年代遷臺女作家的創作空間

#### 第四節 反共文藝的規訓性

本章節著重在五〇年代遷臺女作家鍾梅音生長背景，接著分別將對於當時五〇年代官方語言政策以及官方文藝取向進行歷史脈絡的梳理，屬於鍾梅音創作時代背景的外緣研究，觀察抒情散文在官方文藝體制下的獨特位置，鋪展鍾梅音散文的創作空間，以及考察出作品當中屬於官方文藝的規訓性的層面。

### 第三章 個人即政治

#### 第一節 鍾梅音的病史

#### 第二節 病體·家庭·母職——拉扯與調和

#### 第三節 因病而生成的體悟／對生命的領悟及智慧

本章進行鍾梅音文本的內部研究，主要針對鍾梅音病史的研究，將之區分為從兒時到婚前的病體以及婚後病體的兩階段來敘述之，深入探究鍾梅音散文中因病而生成的體悟，處理鍾梅音宿疾對作家個人生命、思想、人格、家庭的影響，屬於鍾梅音個人的生命圖像。

### 第四章 家·台灣——在地化書寫

#### 第一節 在臺紀實

#### 第二節 懷鄉書寫的心境轉折

#### 第三節 女性文本的生活與日常性及對於時事的觀察

本章主要探討鍾梅音的在地化書寫。考察遷臺初期到多年後心境轉變下所反映出的臺灣紀實及懷鄉文學的文風轉變，並考究出右翼知識女性的保守性，及對於時事的建言。

### 第五章 結論

本章為最後一章結論，綜合以上研究所觀察出五〇年代女性作家鍾梅音反映出的時代面貌和文學場域，列出五點來敘述研究所得，期許能延展對於女性文學的研究及關注。

## 第二章 五〇年代的官方政策與鍾梅音的女性書寫實踐

本章欲探討五〇年代臺灣文壇上，外省女性作者鍾梅音何以在渡海來臺不久之後，即有展露頭角的機會，並梳理當時官方的語言政策及文藝取向中所生成的女性書寫空間，及觀察在反共文學的規訓下，女作家鍾梅音如何書寫及回應。

### 第一節 鍾梅音生平及寫作生涯概述

鍾梅音 1922 年出生於北平，籍貫為福建上杭。外祖父邱澥山，別號潛廬主人，為南社詩友<sup>1</sup>。南社（1909～1923），是個在 1909 年所成立的文學團體，在近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根據林香伶的研究指出：「南社由一群對歷史有特殊憂患情懷，理念相契的熱血青年所組成，乃近代知識分子自覺性的結合。」<sup>2</sup>、「愛國主義與革命思想結合的時代背景，提供南社創社的自然性與條件性，然而，所謂的革命與革新，文學道統與振興文學等動機的促使，真正的根源還是來自於知識分子的良心。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一詞，並非中國所有，中國歷史和知識分子相對應的名詞，應該以「士」最為接近」<sup>3</sup>。鍾梅音的外祖父是南社詩友，而父親鍾之琪則是擔任西南長官公署軍法處長，著有《虛園詩存》。鍾梅音曾在〈我的童年〉一文中提及「我的家庭，無論父系方面，母系方面，都受過相當教育，所謂世代書香，一直列於士大夫地位。」<sup>4</sup>，鍾梅音對於生長在這樣的書香世家感到光榮。

在這裡，筆者認為值得關注的是，在那個政權變動極大的年代中，包括新、舊時代

<sup>1</sup> 陶英惠，〈民國初期的學術研究（1912-1927）〉，《民國教育學術史論集》（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8 年），頁 165-174。根據此書所整理的資料，南社係一文學團體，成立於 1909 年 11 月 13 日。發起人為陳去病、高旭、柳棄疾三人，當時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借詩文以鼓吹革命」。南社的出版物，最主要的是《南社集》，內容選編自社友之稿，自成立初至民國 12 年底，共出 22 集。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中要人（如教育次長景耀月等）有許多是南社社員。民國初年，上海及浙江等地國民黨各報館的記者，大多數亦為該社社員。

<sup>2</sup> 林香伶，〈第二章 南社歷史沿革（上）〉，《南社文學綜論》（臺北市：里仁，2009 年 10 月初版），頁 67。

<sup>3</sup> 林香伶，〈第二章 南社歷史沿革（上）〉，《南社文學綜論》（臺北市：里仁，2009 年 10 月初版），頁 75。

<sup>4</sup> 鍾梅音，〈我的童年〉，《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 年 2 月），頁 41。

與東、西文化衝擊，思想、觀念也快速轉變的年代，人們自然會尋求自己心靈上的依歸。鍾梅音外祖父加入的文學團體——南社，具有某種政治信仰、理念，以及鍾梅音父親所選的職業——西南長官公署軍法處長，也說明了他的身分和地位，父祖輩的選擇與政治信念，在鍾梅音的成長過程中，相信也在某種程度上，對她亦產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培養了鍾梅音她堅毅的性格，且產生對民族、國家多一些的關懷等。

鍾梅音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此番家學影響下，使得她在成年後，經歷了一場國、共內戰，再次面臨了政權勢力交鋒，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她心中存有的那股濃烈愛國的使命感，堅強的反共意識，便化為力量，從一開始僅是抒發她的心緒，希望有知己的讀者傾聽之，便動筆寫些身邊瑣事及日常所思所想等，但她從發表第一篇文章後，便積極地投入寫作，甚至加入官方文藝組織，成為筆隊伍的一員，並且能不顧自身安危前往前線去鼓舞士氣等，這些或許可說是源自於家傳文化。

鍾梅音外祖父是南社詩友，雖然從少有的幾筆文獻當中，筆者並不能確定她外祖父的參與南社活動的程度。然而，若就此組織來看，「南社」可說是革命文學團體，從《南社文學綜論》書中，可更清楚認識南社成員的性質，林香伶指出：「南社不只是舊式士大夫的簡單轉型而已，他們多數是經由新式學堂、留學教育等管道接受西方文化的刺激。」<sup>5</sup>，從事研究南社多年的林香伶說明，南社成員當中也有不少是教職人員，在學校傳授予學生愛國意識及思想，「強調聯繫個人生死與民族興亡、國家存廢的關係，甚至企圖脫離以往讀書人的忠君觀念，突顯自我覺醒和社會自主性的使命感。」<sup>6</sup>

鍾梅音自幼薰陶於文風濃厚的書香環境中，在家族長者的教養及影響下，或許對於國家、民族也多了份關懷及使命感，此外，還奠定了良好的寫作能力以及藝術欣賞的眼光。然而，不幸的是，在她三歲時，卻因一場小感冒被誤診，導致轉為支氣管炎，最後竟成了纏擾終生，令鍾梅音為之所苦的氣喘病。

1936年，鍾梅音小學畢業，參加南京市會考，成績優異，考取第二名，保送就讀中央大學實驗中學。不久，就因體弱承受不住繁重課業壓力，氣喘復發而休學。1937年以同等學力考上五年制湖北藝術專科學校，而後卻又因蘆溝橋事變，隨堂兄遷居漢口，因

<sup>5</sup> 林香伶，〈第二章 南社歷史沿革（上）〉，《南社文學綜論》（臺北市：里仁，2009年10月初版），頁76。

<sup>6</sup> 林香伶，〈第二章 南社歷史沿革（上）〉，《南社文學綜論》（臺北市：里仁，2009年10月初版），頁76~77。



逢武漢大撤退而未能入學，鍾梅音的求學生涯可說是相當坎坷艱辛。後來，為避難又遷至廣西。1939年，鍾梅音17歲時，與時任第五軍工程師余伯祺認識，隨即訂婚。但雙方家長在議婚時，鍾家說鍾梅音還小，可等余伯祺浙江大學畢業後，再結婚，鍾梅音也於1939年就讀廣西大學法律系。兩人訂婚後，分隔兩地，經過兩年八個月書信往返，於1942年結婚，婚後隨夫遷居於雲南祥雲。因此鍾梅音終究未取得學位。1943年長子余占正出生。是鍾梅音散文中常喚的小灝。結婚3年後，二戰結束，1945年底首次回上海公婆家。次年任職於善後救濟復員會中文秘書。1947年秋長女余令怡出生。

1948年3月，鍾梅音隨夫婿余伯祺，帶著長子余占正，前往台灣，落腳基隆。後因國共內戰，國府失利，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兩岸對峙，長女余令怡滯留中國，失去聯繫。隔年，余伯祺出任臺灣肥料公司蘇澳廠長，全家遷居至宜蘭蘇澳。在蘇澳期間，空閒之餘，鍾梅音開始寫作。

1949年6月14日至15日，第一篇散文〈雞的故事〉以筆名「音」連載於《中央日報》第6版，接著7月7日至8日又以「音」在《中央日報》第6版，發表了〈臺北行〉，而後，鍾梅音持續不斷地在各大報發表散文，展開她的寫作生涯。1951年7月，由重光文藝社出版第一部散文集《冷泉心影》，此散文集是由鍾梅音精選自1949年到1951年間，她在各報發表的散文當中的五分之一，一共選輯三十篇<sup>7</sup>。可見鍾梅音寫作之勤，作品發表量之多。

五〇年代初期，鍾梅音剛從事寫作，還不能說是著名作家，算是個主婦作者，她也曾描述身為家庭主婦，能產出《冷泉心影》這本散文集中的文章「實在是因為鄉居無俚，夜坐寂寞，在與知己剪燭西窗的心情之下寫成的。」<sup>8</sup>，居住在蘇澳鄉間，閒暇之餘，寫寫文章，以抒發自身思想及情感。然而，鍾梅音所寫的這些女性為抒發情感的散文文章，在1949年到1951年，僅兩年期間，以筆名「音」在臺灣各大報，如《中央日報》、《大華晚報》等副刊，發表的散文高達一百五十多篇，五〇年代臺灣文壇上，遷臺外省女性能得到這樣的書寫發表空間，似乎是一種特殊的際遇。或許是因五〇年代「官方語言政策」與「文藝取向」，這兩股力量在臺灣文壇中所孕育而生成出的外省女性書寫空間。

作家的第一本著作往往值得我們來多加關注。應鳳凰2016年12月所出版的《文學

<sup>7</sup> 鍾梅音，〈自序〉，《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5。

<sup>8</sup> 鍾梅音，〈自序〉，《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5。

起步 101：101 位作家的第一本書》中評論鍾梅音《冷泉心影》散文內容為「追憶往事，紀錄鄉居閒情，抒發來台所見所思，感情細膩，文字親切有味。」<sup>9</sup>，而值得注意的是，鍾梅音《冷泉心影》乃是由陳紀滢為之作序。據應鳳凰觀察，陳紀滢在《冷泉心影》序文中所提到的一段評語：「我們的女作家替這時代貢獻了她們特別豐富的情感和思想，燦爛了自由中國文學史篇。」，對於陳紀滢的說法，應鳳凰認為此話其實有著「三分吊詭」，她進一步解釋道：「解嚴前後兩岸男性史家眼中，女作家關心的是『婚姻愛情，家庭瑣事』，眼光短淺，『不管國家興亡』，不能反映偉大時代。」，而「《冷泉心影》便是道地一本『身邊瑣事』的散文集……」<sup>10</sup>，應鳳凰點出了善寫「大時代反共長篇小說」的陳紀滢，對於女性作家所記錄的日常瑣事，抒情生活小品散文有著如此的褒詞，確實值得研究者留意。筆者因著應鳳凰的提示，不免亦覺得好奇，常被男性史家概括為反共文學的五〇年代，官方文藝代表陳紀滢對於鍾梅音書寫的「身邊瑣事」為題材之女性抒情散文，又是以何種角度來觀看？

查看陳紀滢為《冷泉心影》所寫的序文，他在〈序「冷泉心影」〉文中表示，對於當時女作家大量群體出現於臺灣文壇上的現象，著實令他感到驚奇，為何能有此現象，陳紀滢的說明是：「其中原因很複雜，但最重要的原因乃是自由中國有自由寫作環境；大家都有寫作的高昂情緒。」<sup>11</sup>，筆者解讀，陳紀滢言下之意，他認為之所以會有這些特殊現象，乃是因為這裡是「自由中國」。他所強調的是，唯有在自由中國，才能有如此自由的寫作環境，不管內容是描述大時代，或僅是身邊瑣事，無論男女皆積極振奮來參與「文藝工作」。

在過去那個政治氣氛濃厚、反共懷鄉書寫情緒濃烈的五〇年代，文學史家一般性地概括為反共懷鄉的文學年代，對於當時出現大量外省女性作家，書寫著在地、日常家居生活的抒情散文特殊現象，卻常將之忽略，又或僅是輕描淡寫地帶過，如陳紀滢，雖然他注意到了，然而，他對此現象產生的緣由，也僅歸結為「自由中國所提供的自由寫作環境」。

所幸，近年來有些學者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說法，如范銘如，從性別角度看觀察，所

<sup>9</sup> 應鳳凰，《文學起步 101：101 位作家的第一本書》（新北市：INK 印刻文學，2016 年 12 月），頁 110。

<sup>10</sup> 應鳳凰，《文學起步 101：101 位作家的第一本書》（新北市：INK 印刻文學，2016 年 12 月），頁 110。

<sup>11</sup> 陳紀滢，〈序「冷泉心影」〉，《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 年 5 月），頁 1。

提出的「台灣新故鄉」說等。五〇年代，文學環境背景雖處於嚴肅的政治氣氛中，然而，范銘如的看法是：「在反共懷鄉的高分貝下，不少女作家輕巧地把家的座標挪置於台灣。」<sup>12</sup>，她認為遷臺外省女作家「她們書寫的重點在於思量在此重建家園的困境與方法。」<sup>13</sup>等等，於是，從性別角度來分析，五〇年代遷臺外省作家，也等於是敲開了文學史中始終概括性地，對於五〇年代，僅存有「反共懷鄉」文學的刻板印象，給予五〇年代實際存在大量外省女性作家所書寫的散文作品，另一個觀察的切入點。五〇年代，因「國共內戰」這樣的時代悲劇而被迫遷臺的外省作家們，自然有著濃烈的懷鄉思緒，但同時，尤其是「女性」寫作者所關注的重心，更是她們在地生活的當下，並且著眼於解決眼前的問題，頗具「現實性」及「空間感」。應鳳凰亦評鍾梅音散文有著「在地書寫」的特色，並且評論鍾梅音所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冷泉心影》內容屬性：

既是鍾梅音來台不久真實生活的寫照，也可說是來台女性知識分子所思所想、日常生活的縮影。有別於其他住在城市的公務員作家，鍾梅音住蘇澳——環境清幽，有園地可種菜，有全副精神可閱讀與寫作。在地書寫正是此書特色，她們的文本流露「台灣新故鄉」落地生根的思維。<sup>14</sup>

鍾梅音的書寫，原本就始於為了抒發其鄉居無俚之寂寞心情<sup>15</sup>，期盼或有知己讀者，經由她的文字與之情感交流對話，鍾梅音或許透過書寫，一來，冀望能向她的知己讀者抒發她的想法，分擔她的悲哀，並共享她的快樂，二來，或許能更深一層地安慰她的心靈。

至於前面所提及的陳紀滢，筆者想再做進一步的探討，陳紀滢對於女性抒情散文所處理的「身邊瑣事」題材的評語，正如同應鳳凰所說的有著三分弔詭，原因出在陳紀滢「身分地位」的特殊性。由於官方文藝對於鍾梅音的書寫有著重要影響力，因此研究鍾梅音，對於五〇年代官方文藝組織需有個概要性的認識，據應鳳凰對於五〇年代的研究：

<sup>12</sup>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年8月），頁41。

<sup>13</sup>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年8月），頁15。

<sup>14</sup> 應鳳凰，《文學起步 101：101位作家的第一本書》（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6年12月），頁110。

<sup>15</sup> 鍾梅音，〈自序〉，《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5。

1950 年的上半年，政府就先辦了一個金額超高的文藝大獎，機構全稱叫「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獎會」）。接著由政府推動成立了國家級的作家團體，叫「中國文藝協會」。……而執行國家文藝政策的重責大任，便落在黨中央核心成員張道藩（1897～1968）肩上。（中略）

「文獎會」於 1950 年 3 月成立後，當局接著在 5 月成立當時規模最大的作家組織「中國文藝協會」（以下簡稱「文協」）（中略）

1954 年 5 月 4 日下午三點，地點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除了來自各地作家、藝術家一百四十餘人，更有黨政大官數十位。典禮由陳紀滢擔任大會主席，張道藩說明發起意義，繼之有籌備經過，大會宣言，並選出首屆理事 15 位：張道藩、陳紀滢、王平陵（以上常務理事），謝冰瑩、許君武、耿修業、馮放民、傅紅蓼、孫陵、梁中銘、徐蔚忱、趙友培、王藍、王紹清、顧正秋，其中一半左右身兼副刊主編。（中略）

大會主席陳紀滢（1908～1997）雖不掛名，卻是文協的靈魂人物，主掌協會大小事務。<sup>16</sup>

陳紀滢是中國文藝協會的常務理事，又是此官方文藝組織的代表人物。筆者查閱陳芳明所著《台灣新文學史》，陳芳明認為，陳紀滢 1949 年來臺後，便成為「國民黨文藝官方政策的執行者」，陳紀滢為反共文學寫下的第一部作品《荻村傳》，也經由他自己於 1950 年所創辦的重光文藝出版社<sup>17</sup>，在 1951 年結集印行。陳紀滢作品是「反共文學的典範」，而且「他的創作方式大約也就是後來反共作家模仿的對象。」<sup>18</sup>此番介紹便充分說明了陳紀滢於當時臺灣文壇上的影響力及地位。

然而，當筆者發現到鍾梅音第一本散文集《冷泉心影》，竟也是由陳紀滢的重光文藝出版社來出版，更是由陳紀滢本人親自為之作序，不免推想，這似乎透露出外省女性抒

<sup>16</sup> 應鳳凰，〈第一章 1950 年代文學環境與文學生態〉，《畫說 1950 年代台灣文學》（新北市：遠景出版，2017 年 2 月初版），頁 25～29。

<sup>17</sup> 重光文藝出版社，出版作品除反共文學，如：陳紀滢《荻村傳》（1950）、《賈雲兒前傳》（1957）等；亦出版女性作家的散文或小說作品，如：徐鍾珮《我在臺北》（1951）、《餘音》（1961）等；鍾梅音《冷泉心影》（1951）；張秀亞《三色堇》（1952）；林海音《冬青樹》（1955）等。

<sup>18</sup> 陳芳明，〈陳紀滢與反共文學的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 年 12 月修訂二版二刷），頁 297～299。

情散文在某方面得到官方代表的認可及鼓勵。鍾梅音，一位初到臺灣且居住在臺灣蘇澳鄉野地帶的女性，書寫著平時她所熟悉的身邊瑣事，為何其所寫的文章，能在短期間內便大量刊載在報章雜誌上頭？又為何能得到官方文藝代表陳紀滢的認可，並集結成冊，由重光文藝出版社刊印發行？而後，鍾梅音除了第一本散文集《冷泉心影》外，陸續又出版了多達 17 本散文集，還有 1 本短篇小說集等，她又為何能出版如此多作品？她在什麼平台上刊登她的作品？又是那些編者的選擇？為何能從家庭主婦搖身一變成了頗具知名度的散文女作家？她的抒情散文又有何特殊性？

或許這就需要再進一步來細看鍾梅音的文本。鍾梅音，除了書寫懷鄉憶舊之外，寫作題材圍繞著家人、日常、真實、在地、鄉間、自然等，筆者翻閱資料發現，由於她所寫的文章，的確深受當時讀者歡迎，報刊雜誌也就因應市場需求，頻頻來向她邀稿，而熱愛寫作的她，受到了鼓舞，便持續不斷地在報章副刊上發表文章，並且累積了相當可觀的篇章。

鍾梅音的書寫，常被評為文筆親切細膩，應是基於她本身在藝術繪畫方面的素養，她尤以寫景特長，從《冷泉心影》〈自序〉中，或許能夠感受其文筆的風采。鍾梅音介紹她的家在宜蘭蘇澳，蘇澳在哪兒呢？

蘇澳是臺灣東北部的一個小小港灣，南方澳與北方澳像兩隻蟹螯，將海水彎彎地圍將過來，我的家，便是螃蟹的一隻眼睛。<sup>19</sup>

鍾梅音的家，經由她饒富童趣的觀察角度，且親切生動地描寫，她的家—蘇澳的所在位置，立刻活脫了起來，彷彿是隻螃蟹還對著初來乍到的外省讀者，眨了個眼睛。鍾梅音對於她臺灣蘇澳的家，做了此番活靈活現地介紹，透過外省女性的書寫，立即讓閱讀者對於陌生的蘇澳產生了親近感，進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於鍾梅音熱愛繪畫，閱讀她的文章，經常能從其文字描述中，讀出景物的立體畫面，頗具空間感，加上文筆細膩生動，對於讀者，尤其是對臺灣各地尚存陌生感，想一探究竟的外省讀者，鍾梅音所書寫的內容，應是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觀看鍾梅音的作品，亦有助於現今研究臺灣文學的研究者，了解五〇年代遷臺外省女性觀看臺灣的視角，看她們如何注視、怎樣描繪臺灣，以及她們又是如何將臺灣介紹

<sup>19</sup> 鍾梅音，〈自序〉，《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5。

給剛遷移此地，對於臺灣尚且陌生的外省讀者們，而外省讀者們或許就是透過鍾梅音的引介來認識臺灣的部分地區，鍾梅音的感受透過文字的傳達，亦會影響外省族群對臺灣的觀感，舉例來說，鍾梅音《冷泉心影》，書名直接點明了這是一本地方性風物，以及作者在此地所得著的心情感受。讀了《冷泉心影》後，他們大概會對蘇澳冷泉產生某種美好又親近的想像吧。遷臺外省女作家鍾梅音將其第一本書《冷泉心影》的命名獻給了她的臺灣蘇澳，她是這麼介紹的：「朝夕與萬頃碧波為鄰，那帆影濤聲，松風鳥語，曾經給我許多靈感，為了紀念這美麗的福地，我把書名贈與蘇澳的名勝——冷泉。」<sup>20</sup>，創辦《婦友》月刊的王文漪曾拜訪過鍾梅音蘇澳住所，鍾梅音帶他們遊覽參觀當地，王文漪曾此對回憶說：

我們還參觀了她〈冷泉心影〉所寫的冷泉，原來只是一個小小的泉池，她卻寫得那樣美。<sup>21</sup>

由上述王文漪的這段話來分析，王文漪與鍾梅音所觀看皆是實際自然存在的地方景物——蘇澳冷泉，但兩人對此處的感受卻截然不同，筆者認為，那是因為「情感」的連結不同，觀看的景象亦自然產生不同的心境。宜蘭蘇澳對於鍾梅音來說，是個特殊的存在，即便後來她舉家遷離蘇澳許多年後，鍾梅音仍舊深深地懷念著，因為蘇澳給了因戰亂時代被迫漂泊不斷地遷徙的她，心靈上的安定力量，在鍾梅音的眼裡，那兒可是她心愛的「家」呢！。

曾和鍾梅音同事過的王文漪，亦曾讚賞鍾梅音擁有一支優美的筆。鍾梅音持這支筆，於 1949 年 6 月發表她第一篇散文〈雞的故事〉，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除了身體健康狀況不允許時，她經營寫作的筆很少放下來，然而，最後一篇散文〈何處是歸程〉，因生病已無法提筆寫字，仍經由口述，透過丈夫代筆而寫成的，1983 年 5 月 16 日發表於美國《世界日報》，她的寫作精神令人感佩。

鍾梅音寫作之勤，以及持續不斷地投入，一共出版了多達 18 本散文集，以及 1 本短篇小說集等，接著，筆者將鍾梅音創作略分為三個時期來研究討論：早期作品為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期；中期作品，從《海天遊蹤》（1966）算起，即六〇年代中後期至七

<sup>20</sup> 鍾梅音，〈自序〉，《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 年 5 月），頁 5~6。

<sup>21</sup> 王文漪，〈懷思梅音〉，《中央日報》，1984 年 2 月 18 日 12 版。

〇年代中期；後期作品則為 1977 年移居美國後所出版的《這就是春天》(1978)，以及鍾梅音出版的最後一部散文集《天堂歲月》(1980)。將分別整理如下：

## 一、鍾梅音早期作品

鍾梅音早期作品：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期，共出版六本散文集及一本短篇小說集。鍾梅音第一部散文集《冷泉心影》於 1951 年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出版之後，而後，陸續於 1954 年出版了兩本散文集，一本是臺北復興書局出版的《母親的憶念》，另一本則是臺北大華晚報社出版的《海濱隨筆》。發表的場域有：《中央日報》、《大華晚報》、《中華日報》、《新生報》、《國語日報》、《聯合報》等報中的婦女、家庭、文藝等副刊、專欄等。藝文雜誌有：《中國一周》、《暢流》、《自由中國》、《中國語文》等。1957 年出版的《遲開的茉莉》是鍾梅音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說集。1958 年出版《小樓聽雨集》，接著 1964 年又出版了兩本散文集，分別為《塞上行》及《十月小陽春》。鍾梅音於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期，共出版了六本散文集，以及一本短篇小說集。此時期書寫產量之豐，在各大報刊雜誌中，經常能看到鍾梅音發表的文章，她的作品受到讀者歡迎，因此當時亦陸續有出版社積極地與她洽談，並刊行出版作品集，成為臺灣五、六〇年代文壇上相當活躍的女作家。

鍾梅音早期創作多為溫婉細緻的生活小品文，如〈鄉居閑情〉、〈有朋自遠方來〉等，以及懷人憶舊之文，如〈父親的悲哀〉、〈母親的憶念〉、〈家鄉味〉等；然而，亦有不少對於當下時事的看法，如〈談今後的女子教育〉、〈為了下一代〉等；另外還有回應官方文藝政策方針所寫的文章，如〈祝壽〉、〈論宣傳〉等；當然更有如〈颱風〉、〈閒話臺灣〉等具臺灣風情味的在地文章。

筆者觀察發現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鍾梅音創作文體大多以「散文」為主，僅在 1957 年由三民書局出版過《遲開的茉莉》一本短篇小說集。在此，或許可以稍微回顧，並整理有關鍾梅音寫作「文體」的選擇問題，以及五、六〇年代臺灣文壇中，「作者、讀者、編者」之間的關係。

## (一)、鍾梅音文體的選擇

鍾梅音於 1958 年出版的第 4 本散文集《小樓聽雨集》，書中收錄了〈放手寫去！〉，此文是她於 1957 年 8 月在「暑期青年戰鬥訓練團文藝隊」的講詞，內容有她創作的心得，以及說明因為自己的興趣廣泛，因此在寫作方面，她也什麼都寫一點，散文、詩歌、小說等都寫，她很坦誠地表示：

說實在的，當我寫第一篇散文的時候，根本沒想到我要寫的一篇東西應當叫做「散文」，只因過去我讀過一點夏丏尊、朱自清、葉紹鈞這些作家的文章，我預備寫的體裁自然而然地就走上這個方向。<sup>22</sup>

從〈放手寫去！〉此篇演講稿中，鍾梅音自述了她過去閱讀了像朱自清等著名散文家、教育家的文章，言下之意，她寫文章就是自然而然地，便採用了像朱自清等人寫的這類「散文」寫法。她說，她之所以寫文章，是因為心裡產生了一些感觸，於是就抒發付諸於文字中，寫好了以後，最後再為所寫的內容加上題目，她直言她根本沒特別想過用這樣的方式寫的文章就是所謂的「散文」。後來，鍾梅音也嘗試寫了些小說，而且她設定想寫的是「不平凡人物」的故事。她寫完後，便將其作品投稿於報社，然而卻遲遲未有下文，她認為或許編者對她的文章有些什麼意見才會「壓稿」，於是，她便採取行動，寫信給報社編輯：

於是去信請求退回來讓我再寫。編輯先生真給退回來了，並且附了一封信，勸我儘量寫自己熟悉的事。可是我成天在家裏，生活圈子是這麼小，「熟悉的事」又只有從身邊去找，不過我總算聽了編輯的話，就照這個方向寫下去，並且就此寫了這些年。<sup>23</sup>

鍾梅音對於編輯先生奉勸她寫自己熟悉的事，雖然感到頗為為難，因為她自知她狹窄的生活圈提供的材料並不足以讓她建構一個小說世界，然而，她還是聽從了編輯先生的建議，從自己熟悉的人事物中找材料。

<sup>22</sup> 鍾梅音，〈放手寫去！〉，《小樓聽雨集》（臺北市：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1958年6月初版），頁157。

<sup>23</sup> 鍾梅音，〈放手寫去！〉，《小樓聽雨集》（臺北市：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1958年6月初版），頁158。



1957年8月鍾梅音在給暑期青年戰鬥訓練團文藝隊的演講詞中，她為了鼓勵聽眾放手去寫，就舉世界文學名著《小婦人》為例，鍾梅音說《小婦人》作者露意莎·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也是寫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據鍾梅音的講稿中內容，鍾梅音說《小婦人》的作者，也就是露意莎·梅·奧爾柯特原本也都在寫一些偵探小說，直到有位教授提醒她應該寫些簡單、樸實，而且寫自己最了解的故事，後來，那位作家才寫出了像《小婦人》這樣成功的世界文學名著。鍾梅音在〈放手寫去！〉文中解釋，她也和《小婦人》作者同樣都寫自己熟悉的內容，但她並沒有跟露意莎·梅·奧爾柯特有一樣的成就，是因：

第一，我根本就沒有立下志願成為一個作家。第二，我比「小婦人」的作者幸運多了，從未感到發表的困難，零零碎碎地「現蒸現賣」是這樣容易，也就沒想到來一部有計劃的創作。第三，……既有一部「小婦人」在先，我們再寫一部類似「小婦人」的作品於後，不過給市場增加一點冒牌貨色。……說來說去，還是自己的努力不夠<sup>24</sup>

善寫散文的鍾梅音，其實也陸續嘗試了短篇小說的寫作，甚至一度將筆鋒轉到小說的創作，她所寫的短篇小說原發表於《中華副刊》、《自由中國》、《今日婦女》，以及香港的《祖國周刊》、《文學世界》、《中國學生週報》、《大學生活》等刊物<sup>25</sup>，後來便把這一些短篇小說整理收錄在《遲開的茉莉》，1957年由三民書局出版，此短篇小說集出版後，到2008年1月時，已經過四版一刷，由此可見，鍾梅音的短篇小說也銷售的不錯。三民書局編輯部在《遲開的茉莉》書中的〈再版說明〉文中介紹說：

《遲開的茉莉》是鍾梅音女士唯一的短篇小說集，向來以散文見長的她，偶有零星的小說發表於文藝期刊上，……民國四十六年，本局有幸蒙鍾梅音信任青睞，將稿件委付本局出版……作者雖曾自謙《遲開的茉莉》是未成熟的作品，但這本小說依舊貫徹者鍾女士終生秉持的純善信念<sup>26</sup>

鍾梅音出版了《遲開的茉莉》短篇小說集後，隔年1958年，鍾梅音則又出版了另

<sup>24</sup> 鍾梅音，〈放手寫去！〉，《小樓聽雨集》（臺北市：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1958年6月初版），頁158。

<sup>25</sup> 鍾梅音，〈後記〉，《遲開的茉莉》（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1月四版一刷），頁170。

<sup>26</sup> 三民書局編輯部，〈再版說明〉，《遲開的茉莉》（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年1月四版一刷），頁1~2。

一本散文集《小樓聽雨集》，然而，在此散文集的〈自序〉中，鍾梅音回顧了 1948 年到 1958 年她十年寫作生涯，文中並細訴其決心未來她將專心致力於「散文」寫作領域的心路歷程，由於這是作家鍾梅音的重要宣言，筆者引文如下：

我的小說集「遲開的茉莉」出版到現在已快半年了，假使它沒有使讀者太失望，只有一個理由——我曾在散文上面下了一點工夫。

當日我一度轉筆鋒於小說之創作，祇是一種嘗試，因為我的興趣是多方面的，既然在整個的生活裏，我的興趣從烹飪、編織、音樂、繪畫、園藝至於寫作，在寫作的生活裏，我又怎能長久自囿於散文的天地呢？

可是隨著歲月的逝去，與閱歷的增加，我已漸漸悟到人的才華有限，精力更有限，從我第一篇「處女作」之發表，到現在已將跨入第十個年頭，我從創作中學習，從生活裏體驗，已摸索了長長的一段路。（中略）

此時此際，承蒙大中國圖書公司的支持，使我能把四十三年下半年以來的散文再加以整理，在這整理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實在更愛自己的散文，而且散文中亦自有它可以任意馳騁的遼闊的天地，無須再求之於小說的領域，從這一刻起，我決定把未來的歲月，完全獻給散文！

這並不是說，這本散文集比小說集高明，我只是覺得，無意中從這些散文裏找回了久已失去的自我。<sup>27</sup>

## （二）、副刊編者處理稿件的準則

以「散文」書寫為主的鍾梅音，曾嘗試寫些不平凡人物的小說故事，然而，在她將所寫的小說文章投稿後，卻遲遲不見刊登，知道被編輯壓稿了，於是寫信給編輯希望能發回改寫，編輯便將其小說作品退回，並回信勸鍾梅音儘量寫自己所熟悉的事。這段過程，讓筆者不禁猜想鍾梅音的寫作風格、內容是否在當時亦受限於報刊編者處理稿件的準則、報社的調性要求，以及某種文藝政策的規範。

---

<sup>27</sup> 鍾梅音，〈自序〉，《小樓聽雨集》（臺北市：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1958年6月初版），頁1。

筆者於此思考過後，考察刊登鍾梅音 1957 年收錄於《遲開的茉莉》短篇小說的場域有：《中華副刊》、《自由中國》、《今日婦女》等，其中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十二年（1956~1968）的林適存（南郭）為男性主編；而《自由中國》半月刊則是由聶華苓女士擔任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十一年（1949~1960）、而張明女士（姚葳）是《今日婦女》半月刊的創始人，有出版社——今日婦女半月刊社，出版了《今日婦女叢書》<sup>28</sup>，根據筆者能檢索到的資料，《今日婦女叢書》皆是女性所寫的作品，有散文、長短篇小說集。筆者觀察女性作家的作品似乎更亦見於女性主編者所提供的平台上，因此，女性若有編輯權，甚至出版發行權，或許對於同為女性所寫的文章更懂得欣賞，也提供了更加友善的發表園地。

筆者據以上這樣的脈絡，側面來推測，未採納鍾梅音短篇小說作品，並指導她應寫自己熟悉的事，這有可能是來自於《中央副刊》編輯先生的建議。那麼，《中央副刊》在當時到底是怎麼樣的副刊呢？五、六〇年代時《中央副刊》主編是誰？《中央副刊》對於其刊出的文章又有何形式、內容上的要求？這些或許可在主編《中央日報》副刊近三十年的編輯人——孫如陵（仲父）於 2008 年所出版的《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書上找到些重要資料。

根據《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書上內容，1961 年 6 月曹聖芬接掌《中央日報》擔任社長一職，並聘請孫如陵於 1961 年 8 月 1 日擔任《中央副刊》改版後的主編。《中央副刊》將比以往擴大一倍版面，每日十六批，亦即《中央日報》總篇幅十分之一，擔負起中央日報十分之一的責任，孫如陵回憶當時他擔此重任，當時心情是相當忐忑：

肩挑重擔，獨任其勞，使我產生一種臨事而懼的心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sup>29</sup>

<sup>28</sup> 張明（姚葳）曾創辦《今日婦女》半月刊，有今日婦女半月刊社（臺北）曾出版《今日婦女叢書》，經考察如下：劉枋，《今日婦女叢書之二》《千佛山之戀》散文（今日婦女社，1955 年 4 月）；揚宗珍（孟瑤），《今日婦女叢書之三》《柳暗花明》長篇小說（今日婦女社 1955 年 4 月）；李芳蘭（廉柏），《今日婦女叢書之四》《銀色蛇》小說（今日婦女社，1955 年 8 月初版）；蘇雪林，《今日婦女叢書之六》《綠天》散文（今日婦女半月刊社，1955 年 10 月）；王琰如《今日婦女叢書之七》《新苗》小說（今日婦女雜誌社，1955 年 10 月）；潘希真（琦君）《今日婦女叢書之八》《菁姐》短篇小說集（今日婦女雜誌社，1954 年）；劉瑢（劉咸思），《今日婦女叢書之九》《尋回的周末》散文、小說合集（今日婦女半月刊社，1955 年 12 月）。王韻梅（繁露），《愛之諾言》短篇小說集（今日婦女半月刊社，1955 年 7 月）。因資料年代已久，有些作家著作又經由別的出版社再版，缺漏部分，尚待他人續考。

網路資料：[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934](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934)（查詢日期：2019 年 1 月 12 日）

<sup>29</sup> 孫如陵，〈尺幅之內有千里之觀〉，《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臺北市：文史哲，2008 年 6 月初版），頁 13。

從三十八年到五十年的十二年間，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是用在中副上面，……工作是嚴師，毫無寬假，把我這塊頑鐵，著實錘鍊好幾年，我乃有充分的機會，把副刊的神經中樞都摸透了，我得以用一百個偶然，等待一個必然，完成我的任務。<sup>30</sup>

《中央日報》的曹聖芬社長以及主管人員等，對於改版後的中央副刊主張是要「大眾化」以及「通俗化」，孫如陵說，社長和他商定了「不用文言」，如此一來，便能更貼近一般社會大眾，孫如陵引用時任《中央日報》總編輯——錢震所說的一句話：「報紙要做宣傳，先要使人愛讀。」<sup>31</sup>，孫如陵在〈副刊的實質與內容〉說：「副刊的目的雖然是嚴正的，所採的手段卻是輕鬆的。因此，副刊所抱定的宗旨是：先求人讀，再將目的很技巧地納入字裏行間，移人於不覺。」<sup>32</sup>，而他也在〈中央副刊的風格〉文中道出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明白地說《中央副刊》肩負重擔及使命，必須經營得穩健踏實，因為「中副肩頭上有復興文化，發揚文藝的使命」<sup>33</sup>。

孫如陵說《中央副刊》到了曹聖芬接掌社長一職後，才開始壯大，孫如陵還提到一句，或許也是配合著當時官方文藝政策指導下的目的，那便是要培養自由中國的文藝力量以對抗共產惡勢力，他說：「中副的筆隊伍對抗『文化大革命』，力量也綽有餘裕了。」<sup>34</sup>，孫如陵表示他早在 1955 年 2 月 1 日寫的〈中副內情〉中，便說明了他辦副刊的理念。但理念歸理念，辦報人——孫如陵亦非常了解讀者願意花錢買報紙來看，報紙才辦得下去，報社也才經營得下去，他在〈副刊及其讀者作者與編者〉一文闡明了這之間的利害關係，他直言不諱地說：

報紙是一種文化商品，是用來賣錢的。賣錢的方式有二，一為出售廣告地位，二為出售報紙成品，而讀者就是這種文化商品的消費者，也就是報紙的主顧。<sup>35</sup>

<sup>30</sup> 孫如陵，〈尺幅之內有千里之觀〉，《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臺北市：文史哲，2008 年 6 月初版），頁 17。

<sup>31</sup> 同前註，頁 17。

<sup>32</sup> 孫如陵，〈副刊的實質與內容〉，《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臺北市：文史哲，2008 年 6 月初版），頁 34~35。

<sup>33</sup> 孫如陵，〈中央副刊的風格〉，《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臺北市：文史哲，2008 年 6 月初版），頁 30。

<sup>34</sup> 孫如陵，〈尺幅之內有千里之觀〉，《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臺北市：文史哲，2008 年 6 月初版），頁 20。

<sup>35</sup> 孫如陵，〈副刊及其讀者作者與編者〉，《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臺北市：文史哲，2008 年 6 月

孫如陵既為副刊的主編，自然對於當時副刊「讀者」的閱讀心理，進行過深層的分析，而筆者所研究的鍾梅音常在各大副刊發表其作品，因此筆者認為了解台灣五、六〇年代當時掌管《中央副刊》的主編者的思考面向，將有助於理解那時臺灣文壇上，鍾梅音等女性作家是在持有怎樣信念的文學場域中發表其文的，這些理解也能讓筆者能認識作者鍾梅音的投稿場域《中央副刊》等報社刊物是如何運作，以及《中央副刊》怎樣奉行官方文藝政策，而又得兼顧滿足其主顧閱讀大眾的需求。這些將有助於筆者對於鍾梅音文本內涵的認識。

根據報社編輯人孫如陵認為《中央副刊》的主顧是，一群生活在悲劇時代裡，需要閱讀一些能醫治他們內心深處懷鄉情緒的讀者，孫如陵道：

今天，來到自由中國的人，心裏都懷著悲痛，他們失了家庭的溫暖，他們失了許多關懷他們的人，也就是失掉了愛，他們的內心是寂寞的，他們想念他們的家鄉，他們的親人，而在現實界很難找到足以安慰他們的東西，要想把他們的懷鄉病醫治好，除了反攻大陸，勝利還鄉而外，是沒有靈藥的，誰都知道，文學有求樂避苦之功，他們既然在現實界得不到安慰，可以在文字裏得到一點安慰，即令不然，文字裏訴苦叫冤的事情，他們也會得到一點滿足，因為他們會想到：「像我這樣孤苦伶仃的人，自由中國有的是。」（中略）

一個痛苦的人，如果有機會發洩，哪怕傷心一場，大哭大叫一場，結果總是輕快的。……不幸我們今天是處在一個悲劇的時代，我們都是悲劇的主角，……在文學的領域中追求快樂，避免苦痛，在讀者本人看來，和其他的娛樂不同，心裏有一種「寓上進於消遣」的意味，自覺有一種高尚的情操，覺得經此一讀，這一天的生活便顯得充實。<sup>36</sup>

綜合以上，已略為回顧，並且考察了當時鍾梅音所投稿的《中央副刊》所持的立場，以及《中央副刊》編者對於其閱讀大眾所希望能夠提供的文章內涵。筆者再次回到鍾梅音的文本，察看她寫作的過程是否經過一番調整，是否也回應報社所要的一些能治讀者

---

初版)，頁 83。

<sup>36</sup> 孫如陵，〈副刊及其讀者作者與編者〉，《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臺北市：文史哲，2008年6月初版），頁 84~85。

思鄉病的文章。筆者讀到一篇她於 1966 年 12 月寫的〈逆水行舟〉得到了些許的解答。

鍾梅音寫作風格本來就善用故事說明她想要表達的意思，〈逆水行舟〉一文中，鍾梅音先用一個故事來說明《中央副刊》對於文章嚴厲的要求可以讓作者成長，她用好萊塢名小說家兼戲劇家柏德·蕭伯（Budd Schulberg）的故事來說明，一個成功的作家，成長過程需要有兩股力量，一是像慈母一般在身旁鼓勵支持，另一方面還要有像嚴父一樣用嚴厲近乎苛求地去要求自己。鍾梅音感到柏德·蕭伯的寫作過程就好像是「逆水行舟」，在面對文壇嚴厲的要求下，在拉扯中，必須花更大的力量才能前進，鍾梅音表示對於投稿於《中央副刊》的確是戰戰兢兢地去面對，且更加努力地自我要求以求提高作品的水準，鍾梅音認為自己的寫作生涯之所以能夠持續向前，因為《中副》之於她，也存在著這兩股力量拉扯她，同時亦鼓勵著她。在此，筆者認為鍾梅音為了不被《中央副刊》的主編退稿，或刪修其文，試圖寫出能在《中央副刊》刊登出來的作品，過程中或許也曾探索過《中央副刊》的隱性刊登準則，約略揣摩合其主編者「上」意的。

《中央副刊》對於鍾梅音是有相當的提攜作用，同時引導她的寫作之路，鍾梅音在 1966 年寫的〈逆水行舟〉一文中回顧自己的寫作歷程跟《中央副刊》有相當密切的關聯：

民國三十八年夏天，我第一篇作品「雞的故事」發表於「中副」，正值久病初愈，只是遣興之作……真難以相信，就這麼寫了十七年下來。除了曾有三年因病停筆，其餘時間儘管也常為國內外其他報刊雜誌寫稿，大體說來，我始終沒有離開「中副」。<sup>37</sup>

鍾梅音認為自己寫的第一篇作品就能「一舉躍登龍門」刊登上《中副》，雖屬不易，然而，她回想自己一路走來，也已有不少的累積，她說自己在幼年時期便經常代母親和外祖母寫信，信的內容，傳達的卻是兒童所不能理解的複雜大人世界，這寫信的「工作」不愉快，然而卻也使得她思想早熟，也磨練出她的表達能力，進而奠定了她的寫作基礎。

鍾梅音的第一篇作品，雖順利的刊載在《中央副刊》，但她也坦言自己的作品也曾被刪修，甚至也被退稿過。〈逆水行舟〉一文中，也提了她投稿《中副》曾遇到的困難：

「中副」編輯先生曾經數度更換，最早的一位是茹茵先生，他對水準不夠的稿件

---

<sup>37</sup> 鍾梅音，〈逆水行舟〉，《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初版），頁99。

之處理方式只是積壓，直到作者自知「夜長夢多」，必是有何不妥，自動去信向他  
要回來重寫。

最久的一位是仲父先生，他比茹茵先生急躁，有「退稿專家」的美稱，與這美稱  
同樣出名的，是他刪稿的「鐵腕」。不過，無論壓也好、退也好、刪也好，這使  
「中副」兼有柏德·蕭伯所說的「兩種不同的力量」，成全了多少作者，也使我一  
直知道愛惜羽毛，不可倚恃「盛名」濫寫。<sup>38</sup>

鍾梅音文中提及的《中副》編輯仲父先生即是孫如陵，而如茵先生則是專欄作家耿  
修業的筆名。林海音也曾在《剪影話文壇》書中，話說當年〈武月卿／當年一「抗議」〉  
一文中，回憶起她投稿《中副》的一段往事，她說：

在台灣의 投稿生涯，是自民國三十八年起，……不止是為了興趣，也為了補貼生活  
所需，投稿生涯必得開展出去。《中央日報》遷台出版，《中副》當時的主編是茹  
茵先生，我第一次投去的，好像是一篇題名〈叫子壺〉的稿子（中略）

接著該報又開闢了《婦女與家庭》週刊。這時向《婦週》投稿的女作者多起來了，  
我由版面上認識了許多當今還不斷寫作並擁有大量讀者的女作家，如：謝冰瑩、  
張秀亞、徐鍾珮、劉咸思、琦君、郭良蕙、王琰如、艾雯、孟瑤、張漱菡、劉枋、  
鍾梅音……等，最早見面的倒是主編武月卿。（中略）

《婦週》的風格是文藝性濃於實用性，刊的多是生活散文小說、婦女問題論著，  
極少數是有關於炒菜、洗窗子、補襪子之類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作者多是文藝女  
作家。月卿對在台灣的女性作家，提供了這塊寫作園地，可說是頗有貢獻和影響。

39

林海音的這段話，或許也可印證筆者的想法，這些說明了若握有主編權是女性，的  
確提供了女性作者刊登其文的一個相對友善的場域，亦有助於女性作家群的養成，後來  
也在很多女性的努力之下，開拓了為女性書寫者、女性讀者提供的版面，如：《中央日

<sup>38</sup> 鍾梅音，〈逆水行舟〉，《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初版），頁101。

<sup>39</sup> 林海音，〈武月卿／當年一「抗議」〉，《剪影話文壇》（臺北市：遊目族文化出版，2000年5月初版），  
頁15~17。

報·婦女與家庭》(週刊)、《中華日報·婦女版》等<sup>40</sup>。而林海音又是個拓展女性空間的另一位重要推手。大陸作家徐學曾在《地母與瘋婦：台灣女性半世紀》書中，介紹了知識女性不但在創作上表現優異，在當時亦有不少位女性成為報紙副刊、文學刊物、出版界的主事者，佔有一席之地，在男性批評女性書寫僅是身邊瑣事，林海音、張秀亞、歐陽子(洪智惠)等人透過自己撰寫、翻譯、出版的能力，合作及資本位階為讀者引介西洋女權主張、爭取、捍衛女性書寫空間等的這段歷史過程：

早在1961年1月，臺灣著名的《現代文學》雜誌就推出《吳爾芙專號》，女作家張秀亞在這個專號中撰文推薦《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不久，張秀亞又向她的女友，已經移居美國的沈櫻(沈櫻曾以一系列描寫女性婚戀的小說驚艷三十年代中國。)要來此書的英文版。張秀亞於1973年譯完《自己的房間》全書，找到林海音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一拍即合，馬上付排，可以說，這本後來為臺灣女性主義者不斷引用的書籍……，是由張秀亞、林海音和沈櫻三位著名女作家通力合作完成的。(中略)

《自己的房間》一書裏，吳爾芙嘲笑了與中國傳統類似的西方男性批評，那種批評認為以戰爭為主題的作品價值要遠遠超過女人寫客廳感情的作品。吳爾芙鮮明地提出了女性的藝術觀。張秀亞和林海音此次聯手大力推出伍爾夫，也是為「女性書寫」爭取合法地位。在六、七十年代，臺灣的女作家如果不去寫所謂的大時代大事件，而是沉吟於兒女瑣事，就會被人譏諷為「瑣碎」、「濫情」、「風花雪月」、「與時代脫節」。處於此種高壓氛圍中，張秀亞、林海音搬出伍爾夫《自己的房間》來加以抵擋，為身邊的女性書寫尋求合理化與正當性。(中略)

從《自己的房間》一書的介紹和翻譯中，具體而微地見出臺灣女性是如何西方文化資源中吸取養份。

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在臺灣有歐陽子和陶鐵柱的兩種譯本。歐陽子等人譯

---

<sup>40</sup> 徐學，〈心路歷程半世紀——哀怨的堅持〉，《地母與瘋婦：台灣女性半世紀》(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1年8月一版)，頁22。



本應該是最早的中文譯本。<sup>41</sup>

徐學所提的《第二性》，法文原著是1949年，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巴黎出版的，關於《第二性》的介紹、譯本相關問題，筆者參考2013年由貓頭鷹出版社譯者為邱瑞鑾，從法文直譯中文的完整版本，貓頭鷹編輯室的出版說明如下：

這一部雄辯滔滔的女性主義聖經，重新定義了女權運動的思想、視野與格局。這就是西蒙·德·波娃震驚世界的《第二性》。……女性不是由男性定義的次等物種，女性是擁有獨立存在意義的完整的人。（中略）

中文世界最早出現的譯本，是一九七二年由當年威名赫赫的晨鐘出版社出版的三卷版（分別由歐陽子、楊美惠和楊翠屏翻譯）。雖說是三卷版，但其實只是原著的第二卷；第一卷並未譯出。（中略）

大陸的譯本則比台灣版晚了十四年，到一九八六年湖南文藝出版社才第一次推出由桑竹影等人合譯的簡體字版本。但這個版本跟台灣版一樣，是略過第一卷不譯的。一直要再過了十二年，到一九九八年，才由陶鐵柱克服困難，挑戰艱澀的理論與廣博知識體系的第一卷，由中國書籍出版社推出全譯本。（中略）

從二〇〇七年開始，台灣重要的法國文學推手邱瑞鑾開始了她和《第二性》長達六年，既痛苦又興奮的翻譯生涯。<sup>42</sup>

遷臺女作家們有別於男性的書寫風格在戰後局勢緊繃下，常被主流官方文藝貶抑為不能表現大時代的小女子的文章。然而，文學應當有其自由創作、自由發揮的藝術空間，而非僅是拿來作為政治及教化的工具，女性書寫自己的話，或許不被男性所欣賞，因此，有些勇敢的、有知識文化資本的、有創作能量的、有翻譯才能的、有出版權的、有發聲權的，也會適時地為自己及女性友人說話，且開始醞釀一種姐妹情誼，彼此合作，甚至進而達到提升女性地位的效果，如林海音、張秀亞、歐陽子等。早在六〇年代初，歐陽

<sup>41</sup> 徐學，〈感性世界——她們的書房〉，《地母與瘋婦：台灣女性半世紀》（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1年8月一版），頁163~165。

<sup>42</sup> 陳穎青，〈編輯室報告《第二性》經典中文全譯本出版說明〉，《第二性》（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13年10月），頁39~41。

子與白先勇等人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社，引介西方文學，如：《吳爾芙專號》對於提倡女性書寫相當有助益，張秀亞撰文推薦吳爾芙的《我的房間》，到了七〇年代初，歐陽子等人譯了西蒙·德·波娃所著的《第二性》；林海音出版了《自己的房間》中文譯本。女作家們亦借助西方文學中女性意識抬頭，鼓勵女性書寫、深刻的哲學思辨、女性自我覺醒等西方思潮，來抵擋男性的嘲諷及貶抑，也同時將歐洲女權思想引介來臺，帶給國人一場知識的洗禮。

1968年林海音成立的純文學出版社，於1973年出版了張秀亞譯、吳爾芙寫的《自己的房間》(1929)，而鍾梅音的第一本散文集則是更早前，於1951年由重光文藝出版社所刊行，接下來筆者想要簡述重光文藝出版社的由來。前文引用了一篇，林海音〈武月卿／當年一「抗議」〉，她在此文中所提及的茹茵（耿修業）曾為《中央日報》副刊主編，而此人亦是重光文藝出版社的創辦人之一。1950年陳紀澄與徐鍾珮、趙友培、耿修業、陸韓波等成立重光文藝出版社。筆者研究的女作家鍾梅音第一本散文集《冷泉心影》即是1951年7月由此出版社出版的。據應鳳凰〈陳紀澄與重光文藝出版社〉的內容資料：

「重光文藝出版社」成立於民國39年11月29日，誕生的地點，就在朱撫松先生的公館裡。朱太太即女作家徐鍾珮女士，她是這個出版社創社之初的成員之一。

「重光」的名字，則是耿修業想出來的。那個時候，他們剛到臺灣，一心想著國土重光；這個名字多少也代表了當時一般人的心境。(中略)

他們的出版理想是——自寫、自印、自銷，希望以最佳的內容，最廉的價格，來服務讀者大眾。第二年年初，即民國40年元月，「重光」的第一本書：徐鍾珮的散文集《我在臺北》便堂堂上市了。<sup>43</sup>

鍾梅音的第三本散文集《海濱隨筆》選錄多篇刊載於1950年《大華晚報》第3版，「瓜棚豆架閒話」專欄，有：〈女人與高等教育〉、〈斤斤較量〉、〈勞軍〉、〈關於平劇〉、〈音樂走向普羅〉、〈面子〉、〈弟弟的小天地〉等篇，內容有鍾梅音對於女性教育、時事、音樂藝術等的看法，收錄於《海濱隨筆》1954年11月由大華晚報社出版，而如茵先生

<sup>43</sup> 應鳳凰，〈陳紀澄與重光文藝出版社〉，《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7，陳紀澄》（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初版），頁319。

——耿修業即是《大華晚報》的創辦人之一，根據鄭貞銘所寫的《百年報人 3：一代新聞宗師》的整理：

耿修業，筆名如茵……他在中央政校新聞系接受馬星野的教育，……民國三十五年底，進入南京《中央日報》服務，三十八年隨報來台，曾任主筆兼編中央副刊。民國三十九年二月一日，他約集錢震、李荊蓀等十三人集資合力創辦《大華晚報》，民國四十年十月，耿修業擔任發行人兼社長，為我國的晚報塑造格調及模式。<sup>44</sup>

五、六〇年代的臺灣文壇上，包括《中央日報》、《大華晚報》等副刊都刊登了許多女性作者的文章，研究孟瑤的黃瑞真觀察五〇年代女作家的處境，她提出這樣的說法：

五〇年代的女作家，幾乎都是在五四新精神的時代氛圍中成長，當她們被時代趨迫著離開家鄉，千里迢迢的由大陸各個角落來到台灣這個小島時，也正是她們人生經歷與思想的一大轉折與考驗。……另一方面當面對五〇年代男性文學雄偉的美學觀點、文藝政策所高懸的鵠的引導下，她們的寫作版圖十分狹小；她們只能以迂迴的方式抗拒男性的審美觀，在縫隙中尋找生命的空間，也在有意無意中漸漸逸出男性主權的話語。<sup>45</sup>

或許女性的掙扎與奮鬥，就如同黃瑞真所言的那般微妙地逐漸開拓出空間來。在五〇年代，有相當多戰後遷臺的外省女性加入了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而這個文藝團體也培養了女性寫作的風氣，參與的女性多受過新式教育，也多經過了五四精神的洗禮，閱讀了像朱自清等散文家的作品，女性因此也試圖從事寫作，然而當時臺灣文壇上有一種力量，引領外省遷臺女性從事寫作，並指導著她們寫作文本走向，藉由刊登她們的作品來鼓勵她們，同時，亦限縮著她們的寫作內涵及方向，將之引導至男性主導的官方文藝政策中，然而，女性也試圖寫出屬於她們的風格，開創出自己的路。

雖然官方文藝所鼓勵的是能反應大時代的長篇小說，然而，鍾梅音選擇的創作文體大多以散文為主，僅在 1957 年出版過《遲開的茉莉》一本短篇小說集，事實上鍾梅音也曾嘗試寫寫小說，她設定想寫的角色是「不平凡人物」的故事，然而，卻並未被報刊

<sup>44</sup> 鄭貞銘，〈耿修業〉《百年報人 3：一代新聞宗師》（臺北市：遠流，2001 年 9 月初版），頁 15。

<sup>45</sup> 黃瑞真，《五〇年代的孟瑤》（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36。

副刊編者所欣賞、採納，建議鍾梅音寫些自己熟悉的故事，這也算是對於女性寫作的一種反鼓勵，以及編者指導著寫作者寫作內容和範圍。

鍾梅音並在 1958 年《小樓聽雨集》的〈自序〉中，在回顧了她自 1948 年到 1958 年寫作十年生涯後，她決定專心致力於散文寫作，因為散文紀錄了她的情感和生活的點滴，自己在整理重讀了舊作的過程中，她說：

無意中從這些散文裏找回了久已失去的自我，隨著字裏行間的笑聲淚痕，我忽而喜悅，忽而憂傷，它們使我想起許多幾乎被遺忘了的人物，包括我此刻正就讀於美國明尼蘇達研究院的小弟，他與我生活在一起時給予我的扶持與安慰，乃至偶然的淘氣和爭執，都令我深深懷念。<sup>46</sup>

因此，筆者認為鍾梅音的散文書寫，在某種權衡之下，她選擇就「散文」文體，寫的是她所「熟悉」，並且也是她所「喜愛」的人、事、物，以及用她的文學素養、思想、看法等，並在長久耕耘之下逐漸寫出了屬於她個人獨特的作品風格。鍾梅音說：

爲文首貴自然，不矯飾，不賣弄，不說別人說過的話，也不說自己並不想說的話。

47

鍾梅音以「家」為創作核心，題材不外乎圍繞在親人、夫妻子女、在臺灣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以及養雞、賣蛋、種花、除草等家居生活的點點滴滴，同時她也經常寫到故鄉親人，以及對小時候的憶念等。因戰爭被迫遷移，離散流亡的人們，來到臺灣後，試著安頓下來，但內心深處仍念著故鄉，腦中盤旋著對過往的種種憶念回想。鍾梅音亦書寫了遷臺人們有著「兩處鄉愁」<sup>48</sup>以及「第二故鄉」<sup>49</sup>的心理狀態，她也透露了她始終處於漂泊的心，到了宜蘭蘇澳，終於有了「家台灣」的安定感。鍾梅音曾提過，一次，她出遠門，去了一趟臺北後，在回蘇澳居所的路途中，踏上了宜蘭縣的快車上，她說：「家，一步一步近了。」<sup>50</sup>，清楚地標記出她的家在一一宜蘭蘇澳。鍾梅音在蘇澳時期寫了相當多的散文並發表於各大報上，她第一本散文選集《冷泉心影》的書名即是

<sup>46</sup> 鍾梅音，〈自序〉，《小樓聽雨集》（臺北市：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1958年6月初版），頁1~2。

<sup>47</sup> 鍾梅音，〈禮帽下的兔子〉，《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初版），頁90。

<sup>48</sup> 鍾梅音，〈無題〉，《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93。

<sup>49</sup> 鍾梅音，〈旅途隨筆〉，《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222。

<sup>50</sup> 鍾梅音，〈無題〉，《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94。

以蘇澳名勝——冷泉來命名。這或許就是范銘如所觀察到外省女性的在地台灣書寫，進而提出的「台灣新故鄉」說<sup>51</sup>，以及應鳳凰直指鍾梅音《冷泉心影》此書的特色，便是在地書寫<sup>52</sup>。

## 二、中期作品

鍾梅音中期作品：1966年《海天遊蹤》至1975年《昨日在湄江》。從1966年《海天遊蹤》的出版算起，即六〇年代中後期至七〇年代中期，包括《海天遊蹤》二集，加上另外九本散文集，共十本。

1949年5月20日政府實施戒嚴<sup>53</sup>，人們不能隨意出入境的年代<sup>54</sup>，然而，鍾梅音於1966年出版了她最受矚目，且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海天遊蹤》，對於此書，鍾梅音在此書序文中說：

我發現我的作品從未像現在這樣受歡迎，也因此，這部遊記決定由我自己刊印，我要盡我力之所及，把它印得十全十美，作為我與外子余伯祺先生的銀婚紀念。封面與扉頁請自由中國第一流美術家龍思良先生設計。<sup>55</sup>

張瑞芬〈海天歸來——論鍾梅音散文〉回顧鍾梅音作品，特別提到《海天遊蹤》的特殊性，在鍾梅音出版的作品中，她認為：「《海天遊蹤》無疑是一個重要分水嶺，足稱為鍾梅音散文寫作的轉捩點。在這部浩大工程的遊記之前，她在報紙副刊寫的小品文，體制短小，主題多樣……典型家常瑣細風格等。」<sup>56</sup>。鍾梅音也曾在1966年10月所寫的〈耳朶、素描、及其他——《摘星文選》代序〉一文中，回顧了她的寫作歷程，引文如下：

<sup>51</sup>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年8月），頁41。

<sup>52</sup> 應鳳凰，《文學起步 101：101位作家的第一本書》（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6年12月），頁110。

<sup>53</sup> 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於1949年5月19日頒布《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一號》（簡稱《臺灣省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總統頒布總統令，宣告臺灣地區自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解嚴。

<sup>54</sup> 令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令（1949-02）。[臺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4f/b6/0d.html（2018/07/19 瀏覽）。

<sup>55</sup> 鍾梅音，〈序〉，《海天遊蹤（第一集）》（臺北市：大中國圖書公司，1978年3月14版），頁2。

<sup>56</sup> 張瑞芬，〈海天歸來——論鍾梅音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市：麥田出版，2006年2月），頁90。

我的寫作是以散文開始，十幾年來，雖曾一度嘗試短篇小說之創作，終因發現自己個性裏缺乏創作小說的條件，決定仍然回到散文。

但散文是一種直接訴諸作者所思所感的體裁，它的創作泉源只有兩處：生活與讀書。而讀書所能提供的，除了若干隨筆之類的雜文以外，主要功能仍是抽象的，那便是思想的深度。個人生活範圍其實非常有限，所以古今中外，散文作家很少「著作等身」的。

爲此我時常想拓展自己的生活圈，總算有那麼一天，我得到環球旅行的機會，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說，再沒有比這更令人高興的事了。<sup>57</sup>

由於這難得有的環球旅行，鍾梅音才得以寫出《海天遊蹤》二集，所以她相當重視此書，甚至決定自己刊印。因此，筆者亦依據張瑞芬的說法，將《海天遊蹤》此散文集創作，劃分為鍾梅音中期寫作時期。由於《海天遊蹤》為鍾梅音重要作品，甚至可說是代表作之一，筆者接下來將作較細膩的探討。

鍾梅音中期寫作時期的作品，最為人所知的便是《海天遊蹤》，此書長達廿五萬字，文中還特別附上三十餘幅，精美全頁的彩色圖片，使人為之嚮往，相當暢銷。到了 1978 年，便達十六版，可見此部遊記受歡迎程度。

筆者查閱同期遷臺女作家出版作品，六〇年代，除鍾梅音《海天遊蹤》以外，發現另外還有其他外省女作家亦出版了遊記。六〇年代正值戒嚴時期，當時人們是不能隨意出入境的，然而，除鍾梅音隨丈夫業務考察出國，而得以出版印行《海天遊蹤》（1966）外，尚有其他外省女作家亦陸續出版了遊記，六〇年代早期如謝冰瑩《馬來亞遊記》（1961），而後又有張裘麗《我在尼羅河上游》（1969）、王琰如《我在利比亞》（1969）等，對於這幾位女作家為何出國，筆者認為得做個交代，以下將進行簡略說明。

與鍾梅音同是外省女作家的謝冰瑩，曾於 1958 年赴馬來西亞太平市華聯中學任教，兩年後回臺。張裘麗則是在 1964 年 10 月，「外子受聯合國聘，派往東非烏干達主持一項水利工程的開發。」<sup>58</sup>，而隨夫婿僑居非洲兩年半，並寫下《我在尼羅河上游》這本散文集。張裘麗在此書〈自序〉中說明其著作內容：

<sup>57</sup> 鍾梅音，〈耳朵、素描、及其他——代序〉，《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1。

<sup>58</sup> 張裘麗，〈自序〉，《我在尼羅河上游》（臺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69 年 2 月），頁 3。

大部都是我在那與週遭環境奮鬥的片斷紀錄，日常發生的身邊瑣事及好多有驚無險的場面。還有一些是我對那尼羅河發源地那份優美風光的感受與讚美。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非洲人的赤誠、可親及有人情味的內心和舉動。<sup>59</sup>

除此之外，另外還有王琰如在六〇年代得以出國原因，亦是夫婿工作關係，王琰如隨夫婿工作而到利比亞居住將近五年時間，寫下了《我在利比亞》。她在〈我所知道的利比亞王國〉一文中，提及了她決定搬遷非洲的心路歷程：

做夢也未想到，我這一生，還有機緣跑來非洲作短期過客。也許出於一種好奇心，也許憑着一腔盲目的狂熱，當外子決定有非洲之行時，我從未阻擋過他，相反的，我覺得能到『黑暗大陸』看個究竟也好。……島居十七年，慨然允應暫別繁花似錦的臺灣，到那不可知的地方，需要相當勇氣。<sup>60</sup>

然而，為何鍾梅音、謝冰瑩、張裘麗、王琰如等外省女作家不約而同地皆能有機會出國，並且能在六〇年代出版了遊記散文呢？張瑞芬指出鍾梅音能出國，和她的「特殊身分有絕對關係」<sup>61</sup>，因為她是臺肥總公司業務處長余伯祺的夫人。鍾梅音因隨丈夫余伯祺（時任職臺肥）出國業務考察，而得以至海外旅行，於1964年夏環球旅遊80日，遊歷13國25座城市，回來後，她將此趟出訪遊歷發表且連載於《中央日報》副刊，後來，將之集結成遊記，共收錄51篇，於1966年出版《海天遊蹤》。

筆者研讀資料後，發現在那個戒嚴時期，的確如張瑞芬所說的得具有特殊身分地位，又或者是有特別任務，或是得經審核過後等，才能出國，實屬不易。查看這些女作家也都符合上述條件，但難得的是，有機會出國的她們，因有著寫作的的能力，寫下了許多遊記散文，將其所見所聞記錄了下來，不僅在戒嚴時期，給了當時人們一個新的視野，對於今日的讀者讀來都能有頗多受益，女作家們的遊記，亦可說是留下了珍貴史料以供後人參考研讀。

《海天遊蹤》是1966由鍾梅音自己刊行的，可說是鍾梅音的代表作之一，筆者將再細緻地討論此書，或許能區分出《海天遊蹤》與其他同期女作家的散文遊記有何不同。

<sup>59</sup> 張裘麗，〈自序〉，《我在尼羅河上游》（臺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69年2月），頁5。

<sup>60</sup> 王琰如，〈我所知道的利比亞王國〉，《我在利比亞》（臺北市：三民書局，1969年9月），頁1。

<sup>61</sup> 張瑞芬，〈文學兩「鍾」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183。

同時，筆者也會將鍾梅音遷徙的經歷作一番的交代。

### （一）、《海天遊蹤》寫作前的練筆準備

鍾梅音為了書寫 1964 年夏環球旅遊 80 日，遊歷 13 國 25 座城市的所見所聞前，其實她是做足了準備。《海天遊蹤》（1966）集結出版後，隔年又由三民書局出版的《摘星文選》（1967），鍾梅音在此散文集的序文中做了說明。

《海天遊蹤》深受讀者喜愛，因此紛紛寫信打聽一些問題，比方說，鍾梅音是否還有什麼其他的創作等，於是鍾梅音便在隔年，也就是 1967 年出版的《摘星文選》〈耳朵、素描、及其他（代序）〉序文中答覆讀者，並且說明了《海天遊蹤》寫作的事前準備，她在《海天遊蹤》這本書，連書名都還沒想出時，鍾梅音就知道要寫 80 日的遊歷，將會是一件大工程，她必須要磨磨筆尖，做足準備，她表示：

我必須再從雕刻小貓小狗開始……這本「摘星文選」……其中僅僅以「搬家」為題材的便有五篇（這兒只選了兩篇）。搬一次家，能寫上五篇文章，這是在課堂上看見老師命題總覺無話可說的學生所難於想像之事。<sup>62</sup>

### （二）、旅遊以外的遷徙，鍾梅音的隨夫婿搬遷史

為了練文筆、磨筆尖，鍾梅音特舉例光搬家這個題材，她就寫了五篇散文。鍾梅音隨夫婿工作業務得以出國，想把那將近三個月的遊歷寫成文，而必須得練筆的她，若以搬家為題材的話，大概可把筆尖磨得鋒利。除了感到驚奇以外，這裡更提醒了筆者需細究並交代，為何鍾梅音遷徙的頻率如此之繁？而且也藉由接下來的回顧，包括余伯祺的工作性質等，以及從〈憶梅音〉文中透過陳紀澄的角度來觀看余氏夫妻，可以更清楚知道為何鍾梅音中期寫作除了《海天遊蹤》以外，其他作品也是多為遊記。

因此，在此必須一提的是，五〇年代外省女性作家，以鍾梅音為例，更是經常性地隨夫婿到處遷徙，或許，就如同描繪傳統華人女性生命歷程的一句俗語：「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因為回顧鍾梅音的生命歷程，可真是一部女性隨夫婿搬遷史。

---

<sup>62</sup> 鍾梅音，〈耳朵、素描、及其他——代序〉，《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2。



余伯祺才華出眾，事業心強，富有開創性，而他的妻子鍾梅音不但是他的賢內助，更在他的事業上提供了實質上的幫助。余伯祺在 1982 年〈老婆大人〉一文中提到有一年颱風從東部登陸，當時他人在臺北述職，因交通問題而無法趕回宜蘭視察災情，而他的賢妻鍾梅音，喘病剛愈，卻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和相關工作人員「披掛上陣」了，途中涉急流、攀削壁，不但替他到現場勘災，還慰問了員工眷屬，並立刻向他告知相關災情。余伯祺說鍾梅音的這一報告，他就有如獲得尚方寶劍，因為他得知道詳細災情，才能請款搶修。他非常感恩地說：「我這小礦要供應兩大肥料廠的原料，兩廠都不曾因供應斷絕而停工，實在應記吾妻一功。」<sup>63</sup>陳紀滢也曾稱讚鍾梅音的意志力比常人堅強，而她的個性搭配著余伯祺的多才、多能使得「這一對夫婦在事業上，顯得特別突出」<sup>64</sup>

余伯祺所回憶的上述往事是 1949 年 3 月時臺灣肥料公司派他在蘇澳任廠長期間所發生的事。1955 年他又調職到臺北，在臺肥總公司任業務處長，卜居杭州南路。根據陳紀滢〈憶梅音〉一文中的資料得知，余伯祺後來離開臺肥後，就任臺灣交通公司總經理的職務，大量地擴張臺北市的交通營業，陳紀滢說「計程車」此字乃為余伯祺所創，「出租汽車」本是根據英文 TAXI 而名，「伯祺認為那是洋名，而且有四個字之多，於是他創一新名詞：『計程車』，按程計費也」<sup>65</sup>，陳紀滢並指出余伯祺因才能出眾，得企業家欣賞而有了更多發展的機會，「伯祺後來又被王永慶氏延攬，為臺塑打頭陣，可知他的才華出眾。因此，他被泰國僑商看中，邀他去創辦事業。在那兒兩年，他又到新加坡創辦事業……（一九七七）伯祺退休，定居美國洛城……伯祺因年事尚輕，天性閒不住，故擬開闢南美商業之路……」<sup>66</sup>，從以上陳紀滢的記述可得知余伯祺不但富創業精神，而且他「花樣」也很多，早在臺肥時代，已為人所共知，而後又受到賞識，他亦勇於接受挑戰。余伯祺能力好，有創意，更積極地拓展他的事業版圖。

由以上余伯祺的工作經歷來看，因為余伯祺的工作性質，妻子鍾梅音經常得隨夫婿搬遷，當初她會來臺灣也就是隨夫婿搬遷過來的。1948 年 3 月，從大陸渡海遷臺到基隆後，隔年 3 月又從基隆遷居宜蘭蘇澳，大約在蘇澳住了 6 年後，於 1955 年 4 月搬到臺

<sup>63</sup> 余伯祺，〈我的老婆大人〉，《我的另一半（第一集）》（臺北市：中華日報社，1978 年 3 月五版），頁 154。

<sup>64</sup> 陳紀滢，〈憶梅音〉，《傳記文學》第 44 卷第 3 期（1984 年 3 月），頁 76。

<sup>65</sup> 陳紀滢，〈憶梅音〉，《傳記文學》第 44 卷第 3 期（1984 年 3 月），頁 74~75。

<sup>66</sup> 陳紀滢，〈憶梅音〉，《傳記文學》第 44 卷第 3 期（1984 年 3 月），頁 75。

北，1959年6月遷居高雄，1961年又遷回臺北。1964年6月24日至9月2日，隨丈夫出國業務考察<sup>67</sup>，環遊世界80日，將遊歷寫成《海天遊蹤》。而後，在1969年5月，因丈夫的工作關係而搬離臺灣，移居泰國曼谷。在泰國期間，持續在臺灣報刊上發表其散文作品，常見如《中央日報》第9版「蘭苑隨筆」專欄。1971年6月由臺北三民書局出版《蘭苑隨筆》散文集。1971年8月再遷居新加坡。1972年4月到6月期間，第二度旅遊歐美兩個月，並於1973年8月出版《旅人的故事》。又於1975年出版了《昨日在湄江》。鍾梅音自從1969年5月旅外期間，在各報刊雜誌上，仍持續發表旅遊紀實的遊記散文，並陸續集結出版，寫作精神令人感佩。

### （三）、遊記的價值及侷限性

鍾梅音隨夫婿余伯祺業務旅行出國，環球旅遊80日，寫成的遊記散文《海天遊蹤》，但是遊記畢竟是短暫的停留，難免有人質疑遊記所記錄下的觀察是否過於走馬看花<sup>68</sup>。然而，子敏對於此論斷，持不同見解，他並推薦鍾梅音所著的遊記說：

一個地方的「神祕的帷幕」，只給初次會面的「新遊子」揭開一兩天。過了那「黃金時刻」，代表那地方的特色和韻味的「曇花」就謝了。鍾梅音女士這次去看「曇花」，在「曇花未謝」以前……「速寫在格子紙上」，因此，她的遊記能給人一幅「有個性的世界萬里圖」，值得我們欣賞。<sup>69</sup>

然而，抓著當下感受固然重要，卻仍有可能是較片面及主觀的判斷，倘若能更深入當地生活，但又保持一定的距離觀察，或許有助於更理性、更客觀地理解當地文化或客

---

<sup>67</sup> 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資料，將移民署組織演變分為四個時期：1949年政府遷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會同臺灣省政府，於2月10日公布「臺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實施入境管理，當時重點在防止匪諜滲透。又為防止臺灣地區人口流失，於同年5月28日公布「臺灣省出境軍公人員及旅客登記辦法」，並於6月1日實施出境管制；上述管制均依戒嚴法第11條第9款執行。此時期為第一時期：軍、民分管時期（1949年2月至1952年4月）。然而，鍾梅音與丈夫出國時間是1964年夏，屬於第二時期：國防部軍事體系時期（1952年4月至1972年9月）這段時期，出境人數逐年增加，到1967年突破十萬人次。

網路資料：<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5388/7169/15869/>，查詢日期：2019/1/2

<sup>68</sup> 三民網路書店在《我在利比亞》介紹文中寫道：「環遊世界八十天」，畢竟是走馬看花的。王琰如女士旅居非洲好幾年，寫的是非洲數十個國家極北的一國——利比亞王國，當然深刻，實感多了。

網路資料：<http://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091461>，查詢日期：2019/1/2

<sup>69</sup> 子敏，〈讀《海天遊蹤》〉，《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294。

居地。1969年5月，鍾梅音移居泰國曼谷，居住當地兩年期間，1971年6月出版了《蘭苑隨筆》等。1971年8月，鍾梅音又移居新加坡，又陸續出版了許多散文集，包括1975年8月《昨日在湄江》等。據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副教授許文榮，觀察鍾梅音於1969年離開臺灣，旅居東南亞多年後所寫的散文指出：

親身在東南亞經歷了當地的現實生活後，與當地人自由交往溝通後，較能從當地人／局內人的視角去看，……更能理解東南亞政治社會文化的特殊性，這是在創作上與思想上的蛻變。<sup>70</sup>

或許我們能說旅居東南亞八年期間的鍾梅音，已從一種看曇花的新鮮神秘體驗，落實到平實的當地生活，生活在其中，感受到的是屬於當地平常的生活脈動，卻又特殊的異國生活情趣，甚至能更客觀地觀察到當地社會真實存在的面貌。

#### （四）、遊記散文外的兒童文學翻譯

鍾梅音中期寫作時期，除了生活小品散文與遊記散文的書寫外，她在1971年夏旅居新加坡後，亦出版了兒童文學翻譯叢書。她為新加坡國家圖書發展委員會翻譯兒童文學叢書。一套是由亞洲十六國作家執筆，另一套則由新加坡作家集體執筆<sup>71</sup>。根據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對於鍾梅音在新加坡所從事的翻譯工作，她表示：

鍾梅音在南洋期間主要翻譯了17冊兒童文學書籍，包括兩冊《亞洲民間故事：給全世界兒童》<sup>72</sup>，以及15冊《亞洲民間故事》<sup>73</sup>。《亞洲民間故事：給全世界兒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洲區聯合出版計劃的成果，由16位來自不同亞洲國家的作家執筆，每冊各8個該國的民間故事。<sup>74</sup>

<sup>70</sup> 許文榮，〈文學跨界與會通——蘇雪林、謝冰瑩及鍾梅音的南洋經驗與書寫的再思〉，《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251。

<sup>71</sup> 鍾梅音，〈美的畫像——「昨日在湄江」序〉，《昨日在湄江》（香港：立兩公司，1975年8月），頁2~3。

<sup>72</sup> 1975年新加坡聯邦出版社出版，聯合國亞洲文化中心贊助。

<sup>73</sup> 1976年新加坡聯邦出版社出版。

<sup>74</sup> 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華文文學》，第127期（廣東省：汕頭大學，2015年2月期），頁53~56。

鐘麗慧在〈鍾梅音卷（四）〉中，對於鍾梅音所譯的兒童讀物，有詳細的資料紀錄及目錄整理，文中她說明 1975 年出版的《亞洲民間故事（二冊）》這套兒童讀物的中文版為鍾梅音的譯作，原本是由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的 16 個亞洲國家會員撰述各國的典型民間故事，第一冊和第二冊各有 8 個故事，兩冊合計 16 國的民間故事，中文版則由鍾梅音來負責翻譯，而聯合國亞洲文化中心贊助出版。另外還有 1976 年出版的《東方民間故事集》全套共 15 冊，用英文撰寫，再譯為中文，「能言鳥」為其中一冊，由謝勳澤文，鍾梅音譯。<sup>75</sup>

鍾梅音所翻譯的兒童文學叢書是皆由新加坡聯邦出版社出版，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學者衣若芬評為：

鍾梅音的翻譯流暢典雅，甚至和她的散文一樣，不知不覺流露文言的句法或語詞。例如，原文作：“Sang Nila welcomed the visitors for in his eyes, they were all brothers”，鍾梅音譯為：「桑尼拉歡迎他們每一個人，因為在他的眼中，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固然應該就是原作者的意思，鍾梅音可以只寫一句「四海之內皆兄弟」，她直接引用《論語》的句子，中間斷開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使得平鋪直敘的白話文產生了文言的曲折感，停頓的效果也使得統治者桑尼拉的話語有了不同凡響的權威感。<sup>76</sup>

衣若芬認為鍾梅音的翻譯就像她散文中常流露出文言句式的典雅風格，而這樣的譯法，不但不影響兒童文學平易的閱讀，她翻譯時所採用的語句製造出的效果，反而更貼近童話人物的角色和地位。鍾梅音承接此翻譯工作，或許也是相關單位對她的能力的肯定，可惜在臺灣似乎沒有發行。

#### （五）、作家身分外所展現的編輯能力，抒情寫作外參與文協組織的身影

說到鍾梅音的工作能力，頗受好評，對於想研究認識鍾梅音的研究者，也許也需了解，在此筆者將略為回顧交代，因為這有助於了解鍾梅音的寫作環境背景。

<sup>75</sup> 鐘麗慧，〈鍾梅音卷（四）〉，《文訊雜誌（雙月刊）》第 35 期（1988 年 4 月），頁 243～244。

<sup>76</sup> 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華文文學》，第 127 期（廣東省：汕頭大學，2015 年 2 月期），頁 53。

早在 1955 年鍾梅音在臺時期，當時鍾梅音家從蘇澳遷居至台北後，生下暱稱為小白羊的女兒余令恬，在她小女兒出生八個月時，她應王文漪、林海音、姚葳之邀，於 1956 年 4 月進入職場，任職於《婦友》月刊主編。《婦友》月刊是在 1954 年 10 月，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簡稱「婦工會」）<sup>77</sup>所發行的。根據游鑑明的研究，當鍾梅音接任《婦友》主編工作時，婦工會於年度報告中曾記載鍾梅音銳意革新。創辦《婦友》的王文漪，婦工會的重要幹部，也稱許鍾梅音的工作效率高<sup>78</sup>，才思敏捷。王文漪回憶道：

梅音是一位冰雪聰明，才華橫溢的作家，還記得早在民國 41 年，我和鍾珮、月卿、多慈諸姐，還有陳紀滢先生到蘇澳，在她海濱的家去作客時，就發現她多方面的才華，敏捷的動作一如她敏捷的才思，有豈止擁有一支優美的筆？<sup>79</sup>

筆者查看外省作家過往所留下的照片中，有不少是參與組織活動期間，或文友們私下聚會交流等所攝的合影留念，包括了中國文藝協會、女作家慶生會等藝文活動。外省族群參與組織，或許是因有著共同的遭遇與一定的信仰，文人之間，頗有互動來往交流。據陳紀滢在 1984 年 2 月 4 日寫的〈憶梅音〉一文中，回憶了這段文人之間的友誼，他回顧道：

我知道梅音之名約在民國三十九年初。那時耿修業兄正在主編『中央日報』的副刊（中副），時常有『鍾梅音』及『音』字大名的作品。在她同時，女作家中，時常見報的有徐鍾珮、張秀亞、林海音女士等人，她們的作品，幾乎散見各報副刊。等三十九年五月四日，中國文藝協會成立之後，所有這些男女作家都互相認識了。

80

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牽起了文人之間的交流的機緣，而陳紀滢在〈憶梅音〉文中也提及了余氏夫婦的好客，及文藝界人士到蘇澳遊玩，並參觀鍾梅音的筆下「冷泉」的紀錄，引文如下：

<sup>77</sup> 1953 年 10 月 21 日，國民黨成立的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簡稱「婦指會議」），即戰後婦女界的最高領導機構。「婦指會議」其下設置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簡稱「婦工會」）。

<sup>78</sup> 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 年代的《婦友》月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 年 12 月），頁 211~216。

<sup>79</sup> 王文漪，〈懷思梅音〉，《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 年 12 月），頁 133。

<sup>80</sup> 陳紀滢，〈憶梅音〉，《傳記文學》第 44 卷第 3 期（1984 年 3 月），頁 72。

夫婦倆都好客，先後於三十九年夏秋之交分次迎臺北文藝界友人到蘇澳去遊玩。計第一批的有海音夫婦（夏承楹兄）等，第二批則有大批人馬，其中包括孫多慈教授、徐鍾珮、武月卿、王文漪女士等。男性方面有攝影家苗豐盛及我。苗先生係臺肥基隆廠高級職員。（中略）

那幾年，她經常招待來自臺北的朋友……她們夫婦又帶我們去參觀了「冷泉」。我沒到過濟南去參觀「珍珠泉」，如「老殘遊記」所寫。但參觀了「冷泉」之後，想到珍珠泉的形狀。「冷泉」面積並不大，但靠梅音的一支筆，已遐邇皆聞。「冷泉」本身不出名，却因「冷泉心影」聞名海內外了。<sup>81</sup>

鍾梅音在〈有朋自遠方來〉文中曾透露她相當珍惜這些文友之間的情誼。住在宜蘭蘇澳的鍾梅音，若有臺北友人願意前來探望她，她都抱著感謝之心情，因為「住在『舉目無親』的鄉下，好就好在一點，——願意冒著盛暑長途跋涉，從臺北不遠千里而來降臨寒舍使蓬蓽生輝的，當然不是同窗，便是知己。」<sup>82</sup>，可見外省作家們的書寫社群，透過文藝組織團體、交誼活動等，於公領域與私領域都互有交流。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文藝組織有其成立的理念及冀望達成的目標，在「婦工會」有一「要點」為，組織並結合婦女人才。可見鍾梅音是個受官方肯定的人才。因此當我們的印象還停留在她所寫的〈雞的故事〉內容敘說一隻公雞和兩隻母雞的愛情故事，小母雞擔心自己會成為節慶中主人桌上的佳餚，公雞安慰小母雞說，母雞只要能下蛋，便能存活下來。後來小母雞順利生了蛋，而公雞也在一旁守護著牠，總算，皆大歡喜。內容屬於養雞、種菜等「身邊瑣事」<sup>83</sup>，從鄉間簡單的主婦生活中提煉出的趣味。

然而，其實也應看看鍾梅音為凝聚國族力量、推崇領袖而寫的〈祝壽〉，以及鍾梅音丈夫余伯祺 1982 年 7 月所寫的〈我的老婆大人〉<sup>84</sup>等文，來認識鍾梅音的另外一個面向的思維呈現。〈祝壽〉是鍾梅音為慶祝蔣中正總統 66 華誕所寫，「我們今日祝壽，並非為一個個人祝壽，乃是因為 總統是領導革命的先知，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以 總統一身而繫國家之安危，有 總統，才有國家，所以我們不僅要為 總統祝壽，更要為民族祈福。」

<sup>81</sup> 陳紀澄，〈憶梅音〉，《傳記文學》第 44 卷第 3 期（1984 年 3 月），頁 72~73。

<sup>82</sup> 鍾梅音，〈有朋自遠方來〉，《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 年 5 月），頁 18。

<sup>83</sup> 陳紀澄，〈序「冷泉心影」〉，《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 年 5 月），頁 2。

<sup>84</sup> 余伯祺，〈我的老婆大人〉，《我的另一半》（臺北：中華日報社，1982 年 7 月），頁 151~163。

<sup>85</sup>這是愛戴領袖的赤忱表現，十足站在官方主流立場思考；鍾梅音身體不太健康，當我們替她擔心，以為她僅是個虛弱需要在家休養的弱女子時，丈夫余伯祺寫的〈我的老婆大人〉「她是至性中人，國家需要她，一有徵召，立刻前往，金門就去過不止一次，而且有一次是在戰情危急之時。」<sup>86</sup>在危難時，她曾勇敢地前往前線金門、馬祖等地勞軍，還寫下了多篇文章來安慰人心並激勵鼓舞士氣。

鍾梅音散文中流露出的真實情感，和逐漸八股僵硬的反共小說比起來，女性筆下書寫出的抒情散文似乎顯得更易觸動人心，為官方倚重的另一股軟性柔情力量。1969年3月鍾梅音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余伯祺於1982年7月所寫的〈我的老婆大人〉文說鍾梅音曾被「提名競選中央委員」<sup>87</sup>，而鍾梅音告訴丈夫自己原不是那塊料，連自己被提名都不知道呢！余伯祺表示他的妻子雖然有其能幹處，也相當愛國，但記性差，幸好自己的太太尚有自知之明，余伯祺透露說妻子有兩度承蒙以前服務的機構要保送她上陽明山受訓，她都婉謝之。余伯祺還幽默地說他數字觀念不大清楚的太太，沒有選上中央委員確實是國家的福祉。

當我們關心她是否會更接近黨政核心機構時，或許基於本人意願也不高，也自認並不是從政的料，加上有著氣喘宿疾，實在無法承擔責任繁重的政治工作。1964年，又由於丈夫工作性質的轉換，隨夫業務考察出國旅行，環遊世界80天。1966年集結成《海天遊蹤》出版。1969年5月，因丈夫工作的關係，移居泰國曼谷。1971年8月又遷居新加坡。鍾梅音旅居國外，因著生活居住環境的轉換，眼界打開，逐漸從「家台灣」放眼世界了。

鍾梅音中期寫作時期，以環遊世界80天的遊記1966年《海天遊蹤》二集為起始，而後1969年鍾梅音移居泰國曼谷兩年期間，1971年6月出版了《蘭苑隨筆》等。1971年8月，鍾梅音又移居新加坡，又陸續出版了許多散文集，包括1973年《旅人的故事》、1975年《昨日在湄江》，旅居東南亞八年後，隨著丈夫余伯祺於1977年7月退休後，又移居美國加州洛杉磯。

<sup>85</sup> 鍾梅音，〈祝壽〉，《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17。

<sup>86</sup> 余伯祺，〈我的老婆大人〉，《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125。

<sup>87</sup> 同前註，頁125。

### 三、鍾梅音寫作後期階段

最後，來到了討論鍾梅音寫作後期階段，她 1977 年移居美國後，出版的最後兩本散文集。鍾梅音的後期作品為：1978 年所出版的《這就是春天》以及 1980 年鍾梅音出版的最後一部散文集《天堂歲月》共兩本散文集。

移居東南亞近十載後，隨著丈夫余伯祺於 1977 年 7 月退休，又移居美國加州洛杉磯。那是她心愛的子女所在地，一家團聚。移居美國後 1978 年所出版的《這就是春天》內容多為宗教唱詩、藝文生活等小品文。

一生與喘病奮鬥的鍾梅音，卻在 1979 年秋診斷出罹患了帕金森氏症。1980 年出版了最後一部書《天堂歲月》。在這本書的序中，鍾梅音對於她的一生做了一句總結——「裹創而戰」<sup>88</sup>。對於國家的創痛、父母的創痛、個人的創痛，還有丈夫與兒女的……她感慨萬千，因為她體認到人世越深，才知道世界真是複雜又令人寒心，這也使她特別懷念在她子女童年時期一家在臺灣蘇澳過的單純又平靜的鄉間生活。她愛鄉間自然，愛讀書寫作，愛畫品畫更學畫，尤其繪畫對她而言是傷痛的止痛藥，而對於她的著作，她則謙虛地表示願她的文字對這個世界有點貢獻，所以即使裹創而戰，她還是慶幸她曾有過生命。尤其在晚年，她與先生受洗成為基督徒，「外子與我，已於 1975 年 5 月 18 日在新加坡聖公會教堂接受洗禮。」<sup>89</sup>有了宗教信仰，在教堂唱詩時，就忘卻病痛，心靈亦得到滿足<sup>90</sup>。余伯祺 1982 年發表〈我的老婆大人〉時已退休，當時他細心地照顧著生了病的鍾梅音，使鍾梅音深受丈夫的愛所感動，有感而發地對他說：「你真是上帝賜我的好丈夫啊！」余伯祺說妻子對他說的這句話教他不虛此生，於是寫下這篇文章為記。夫妻兩鶼鶼情深，妻子雖得了病，卻因病讓夫妻之間的愛昇華，不離不棄，守護在身旁的愛。

鍾梅音於 1982 年因病回到闊別 13 年的臺北，接受臺大醫院的治療，由於受病痛折磨，使得她更能了解生病的人的感受及痛苦，由丈夫余伯祺代為籌建慈光療養中心，因為她希望能有療養院來照顧因病所苦的人們。慈光療養院於 1983 在桃園揭幕，實現鍾梅音關照病人的愛心。1984 年鍾梅音因併發症病逝於臺北林口長庚醫院。享年 63 歲。

<sup>88</sup> 鍾梅音，〈裹傷而戰（代序）〉，《天堂歲月》（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0 年 6 月第一版），頁 5。

<sup>89</sup> 鍾梅音，〈往事如夢〉，《昨日在湄江》（香港：立兩公司，1975 年 8 月），頁 49。

<sup>90</sup> 鍾梅音，〈裹傷而戰（代序）〉，《天堂歲月》（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0 年 6 月第一版），頁 5~10。



筆者想用鍾梅音《天堂歲月》中的一段話作為鍾梅音和臺灣的連結：

我親愛的孩子們。是的，他們都在我身邊，但也都不是「那時的他們」了，忽然一股濃濃的鄉愁，竟如烈酒似地灼痛了我的心。這時我才明白，不管走遍海角天涯，我的心還是在台灣。<sup>91</sup>

鍾梅音寫下的此番感受，筆者認為足以當作范銘如以性別為角度觀察，提出的遷臺外省女作家「家台灣」的一段佐證。筆者將在本論文的第四章來說明鍾梅音的「家·臺灣」。鍾梅音過往生命歷程飄移不定，出生於中國，生長在戰亂時代，隨夫渡海來臺，而後又遷往東南亞，然後去了美國，海天遊蹤過後，走過天涯海角，寫下《天堂歲月》時，身在美國，有一雙兒女環繞於身旁的鍾梅音，回顧從前，在她心靈深處所深深懷念的，並且使她產生濃烈鄉愁的竟是一她臺灣的家。此番外省女性作家所道出的鄉愁，早已跳脫出男性善寫的那遙遠大時代的反共懷鄉的中國生長地了。

臺灣，對初遷來時的鍾梅音來說，或許也僅是將之當成暫居地，並沒想要久留，然而，她在臺灣宜蘭的蘇澳期間，漸漸地有了對臺產生了不同情感，她與丈夫胼手胝足地在此地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家，用自己的雙眼、兩腳見證體驗臺灣，並從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所思所想轉化成了文字，傳達給與她有著類似際遇的讀者，鍾梅音的抒情散文曾安慰著，那個時代中，無數漂泊不安的心。鍾梅音愛原鄉中國的心，也曾使得她頻頻回顧過往中國故土，而且，在反共文藝的規訓下，也寫了許多流露真實情感、發自內心懷念家鄉故人的散文作品，但在那逝去的年代，反攻號角遲遲未能響起，漸漸地，遷臺外省男性的眷屬、家庭主婦身分，亦是一雙子女的母親的鍾梅音，基於現實，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家，日久他鄉變故鄉，臺灣也在她的心中扎了根了。

以鍾梅音的書寫歷程來看，她經歷了家國的流亡、臺灣鄉居水土風情的調適，以及五〇年代國家機器下對文人的動員，身為婦女寫作協會一員也是黨員的鍾梅音，從前期「懷人憶舊，溫婉細緻的生活小品文」的書寫，到中期「逐漸放眼世界的旅遊散文」，乃至到了後期，對於人生既感慨又感恩的「宗教唱詩、藝文精神生活小品文」的書寫；另外，在文類選擇上橫跨了散文、詩歌、小說、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翻譯等。筆者在研讀鍾梅音的文本時，還關注到「疾病」與其書寫間的關聯。鍾梅音終生受宿疾困擾，卻又

<sup>91</sup> 鍾梅音，〈我心在台灣〉，《天堂歲月》（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頁53。

能以積極正面的思想來面對及調適，與疾病奮鬥不息的鍾梅音，有別於一般作家，生成另一種特別的人生哲學，以及在精神思想上達到不同的境界。筆者對於鍾梅音疾病與其產生的影響在論文的第三章中會有較細緻的論述。

## 第二節 遷臺女作家創作的時代背景

每一位作家的寫作或多或少受其所處時代的影響，在閱讀了鍾梅音的生平、寫作歷程以及時代背景後，筆者認為五〇年代國家文藝政策在文學生產上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因此，在這裡稍微回到四〇年代後期、五〇年代的時空背景與文藝政策的生成脈絡來探討鍾梅音及其寫作。在此章節，筆者研究的資料、數據等，多參考至陳芳明所著《台灣新文學史》以及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還有林淇瀟《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等著作，透過以上學者的研究，使筆者對於遷臺外省女作家所處的時空環境背景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國民政府 1945 年接收日本殖民地臺灣。對於受日本近半世紀統治下的臺灣，當局制定思想及語言等的改造政策，並積極、強力地推動之。1946 年 4 月設置「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在臺推行國語政策。隨著國共內戰，戰事加劇，政局動盪不安。陳誠於 1949 年 5 月 19 日頒布《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一號》（簡稱《臺灣省戒嚴令》），宣告自同年 5 月 20 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sup>92</sup>。國共內戰導致國民黨退居臺灣，以臺灣作為反共的堡壘，反攻大陸的跳板，許多遷臺人們當時相信不久就能隨政府返回大陸，將臺灣視為暫居之地。五〇年代有其時代特殊性，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亦投射於當時的文學場域，因此，若是能了解遷臺女作家所身處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官方所推行的語言政策和文藝取向，相信能更接近理解作家書寫與時代的牽扯所呈現出的關係。

### 一、五〇年代官方的語言政策

---

<sup>92</sup> 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於 1949 年 5 月 19 日頒布《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一號》（簡稱《臺灣省戒嚴令》），宣告自同年 5 月 20 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1987 年 7 月 14 日，蔣經國總統頒布總統令，宣告臺灣地區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零時起解嚴。

回溯近代史，中國、日本、臺灣之間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糾結，話說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殖民地臺灣，由國民政府接收，自此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然而，臺灣在日本長達近半世紀的統治，再加上在二戰後期日本軍力戰況吃緊時，日本執政當局認為急需加強臺灣人對日本的整體向心力，遂在臺強力推行同化政策及皇民化運動，欲將臺灣人同化成效忠天皇、信仰神道教的日本皇民。這段歷史，根據黃英哲的研究指出「殖民統治末期，大多數台灣人幾乎都已經日本化了。」<sup>93</sup>他並採用葉石濤(1925-2008)的憶詞，使人更加能體會當時臺灣人日本化的程度之深。

作家葉石濤(1925-)回憶戰爭結束時，他甚至連台灣話也不會說，因而斷言當時，台灣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經日本化了。儘管這個數字只是他個人的主觀感受，卻在相當程度上提示了日本戰敗前後當時台灣的社會狀況。<sup>94</sup>

國民政府為接收臺灣，於 1945 年 10 月 25 日成立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5~1947)。陳儀被派任為第一位行政長官。陳芳明解釋此機構「無論在權力結構上或組織規格上，都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sup>95</sup>，而日本台灣總督府原是日本官方設計來殖民、控管殖民地，非一般常規性的特殊機構。陳儀的文化政策，便是要以「中國化」來清除日本人的「皇民」<sup>96</sup>。臺灣，再次面臨官方強制力量下的文化改造。黃英哲指出面對長期浸潤在日本殖民教育，已日本化了的台灣人，國民政府採取了「文化重建」<sup>97</sup>的因應方式，所謂的「文化重建」，意指「為了強固國家體制而以人為的力量建構文化。如此情況下建構出的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乃是自上層或外部強制產生。」<sup>98</sup>，運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強力催化臺灣人對中華民國國民的認同。也就是接收臺灣這個原為日本殖民地後，國民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文化政策的目的是要「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積極重建打造

<sup>93</sup> 黃英哲，〈前言〉，《「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市：麥田，2007年12月)，頁17。

<sup>94</sup> 同前註，頁17。

<sup>95</sup> 陳芳明，〈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重建與頓挫〉，《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10~211。

<sup>96</sup> 陳芳明，〈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重建與頓挫〉，《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12。

<sup>97</sup> 黃英哲，〈前言〉，《「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市：麥田，2007年12月)，頁17。

<sup>98</sup> 同前註，頁17。

「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新的『文化體制』，將台灣整合入中國文化圈。」<sup>99</sup>

若想快速改造文化，採取的手段，首先要貶抑原本的文化價值，清除掉舊有的文化體系，再灌入所謂更優秀、更高等的文化，這樣試圖清掃、改變又無耐心地改造文化，這個過程及結果都極不自然，被影響的對象一定極易產生不適的痛苦感，進而醞釀出不滿。黃英哲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書中提供了相當具體的史料，並詳實的交代了當時國民政府的強勢作為，以及官方所制定的政策使得臺灣人面臨的失根問題，並可能產生自我喪失的危機。據黃英哲書中資料統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當時約六百萬人左右的台灣人，日語的使用率高達 70%。戰後接收初期，在台灣發行的報紙、雜誌，官方尚允許有日文欄的存在<sup>100</sup>，但為了解決語言問題，在 1946 年 4 月設置「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推動國語運動。

官方所推行的國語運動是一項運用國家力量，強勢且急於推動，然而卻是有瑕疵的政策。舉例來說，「來台教中國語的中國人所講的中國語不一定標準，徒然增加台灣人的語言混亂，甚至使其認為中國語有六種，導致中國語的推行並不順利。」<sup>101</sup>，除了語言，思想也要同時進行改造。官方設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黃英哲表示此宣傳委員會是藉由管制傳播媒體以及普及宣傳品，來掃除國民政府所認為的「日本文化思想的遺毒」<sup>102</sup>，同時並欲將中華民族意識灌輸給臺灣人民。

然而，根據黃英哲的研究資料，當時政府在推行語言政策時，顯得操之過急，不顧民情以及臺灣人民的感受。對於 1946 年 9 月 14 日，當局便下令禁止中學使用日語。同年 10 月 25 日，宣布台灣光復已屆週年，官方即又指示報紙、雜誌禁止使用日語，他揭示，這些都是為了執行「台灣中國化的政策」<sup>103</sup>，企圖利用禁止使用日語的手段，加速臺灣的中國化。當時的臺灣人面臨官方這樣強勢的改造政策，當然相當反對，因為經過近半世紀日本殖民統治，加上殖民統治後期，日本所推行的皇民化政策，臺灣人，不論

---

<sup>99</sup> 同前註，頁 17。

<sup>100</sup> 黃英哲，〈結論〉，《「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 年 12 月），頁 224。

<sup>101</sup> 黃英哲，〈台灣人對文化重建的反應〉，《「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市：麥田，2007 年 12 月），頁 214。

<sup>102</sup> 黃英哲，〈結論〉，《「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 年 12 月），頁 224。

<sup>103</sup> 黃英哲，〈台灣人對文化重建的反應〉，《「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市：麥田，2007 年 12 月），頁 214。

思想及生活用語，除了母語（包括閩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等）以外，日語已經是一般日常進行溝通、表達情感所使用的語言，甚至透過日語接受教育。因此，若是這麼輕率地，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要全面地禁止日語、否定日本教育及文化，極有可能，使得臺灣人「自我喪失」<sup>104</sup>。

陳芳明表示官方為了肅清日本文化思想在臺其所謂之遺毒，甚至施行思想檢查辦法，而且作法是「嚴密而徹底」<sup>105</sup>，然而，過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也透過日本教育而受到現代化的洗禮，吸收了許多不同於傳統中國，如衛生知識、法治概念、社會公德等現代、科學、進步的觀念，而接收臺灣的陳儀政府竟還「攜帶文化優越感來台灣，實施歧視性的文化政策」<sup>106</sup>，結果因為種種文化認知的差異、強勢的權力壟斷、搶奪資源的顛預、欠缺周詳考量的錯誤政策等所造成的衝突，最後累積爆發於 1947 年史稱的「二二八事件」<sup>107</sup>。政治衝突又造成了再進一步的全面性管控，亦採更加限縮文化策略。陳芳明感慨「台灣文學史的雙重斷裂，亦即抗日文學與五四文學的傳承，在二二八事件後便發生了。」<sup>108</sup>，二二八事件這歷史悲劇在臺遺留下難以療癒的許多深刻創傷，不論是大陸內戰的教訓及臺灣不安的局勢，這些也都強烈地影響了官方文藝政策的制定，將朝著更緊縮而保守的方向考量。

而後，隨著國共內戰局勢轉化，國民政府軍在中國戰事吃緊，而臺灣又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陳儀離職。甫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的陳誠必須要對政府遷都臺北做好準備，要整頓並嚴格高度地控管臺灣。陳芳明表示 1949 年 4 月 6 日，臺灣警備總司令藉故逮捕學生的行動，史稱四六事件，對於知識分子有計劃的進行壓制。

所謂四六事件，……實質上是陳誠政府透過微小的細故介入當時日益高漲的學生運動，從而對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進行恫嚇。當時陷於政權危機的國民政府，已經決定要撤退到台灣。因此，如何在這最後政治據點維持穩定的環境，就成為陳誠政

<sup>104</sup> 同前註，頁 214。

<sup>105</sup> 陳芳明，〈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重建與頓挫〉，《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 年 12 月修訂二版二刷），頁 231。

<sup>106</sup> 同前註，頁 231。

<sup>107</sup> 同前註，頁 231。

<sup>108</sup> 陳芳明，〈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重建與頓挫〉，《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 年 12 月修訂二版二刷），頁 233。

府的優先考量。<sup>109</sup>

隨著國共內戰越演越烈，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臺灣的行政機關遂展開佈局國民政府的遷臺準備。國民政府最終於 1949 年從中國大陸撤走，退守至臺灣。約有兩百多萬大陸籍人民包括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先後隨國民政府遷轉逃難來到臺灣，其中有許多知識分子，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知識分子也隨之來臺，鍾梅音是較早於 1948 年 3 月便隨夫攜長子，居住於基隆。又或是艾雯則是隨夫帶女兒，同母親及妹妹於 1949 年 2 月來臺，定居屏東。

## 二、五〇年代官方的文藝取向

在略為回顧遷臺人們所處的環境背景後，接下來筆者想來探討五〇年代官方的文藝取向、文藝政策的制定等。五〇年代官方文藝宣傳政策是運用國家力量強硬來施展，林淇濬揭示這對當時政黨而言，實為政權存亡極為關鍵的政策，他表示在過去中國各政黨共同的想法即是「把文化傳播及文藝的創作視為與政權存亡具有因果關係，視為『建國的推動力』」<sup>110</sup>，林淇濬指出「中國國民黨於 1949 年由中國大陸撤退來台，開始『痛定思痛』。發展出以『三民主義與文藝之必然關係』為基礎的文藝政策。」<sup>111</sup>，而擬訂這個政策的是張道藩。

五〇年代初期官方最重要的文學獎即是 1950 年 4 月所成立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獎項，就是由張道藩擔任主任委員，於每年元旦、五四、雙十、國父誕辰定期舉辦文藝獎金<sup>112</sup>。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在報刊公告的獎勵辦法是：本會獎勵之各類文藝創作，以能應用多方面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及蓄有反共抗俄之意義者為原則<sup>113</sup>。換言之，就是以高額獎金吸引鼓勵提倡寫有關反共抗俄的內容。接著在同年 5 月 4 日組成「中國

<sup>109</sup>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 年 12 月修訂二版二刷），頁 264～265。

<sup>110</sup> 林淇濬，〈第六章：打開意識型態地圖——戰後台灣文學傳播的媒介運作〉，《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市：麥田，2001），頁 157～158。

<sup>111</sup> 林淇濬，〈第六章：打開意識型態地圖——戰後台灣文學傳播的媒介運作〉，《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市：麥田，2001），頁 158。

<sup>112</sup> 曾鈴月，〈女性、鄉土與國族——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三位女作家小說作品之女性書寫及其社會意義初探〉，（私立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90 元月），頁 52。

<sup>113</sup> 應鳳凰，〈畫說 1950 年代台灣文學〉（新北市：遠景出版，2017 年 2 月），頁 26。

文藝協會」，陳紀澄擔任大會主席。而後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就是透過這個組織來推行。中國文藝協會主要的成員以遷臺的外省作家為主。

官方反共文藝活動的重要主導者陳紀澄，為反共文學寫了許多作品，如：《荻村傳》（1950）、《赤地》（1955）、《賈雲兒前傳》（1957）、《華夏八年》（1960）等。陳芳明表示陳紀澄的這些作品亦成為反共文學的典範，並分析陳紀澄小說所展示出來的範式，基本上「建立在人性的光明與黑暗之相互對比。」<sup>114</sup>，光明的一方是站在國族立場，維持正義的報國者，而黑暗邪惡的一方則是藉由帝國主義壓迫其他民族的日寇以及破壞文化秩序的共匪。陳芳明指出：

就時間而言，陳紀澄往往把黑暗歸諸於過去，而光明則期待於未來，現在的這個時刻便輕易遭到放逐。同樣的，就空間而言，重大歷史事件與重要個人記憶都發生在遙遠的中國，對於此時此地的台灣現實卻甚少著墨。<sup>115</sup>

陳紀澄小說既然是反共文學的典範，許多外省尤其是男性作家寫下了類似的作品，這些反共長篇小說描寫了大時代下的動亂，當中內容表露作者的意識形態，充滿了對於國族之情，也就是如陳紀澄的文本中，黑暗那端是，那過去受日本帝國主義侵襲的那遙遠的中國，以及邪惡的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及作亂經過，光明則期待發生於未來。這些反共小說回想過去，寄望於將來，抽離當下臺灣的生活，這樣的反共文學可以說是脫離了當下現實的文學<sup>116</sup>。

雖然如此，此類的反共文學作品在當時五〇年代初發展得很好，不只是男性，女性作家如潘人木亦寫下了得獎作品《蓮漪表妹》，此部長篇小說獲得一九五二年中華文藝獎。根據曾鈴月的研究如下：

如果作品是符合官方文藝政策，得獎的機會是比其他作品來得高。國民黨官方利用「規範權力」，分派並操縱象徵性獎勵，使作家服從其文藝政策，進而創作符合的文學作品。其目的不外是利用女作家的創作凝聚國族意識，依據她們的國族敘

<sup>114</sup> 陳芳明，〈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局限與突破〉，《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98。

<sup>115</sup> 陳芳明，〈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局限與突破〉，《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99。

<sup>116</sup> 同前註，頁299。

述重新建構正統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以利進行政治動員。<sup>117</sup>

在官方的主導下，以政治力量加上高額獎金來攏絡收編文人，將政治與文學結合起來，在臺灣確立其正統的政權地位。當時臺灣文壇上充斥著各種反共抗俄的作品，亦顯示在官方策動下，又加上名和利的吸引的確奏效。男性作家，本善於寫論述大時代長篇的反共文學。而女性作家，亦在國族意識下，積極配合官方文藝號召。對於這樣的現象，陳芳明將外省女性作家作品對比了男性作家的作品，他認為：

在民族主義與反共抗俄的呼喚中，她們的作品與男性作家的風格比較，似乎沒有太大的區隔。具體言之，國家的權力使她們的性別界線並不那麼鮮明。女性作家越是高唱反共、高喊愛國，就越喪失女性的主體<sup>118</sup>

在官方文藝政策指示下，外省作家不分性別，書寫了對共產黨的控訴，強調因為共產主義邪惡及黑暗面，導致中國大陸全面淪陷，以及留在大陸的親友被關進共產鐵幕的悲痛生活想像，他們大聲疾呼解救大陸同胞是刻不容緩的。閱讀反共文學，這些外省族群所寫的文章，傳遞出濃烈的國族情感、反共的強烈意識，讀者只得以分辯寫作者的政黨政治的意識形態，而分不清作家的性別特色。

然而，即便如此，女性所書寫的作品，仍然會流露出些許與男性不同的氣息。就拿潘人木的《馬蘭自傳》來說，這部小說獲得 1954 年中華文藝獎，陳芳明評論：「這是一個典型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小說，頗符合反共復國的格局。就文筆而言，潘人木已相當細膩寫出女性特有的情感與情緒」<sup>119</sup>，潘人木得了文藝獎的小說，仍流露出女性特質，更何況筆者的研究對象鍾梅音所寫的是抒情散文，題材是「身邊瑣事」，臺灣在「日常生活」當中所產生的靈感，確實是難以僅用五〇年代即以反共作品來概括的女性寫作實踐。筆者也期待在遷臺女作家，或是就由鍾梅音的文學作品中，找出政治文藝權力規訓外的縫隙。

---

<sup>117</sup> 曾鈴月，《女性、鄉土與國族－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三位女作家小說作品之女性書寫及其社會意義初探》，（私立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元月），頁 53。

<sup>118</sup>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 年 12 月修訂二版二刷），頁 274。

<sup>119</sup> 陳芳明，〈陳紀澄與反共文學的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 年 12 月修訂二版二刷），頁 300～301。



### 第三節 五〇年代遷臺女作家的創作空間

筆者設定以遷臺女作家鍾梅音為研究範圍，對於鍾梅音所身處的五〇年代的文壇，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地來思索當時的文學生產機制。五〇年代臺灣文壇，若以作家性別的角度來觀察，不難發現，男性多寫反共小說，而女性則多以散文為寫作文體，然而，五〇年代，當時官方的主導人物，也就是反共文藝政策制定者多為男性。反共文學獎勵的文體也似乎常由男性主流文學審美標準來設定。反共文學的最高美學準則，即是要反映出「驚心動魄的大時代」<sup>120</sup>。陳紀澄所書寫的《荻村傳》等長篇小說即為反共文學的典範。然而，女性所擅寫的散文文體，張瑞芬觀察到在當時「五〇年代初，『文協』與『文獎會』成立未久，戰鬥文藝初倡，相對於小說，散文一項因不在獎助項目之列，相對較不受重視。」<sup>121</sup>官方獎助文體並不包括散文。官方文藝政策下重視的是反共小說體制，而其所獎勵的也並不是女性善寫的散文。

雖然官方獎勵的是小說文體，然而，在戰後五〇年代這十年間的女性文學作品，最大宗的並不是官方高額獎金鼓勵的小說創作。這種現象官方文藝代表陳紀澄注意到了。女性學者王鈺婷也觀察到了「五〇年代最大宗的女性文學並不是女性小說，而是女性散文……。」<sup>122</sup>而筆者的研究對象鍾梅音書寫的文體，即是散文，一共出版了多達十八本散文集之多。為何女性選擇此文體呢？專注經營散文的鍾梅音曾這麼表示「散文的主題是作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散文給讀者的感受是直接的。」<sup>123</sup>鍾梅音運用散文作為載體，希望能將她的情感思緒直接地傳達給讀者，她散文的內容在陳紀澄的描述下是多屬於「身邊瑣事，很少直接『反共抗俄』的描寫，乍看來，似乎都與時代無關」<sup>124</sup>女性所擅寫的散文並非當時獎勵的文體項目，但又為何鍾梅音的散文能有「攻占大小刊物藝文版面」<sup>125</sup>，有如此大的寫作發表空間？筆者不禁覺得，這現象似乎顯示「具女性特質的抒

<sup>120</sup>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75。

<sup>121</sup> 張瑞芬，〈三生花草夢蘇州－論艾雯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2006），頁108。

<sup>122</sup> 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2月，頁237。

<sup>123</sup> 鍾梅音，〈漫談寫作〉，《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12），頁113。

<sup>124</sup> 陳紀澄，〈序「冷泉心影」〉，《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2。

<sup>125</sup> 王鈺婷，〈作家·編者·旅者——鍾梅音的創作生涯〉，《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

情文類」雖不是能獲得獎勵金的文體，但或許亦是受到官方默許甚至是從旁鼓勵的。

回顧當時，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戰爭失利，撤退來臺，已無退路，因此得痛定思痛，修正並加強其文藝政策的方針，必須全面對抗共黨的意識形態。在那個戰爭年代，文藝宣傳更是重要，因此，除了發展強勢的戰鬥文藝以外，張誦聖分析道：

早期政府對軟性、主觀、抒情、「純粹」的文學類型的鼓勵，強調文學要標榜「人性」等等，具有典型的右翼色彩。極大成分是著眼於對抗隔岸的左翼思想。<sup>126</sup>

張誦聖指出，在性別化的文學類型與「官方意識形態」結合之下，與「女性特質」等同的抒情文類因而得到額外的正統性，這也就解釋了五〇年代女作家群在文學生產場域裏，為何得以分配到很大的發展空間的緣故<sup>127</sup>。

在張秀亞、鍾梅音、蘇雪林、琦君、林海音等作家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五四一支流派、古典抒情傳統與女性特質文類的結合。<sup>128</sup>

在《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這個五〇年代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婦女版面，鍾梅音即常在這個平台上發表其散文作品，王鈺婷認為《婦女與家庭週刊》「呈現出符合主導文化之審美價值的女性文學型態，也透過特定美學形式與抒情想像，對當時讀者產生吸引力。」<sup>129</sup>女作家們經營的題材多樣且具有變化，並接受且呼應官方文藝指導，文字則是「溫潤婉妍、典雅精奧，一洗五四文學以降文白夾雜的生澀句法，進而將白話散文提升至美文境界。」<sup>130</sup>

在王鈺婷所著的《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研究中對於抒情美文的觀察是：

抒情美文所呈現的古典詩學與文藝修辭，使得女性散文家在戰後初期文學場域扮

---

(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90。

<sup>126</sup> 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市：麥田出版，2000年10月)，361頁。

<sup>127</sup> 同前註，361頁。

<sup>128</sup> 同前註，361頁。

<sup>129</sup> 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2月)，頁239。

<sup>130</sup> 范銘如，〈附錄／新文學女作家小史〉，《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年)，頁295。

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一個是抒情美文和官方語言政策之間形成共構的關係，抒情美文趨近於戰後推行的國語運動的核心概念，另外在於女性散文家在國語本位文學生態中不僅擁有各種文化資本，也成為讀者學習的範本，使得抒情散文成為台灣文學場域中穩固的美學品味，成為報紙或是教科書上的美文典範。<sup>131</sup>

外省知識女性所書寫的抒情散文，的確如同王鈺婷所說的呈現出一種揉合古典詩學與文藝修辭的美感。我們在閱讀中不難感受到一種抒情的、溫柔的、美的、細膩的、軟性的、非左翼的、傳統的、符合正統的、甚至是適合教化的一種思想傳達。散文作為一種載體，可將作者的思想直接傳遞給讀者。國民政府遷臺前後，為了鞏固其政權，也為了要讓臺灣人民成為中華民國國民，進行了一連串政治動員。遷臺女作家在此時擁有極好的優勢，政府推行國語政策，而外省女作家們正巧語言正確，官方認為中國文學思想的正統是溫柔敦厚，女作家所寫的抒情美文即是最佳的國語學習範本。二戰前，原本活躍於臺灣文壇上的本土臺籍作家不分年齡、性別，皆在官方語言政策及文藝取向雙重的排擠下，失去了發表的位置。因此范銘如直言五〇年代這些遷臺女性作家的位置多少是拜台灣文壇在政治文化真空所賜<sup>132</sup>。又於官方的鼓勵下，在文學生產場域裏分配到很大的發展空間<sup>133</sup>，得到能占據一方，找到了自己能發揮的舞台。

遷臺女性作家鍾梅音亦適逢其時，於 1949 年 6 月 14~15 日發表第一篇散文〈雞的故事〉，以筆名「音」連載於《中央日報》第 6 版。接著一直持續都有文章見報，大量刊載，並引起陳紀滢注意：

我常在報端讀到署名一個『音』字的文章，她常以身邊瑣事為題，寫出種種心思，她的文筆細膩，感情豐富，思路深遠，興趣廣泛，有一個時期，她產量之豐，幾乎在每一個刊物上都有她的文章，所寫方面之廣，更包羅萬象。<sup>134</sup>

陳紀滢的這段話，見證了鍾梅音發表文章的頻率之繁，可說是「攻占大小刊物藝文

<sup>131</sup> 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 2 月〉，頁 239。

<sup>132</sup>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 年 8 月），頁 31。

<sup>133</sup> 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市：麥田出版，2000 年 10 月），361 頁。

<sup>134</sup> 陳紀滢，〈序「冷泉心影」〉，《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 年 5 月），頁 1。

版面」<sup>135</sup>。而後，散文發表的數量多到僅選輯各報發表的五分之一篇的散文，由陳紀滢創辦的重光文藝出版社印行第一本散文集《冷泉心影》。這種現象表示鍾梅音的散文有一定程度的讀者群，讓人不免想到這或許也有市場商業價值。應鳳凰甚至直言「或有人佩服陳紀滢『眼光獨到』」<sup>136</sup>，這又是怎麼說呢？以下摘錄應鳳凰發表於《人間福報》的一段話：

「重光文藝」是陳紀滢自己經營的出版社，由於他個人占據國府文壇極有利位置，是「中國文藝協會」實際掌門人，能邀集叫好又叫座的女作家到旗下出書。果然出版一系列散文如張秀亞《三色堇》、徐鍾珮《我在台北》……。「重光」閃亮出版招牌，可以說穩穩占住台灣一九五〇年代文學市場首席位置。陳紀滢一手推行反共國策，另一手抓緊商業市場：政治與「經濟利益」實際上是相通的，此一道理顛撲不破，不論什麼年代都適用。<sup>137</sup>

五〇年代臺灣文壇上，浮現這樣的大量女性出頭的機會，在故土中國可說是相當罕見稀有的，連陳紀滢對於這樣的現象都不禁覺得「多少還不免有點驚奇之感的情況，便是女作家之多」<sup>138</sup>，應鳳凰的觀察到陳紀滢驚奇之外，也留意到女性散文有出版的市場價值，並抓住了商機，因此，五〇年代台灣文壇實際情況，並不像刻板印象中僅有反共文學，戰鬥文學，市場讀者大眾的需求，提供了外省女作者一個書寫的空間。

對於五〇年代的臺灣文壇，來自大陸的女作家大量浮現，並書寫數量不容小覷的散文作品，對於此特殊現象，筆者以上提出了幾位學者的研究與解釋，比如，張頌聖從文學場域，讀者和作者的關係來分析；陳芳明則從政治與文學史的脈絡來看；王鈺婷從抒情文學傳統與五〇年代女性作家的美學風格及策略運用來研究。還有，應鳳凰從政治位置及經濟利益來剖析文藝政策下商業運作的情況，更直指陳紀滢是如何嗅得商機，並得以出版多位女作家的第一本書等。

原本一般傳統臺灣文學史大多以反共懷鄉來概括五〇年代文學，范銘如提出了質疑，

<sup>135</sup> 王鈺婷，〈作家·編者·旅者—鍾梅音的創作生涯〉，《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90。

<sup>136</sup> 應鳳凰：【作家第一本書】53 鍾梅音／冷泉心影《人間福報》〈2012/12/31〉  
網路資料：<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288740>，查詢日期：2018/10/20

<sup>137</sup> 同前註，網路資料。

<sup>138</sup> 陳紀滢，〈序「冷泉心影」〉，《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

特別的是范銘如是由性別的角度來切入探討。因為遷臺女作家雖然多因為戰爭及政治傾向等因素，無法再回到故土中國，她們當然也因此寫下了很多惆悵感傷，懷念故土親友，甚至文章也呈現出恐共、反共的意識型態，然而，到了臺灣，亦可說是有了特別的境遇，也讓人不禁揣測，五〇年代的遷臺外省女作家或許內心亦存有著矛盾的心理，學者范銘如說：「在思親憶故的返家欲望之餘，難道不會為自己離家之後的發展成就有一絲竊喜？」

<sup>139</sup>如同范銘如所言，因為若是真的國民政府反攻大陸，復國成功，女性作家再回到那個「父權體制織羅嚴密的故鄉，她們能否再享有相似的資源？即使老家富甲一方，干卿底事？」<sup>140</sup>，當時遷臺女性或許很快地發現，比起中國，在臺灣有屬於女性，屬於她們可揮灑才能的相對廣大空間，得以建立屬於自己的遼闊且不受傳統封建約束的新天地，而女性作家真的能捨得，能捨棄嗎？

畢竟，台灣正處於百廢待舉的狀態：一則父權還沒全面滲透箝控政治與文化機制，二則台籍作家還在與中文掙扎中，無從競爭。女性知識分子恰好恃其語言文字優勢，取得與同樣遷台的男性同儕較均等的立足點。<sup>141</sup>

范銘如所謂的「父權體制織羅嚴密的故鄉」<sup>142</sup>，筆者閱讀鍾梅音的文本中找到了例證，鍾梅音曾書寫她過去新婚時期在大陸公婆家的情境，或許能作為體會范銘如所指。鍾梅音記錄了一段曾經與丈夫憶當年細數從前時所說的話，她說：「剛嫁你時，你屬於父母，要盡孝，於是我過的那種日子。」<sup>143</sup>，然而，鍾梅音所謂的那種日子，其實就是傳統中國文化中，某些女性婚後生活的日常：

我一天要請六遍安，你爸三遍，你媽三遍，時間都錯開的。你知你爸抽大煙黃昏六點才起床，半夜十二點才吃午飯，我要等你爸吃過午飯才敢睡覺。可是你媽不抽大煙，早上六點就起來了，你可記得？<sup>144</sup>

多年後，在鍾梅音感慨當中，或許也存著些許慶幸，若當初沒離開中國，大概就只

<sup>139</sup>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年8月），頁31。

<sup>140</sup> 同前註，頁31。

<sup>141</sup> 同前註，頁31。

<sup>142</sup> 同前註，頁31。

<sup>143</sup> 鍾梅音，〈湖畔〉，《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18。

<sup>144</sup> 鍾梅音，〈湖畔〉，《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17。

能守在傳統大宅院裡，侍奉公婆，成了傳統父權文化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守著婦德的少奶奶。或許就如朱嘉雯所說：

女性卻在渡海後始恍然領悟這是自己得以拋棄過往龐大包袱的契機。乘著一九五〇年代語言政策與文藝取向雙重優勢的羽翼，亦使她們得到書寫自我的遼闊天空。女性邊緣化的政治身份也使她們更有餘裕將成長過程所經歷的文化洗禮、亂離渡海、思鄉情濃，以及重新適應新生活等心路歷程，轉化為文學作品，表現出亂離書寫中熱烈渴望的自由意識。<sup>145</sup>

兩岸隔離的狀態，使得遷臺女性包括鍾梅音因而有了開展新生活的機會，能憑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雙手來編織、建立單純就只有夫妻倆和其子女，所謂現代核心家園的契機及自由，女性來到臺灣，拿起筆來書寫記錄日常瑣事，抒發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許也因著她們的政治選擇，政治意識形態亦符合官方的語言文字及文藝政策，其文常見於報章雜誌上，又幸運地受到部分群眾喜愛，如筆者所研究對象鍾梅音遷臺後本為家庭主婦進而成為作家、畫家，旅者，意外得到可發揮自己才能的文壇位置及書寫空間。

兩岸政治團體意識形態的對峙，地理上隔著臺灣海峽，國共內戰後，跟著國民政府遷臺的人們頓時失去了故土，失去了與親屬的連結與支持，從而成了失根的離散逃亡族群。然而，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觀看，這代表同時也得以揮別過去的傳統封建的綑綁，令人窒息的守舊規矩等束縛也跟著一併斬斷，不再受到牽制，尤其對於女性何嘗不是一個能跳脫傳統體制的機會呢？

筆者進一步地想梳理遷臺女性散文作為國語學習範本，文本經典化的情形。政府推行的國語運動，在五〇年代臺灣的文壇上，亦使得女性抒情散文有開展的空間。早在二戰結束後，來臺接收的陳儀政府為加強臺灣的中國化。自 1946 年 4 月，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以來，便急迫地展開中國語推行運動<sup>146</sup>。官方運用「文化重建」以及推行「國語運動」，強力地貶抑否定日語、日本文化，甚至使用日語作為思考的臺灣人民。然而在被異族高壓統治過，長期被壓抑的台灣人民傾向認同中華民國為其祖國。所以也逐漸顯

---

<sup>145</sup> 朱嘉雯，〈「家」的雙重認同〉，《追尋，漂泊的靈魂：女作家的離散文學》（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9年2月），頁61~62。

<sup>146</sup> 黃英哲，〈台灣人對文化重建的反應〉，《「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市：麥田，2007年12月），頁214

現出配合學習國語的努力。

五〇年代遷臺外省女性作家們，挾著自身語言優勢，抒情散文書寫溫柔敦厚的風範，在國語政策下，禁用日文，在自由中國文壇上仍處於「荒蕪一片」<sup>147</sup>時，湧現於戰後臺灣文壇。在國語運動推行時期，有些女作家的文章更是成為青年學子為學習國語所背誦的文本。楊幸如在〈露根的蘭花——試探艾雯文本中的鄉土想像〉中指出艾雯 1951 年出版的《青春篇》中的〈路〉一文被教育部編譯館選入國中國文課本，有其時代的意義。

艾雯是 1950 年代女作家中，經由國民教育的管道，取得『經典化』地位的代表之一。以國立編譯館出版的國中國文課本為例，除了艾雯外，還有鍾梅音〈冷泉心影〉、張秀亞〈溫情〉、琦君〈故鄉的桂花雨〉、孟瑤〈智慧的累積〉等。<sup>148</sup>

楊幸如評論艾雯的寫作特色是「文字的細膩」、「思想的正面」，像〈路〉一文即是「平實的題材，卻能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並從而闡揚正面的思想。」<sup>149</sup>楊幸如認為這種寫作風格在 1950 年代或有其成名的理由。她所提出例證為本省籍的余阿勳在《涓涓集》書中〈寫作生涯〉一文中曾提到清晨在路邊背誦艾雯的《青春篇》，「可見艾雯的『美文』在推行國語運動的年代中，是被認為是提升國語能力的絕佳範本；至於艾雯文本中的『正面思想』符合當時官方所提倡的戰鬥精神，由此可見艾雯在 1950 年代廣受好評有其時代性的理由。」<sup>150</sup>抒情散文正面思想的確受到官方文藝政策的認證。

艾雯的文友鍾梅音，亦是當時相當受歡迎的抒情散文作家，《冷泉心影》中的〈鄉居閒情〉一文也曾被選入初中國文課本，而廣為流傳。而這本《冷泉心影》正是由陳紀滢創辦的重光文藝出版社印行。陳紀滢並為之寫序，代表獲得官方立場中國文藝協會領導人的肯定。這些主婦身分的女作者便成了女作家，無心插柳，柳成蔭，在戰後台灣文壇上享有一席之地。

五〇年代國民政府從國共內戰的教訓，為何指向強調文學要標榜「人性」等等，具有典型的右翼色彩，且極大成分是著眼於對抗隔岸的左翼思想？而由為何女性抒情散文

<sup>147</sup> 陳紀滢，〈序「冷泉心影」〉，《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

<sup>148</sup> 楊幸如，〈露根的蘭花——試探艾雯文本中的鄉土想像〉，《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31，艾雯》（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11月），頁243。

<sup>149</sup> 同前註，頁243。

<sup>150</sup> 同前註，頁243。

從而得到額外的正統性？這則可從回顧二戰末期，當時在中國風雨欲來的國共內戰之醞釀來理解。筆者在閱讀齊邦媛在《巨流河》後，發現書中紀錄的內容對於意識形態的鬥爭的描述，能使我們感受到當時的動盪不安氣氛，或許透過與鍾梅音同時代的遷臺女性學者齊邦媛的視角來理解，暫時跳脫外省女性的散文書寫，從《巨流河》來看那個曾籠罩在詭譎多變的政治風暴年代的中國，以及更進一步對於當時人們反共、恐共想法的理解。

齊邦媛《巨流河》中記錄了一段她在川西樂山的親身經歷，當時正值二戰末期，因為戰爭人心長久處於惶恐不安的狀態，而齊邦媛認為這種人心的空虛不安也正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容易滲透及傳播的原因之一，甚至是單純的校園中也不例外，那樣的思想，對青年知識分子事實上更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然而，齊邦媛在書中明確的表明她的政治立場，她選擇不加入任何政治陣營的，可是卻也因為這樣而被孤立及打壓。

那一年我二十歲，面對重重威脅的人生，覺得隨時可能失去一切，孤苦無依。

唯一必須留下的是自己的心靈，這一顆切切思慕知識、追尋善與美的心靈，而這河岸小片淨土，曾是我安心置放心靈之地。<sup>151</sup>

齊邦媛說她從沒有告訴任何人這河岸秘境。可是，難道當時她身邊全無知心友人能陪伴？原來是齊邦媛在武漢大學求學時，在經歷了一段被「前進學生」鬥爭後，內心感到虛無及恐懼。剛到武大念書時，曾有一名侯姓學姐對於隻身而來的她很是殷勤照顧，但由於齊邦媛父親來信提醒生性單純的她應該專心念書，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於是齊邦媛就藉口功課忙要背書，不再跟侯姓學姐去參加讀書會了。沒想到自此侯姓學生竟翻臉無情，三番兩次地用凶惡言語來攻擊她，對於這樣突如其來的態度全然的轉變，讓齊邦媛簡直招架不住。有一天，那個侯姓前進學生大聲斥責齊邦媛，指控她是貪官污吏的女兒並要她滾出去，這可怖的景象使齊邦媛領悟到政治的可怕與無常，「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sup>152</sup>齊邦媛將有情有義對比寡情無常說明政治活動的詭譎多變，而中國陷入意識形態的鬥爭。對於齊邦媛的影響是「從此以後六十年

<sup>151</sup> 齊邦媛，〈前進的讀書會〉，《巨流河》（臺北市：遠見天下，2009年7月），頁207。

<sup>152</sup> 齊邦媛，〈前進的讀書會〉，《巨流河》（臺北市：遠見天下，2009年7月），頁200~204。



來，我從不涉入政治。」<sup>153</sup>

從書中我們感受到了中國陷於意識形態的分裂，左翼社會共產思想，階級鬥爭為手段來求取進步，清算鬥爭以打到資產階級為號召。中國共產黨靠著讀書會，早已滲透到校園裡，鼓動進步學生參與學潮。齊邦媛《巨流河》從一個大時代整個歷史的脈絡來談，其中亦提及 1946 年至 1948 年間大學校園中充滿政治動盪和叫囂的親身體驗<sup>154</sup>。而後，國民政府帶著大批軍民倉促遷臺，1949 年共產黨占據全中國。這段文字所記載的過去中國社會讀書人的經歷，讓我們體認彼時政治社會甚至單純校園中彌漫的煙硝味。而戰爭失利的國民政府，如張誦聖所揭示的「基於國共內戰的教訓，早期政府……強調文學要標榜『人性』等等，具有典型的右翼色彩。極大成分是著眼於對抗隔岸的左翼思想。」<sup>155</sup>國民政府已是退無可退，只能痛定思痛，更要維護其正統地位，加強文藝反共宣傳的策略。

回到筆者所研究對象鍾梅音，她來臺後所書寫的《冷泉心影》，這本看似只書寫鄉間日常瑣事的散文集，與齊邦媛《巨流河》從歷史的脈絡下所處理的內容是橫再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反映中國近代苦難歷史記憶的巨著迥然不同，雖說她們同為遷臺外省女性，可兩人有各自的人生際遇，文字表達的思想並不相同。

然而，若仔細觀看，事實上鍾梅音《冷泉心影》散文中也紀錄了有關上海學潮的事件，甚至表露了鍾梅音保守右翼思想，在書中一篇〈阿冬的小情人〉文中，鍾梅音寫下了一段她對於上海學潮的感受，鍾梅音有一個同學，而鍾梅音擔心她同學的弟弟阿冬，這個年輕人也可能會參加抗議活動，因此鍾梅音就把阿冬從學校抓了回來，關在鍾梅音的家，甚至關了整整一個星期。鍾梅音的這篇文章仔細讀來，其實很耐人尋味，可以看出鍾梅音的保守性與官方右翼思想極為契合。她說上海鬧學潮，打著反飢餓，反迫害的口號，把好端端的社會，卻給攪得「烏烟瘴氣」，而阿冬這些青年學子，不好好專心念書，既不「飢餓」，又沒人「迫害」。鍾梅音在文中特別提醒，對於這樣的年輕人不可掉以輕心，要保持相當警覺心來監管他們，因為他們很有可能只是因為一時不滿現實，便會被有心人煽動而走偏了路。摘錄一段於下：

<sup>153</sup> 同前註，頁 200~204。

<sup>154</sup> 齊邦媛，〈學潮〉，《巨流河》（臺北市：遠見天下，2009 年 7 月），頁 235。

<sup>155</sup> 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市：麥田出版，2000 年 10 月），361 頁。

阿冬是我同學的弟弟，……阿冬念書不大用功，為了督促他，着實惹了一點悶氣，……有一陣子，上海正鬧着學潮，反飢餓，反迫害，攪得烏烟瘴氣，阿冬既不「飢餓」，又沒人「迫害」，我原無須擔心，可是仔細一想，孩子們有時不滿現實，容易受人煽動是真的，果然，找着他以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從學校裡弄了回來，總算服服貼貼在我家裡關了一個禮拜。<sup>156</sup>

鍾梅音文中表示她同學的弟弟——阿冬是個聰明的孩子，雖然不太用功，但阿冬並沒有什麼匱乏之處，並不需要擔心會去參加學生運動，然而，她後來仔細一想，她覺得當時社會上的確有些讓孩子感到不平或不足之處，再加上年輕人血氣方剛，做事容易衝動，鍾梅音想阿冬說不定就去參加了上海學生抗爭活動，因此她決定要把阿冬帶回家。

鍾梅音，她的社經地位也可說是屬於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有時在某些情況下會有一些較保守的傾向，或許在思想上也認為有些抗爭活動實非必要，社會維持安定狀態才是更重要的，政治上也能在穩健中發展，長期處在動亂下的鍾梅音出於愛國之心，也許也認為國家社會安定對人民來說是很重要的，而這種想過安穩生活的保守傾向，或許跟官方右翼思維也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密合性。

國共內戰造成兩岸隔絕，鍾梅音又聽聞留在中國的父親，因曾在國民政府工作而被共產黨逮捕了，因此恐共、反共，甚至是厭惡共產主義思想，著實存在於鍾梅音和跟她有著同樣遭遇的外省遷臺人們的心中。而國民政府在中國失敗的經驗，使得國民政府在思想文宣上採取更強勢的措施。當臺灣警備總司令於1949年5月19日戒嚴令的實施，這表示將用軍事統治臺灣，更加全面性地高度控制著人民的行動、言論以及思想等。在臺灣的示威遊行等也納入官方的控管。陳芳明觀察臺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直言五〇年代「官方文藝政策對一九三〇年代文學抱持警戒、查禁的態度，主要是為了斷絕左翼文學的傳承。」<sup>157</sup>，對於極右派的國民黨而言，又經過二二八事件後，在政治思想控管上有著極保守的策略，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賴和、楊逵等人的著作都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抗日文學」，而五四運動過後的中國作家如魯迅、矛盾等人亦是傾向主張社會主義的「左翼文學」。這些充滿高度批判色彩的思想，不容於官方所提倡的文藝政策，因此遭到全面的

<sup>156</sup> 鍾梅音，〈阿冬的小情人〉，《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11。

<sup>157</sup> 陳芳明，〈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局限與突破〉，《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88。

封鎖。官方反共文藝政策靠著國家行使霸權力量，斬斷具批判精神、左翼色彩的抗日文學與五四文學的延續與傳承，而得以「橫行無阻」<sup>158</sup>。可說是國共內戰失利，退守來臺的國民政府為了鞏固及合理化其在臺灣的統治基礎，採取了相當強硬的手段。

然而在官方文藝政策的運作下，陳芳明表示當時各大報如、《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台灣新生報》等副刊，皆以大量篇幅來刊登反共作品，於是臺灣文壇上充斥男性書寫的反共作品，但由於形式的固定不變，教條化的主題，內容也總是光明與黑暗的對照，正義與邪惡的對抗，把黑暗歸諸於過去，而光明則期待於未來，脫離了現實，「使得反共文學發展不到五年期間，就已使讀者感到疲倦。」<sup>159</sup>遷臺女性作家亦回應著官方思維，但她們常書寫的的題材是她們日常生活所思所感，面對新環境下的調適及矛盾，細部的描繪注入了現實及空間感，吸引了一般閱讀大眾，開發出不同於男性的寫作特色，而有了發展的機會。

#### 第四節、反共文藝的規訓性

1955年5月5日官方所成立的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其主要目的是「在於協助反共文學的推展，從事前線勞軍、醫院慰問、贈送征衣的工作。」<sup>160</sup>。陳芳明揭示五〇年代遷臺外省女性作家，從政治功能而言，她們「只是屬於反共文學的從屬角色，她們只是承擔主流文學搖旗吶喊的工作」<sup>161</sup>。

劉心皇也曾說過：「在自由文藝中，散文以女作家為多。……可惜的是，她們所寫的差不多都是身邊瑣事。」<sup>162</sup>，他認為女作家的散文書寫不出當時波濤洶湧的大時代，能處理這樣廣闊而深厚的大時代題材，他所肯定的是男性作家，「男作家的散文，則多能反映這樣不平凡的時代」<sup>163</sup>，對於這樣的說法，王文漪則認為不夠公允。大約在1979年王文

<sup>158</sup> 同前註，頁288。

<sup>159</sup>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83~299。

<sup>160</sup>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74。

<sup>161</sup>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74~275。

<sup>162</sup> 劉心皇編著，〈導言：自由中國文學三十年〉，《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台北市：天視出版，1981年8月初版），頁70。

<sup>163</sup> 同前註，頁70。

漪負責編選《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在整理目錄時，她發現此選集的特色是作家全是由大陸來台或是到海外去的忠貞反共者，而其中女作家則幾占半數，在此散文選集的〈導言〉中，她寫道：「有人說，女作家所寫的不外身邊瑣事。這樣說法未免武斷。且讓事實來證明」<sup>164</sup>，文中她舉了幾篇文章作為例子，包括鍾梅音〈接受金門炮火洗禮〉寫前線保家衛國英勇的將士，及甘冒生命危險具備濃厚愛國情操的筆隊伍等，這些女作家所寫的散文「何嘗是身邊瑣事。」<sup>165</sup>

然而，官方在文藝宣傳政策下所鼓勵書寫的文體並不是女性善寫的散文，這或許也跟主導官方文藝政策的決策者為男性有關，女性處在權利的邊緣位置。但由於女性作家是以群體出現，且每每有大量文學作品的產出，女性不同於男性作家的思維，細膩入微地描寫日常當下的寫作，非常具現實感、空間性，讓那個驚心動魄的大時代充斥著堅強戰鬥的反共書寫，竟使得反共體制從「內部已逐漸產生從量變到質變的發酵作用。」<sup>166</sup>

因此，筆者研究鍾梅音的寫作中，注意到鍾梅音的書寫常以家為題材，記錄日常生活所思，關於她的「家·臺灣」在地化書寫傾向，筆者預計在本論文的第四章中會做詳細論述。而這裡想處理的是，鍾梅音除了日常瑣事的書寫外，身處在國族意識濃烈的環境下，她的政治傾向及立場書寫表達。

鍾梅音身為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的一員。體弱多病的她卻曾經多次參與前線勞軍，並且在勞軍回來後，很快地在報紙副刊上，發表大篇幅為鼓舞士氣、安定人心的散文作品。1958年10月19日，鍾梅音應青年寫作協會邀請訪問金門，時值八二三砲戰後再度駁火。她自金門歷劫歸來後，寫了〈父親瞑目否？〉11月3日發表於《聯合報》第7版，此篇文章紀錄了鍾梅音曾在烽火交會下，為鼓舞前線戰士，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前往金門，也提及從金門回台後，多達十家刊物稿約要來報導這件事。以下摘錄其文中一段文字：

十月十九日我去金門了，廿一日歸來，洗去滿身征塵後，先為我所服務的晚報寫一篇「接受金門砲火洗禮」，接着就是茶會、廣播、朋友們的壓驚飯，跑個不了，

<sup>164</sup> 王文漪編選，〈導言〉，《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台北市：天視出版，1979年8月初版），頁7。

<sup>165</sup> 王文漪編選，〈導言〉，《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台北市：天視出版，1979年8月初版），頁8。

<sup>166</sup>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年12月修訂二版二刷），頁275。

吃個不了，還得應付將近十家刊物的約稿，心裏一急，一個字也寫不出，幾天功夫就把健康弄垮了。<sup>167</sup>

鍾梅音為鼓舞士兵，不顧家人擔憂及反對，冒生命危險也要去最前線，此時她的身分已不再只是外省眷屬及一般家庭主婦，而是以作家的身分，官方組織中筆隊伍的一員去的，回來更迫切地參加廣播，發表深具愛國情操，國族軍民同心的前線報導，在鍾梅音的寫作中，亦可見她反共實踐的書寫。

常在極危險的緊張局勢前往戰地，甚至讓丈夫余伯祺一度擔心會失去她，鍾梅音回憶丈夫對她訴說其擔心，可是若國家有需要，她還是勇往直前：

自金門歸來後，他曾說：「以後我再不讓你去前方了，砲轟金門那晚，弟弟們都來陪我直到深夜，怕我承受不起萬一失去你！」但言猶在耳，我又在匪船進襲高登之夜踏上了去馬祖的征程。<sup>168</sup>

當時在渡船往馬祖的途中是非常危險的，鍾梅音甚至遇到了讓她警覺到也許船會被擊沈，這支筆隊伍或許會被海葬的緊急時刻。為何她願冒如此之危險？為何不顧家人擔憂也要前往，她解釋道：

誰能說我不愛丈夫？十幾年來的奮鬥，從未分過彼此，如今他之容忍我，正由於他了解我不是那種可以養在金絲籠裏的金絲雀，我的愛在實質上不夠撫養一個孩子，在精神上却常想給予整個世界。<sup>169</sup>

她表示她不是養尊處優的女子，而是筆隊伍的一員，她的筆表達的是她的愛國心，書寫鼓舞人心的文章就是她的反共實踐。

鍾梅音作品記錄的這趟馬祖之行是 1959 年 6 月 12~15 日，隨中華文藝協會赴馬祖訪問，副團長為王藍。7 月 1 日將此行寫成〈赴馬祖途中〉發表於《暢流》第 19 卷第 10 期。而後鍾梅音又作〈戰雲彌漫訪馬祖〉收錄於 1969 年 2 月由三民書局出版的《夢與希望》中，摘錄其中一段：

<sup>167</sup> 鍾梅音，〈父親瞑目否？〉，《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 年 2 月），頁 63~64。

<sup>168</sup> 鍾梅音，〈赴馬祖途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100。

<sup>169</sup> 鍾梅音，〈赴馬祖途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103。

筆者隨中國文藝協會馬祖訪問團啟程的那天，正是匪船進窺高登，引起砲戰三小時的六月十二日，可是自團長趙友培，副團長王藍，至團員施魯生（師範）、張萬熙（墨人）、王鼎鈞、龔聲濤、吳裕民、謝吟雪、張大夏、朱介凡、程其恆十一人中，沒有一位退縮。本來因為宿疾復作，出院還不到十日，原已放棄此行的我，一聽到這戰報，也像注射了一針強必劑，在啟程的半小時之前，終於改了主意，毅然加入他們的行列湊成了十二位。這並非我有好戰的變態心理，而是覺得以一支筆隊伍，能在戰雲瀰漫之際訪問前線，才真正能給戰士們帶去有力的鼓勵，與誠摯的溫情。<sup>170</sup>

這些人名，這些事蹟，透過女性作家的文字給紀錄了下來，並且隨著鍾梅音的散文集出版而廣為流傳，鼓舞士氣，並凝聚國族意識。

鍾梅音於 1959 年 6 月 12~15 日隨中華文藝協會訪問馬祖，而此趟馬祖之行的副團長——王藍，即是趙彥寧在其所著的《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在《寫什麼？怎麼寫？》中寫下指導文的王藍。

接下來筆者想談的是官方文藝組織，到底希望作家們如何呈現他們的反共立場，透過趙彥寧書中記錄的王藍反共書寫指導文，或許可以對照出鍾梅音的反共實踐書寫，以下為摘錄自趙彥寧書中的資料：

根據曾任文協多任常務理事的王藍在《寫什麼？怎麼寫？》中的指示，只要能在「推斷」、「想像」、與「眾所周知」三個層面上吻合前述不理自明的原則，即便再現者無法證實其欲再現之物，或即便再現者僅能公開想像此物，也完全不會影響此再現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因為，共匪之邪惡本就是必須不斷被公開想像的：<sup>171</sup>

有三個範圍以內的事情，可以照寫無誤。（下略）

一、推斷的——（中略）我們常寫「今日大陸鐵幕裡的同胞都痛不欲生」，我們身在台灣沒有「千里眼」看到他們的慘狀，沒有「順風耳」可以聽到他們的哀

<sup>170</sup> 鍾梅音，〈戰雲瀰漫訪馬祖〉，《夢與希望》（臺北市：三民，1969年2月），頁140。

<sup>171</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臺北市：巨流，2001年11月），頁168~169。

鳴，為什麼可以這麼寫呢？因為這是可以推斷的事實。

二、想像的——例如：「一條共匪正在加緊『整肅頑固教師』的新聞，立刻攝住了我的目光。我似有不詳的預感，又連忙祈禱不要發生那樣的事情……」「我的眼前一黑，報紙由手裡鬆落在地下。」「我闔上眼，……可是慶老師帶著血污的臉在我眼皮上翻著筋斗……」……都不是「我」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的；但是讀者一看便可明白係出於「我」的想像。故可以這麼寫。

三、眾所周知的……「我」在台灣，並未看到，但這是可以由報紙上知道的。……這是眾所周知的當時西北淪陷前夕的實況，所以可以這麼寫。<sup>172</sup>

筆者透過仔細閱讀鍾梅音的散文集，發現鍾梅音的散文書寫有多篇符合王藍所指導的寫作原則，她採用並呼應官方文藝政策，凝聚國族力量，打擊邪惡的共產思想，來維繫正統傳統文化。舉例如下：

一、鍾梅音著〈家鄉味〉中談及她回憶家鄉味的散文中，即符合王藍指導文的第一條——推論的，鍾梅音寫於1950年12月9日，收錄於《冷泉心影》中

越是不曾「一見傾心」而又終於博得你的賞識的東西，越是頑固地纏住你的鄉愁，再寫下去，我擔憂自己和一些讀者會害起嚴重的懷鄉病來，所以我不敢再往下寫了，其實除非打回家鄉，如今不管那兒的家鄉味，都已無法嚐到，昔年時常寄包裹給我們的大伯父，墓木已拱，二伯父正在「人民政府」的壓迫之下苟延殘喘；蘆花蕩裏聽說已經成為遊擊英雄集會的秘密場合，而且黃雀也被饑餓的人們捉光了，做糰子和擦酥餅給我們吃的孀娘，正在以粥度命，想到此時，寫一篇望梅止渴的「家鄉味」，已覺是一種奢侈了。<sup>173</sup>

<sup>172</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臺北市：巨流，2001年11月），頁169～170。

<sup>173</sup> 鍾梅音，〈家鄉味〉，《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97～98。

二、符合王藍指導文第二條——想像的，鍾梅音〈父親瞑目否？〉1958年11月3日發表於《中央日報》第7版，摘錄於下：

父親，我是幸福的、滿足的，我不該再痛哭，您也該靜靜地閤上眼睛。可是，當我看見前線上有那麼多戰士在為反抗奴役而赴湯蹈火，當我想起大陸上還有無數的好兒女正被魔鬼瘋狂地驅上血淋淋的祭壇，我怎麼笑得出來呢？您又怎能瞑目呢？<sup>174</sup>

三、符合王藍指導文第三條——眾所周知的並加上想像的。鍾梅音〈滇西憶舊〉1950年9月1日發表於《暢流》第2卷第2期。

前幾天在中央日報看到一篇「滇桂道上行路難」，說：「昆明人都在留戀著逝去的年華，滇池綺麗的秀水也變成淚海，金馬碧雞，深夜再也聽不到雙雙情侶的柔情蜜語，唯有匪幹拖著老鼠的尾巴到處亂竄。」閱後不禁想起了盤絲洞，晒經坡……這一切景物，這所有的人，這一石、一木、一花、一水，還有我昔日住過的小樓，是否都安然無恙呢？<sup>175</sup>

中華文藝協會常務理事王藍明示，作家們只要能在「推斷」、「想像」、與「眾所周知」三個層面上，書寫這些反共的內容都是不理自明的，即便寫作者無法證實，也不會改變其合理性與合法性——因為「共匪之邪惡本就是必須不斷被公開想像的」<sup>176</sup>。遷臺外省女作家鍾梅音書寫的內容也常符合這些指導原則，再加上女性善寫情感，柔性述說身處戰亂時代中，離散的人們的莫可奈何，與親人分隔兩地，離開自己的故鄉，又不能回去的無奈心情，更何況若又因政治因素，關進共產鐵幕裡的家人遭到批鬥，那更是痛苦不堪，女作家的文章，筆下流著淚，文字裡淌著血，血淚控訴，令人為之鼻酸；離散人們想嚐一口家鄉的滋味，女作家表明那只能在夢裡；而對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以柔情筆調來警醒並喚起閱讀人們的戰鬥意識，並呼應政府「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口號。

女性以不同方式亦呼應著官方文藝政策，或許也是因為她們家族身分地位，是共產黨所不容的資本階級，若留在大陸恐怕也成了被共產黨鬥爭的對象，如鍾梅音的父親因

<sup>174</sup> 鍾梅音，〈父親瞑目否？〉，《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66。

<sup>175</sup> 鍾梅音，〈滇西憶舊〉，《母親的憶念》（臺北：復興，1954年4月），頁7。

<sup>176</sup>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臺北市：巨流，2001年11月），頁168~169。



曾為國民政府的官吏而遭共產黨逮捕，鍾梅音心中焦急不安，卻也束手無策，僅能寫下〈遙寄我父〉祝願其父無恙平安、而〈阿冬的小情人〉寫阿冬從軍去了，鍾梅音認為阿冬或許是受了在陸軍醫院工作的護士女友所影響，因而在他生命裡燃起了愛正義，愛自由的火炬，正面肯定阿冬當兵的愛國心。鍾梅音亦書寫著思親、愛國心濃烈色彩的文章，並以作家身分，筆隊伍的一員，而有了女性參與公共領域中實踐自我的可能。



## 第三章 個人即政治

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是一個主體，然而，人畢竟是在群體當中生活，與他人、團體、社會都有所互動。個人因天生資質、身體樣貌、生理性別，身體狀況，以及後天對身體的養護，所處的生長環境、家庭教養、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經驗視野、婚姻關係、道德觀念、宗教信仰、流行文化、時代經濟的發展狀況、國家體制運作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影響著個人的主體形成，進而涉及到一個政治性的可能，這裡所謂的政治性是彰顯個人與周遭的互動、牽連、影響、後天種種因素的添加、形塑成某個「人」。人從出生到長大成人，他／她的性情、性格、品味、認知、思考模式、處事態度等，再再受其所處的環境、家庭、社會、國家、各種文化影響，人之所以成「人」，不是天生就形成，除非離群索居，也就是說，從個人的一個小歷史亦包含、涉及了群體的牽連性，在認知上，什麼是對與錯、好或壞、美與醜、高跟低的標準等，跟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眾人怎麼看待、怎麼評價，可說是存在著許多的連結，生理的性別、主體形成，本質上皆是或多或少都曾被改造、適應的過程中逐漸地形成，能在群體社會生存下來所該具備的某種條件。人很多時候，也會產生適應不良，比如說：換了新環境，易水土不服；生理的成長，有所謂的青春叛逆期；身分角色的改變，少女結婚、懷孕生子，成為母親，也有種種要適應的問題。若碰上了時代新舊交替、東西文化、新舊教育、思想觀念等碰撞，或許激盪出更妙的火花，然而，若不幸生長在政權轉換、戰爭頻繁的動亂時代，那麼，命運會怎麼改變，簡直是半點不由人。

近代中國，有一群女性就趕上了這麼個時代，包括筆者所研究的對象鍾梅音，中國國勢陵夷、屢遭帝國主義的侵襲、戰爭的侵略等，在國家、個人生存上有了極大的壓迫下，產生了國人的覺醒，不論是對於民主的渴望，或是對於新觀念、新技術、求知若飢，更有了「德先生、賽先生」的啟發，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亦有相當幅度需待修正的空間、語言文字更要白話，要易於流通、傳播新思想、新觀念，又或者是隨著封建社會的崩解、舊思想、舊體制、如，在傳統父權制度下，對女性三從四德的要求、儼然是對女性長久以來，有形、無形的一種禁錮，隨著更多女性接受了新式教育，成了知識分子，女性逐漸從某種綑綁中掙脫出來。要民主得經過革命，要自由可能得流血，要

成功需要有很多條件的支撐，就如同鍾梅音曾傳授給女兒的，以及分享給她的讀者一個成功的公式，毅力+智力+體力=成功<sup>1</sup>。這是在被氣喘宿疾所纏，不甚健康的鍾梅音，對於人生的一種體悟，從病痛提煉的智慧，她提倡體育、鼓勵人運動、提醒人欣賞自然的景色、注意四季的變化，以保持身心靈的平衡。

戰後遷臺的一群外省女性有著共同的命運，生長在戰亂時代，受新式教育的潛移默化，她們有普遍的共通性，當然亦有個人的獨特性，她們之間存在著差異，亦不能被輕易的概括為同屬於某一類的人。

本論文所研究的對象鍾梅音，生長在一個書香世家，與父母的關係也算是親近，然而，她卻因一個小感冒被誤診轉而成終身侵擾她的生命。帶著宿疾的鍾梅音，有著屬於她獨特的生命圖像，筆者試著梳理出她的特殊性，和屬於她個人的生命。國共內戰期間，隨夫遷徙的鍾梅音，聰明賢慧的主婦形象，克勤克儉，樂於為她的家庭付出，身體受病痛折磨，進出醫院相當頻繁的她，有時彷彿也快放棄，但有數度，為了她所愛的家人、孩子，忍住眼淚掙扎起來<sup>2</sup>，又再度活了過來，甚至寫下了無數文學作品，包括《海天遊蹤》等名著。然而，愛家、寫家、樂於為家付出的鍾梅音，對主婦終日繁複的食物烹調，費力的三餐供給，讓她也忍不住說：

人這種動物實在麻煩，一天要吃上這麼多次的飯，甚麼時候可以進化到每天吃一頓飯就夠了呢？<sup>3</sup>

每日面對、處理頻繁細瑣的家務，對主婦來說，不管是精神上，或是體力上實在也是相當大的負荷。尤其鍾梅音身體經常不適，喘病發作頻繁，她常需要雇用人來代勞家事，當時稱之為下女小姐。鍾梅音曾說太太們經常感到下女的威脅，有時下女說辭職就辭職，說請假就得准她們假，鍾梅音也感受到時代在變化，太太與下女已不再是「主」、「僕」的上下關係，下女如今是雇主聘請來的勞動者，也有請假的自由，已經演變成「勞資雙方」的關係了<sup>4</sup>。

即使是愛家如鍾梅音，也對家務繁瑣感到疲累，研究鍾梅音可關注她對女性婚姻、

---

<sup>1</sup> 鍾梅音，〈寫給女兒〉，《風樓隨筆》（臺北市：三民書局，1969年8月初版），頁87。

<sup>2</sup> 鍾梅音，〈耳朵、素描、及其他（代序）〉，《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2。

<sup>3</sup> 鍾梅音，〈迎接「劃時代的三八」〉，《風樓隨筆》（臺北市：三民書局，1969年8月初版），頁147。

<sup>4</sup> 鍾梅音，〈迎接「劃時代的三八」〉，《風樓隨筆》（臺北市：三民書局，1969年8月初版），頁147~148。

以及主婦、作者、編者等多重角色的轉換間，得經常不斷地做調整以盡其責，又因著病體，常力不從心，莫可奈何。到底鍾梅音為何帶有喘病宿疾？又受到怎麼樣的影響？病帶給她的不盡然是苦痛，也淬煉了她，她又從中提取了什麼樣的人生哲學呢？鍾梅音對於家務價值又有什麼樣的想法？其實，鍾梅音也希望人們給女性多點空間，不要將女性僅限制在洗衣、煮飯、縫製衣裳等不得閒的繁瑣家務中：

女人與男人一樣的都應為家庭謀共同的幸福，但不限於在廚房裡，也不限於在洗衣盆裡，假使太太能把困守在廚房裡和洗衣盆裡的時間分些出來種種花、養養魚，做些美化環境的工作，難道不比每天只圖三餐的工作更有趣嗎？在世界上已經有了人造纖維的出品以後，又何必一定要太太親自紡紗織布呢？<sup>5</sup>

賢慧主婦、完美母親形象，或許有女性努力地想要達到標準，然而，鍾梅音盼望社會上也得調整一些價值觀念，對於女性的要求也得更具有彈性，或許我們也可以思考母親形象是否能更多元，因為母親也是人，也有屬於她個人的需要，也有不足之處，也有適應的問題，也需要他人協助，透過一些方便的器具，小家電的輔助、食品加工業逐漸成熟，很多家務可以請人代勞、衣服也可以買現成的成衣等，社會的轉型下，就如同鍾梅音說的衍生出很多可能的想像，她也曾提出了許多建言，從她的病體匱乏需求，從她的坦言勞累，供我們思考、反省是否將女性照料家庭當作是太理所當然的責任。

## 第一節 鍾梅音的病史

鍾梅音生長在動亂年代，除了在戰爭中要設法保住性命外，身患喘病宿疾的鍾梅音不同於一般健康人，身體內部還存在著另一個戰場，她一輩子要與之戰鬥。鍾梅音的作品，也紀錄了相當多她掙扎於病痛與生存當中，不管何時，隨時隨地都得做好準備，因為若是氣喘忽然發作時，鍾梅音或許就得立刻為自己打一針，她在〈畫裏乾坤〉便記錄了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氣喘病患的日常生活，鍾梅音曾說：

幸我能為自己注射藥針，每當喘息發作，便注射一針，可是一晝夜喘息六七次，就得注射六七針，因此每次到孫女士畫室學畫，手袋裡總是隨帶針筒，提防畫到

<sup>5</sup> 鍾梅音，〈迎接「劃時代的三八」〉，《風樓隨筆》（臺北市：三民書局，1969年8月初版），頁148～149。

一半，喘息又作。<sup>6</sup>

即便此宿疾如此干擾她的生活，筆者閱讀著鍾梅音的文章，卻很少讀到她對於病痛的呻吟抱怨，反而傳達的是她的戰鬥精神，更難能可貴的是，她文章內容始終給人正面積極的態度。

五〇年代官方文藝核心政策可以說就是「戰鬥」，外省男性作家多套用陳紀滢反共文學範式，情節就是在那大時代裡，自由正義與邪惡共黨的戰鬥，屬於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而女性作家鍾梅音亦傳達了人為了生存必須挺身迎戰，同樣處理了戰鬥精神，她以自身的抗病心路歷程為題材，卻更貼近讀者，更易鼓舞人心，因此研究五〇年代遷臺女作家鍾梅音，筆者認為不能缺少認識她這塊病史。

## 一、從兒時到婚前的病體及其影響

### （一）、小時疾病纏身

鍾梅音在三歲時，在麻疹痊癒後，身體狀態尚虛弱時，得了感冒，家中請中醫來做治療，然而不但沒恢復健康，反而變成了慢性支氣管炎，形成終身困擾不已的喘病<sup>7</sup>。所以可憐鍾梅音從小，打從她有記憶以來，就是瓶瓶罐罐的藥品。這纏人的氣喘病不時地發作，沒日沒夜地打擊著她。使得她童年的成長過程，不同於其他的小孩，時時刻刻得注意飲食，甚至不能隨性玩樂，因為一動一笑之間就有可能會引發氣喘<sup>8</sup>。

這病不僅痛苦，而且整年纏著我，使我無法像一個正常的兒童那樣甜蜜地吃，舒服地喝，放情地笑，甚至暢快地呼吸。<sup>9</sup>

### （二）、因病頻繁中斷求學之路

由於鍾梅音的家裡經濟條件許可，家人也積極地尋求治療喘病的方法，「此後十幾

<sup>6</sup> 鍾梅音，〈畫裏乾坤〉，《母親的憶念》（臺北：復興，1954年4月），頁92~98。

<sup>7</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79。

<sup>8</sup> 鍾梅音，〈我的童年〉，《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36。

<sup>9</sup> 同前註，頁36。

年裏，所看過的中西名醫可以開設一座規模宏大的醫院，而病勢愈陷愈深。」<sup>10</sup>父母為了治她的病，遍訪中西名醫，可是病情非但無絲毫改善，病勢反而愈發嚴重。導致她正規學校教育經常中斷，母親只好幫她辦理休學，爾後鍾母為女兒辦過數次離校經驗，經辦手續愈發純熟。可見鍾梅音被此病折磨之深之頻繁。休學使得鍾梅音失去了與同儕共同學習、在外玩耍的機會。

然而鍾梅音進取心旺盛，又為自己爭來念中學的機會，參加獎學金考試，考上了，並被保送國立中央大學實驗中學。但中大實中課業相當繁重，鍾梅音回憶起那段求學生涯，說她是一天也沒鬆過心，連夢裡都在讀英文，證三角等，加上一次秋日遠足徒步返校，精力透支的結果又引發了喘病，未到寒假就因二次發作而幾乎一病不起，母親只好又到學校為鍾梅音辦停學手續。

在藥石的苦味摻和着絕望的苦味中，我又度過了長長的一段不見陽光也沒有春天的日子，我已識得藥性，曾經不止一次想結束這累贅的生命。<sup>11</sup>

鍾梅音從學校被帶回來後，整天悶在家裡調養身體，藥苦心更苦，只能做些女紅，冬天編織絨線衣物，夏天繡花<sup>12</sup>。鍾母認為雖然女兒病得虛弱，但做些簡單勞務，不致太過操勞，或許能促進身體和精神健康。可是只能在家養病及做些簡單手工針線活的鍾梅音，幼小心靈深處著實深受打擊，本是天真爛漫、無憂無慮的年幼時期，在內心卻已蒙上了層層的陰影，「這病使我在許多年都陷於絕望之中，人生最悲慘的事，莫如對這世界已經絕望。」<sup>13</sup>小小年紀的她，竟多年來對於自己的人生感到相當絕望。再加上傳統大家族結構，鍾梅音周邊的親屬也經常談論她的狀況，讓她感到尷尬不安，陷於羞愧的情緒當中。

自十四歲休學後，親友們都以為父母從此必須負責贍養我的一生，難堪之餘，不只一次徘徊於生死邊緣。<sup>14</sup>

在那個年代，華人傳統保守封建社會環境中，家族親屬關係緊密牽扯不清，卻也帶

<sup>10</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79。

<sup>11</sup> 鍾梅音，〈我的中學生活〉，《春天是你們的》（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6月），頁133。

<sup>12</sup> 鍾梅音，〈我的童年〉，《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37。

<sup>13</sup> 鍾梅音，〈我的童年〉，《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36。

<sup>14</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79。

給個人始終環繞在旁，無時無刻不感受到親屬關注的眼光，一種無形而沈重之感，讓她本就不順暢的呼吸系統，身體、心靈、精神上產生窒息感，甚至興起不如死去的念頭。

幸好鍾梅音生性樂觀，她說：「儘管這個世界對我不甚友善，我對四週一切總是很容易滿足，很知道感謝。」<sup>15</sup>，這使得她終究克服這種自毀的想法，因病痛反而激起了強烈的求生意志，而後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她是這麼鼓勵自己的「每當我有這種意念，立刻猛省——既然我連死都不怕，世上也再沒甚麼可怕的了，我要努力奮鬥。」<sup>16</sup>，她疾病纏身，卻保持著正面的思想，積極樂觀的性格，著實難得。

鍾梅音體認到困難和打擊是一時的，假使能撐過的話，生命的春天又將來到：「生命畢竟是珍貴的，強韌的，只要一息尚存，倒下的樹幹旁邊仍會再發枝葉的。」<sup>17</sup>她如此堅強的心志，造就她能更有彈性的去面對困境。人在面臨到自身不能控制的變局時，若能有安頓身心靈的能力，將成為支持自己極為重要的能量，才不致被艱辛的困境而擊倒。這樣的堅毅性格，也是她爾後面臨更大挑戰時，在那風雨飄搖，身處在個人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大時代中，尚能安頓及適應的關鍵因素。

病體的折磨，也使得年幼的鍾梅音思想早熟，「喘息，它使我把父母折磨慘了，因而失去了父母的鍾愛。」<sup>18</sup>因為對於這樣的慢性病也逐漸地把父母對她的愛給消磨殆盡，加上她這富貴喘病正消耗著家中的經濟，親屬也為之擔心，但或許是在無心間脫口而出的冷言冷語，無助於解決鍾梅音的病痛，反而更加無情地打擊她幼小的心靈，大概讓她因而產生自己也許是家中累贅的想法。但這些卻也讓鍾梅音激發出另一種消化吸收負面情緒的能力，她並不將這些痛苦在心中反覆琢磨，「當大人們對我表示失望時，我雖也覺得難堪，可是不久便又忘得一乾二淨了。」<sup>19</sup>隨著健康的情況改善，她得以喘息靜思，對於無法理解，人力無法改善的，鍾梅音有智慧地選擇遺忘。「我不想回憶過去，我只想遺忘一切。」<sup>20</sup>

上帝待我最仁慈處，是給我另一特殊的恩惠——健忘，我若不能忘掉許多悲痛的

<sup>15</sup> 鍾梅音，〈我的童年〉，《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37。

<sup>16</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79。

<sup>17</sup> 鍾梅音，〈我的中學生活〉，《春天是你們的》（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6月），頁134。

<sup>18</sup> 鍾梅音，〈我的中學生活〉，《春天是你們的》（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6月），頁128。

<sup>19</sup> 鍾梅音，〈我的童年〉，《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37。

<sup>20</sup> 鍾梅音，〈我的童年〉，《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36。



往事，與給我幼稚心靈以重創的人物，我怎能面對這坎坷的人生呢？<sup>21</sup>

鍾梅音的求學之路也坎坷異常，不只是因個人自身健康的問題，更因為生長在那苦難多舛的戰亂頻繁的年代，中國飽受了帝國主義的侵襲，長年地對日抗戰，鍾梅音隨家人不斷遷移逃難，後來全家遷往漢口。好不容易安頓下來後，等到隔年，她以同等學力考上五年制藝專，雖然最終又因為武漢大撤退並未入學，可是對於鍾梅音來說，虛弱的她能夠考上學校，像是給自己打了一劑強心針，因為她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這對經常受到疾病痛擊的她，在心理上是個極必須要有的對自我信心的確立。後來幸運的是，她的健康情況逐漸好轉，氣喘病根雖未斷，但發作次數已明顯少了很多<sup>22</sup>。

正好對日抗戰爆發，遷往漢口，第二年便以同等學力考入一所五年制的藝專，雖因武漢大撤退未能入學，信心却大為增加，健康也漸漸轉佳，但只是發作次數減少，從未斷根。<sup>23</sup>

隨著中日戰局的變化，人們不斷遷徙，後來鍾梅音又與家人再遷至廣西。1939年就讀廣西大學。就學期間，17歲的她與余伯祺認識訂婚，余伯祺隨部隊到雲南，兩人在兩年八個月中透過書信往還於雲南和廣西之間，後來於1942年結婚，鍾梅音隨夫定居於雲南祥雲。

## 二、婚後的病體與母職及自我實踐間的難題

### （一）、婚後宿疾再度猛力地侵襲

對日抗戰的持續發展，人們長期處於生死存亡當中，精神狀態相當緊繃，已面臨快要崩潰的臨界點了。鍾梅音氣喘宿疾，雖然較少發作，但病根未除，就在21歲懷孕生子讓她身子健康狀況急轉直下，氣喘竟又再度地侵襲她的身體。「病勢再度轉劇，是廿一歲時小兒出世以後，正值對日抗戰末期，生活備極艱苦，我在不勝勞瘁之餘，喘病時常發作。」<sup>24</sup>而且此疾一旦再發作，就變得相當棘手而難以收拾，持續了三年，直到戰爭結束，

<sup>21</sup> 鍾梅音，〈我的中學生活〉，《春天是你們的》（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6月），頁128。

<sup>22</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79。

<sup>23</sup> 同前註，頁179。

<sup>24</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79~180。

復員回上海公婆家，也不見恢復<sup>25</sup>。在兒子出世後的四年間，鍾梅音虛弱無力，照料孩子的工作全託給娘家母親、妹妹、嫂嫂、婆婆等人，鍾梅音回憶說：「孩子的幼年對我簡直沒有什麼印象，彷彿一轉瞬間，他已經變成一個小大人了。」<sup>26</sup>她那第一個孩子的童年時期，鍾梅音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因為等她病好轉後，她才驚覺彷彿一眨眼之間，他的孩子已經四歲了<sup>27</sup>。

就在鍾梅音好不容易身體狀況好轉，又懷了第二胎，是個女兒，生下孩子後，產後身子極虛的她產月中得病，服藥治療將近八年之久，這第二個孩子只好交由奶媽照顧。鍾梅音的這大女兒始終跟母親無緣，交由他人之手，使得母女更為生疏，甚至後來又因為國共內戰爆發，悲劇性的分隔海峽兩岸。讓鍾梅音內心感到非常難過不捨、遺憾痛苦。

當我健康恢復後，又有了第二個孩子，不幸因為產月中得病，又是將近八年與藥石結不解緣，這孩子便交給奶媽，對我更疏遠了，現在深陷鐵幕，與我隔成兩個世界，我連想看看那小大人的樣兒都不可得。<sup>28</sup>

## （二）、遷臺後所書寫的兩處鄉愁

孩子總是父母的心頭肉，兩岸隔絕，鍾梅音雖見不到大女兒的面，卻時常夢見她。而遷居似乎是那個年代的人常有的漂泊，1948年3月隨夫遷臺後，先在基隆短暫居住後，隔年遷往宜蘭蘇澳，而後1955年4月又從蘇澳搬到台北。鍾梅音始終懷念居住在蘇澳的六年期間，因為那是她親手建立的家，也是她大兒子童年生長的地方。一日在台北家中榻榻米上，朦朦朧朧夢見了，彷彿回到了自己親手植栽花木裝飾的蘇澳故居，外面正下著雨，從紗窗看出去是一片黑暗，家裡日光燈透著柔和的光線，還依稀聞到了百合花香，丈夫正在看書，兒子在看畫，她則在檯燈下寫作，忽然間有隻胖胖小手撫摸了她的腿，低頭一看，竟是日夜所思，總見不著的大女兒小安。

丈夫閱書，小灝看畫，我坐在檯燈下面寫作，忽然覺得有隻柔軟的小手在我腿上撫摸，低頭一看，是小安，她正仰著圓圓的小臉對我微笑，那閃著藍色光暈的眼

<sup>25</sup> 同前註，頁179~180。

<sup>26</sup> 鍾梅音，〈孩子不會永遠幼小〉，《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31。

<sup>27</sup> 同前註，頁31。

<sup>28</sup> 同前註，頁31。

睛愛嬌地一瞬，便又含羞似地把頭別轉過去。<sup>29</sup>

醒來後，這個夢境讓鍾梅音悵然不已。她思念著滯留在大陸沒帶過來臺灣的女兒小安，而小安卻出現在她最想回去的蘇澳家中，她說這真是「兩處鄉愁，竟攢到一個夢中來捉弄我了。」<sup>30</sup>，兩岸隔絕後，留在中國大陸的大女兒小安，和遷居臺灣後自己親手所建立的蘇澳故居，竟在夢中揉成了鍾梅音內心當中的兩處鄉愁。這樣的揪心，這般的無奈，鍾梅音只能透過書寫抒發出來。刊於報紙的副刊上，作者和大多有著類似遭遇的讀者，透過文字交流，彼此紓解存於心中濃重的鄉愁與無法回歸故土過往的失落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互取暖。在那個動亂流離失所的年代，誰沒有被時代捉弄的萬般無奈。而女作家的抒情散文給離散浮動的人心，一個紓發苦悶情緒的窗口。

民國四十四年，鍾梅音的先生余伯祺工作轉任到臺北，全家因而搬離宜蘭蘇澳，離開那步調緩慢且令人難忘的美好鄉間生活，到了臺北，鍾梅音家起了變化，她肚子裡已有了孩子了。在首都臺北的生活消費高，加上又生了個孩子，經濟相當吃緊<sup>31</sup>，沒有額外的錢能僱請奶媽和保姆來照顧。親屬也都不在身旁，什麼都得自己來。鍾梅音常常在哄好孩子睡著後，自己累得像是「一堆散了板的廢木頭」<sup>32</sup>。孩子一天天一點點地長大，鍾梅音卻快要撐不下去了。

孩子體重日增，我的力氣卻隨著撕去的日曆俱減，漸漸地我連給她洗澡都洗不動了，為此我不知流過多少絕望的眼淚，我覺得上天若要降罰於一個女人，最殘酷的方式便是給她一個孩子而又不許她撫養。<sup>33</sup>

事實上鍾梅音的身體在生產前已經轉壞，又加上孩子消耗母體，醫生已對鍾梅音提出警告，她生產後，需要靜養，不能親自撫養嬰兒。而原先鍾梅音接受了醫生的建議，預備把孩子送給朋友。但卻也有其他友人不能理解為何她有此打算，甚至還以為要送走孩子的鍾梅音是「貪圖享樂」<sup>34</sup>，讓鍾梅音也無言以對。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雖然之前已生過兩個孩子，但她從來沒體力照料他們，所以對自己是否有能力照料

<sup>29</sup> 鍾梅音，〈無題〉，《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93。

<sup>30</sup> 同前註，頁93。

<sup>31</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80。

<sup>32</sup> 鍾梅音，〈孩子不會永遠幼小〉，《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31。

<sup>33</sup> 同前註，頁31。

<sup>34</sup> 鍾梅音，〈孩子不會永遠幼小〉，《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33。

這第三個孩子並無信心。

其實最大的原因，還是想起前面兩個孩子都吃過我太多的苦頭，對於做母親本來缺乏自信的我，忽然喘病加上肺病，而且因為胎兒不斷地消耗我，痊癒的希望非常黯淡。<sup>35</sup>

但鍾梅音心中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曾告訴她的話，當一個母親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親手抱她的孩子，也回想起從前未滿三個月的大兒子時常哭泣，而她只顧著自己手邊的針線活，母親責備她為何孩子哭她都不理，這時她才抬起頭來，看到她的孩子已經哭成了淚人兒，孩子滿臉淚痕的模樣，讓她內心感到相當自責。因此這第三個孩子，不管醫生怎麼說，無論如何辛苦，她都要照料她自己的孩子。這也是她「第一次真正做母親」<sup>36</sup>。幸好後來孩子健康地成長了。

我這樣做，只為對孩子有一個妥善的交代，自身的健康問題還在其次。總算這一切的煩惱都已過去，現在孩子長得很好了。<sup>37</sup>

### （三）、因病阻斷職涯

鍾梅音愛她的孩子，為了孩子她強健起來，大概是所謂的「為母則強」的力量所致。然而 1955 年 4 月搬到臺北後，「小女出世，又兼居長安，大不易。」<sup>38</sup>住在臺北生活開銷大，加上友人強力邀請她參與編務。於是在她小女兒出生八個月時，1956 年 4 月她進入了職場，任職《婦友》月刊主編。可是她的身體本來就無法太過操勞，職業婦女工作家庭兩頭燒，「我既要撫養嬰兒，又要出外就業，喘病再度轉劇。而且病況之惡劣，與民國三十七年不相上下，住醫院已成了家常便飯，也接受過一切最新的治療，可是都未發生顯著的功效。」<sup>39</sup>編務工作又繁忙異常，要處理及留心的地方太多，勞心又勞力，已耗費掉許多精力，再加上她做事態度謹慎，自我要求甚高，回家後還要照顧年幼的孩兒，處理家務，終於不堪負荷，最終於 1957 年 11 月因喘病辭去職務，忍痛離開職場，也在醫

<sup>35</sup> 同前註，頁 33。

<sup>36</sup> 鍾梅音，〈孩子不會永遠幼小〉，《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 年 2 月），頁 32。

<sup>37</sup> 鍾梅音，〈孩子不會永遠幼小〉，《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 年 2 月），頁 33。

<sup>38</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180。

<sup>39</sup> 同前註，頁 180。

生的囑咐下，停止寫作。她在〈寫給女兒〉文中，提及這段割捨心愛工作的心路歷程。

在你出世八個月時，我去編一份刊物，為生活、也為興趣，編務之餘，我還寫了廿幾萬字，這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兩年。但一場大病，使我不但放下了筆，也忍痛離開我最喜愛的工作，從那時起，我常想一覺睡去永遠不再醒來。拿破崙在滑鐵盧之役後一覺睡了三十六小時，也許非關健康，但信心的喪失，我與他並無二致。<sup>40</sup>

鍾梅音失去了一份編務工作，如此地難過，沈重的打擊、身心靈都產生的失落無望，她甚至拿戰爭失利來比喻她心中那極深沉的潰敗感。對戰後遷臺的女子鍾梅音來說，放下筆，離開工作，不是為了少了一份薪水而可惜，而是失去了一種自我價值肯定的信心，失去的是一個身分位置，一個讓她在臺灣能與他人互動的平台，失去了一個發聲管道，也失去了與讀者知己抒發心情的機會。鍾梅音最初提筆寫作是因為鄉居寂寞無俚，以一種渴望與親友在夜裡聚談的心情抒發、寄情於文字當中，若非離散的歷史因素、在故土中國，她有屬於她原來就有的家族支持的力量，親屬、好友環繞在她身旁，身體不好的鍾梅音，若不能親自餵養她的孩兒，也會有婆婆、媽媽、嫂嫂、奶媽們等幫忙照料，遇事總有親人、好友可商量。然而，來到異鄉臺灣，孤身一家子，身邊僅有丈夫和孩子，少了家族的支撐，只能靠自己用筆，用職業帶來的身分位置與生活周遭的人們，以及這塊陌生的土地連結在一起，鍾梅音所寫的文章，無心插柳柳成蔭，從獲得了編者的欣賞而刊登了出來，而後結集成冊發行，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因此，鍾梅音也建立起信心繼續筆耕，更期待自己的才能得以發揮出來，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

蘇雪林曾給鍾梅音《母親的憶念》寫了序文，她說從閱讀鍾梅音所寫的文章〈我的手〉等就能感受到鍾梅音天分頗高。王文漪則從鍾梅音的工作效率肯定了她的能力，鍾梅音自己也曾在〈寫給女兒〉一文中告訴她的女兒，也分享了成功的公式給她的讀者，那就是「毅力+智力+體力=成功」。閱讀鍾梅音文本，我們知道她是有毅力的，蘇雪林及王文漪更看到鍾梅音的資質及潛力，然而，病終究潰敗了始終堅強的鍾梅音，打擊了她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心，切斷了她和社會的連結，她僅能閉上眼不再掙扎，也難怪她會如此的難過，也需要時間來平撫她受傷的心。

<sup>40</sup> 鍾梅音，〈寫給女兒〉，《風樓隨筆》（臺北市：三民書局，民國67年7月三版），頁87。

#### (四)、同事友人眼中的鍾梅音

1954年也就是民國43年國慶日，王文漪奉命創辦《婦友》月刊，創辦刊物不易，再加上編輯任務也一併扛起責任，並且要負責行政工作，然而後來實在不是一人之力能負荷，1955年，鍾梅音隨夫調職而遷居臺北。王文漪請鍾梅音來分擔編務。鍾梅音於1956年接任為中央婦工會的《婦友》月刊主編。王文漪很欣賞鍾梅音的工作表現，在她認識的同儕當中，她認為鍾梅音是少數做事相當快速的人才，把《婦友》月刊編得相當出色。王文漪雖注意到鍾梅音氣喘病經常發作，然而在一次的探病時，才驚訝於此症的厲害，她回憶說：「我有一次去探視她的病，才知道這種病折磨人的苦痛，她躺在床上不停的喘，原來連躺下也不能，只喘得透不過氣來，更說不出話。」<sup>41</sup>王文漪親眼目睹鍾梅音的氣喘發作，才了解鍾梅音宿疾的磨人，她後來回憶鍾梅音的病是：「說來就來，一來就狂風暴雨，令人難以招架，發作的次數多了，梅音也倦勤了，不想編《婦友》了。」<sup>42</sup>雖然王文漪極力想留鍾梅音，甚至出動友人林海音和姚葳挽留，但鍾梅音辭意已堅，還是離開了。可是鍾梅音是多麼捨不得她的這份工作，只因無奈自己的身體狀況真的不能再配合了。

## 第二節 病體·家庭·母職——拉扯與調和

鍾梅音這如影隨形擾人的宿疾，不只困擾著她自身，且不斷干擾屬於她的夢想，迫使她曾痛苦地放棄她的學業、事業。帶著宿疾的鍾梅音，也讓最愛她的家人很心疼她。她的先生，孩子們也都受到了影響，病痛消磨的不只是生病的人，同時也折磨家人的心，然而，在閱讀鍾梅音散文作品中，卻也能從中感受到家人之間的愛，親情給予支撐個人生命的能量，家所賜予個人的安定力量。

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的考察，鍾梅音散文文本中，鍾梅音的病體對於其子女及夫婦關係的影響，鍾梅音的家庭關係，家人之間的相處，分為兩個層面來觀察，一為親子之間的互動，另外一個層面則是病體所影響的夫妻關係。

<sup>41</sup> 王文漪，〈懷思梅音〉，《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133。

<sup>42</sup> 王文漪，〈懷思梅音〉，《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134。

## 一、子女心智的早熟

### (一)、兒子小灝與大女兒小安

鍾梅音一共生育了三個孩子，她的孩子當中排行老大的是兒子小灝，老二是大女兒小安，老三則是她暱稱為小白羊的小女兒。她的大兒子小灝，大女兒小安都出生於中國，而小白羊則是鍾梅音遷居來臺後才有的小女兒。

1948年，鍾梅音跟隨先生余伯祺，帶著約四歲大的兒子，一同來到了臺灣，鍾梅音當時身體並不太健康，再加上基隆的氣候多雨陰濕，身體狀況一直不好，幸好隔年就遷往宜蘭蘇澳。鍾梅音在1951年寫〈基隆一夕〉，文中紀錄她已經兩年沒去過基隆了，她帶著兒子小灝去了基隆一趟，她寫道：「我到臺灣第一年便是住在基隆，按理，基隆給我的回憶應是不愉快的，因為我在基隆曾有大半年在病中，那苦雨連綿的雨季，那嘈雜紛亂的碼頭，那骯髒的醫院，那痛楚的呻吟……」<sup>43</sup>，幸好鍾梅音生性樂觀且健忘，而且已事隔兩年了，她再次回到基隆時，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基隆，竟變成甜美的，「時間是最可人意的朋友，在你不知不覺中，它把這些不愉快的回憶統統給你拂去了，代替的卻是許多繫人心魂的意象。」<sup>44</sup>她的兒子小灝也和朋友玩得開心，還對母親說：「媽咪，這次我們到基隆只玩了兩箇半天，等我們回上海時，希望再到基隆來玩十天！」<sup>45</sup>。

這趟基隆之旅，使得鍾梅音和她兒子小灝，對於基隆時期的生活回憶，由苦轉甜，然而，鍾梅音還記得當時因著她的病，讓她小小年紀的兒子小灝也被迫要做些適應，影響了孩子原本單純的童年生活。鍾梅音在多年後，1967年寫了〈與吾兒書〉抒發了她頻繁地出入醫院，著實讓她的兒子受苦了，她心疼地說：

早在你很小的時候，便已習慣看我住醫院。那時我們還在基隆，你才四歲，每當我住醫院時，爸爸先為你收拾一包衣服，讓你捧着跟在鮑叔叔後面去趕交通車，有人問起，你會說：「媽媽又發喘病啦，嚙沒人燒飯，阿拉到臺北大舅舅家去。」

46

<sup>43</sup> 鍾梅音，〈基隆一夕〉，《母親的憶念》（臺北：復興，1954年4月），頁8。

<sup>44</sup> 同前註，頁8。

<sup>45</sup> 鍾梅音，〈基隆一夕〉，《母親的憶念》（臺北：復興，1954年4月），頁11。

<sup>46</sup> 鍾梅音，〈與吾兒書〉，《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197。

鍾梅音身體的不健康，影響了她子女的生活，在她所寫的文章中，常常道出她的不捨與無奈。作為一個母親最痛苦的遭遇，莫過於與子女離散，而鍾梅音心中一直有這麼個遺憾，那就是她未將她的大女兒帶在身邊，她於 1947 年秋生下她的長女余令怡，也就是她文中的小安，產月中的病，產後身體虛弱，無法餵養，只得請奶媽代為照料女兒。

身處戰亂時代，總有許多悲劇性的故事，鍾梅音的痛苦是與她的大女兒小安的分隔兩地，因為 1948 年鍾梅音與丈夫來臺時，他們僅把兒子帶在身邊，大女兒則留在中國，鍾梅音曾提過自己生大女兒小安後，身體狀況不佳，無法撫育女兒，而只能交由他人照顧，鍾梅音在〈孩子不會永遠幼小〉中述說她的虛弱病體大大影響了她與小安的母女關係：「當我健康恢復後，又有了第二個孩子，不幸因為產月中得病，又是將近八年與藥石結不解緣，這孩子便交給奶媽，對我更疏遠了」<sup>47</sup>因此，或許當初孩子就是交由奶媽在照料，才沒帶能帶在身旁，未料後來卻因為兩岸隔絕，鍾梅音與她的大女兒小安因而分隔兩地，從此只能在夢中相見<sup>48</sup>。

鍾梅音隨夫來臺時，僅攜大兒子來臺，女兒則留在大陸交由親屬代為照料，原本以為很快就能回中國，沒想到，再也回不去了，鍾梅音控訴這樣親子骨肉分離的悲慘遭遇，起因就是共產黨引發的動亂所導致的。因此，閱讀鍾梅音文章中，不難發現她反共立場鮮明，也經常將之化為行動，配合著官方反共文藝宣傳。鍾梅音甚至為了寫反共的宣傳稿，終日費心思，日夜琢磨著如何揭露出共產黨的惡性惡行，因此連哄她的孩子睡覺的床邊故事，竟也脫口而出罵共產黨的話。〈某夜〉這篇文章中記錄了鍾梅音與兒子親子互動中這樣一段小插曲。

1951 年 1 月 13 日寫的〈某夜〉一文刊於《中華日報副刊》上，內容是有一天丈夫出差去了，家裡只剩鍾梅音和她兒子母子二人，晚上兒子在寫功課，寫到一半停電了，她提議既然沒辦法寫功課，那就早點睡吧，可是那時只不過才晚上八點，孩子央求媽媽講個故事給他聽，鍾梅音拗不過就跟兒子說了個熊的故事，不過說著說著，鍾梅音提了一句，那大熊脾氣太壞，牠以為人家總是奈何牠不得，跟共產黨一樣——鍾梅音忽然驚覺到自己的思路，怎麼變得三句不離共產黨，「我忽然停住了，是不是因為這一向寫多了

<sup>47</sup> 鍾梅音，〈孩子不會永遠幼小〉，《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 年 2 月），頁 31。

<sup>48</sup> 鐘麗慧，〈鍾梅音卷（一）〉，《文訊雜誌（雙月刊）》第 32 期（1987 年 10 月），頁 252。

從此資料中，一則值得高興的訊息：三十六年秋天，在上海生長女余令怡（目前侍奉外婆於福建老家）。



宣傳稿？變得三句不離共產黨，真是煞風景之至！」<sup>49</sup>，由此可見鍾梅音常寫此類反共文宣，思路自然連結要提到萬惡之源共產黨，然而這是給她孩子講的床邊故事，正當不知該怎麼說下去時，幸好兒子已經睡著了。而後她也就跟著睡了，在這麼個寧靜的夜晚，母子都已就寢了，然而〈某夜〉這篇文章同時也記錄了鍾梅音的喘病發作的頻繁：

睡到夜半，宿疾發作，趕忙捻亮電燈起來，消毒針筒準備注射，耀眼的燈光把孩子驚醒了，……「媽咪，你又不舒服了嗎？」「唔，沒有什麼。」<sup>50</sup>

這篇文章的內容，讀到了鍾梅音的兒子經常看到母親的宿疾發作，知道母親的身體狀況不甚健康，在夜裡，孩子本來已安穩地睡著了，但在深夜時分被耀眼的燈光給驚醒，睜開眼一看，媽媽正在打針，小灝立刻明白，媽媽身體又不舒服了。母親是帶著病的患者，不是健康的身體。然而母親對於孩子而言，是安全感的來源。鍾梅音輕描淡寫一語沒有什麼帶過，而小灝竟也沒再多問一句，可是這樣的景象，在孩子內心深處潛意識裡或許留存著不安的感覺，鍾梅音在照料孩子當中，也許是因為希望自己的病情，不要引起到孩子的不安。鍾梅音曾於 1968 年寫了〈艱辛又快樂的歲月〉回顧當年她拖著病體生育孩子的一段艱辛歲月，引文如下：

自從我第一個男孩(也是我唯一的男孩)出世以後，由於操勞過度而致宿疾復發，此後年年輾轉掙扎於病痛之下，基於優生的要求，也爲了自己的健康，早已絕了再做母親之念。可是那時的節育技術不及今日進步，當我兒四歲時又得一女，因我不能勝任母職而被留給祖母，而終因未能得到妥善撫養而犧牲。所以八年後得知自己又懷孕時，心情惡劣萬分，在這種情況之下孕育的嬰兒會是甚麼樣的性格呢？……事實上她很少無理取鬧，也非常樂於與人為善，全無「獨養女兒」的傲慢與孤僻行徑，……那搖籃邊的催眠曲，曾在無數寧靜的夜晚輕搖她含笑睡去<sup>51</sup>

此文道盡一個生病的女人，想扮演好當母親，但卻也經歷了千辛萬苦，幸好苦盡甘來，文中的那個嬰孩，也就是余伯祺和鍾梅音兩人眼中嬌滴滴的可愛小白羊。

<sup>49</sup> 鍾梅音，〈某夜〉，《母親的憶念》（臺北：復興，1954年4月），頁56。

<sup>50</sup> 鍾梅音，〈某夜〉，《母親的憶念》（臺北：復興，1954年4月），頁53~56。

<sup>51</sup> 鍾梅音，〈艱辛又快樂的歲月〉，《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172~174。

## (二)、小女兒小白羊

鍾梅音的健康情況實在不好，她的宿疾彷彿像是個不定時炸彈，隨時會發作，甚至有時爆發起來，嚴重的程度是必須得緊急送醫。時常進出醫院的鍾梅音，在醫院體驗到人生的無常，也從中看盡人間的冷暖悲歡，寫下了〈送病文〉、〈啼笑人間〉等篇她從痛苦中得到的領悟。她說：「人間的溫情」在醫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sup>52</sup>。她不要給家人帶來麻煩，住院就自己一人待在醫院，「獨自躺在病床上，鼻子裏接著氧氣管，手臂上刺着鹽水管，就成了不少好事者參觀的對象。」<sup>53</sup>，因此鍾梅音只要身體狀況好了點後，就會趕緊離開醫院。她對於這樣的讓人難過的景況，並不像她小時候，因為無助而感到對人生的絕望，反而更加堅強，因為她是母親，所以她說她並不沮喪，仍有勇氣，而這股力量就是女兒小白羊給她的。

當鍾梅音一次未等身體完全恢復就出院，剛抵達住所下車時，遠遠就聽見女兒喚她的聲音，緊接著女兒就急步跑了過來，投入她的懷抱，然而，四歲的孩子，在媽媽懷中聽到媽媽其實並還沒好，還在氣喘吁吁地，小白羊對母親鍾梅音說：「你的病還沒好嘛，為甚麼急着回來？」<sup>54</sup>，小女兒說的這番話，讓鍾梅音感到又心疼又感慨，她沒想到這麼嬌小的孩子竟會說出這麼懂事的話。一個父母寵愛有加的掌上明珠，僅四歲的女孩子，一定無時無刻都想黏在媽媽身邊，但懂事的孩子知道，媽媽病了，需要暫時離開自己到醫院治療，從小白羊口中說出的話，透露出超齡的懂事，我們感受到年紀小小的她因為對母親的愛，而有了早熟的體貼。

鍾梅音對於自己的病體，心知肚明地知道自己本不適合生養孩子，本來生了兒子之後，並不打算再生第二個孩子，然而，因為當年節育的技術尚未能盡如人意，又生了個孩子，但因為身體實在不好，因此僅能推給親屬照顧，來到台灣後，1954年鍾梅音得知自己懷了第三胎時，曾表示自己心情非常惡劣，她也擔心在這樣心情下，孕育的孩子會有什麼樣的性格？鍾梅音在〈母親的淚珠——給還未出世的孩子〉一文中，曾道出她懷有身孕，但她的身體卻又不適合生養孩子的悲哀：

---

<sup>52</sup> 鍾梅音，〈送病文〉，《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72。

<sup>53</sup> 同前註，頁72。

<sup>54</sup> 鍾梅音，〈送病文〉，《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73。

我不曾盼望你來，你却來了。……自從你來之後，我却不幸又得了另一種難以治癒的病症，醫生告訴我，因為你正在無情地消耗我。……我只有盡我一切力量，從營養與醫藥上去支持我自己，希望我能經得起你的消耗。……終於在不久之前，我病得不能下床了，那時家中有無下女，你父親急得只會亂轉……比這更壞的，醫生告訴我產後不能自己授乳，並且至少須經過一年的調養，我才能恢復健康。照醫生的忠告，照眼前這種情形，我只有準備把你交給我一位好友了。

「隨你吧，」你父親知道我的打算以後，傷心地回答：「若在抗戰以前，找個奶媽也就把這問題解決了，現在身爲國營事業機構一個高級職員，却養不活一個嬰兒，我又還有甚麼可說！」<sup>55</sup>

或許是為母者強，後來，鍾梅音還是把孩子留了下來，而且養育得很好。她於1968年寫了篇〈艱辛又快樂的歲月〉，文中心中充滿感恩地說道：

感謝上天，她和她哥哥真是上天賜我的雙璧。雖然因為先天不足而都欠強壯，但在我悉心護持之下，如今他們的健康已在水準之上；而且好學不倦，尊敬師長，並愛護他們周圍的人<sup>56</sup>

當初醫生告知鍾梅音產後不能自己授乳，而且得調養身體至少一年之久，使得鍾梅音甚至已準備將女兒送給好友照顧，然而，母親始終是愛孩子的，鍾梅音終究克服了這個困難，她的小女兒得以留在自己的身邊，且順利地成長了。

## 二、丈夫對病妻的愛

余伯祺，深愛鍾梅音的丈夫，他更是鍾梅音一生的支柱，余伯祺曾在〈我的老婆大人〉一文中，幽默地話語中，透露著對妻子的愛：「這一輩子已被她折磨夠了，我等於跟一個藥罐子結了婚，為她的病，我不但學會打針噴霧，還宰過貓，剝過蛇，騙她是龍肝鳳膽吃下去。」<sup>57</sup>男女本為獨立個體，或許因為有愛才能做到這種程度。這短短的幾行

<sup>55</sup> 鍾梅音，〈母親的淚珠——給還未出世的孩子〉，《小樓聽雨集》（臺北市：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1958年6月初版），頁7~8。

<sup>56</sup> 鍾梅音，〈艱辛又快樂的歲月〉，《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175。

<sup>57</sup> 余伯祺，〈我的老婆大人〉，《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123。

字，著實讓人感受到什麼是夫妻之情，什麼是不離不棄的夫婦之愛。

鍾梅音氣喘病情隨著經驗及藥物的發展逐漸得到較好的控制，然鍾梅音晚年時期，身體健康又出了問題時，需要靜養，有時虛弱到無法跟關心她的朋友們見面，因為她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余伯祺總在旁，體貼地照料著她。有一次鍾梅音從臺灣回美國探望子女，而後又飛回來臺。帶病飛了卅多小時，回到家當然得好好休息，但朋友們也都盼著見到她。余伯祺做了個比喻：「野獸受傷以後，都有躲在洞裡獨自舔創口的習慣。」<sup>58</sup>也許是自尊心強的關係，或許也是女人愛美，丈夫便幫著老婆擋下了這些人情，他說：

電話都不敢接。我像窩藏著一名通緝犯，談起她的行蹤嗯嗯啊啊，冰箱早已儲足食物，只由她靜悄悄做賊似地自己燉點好湯來喝。……而當人們再見她時，她又容光煥發，若非脖子上有鐵枷為證，誰也不信她曾病過，而且是病得那麼狼狽。<sup>59</sup>

閱讀鍾梅音文章，看過鍾梅音發病的人們，常會以為她大概撐不過去了，但總是沒過多久就如同余伯祺所說的段話，她出院了，「又精神奕奕的與常人無異」<sup>60</sup>。可是外人怎麼能真正了解當中到底經過了怎麼樣的生死關頭痛苦掙扎，家人又是提供了多大的照料，病人和家屬之間的緊密關係，是給病人相當大的鼓舞與支持，有了家人的愛，才讓鍾梅音一次又一次提起勇氣「裹創而戰」。

### 第三節 因病而生成的領悟及智慧

#### 一、亦戰亦和，與病和平共舞

鍾梅音對於自身的疾病，寫了篇〈與造化抗爭〉，文中描述她與喘病的抗爭經過，從絕望到重拾信心而後，轉而正向思考來面對病體的心路歷程、介紹醫生治療的方法、用藥的說明、友人所提供治喘的食療以及她自身久病成良醫所得到的自創治療心法。

1949年居住在臺灣宜蘭蘇澳近海處，那裡的環境給了長期身處戰亂之下的鍾梅音，

<sup>58</sup> 余伯祺，〈我的老婆大人〉，《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131。

<sup>59</sup> 同前註，頁131。

<sup>60</sup> 王文漪，〈懷思梅音〉，《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134。

一種很安定的感覺，暫時能不用為了活命而搬遷，精神上的壓力暫時能得到紓解，有了喘息的空檔，她終於第一次感到有了屬於自己的家了。在蘇澳好山好水的自然環境下，心靈上也不再漂泊無定，便讓人能休養生息。鄉村慢步調的生活，種花、養雞、聽海浪聲，調劑心情，心情愉快自然有助於身體恢復健康。鍾梅音喘病發作的次數也因而趨緩。

生活雖然不大方便，但很安定，我第一次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家。更由於我一向喜愛農村風光，病後種花養雞，怡情悅性，頗為自得其樂，喘病發作的次數才漸漸減少，寫作也從那時開始。<sup>61</sup>

然而 1955 年隨夫工作轉調移居臺北後，生活方式改變，加上接了繁忙的編務工作，又要兼顧家務及照料孩子，喘病又發。於是鍾梅音又如同她小的時候，為了求特效藥及根治的方法，遍尋中西療法，臺北的各大醫院她都去過了，也請教過近十位的中醫師。這些求取的過程都是所費不貲，且耗盡精神及寶貴的時間，可是得到的結果令她失望，「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緣木求魚，不再拿自己去作試驗品。」<sup>62</sup>

後來她明白喘病根治也許還有待未來醫療科技的發展，當下只能求治標，而治標之法還是服藥。但藥總是藥，少用為妙，鍾梅音說用藥如用兵，愈少殺傷愈好，因為服藥治病的同時，也傷人的元氣。要能控制病勢，不使它發作，還得靠自身的努力與生活方式的調理。鍾梅音從病中學習，鍛鍊出她過人的堅毅性格及意志力：「我的健康曾經使我想做一個起碼的主婦亦不可得，但我只能說，我沒有讓自己白挨——我一直在努力奮鬥之中。我的病從未好過，在醫學上，至今還是個困人的懸案，我的奮鬥，只能使它有時少發作幾回。」<sup>63</sup>

鍾梅音使用了許多戰爭場域的隱喻來描述她的喘病，以及她對抗的方針及所下的指導棋。「喘病是罕有的頑敵，對付它要像漢唐時代討伐匈奴一般，不可等到秋高馬肥之日再去攻堅，而必須在它大勢尚未形成之前予以擊潰。」<sup>64</sup>，她亦借了戰爭失利後常用來檢討的「痛定思痛」來檢視她的這難纏的病，而到底她的喘病是什麼樣的病呢？她說：

現在「痛定思痛」地檢討這種疾病，嚴格說來，它實在又不是甚麼「病」，它只是

<sup>61</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80。

<sup>62</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83。

<sup>63</sup> 鍾梅音，〈寫給女兒〉，《風樓隨筆》（臺北市：三民書局，1978年7月三版），頁87。

<sup>64</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84。

一種支氣管神經痙攣的現象，既不傳染，除非夾着傷風咳嗽或氣管支炎，也沒特別的病菌。可是當發作時，死不了又活不了。<sup>65</sup>

喘病就是如此的微妙，這般的難解。患者需要的是平日多方面的配合來提防此疾病。鍾梅音久病成良醫，她發現想要改善病情，心情上要先學會放鬆，注意情緒的平衡，加上增強體力，必須在病發之前，先做好戰力的儲備，她描述曾有三年的夏天，她每天游泳，因為整個夏天的鍛鍊，就是只為抵抗秋冬的喘病襲擊。面對這纏人的氣喘病，要在它形成之前，就壓制下來，但一方面也必須學會與病和平共處。

她樂觀地表示，喘病雖無根治之藥，但若具備了以下七項條件，也許仍有根治的可能。也就是適當的運動、休息，豐富的營養，清潔的空氣，充足的陽光，愉快的心情，堅強的意志。鍾梅音雖因病痛糟蹋掉她人生可貴的時間，但也培養出她的彈性思維，她仍朝陽光面思考，「假使喘病也曾留下一點甚麼教訓給我，大約就是讓我認識了生命的價值吧？」<sup>66</sup>鍾梅音的思考方式使人佩服，在動盪不安五〇年代中，似乎也藉此鼓勵著人們堅強起來，為生存不斷地努力奮鬥到底。

## 二、因病而得到的靈感及啟發

鍾梅音的正面思考值得關注，生病使一般人什麼都不能做，什麼也不能想，但鍾梅音的思考方式與常人不同，她甚至提出人在生病時，更能專注於思考，因病而得到安適，對寫作更有幫助等，這樣另類的思考面向，鍾梅音在〈寫作甘苦談〉文中曾表示：

只有在病榻上才能心無二用，集中精神去寫作，這時不但思想上可以脫離現實，任意騁馳，在技巧上也可以字斟句酌，刻意求工。<sup>67</sup>

她解釋若有健康的身體，當然更為幸運。寫作需要靜，好文章更是不容易寫，不能只靠才情，也必須輔以技巧，寫作常需要費盡心思，寫作者要有能承受「銷肌膚，落毛髮」<sup>68</sup>的能耐，專心一致地寫。因此好文章可是作者一點一滴的心血結晶。

<sup>65</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80。

<sup>66</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89。

<sup>67</sup> 鍾梅音，〈寫作甘苦談〉，《小樓聽雨集》（臺北市：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1958年6月），頁156。

<sup>68</sup> 同前註，頁156。

生病讓鍾梅音失去了許多寶貴時光，病情嚴重時，她只能專注在氣喘吁吁痛苦掙扎，些許恢復後，回過神一看，時間轉瞬間也就過了。因此在她好不容易能恢復氣力的時候，對於她來說是非常珍貴的好時光。

尤其到了中年，她體認到她必須更加地審視她的時間安排，必須謹慎地思考時間上的運用，那可是她的寶貴時間，如何善用時間在對的事上。對於一些社交活動，她開始有些反省，她曾靜下心來檢討了一番：「我在很多年前就發現自己有這種毛病——出席很多的會，明知自己對這些會全無貢獻，可是不去『不好意思』，而做人真難。」<sup>69</sup>年輕時，不容易也不好意思在人情上做切割，怕拒絕別人的邀約，沒給人面子。但考慮這麼多的人情世故真的好嗎？她感到懷疑，「漸漸地愈難了解今天去看張大哥，明天去看李大姐，談談柴米油鹽，家常理短，又有些甚麼意義？」<sup>70</sup>

她得要取捨，因為她熱愛寫作，而寫作需要靜下心來，不能在到處應酬，耗費精神後，文章就能行雲流水地產出來，於是鍾梅音決心她得做出抉擇，「毅然『慧劍一揮』，雖因此開罪於人，也顧不得許多了。」<sup>71</sup>

人活到了中年，在奮鬥的過程裡，從艱辛的生活中，逐漸體會到人情世故的堆積就如馱包袱似的沈重，若不適當處理捨棄，會使人衰老地快。取捨之間，智慧也在其中生成。每個人有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許亦有其盲點或身不由己之處。但是鍾梅音提醒很多累積來的壓力，需要適時地放下，她以自身經歷來說：「生命的本身就是一場壯烈的奮鬥，我們必須面對許多憂患，一次又一次地摔到又爬起，假如這些憂患留下的苦痛像包袱似地，統統馱在背上，我豈不早就『一命嗚呼』了？」<sup>72</sup>以下摘錄一段，她因病而產生出來的人生哲學：

我真慶幸，我從痛苦中認識了人生，已逐漸領略到苦盡甘來的滋味。一個人能夠放棄她認為沒有意義的，以及無法挽回的，不再煎熬自己，只全心全意地享受生活裏單純的事物，這時我們才發現，上天的賜予是多麼豐富？許多境界，當我們狂熱地追求世俗的所謂歡樂時，都被忽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現在，我們都

<sup>69</sup> 鍾梅音，〈我祇追求一個「圓」〉，《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205。

<sup>70</sup> 鍾梅音，〈我祇追求一個「圓」〉，《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206。

<sup>71</sup> 鍾梅音，〈我祇追求一個「圓」〉，《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205。

<sup>72</sup> 鍾梅音，〈健忘頌及其他〉，《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185。

可一一地接納了。<sup>73</sup>

人生有很多要追求的，五、六〇年代以來，有些特殊現象逐漸浮現，在政治無解，僅存空喊的反共口號中，時間不停流轉，隨著社會轉型，逐漸轉變成工商業生活方式，資本累積，金錢遊戲，人們轉而將心思投注在別的事物上，但往往就迷失在物欲的無窮無盡地追逐，有的人享樂人生，吃喝玩樂，菸酒不忌，日夜顛倒、有的人埋首於工作堆中、有的人賭性堅強，忘情於賭博當中，有的人被困在狹窄的公寓生活中，靠看電視度日，然而，從病得九死一生中活過來的鍾梅音卻得到了智慧，悟得了一些道理：

健康的人，常不知健康的可貴，正如自由的人，常不知自由的可貴，須知放肆的吃喝，昏亂的起居，還有菸、酒，都是健康之敵。而為了獲得健康，許多人對於吃藥很是勇敢，對於運動就視為畏途；其實藥物只能醫病，運動才能使你健康。人類必須生活在都市裏，並且以汽車代步，是文明的悲哀，但對於愛好自然、愛好運動的人，洋房汽車就不會成為桎梏了。<sup>74</sup>

世上也再沒有比健康更為重要的東西，否則一切都是空談，而休息乃是健康所必需，打完通宵麻將再去注射「克勞酸」，正像小偷每天半夜做壞事，第二天早晨又去教堂懺悔一般不可思議。<sup>75</sup>

人們又因電視機的問世，工作結束後，將空閒時光，全副精力投注在那小機器盒子裡，時間流逝在遙控器轉啊轉當中。邁向中年的人們，在忙、盲、茫當中，忘了最重要的人，忘了該做的事，甚至失去了自己。「機器文明與大眾傳播事業的發達，已為我們帶來更厲害的吵鬧，以致神經崩潰成了這個世紀的『副產品』。多一分囂嚷，少一分智慧，拋頭露面趕熱鬧的事還是讓給年青人吧？」<sup>76</sup>現代人必須提防得了比喘病更耗損人心智的文明精神病，因此鍾梅音提醒在社會型態快速變化下，要確認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至於模糊了方向。要試著讓自己的心靜下來，才能思考，她說為什麼人的外表會漸漸變老

<sup>73</sup> 鍾梅音，〈我祇追求一個「圓」〉，《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207。

<sup>74</sup> 鍾梅音，〈健康—是美滿幸福的鎖鑰〉，《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頁154。

<sup>75</sup> 鍾梅音，〈我祇追求一個「圓」〉，《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208。

<sup>76</sup> 鍾梅音，〈健忘頌及其他〉，《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188。



變舊。「我想這一定有深意在——上帝希望人們老了不要出去東奔西走，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心靈安靜下來，善用其多年積聚的智慧。」<sup>77</sup>，減少一些在外頭的干擾，而享受生命中單純的美好，是她給人們的美麗建言。

---

<sup>77</sup> 同前註，頁 188。



## 第四章 家·台灣——在地化書寫

臺灣給我的最初的一瞥是黃昏，中興輪夜泊基隆港外，遙望一串明珠似的燈火，橫互於水天相接之處，把黝暗的星空，淡淡地映出一帶乳色的光暈，猶如仙女頸上的項鍊，幻麗而又神秘！<sup>1</sup>

鍾梅音〈閒話臺灣〉 1950年10月25日

### 第一節 在臺紀實

#### 一、鍾梅音臺灣居所

##### (一)、玩具模型——基隆住所

1948年3月1日，鍾梅音隨丈夫余伯祺攜長子來到臺灣，鍾梅音當初來臺時，其長女是留在大陸交由親人照料的，當時由於鍾梅音與家人是較早來臺，並非像後期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外省族群，在1949年大撤退時，那般倉皇逃難來臺。因此，由鍾梅音的散文書寫中，我們可以讀到她對於臺灣存有的某種浪漫想像。當時鍾梅音一家乘中興輪夜抵臺灣基隆港時，對臺灣的第一印象是朦朧中帶著幻麗又神祕的熱帶島嶼風情。

然而不久，這層美麗的薄紗就在隔天清晨即被揭開來，鍾梅音感受到的不是艷陽高照的燦爛熱帶海島，而是昏暗低迷的陰雨天，雨都基隆的灰濛濛初春景象，近海港地面上的泥濘，她道出了現實與她的想像存有落差的失望情緒。「次日破曉入港，基隆便失去了美妙的想像，陰沉的天，泥濘的地，只有碼頭上悠揚的音樂，與花裙婆娑的南國少女，為這灰色的天地，點綴幾許青春的綫條與色彩。」<sup>2</sup>

下了船，便有人來接應鍾梅音一家人，並且開車載他們到基隆的住處，鍾梅音形容沿路上她所見的竟是一片蕭條景象，車子抵達了她臺灣落腳處——基隆住所，在她的筆

<sup>1</sup> 鍾梅音，〈閒話臺灣〉，《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99。

<sup>2</sup> 同前註，頁99。

下形容，那個地方簡直像是個玩具模型，直言道出了她的失望：

三年前的基隆還是一片蕭條景象，在公路上行不多時，便彎進一個工業區，右面是綠幽幽的青山，左面是黑黝黝的板屋，車子嘎然而止，在一扇門前停下了。「到啦？」我還坐在車上遲疑着不敢下來。「到啦！」來接的朋友欣然為我打開車門，說實話，當時我是非常失望，雖然這幢房子正如朋友信上交代的：「臥室飯廳浴間廚房一應俱全」，可是那經濟的設計，使人想到玩具模型。<sup>3</sup>

看到實際居所的景象，鍾梅音在幻想破滅後，她感到頗為失望。然而，人終究是習慣的動物，靜下心來，試著接受現實後，再次睜眼觀看，又有不同的感受了。鍾梅音對於位於基隆工業區的房子雖不甚滿意，但在那兒有的天然景物，自然地在一時間後讓她得到安慰。鍾梅音說臺灣基隆冷起來也和內地不相上下，但地處南方地帶的臺灣，像內地北方那樣寒冷的氣候，畢竟發生的頻率還是較低的。臺灣就算是北部地區如基隆，對從中國大陸來的人來說，還是屬於南方氣候，鍾梅音說基隆即使在陰雨綿延不絕的時候，她覺得依然溫暖如春。這裡是四季如春的寶島臺灣。

從未到過臺灣的大陸人，對於臺灣是存有想像的，或許也有些是來自於道路風聞的。因此，閱讀遷臺女作家所書寫出她們實際感受時，便可反推遷臺外省族群的確對臺灣曾存有不同於臺灣實地的既定印象。鍾梅音對臺灣的刻板傳聞，作了翻案文章，她在〈閒話臺灣〉文中便說：「人們常說臺灣的鳥不語，花不香，可是在我對面山上，便終年響着清澈的畫眉與杜鵑，夏來山邊水涯，開遍了潔白芬芳的百合花。」<sup>4</sup>可見當時外省族群對於臺灣的陌生與想像，來臺後面對的衝突與錯愕，以及需要身心各方面的調適。

鍾梅音來臺一段時間後，逐漸看見及感受到臺灣的美，她說：「在上海經常面對濁浪滔滔的黃浦江，一旦置身於碧波萬頃，白鷗點點的海邊，還有那松風、嵐影、蔚藍的天，詭譎的雲，又如何教人不喜愛臺灣呢？」<sup>5</sup>她對比了上海的黃浦江濁浪和碧波萬頃的臺灣海景，海的遼闊豈是黃濁江水可比，這裡充分表明了她的心意，她如何能不喜歡臺灣自然美景呢？鍾梅音描述臺灣遼闊無際的海景及自然景物實際上比起中國大陸黃濁的江水更是令人折服。

<sup>3</sup> 鍾梅音，〈閒話臺灣〉，《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99。

<sup>4</sup> 鍾梅音，〈閒話臺灣〉，《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00。

<sup>5</sup> 同前註，頁100。

臺灣自然的風光，不但美，隨著不同的境地，視野也為之開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讓鍾梅音的心安定下來。不止如此，物產豐富的臺灣，有海島特有的魚蝦，以及熱帶氣候盛產的農產品，這些更是讓鍾梅音讚嘆不已。臺灣的蔬果在她的文字記錄下，是即豐盛又碩美，內地的蔬果則相形遜色許多，她舉例說明：

花椰菜在內地很少，這兒可不希罕；豌豆在內地要剝殼，這兒可以連皮吃，甜津津地別有風味；絲瓜，內地是細而長的好像黃鱔，難於削皮，這兒的却是肥而短像花旗麵包；苦瓜也長得碩大無朋，厚墩墩地又白又嫩<sup>6</sup>

鍾梅音丈夫余伯祺特別喜愛的是臺灣的新鮮漁獲，臺灣魚蝦之美味可口，讓鍾梅音的丈夫余伯祺甚至培養了個人特殊的習慣，他上班前的例行私事，那便是去攔截漁民剛捕獲的海鮮，近海的海產既新鮮又肥美，比如龍蝦身形之大，鍾梅音覺得那是大得令人感到有些害怕，她說：

那各式各樣的龍蝦，有的像大臭蟲，有的像貓頭鷹，觸鬚長達尺許，瞪着骨碌碌轉動的大眼睛，身子圓滾滾有兔兒那麼粗壯，令人望而生畏<sup>7</sup>

鍾梅音在〈閒話臺灣〉描述了臺灣特殊的美麗風光以及豐饒的農產和漁獲等，對於臺灣當地人她的筆下描寫的則是「忠厚淳樸，不尚虛偽」<sup>8</sup>，她同時也記錄了自己來臺後的心境轉折，從一開始的既定刻板印象，到剛接觸時的浪漫迷濛，而後又有些許的失落感，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澱以及適應，又逐漸地轉為欣賞，進而喜愛上臺灣。

## （二）、我的家——宜蘭蘇澳

1948年，鍾梅音隨丈夫余伯祺從大陸遷到臺灣來，隔年又因丈夫工作的關係，再從基隆搬遷至蘇澳後，在宜蘭蘇澳，出她意料之外，竟產生了家的歸屬感。

話說鍾梅音丈夫余伯祺出任臺灣肥料公司蘇澳廠長，1949年鍾梅音全家遷居宜蘭蘇澳。那兒位處海邊，給鍾梅音一種安定的感覺，始終處於漂泊狀態的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屬於她自己的家，而這個「家」竟是在遠離中國大陸的臺灣蘇澳住處。

<sup>6</sup> 鍾梅音，〈閒話臺灣〉，《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00。

<sup>7</sup> 同前註，頁100。

<sup>8</sup> 鍾梅音，〈閒話臺灣〉，《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01。

三十八年春因外子工作奉調臺灣東部的蘇澳，居所近在海邊，生活雖然不大方便，但很安定，我第一次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家。更由於我一向喜愛農村風光，病後種花養雞，怡情悅性，頗為自得其樂，喘病發作的次數才漸漸減少，寫作也從那時開始。<sup>9</sup>

當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來看，一九四九年，當時中國大陸正陷於內戰泥沼當中，鍾梅音一家來臺可說是脫離了中國戰場。雖說鍾梅音喜愛蘇澳，丈夫也擔任臺肥廠長一職，工作職位、居所等都應當是經過事前安排好的，但這並不表示鍾梅音一開始就有心理準備打算在臺灣長久居住，紮根於此，更何況他們的大女兒、親屬都在中國大陸，可是戰爭的無情，局勢的瞬息萬變，並非人能預料到的，兩岸隔絕後，包括鍾梅音等遷臺外省族群心中迫切盼望的是早日回鄉，他們以為兩岸隔絕只是暫時，怎麼也沒想到再也回不去。

從學者侯如綺《雙鄉之間》的論述角度來看，1949 年左右來臺外省人族裔的離散課題，她的研究表示：

當時來台的外省作家都沒有久留的心態，覺得不久就能夠再回到大陸。他們接受黨國的理念以及教育，中國屬性鮮明，對於自我認同的問題沒有疑惑，……再加上來台的外省人掌握了絕大部分的黨、政、軍權，縱使外省人和台灣其他的族群相較人數較少，可是並不邊緣。<sup>10</sup>

來臺的外省族群的確不邊緣，而且中國屬性鮮明，或許我們亦可從遷臺女作家的散文作品，得到一些印證。在鍾梅音〈孩子的朋友〉一文中，鍾梅音敘述她的兒子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她兒子的那位朋友是個軍人，兒子從朋友那兒知道了許多事情，包括「在戰場上如何廝殺，機關槍的聲音與手榴彈的聲音如何辨別，毛澤東是甚麼人，共產黨的軍隊如何像堆可憐蟲」<sup>11</sup>而對於這位軍人朋友教導小孩的事，身為母親的鍾梅音表示大為歡迎，她說：「我真感謝他有那麼好的能耐，在不憚煩瑣的閑話裏，無形中給孩子灌輸了許多智識與國家觀念」<sup>12</sup>，鍾梅音甚至還想知道她的孩子從朋友的教導當中，到底吸收

<sup>9</sup> 鍾梅音，〈與造化抗爭〉，《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80。

<sup>10</sup>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台北：聯經，2014年6月），頁21。

<sup>11</sup> 鍾梅音，〈孩子的朋友〉，《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31。

<sup>12</sup> 同前註，頁131。

了多少，因此測驗她的孩子懂不懂什麼是反共大陸，小孩子便童言童語地回答鍾梅音說：

反共大陸就是打回上海，打死那些共產黨壞杯子，啊，媽咪，我喜歡上海，那年公公從上海寄來的「小人國」真好看，等我的朋友把那些壞杯子打死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回上海了！<sup>13</sup>

這段話說明了鍾梅音和外省族群的普遍心態上，他們認為並且希望很快地就能回大陸家鄉了，遷臺外省族群，軍民一條心，相信黨國終究會戰勝邪惡共產份子，將臺灣當成是反共的堡壘及跳板。就如同侯如綺的觀察，外省族群並無認同的問題，清晰可見其中國屬性，再加上掌握了軍事力量，人數比起臺灣本地其他族群雖較少，但是絕不是弱勢團體，反而是掌握力量，尤其是掌握黨政軍力量的外省男性更是居於臺灣土地上的政治核心位置。

外省族群有鮮明的中國屬性，但族群中，因著性別而有不同的傾向。男性的國族意識，主張反攻大陸，官方文藝論述著大時代的長篇反共小說，而女性存有家國意識，認同國家的意識形態，但同時專注於日常的家居生活經營。接下來來筆者想更進一步地探索作為外省男性的眷屬，遷臺女性作家對於家·臺灣的脈絡梳理。

根據王鈺婷對於五〇年代遷臺外省女性作家的研究，她認為臺灣是遷臺外省女性作家因戰亂逃生所暫居之地，在此等著和政府隨時返回大陸家鄉，只是在等待的過程中在此地建造了家園，她表示：

女作家最初來台只是作客，沒有久居的念頭，但是在政局局勢未明朗前，反共號角遲遲未吹起，女作家於是安了家，落了戶，胼手胝足所創建的家園，在某個意義上是身歷烽火流離的暫時性居所。<sup>14</sup>

然而，這場國共內戰所造成的兩岸隔絕，導致外省族群如鍾梅音等等遲遲無法回原鄉，她閒居臺灣鄉間，寂寞心情所寫下的散文作品中，竟產生了對臺灣的歸屬感。對於從小身子虛弱、生長在傳統大家族中、在拘謹的傳統教養下成長的鍾梅音來說，由於身體不健康，氣喘經常發作而一再地消耗著家裡的經濟，因而時常處在難堪的無形壓力中，

<sup>13</sup> 鍾梅音，〈孩子的朋友〉，《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5月），頁134。

<sup>14</sup> 王鈺婷，〈想像臺灣與再現本土（節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235。

又不幸遭遇戰亂，長年生活在漂泊無定的遷徙中，與余伯祺結婚後，在當時仍處於傳統父權社會文化下，家庭制度屬於三代同堂的家長制，而鍾梅音上海的公婆家更是保守傳統的大戶人家，有無數封建禮數要遵從。

經歷種種戰亂生涯，生活在傳統父權文化社會制度中的她，當時能與丈夫從中國上海公婆家搬出遷移來臺，鍾梅音竟因此，不但遠離了中國主戰場的戰爭波及，中國傳統父權文化教條下，對於鍾梅音的束縛也得以鬆綁，後來，她更在臺灣建立起屬於她和先生夫妻倆的小天地。或許又因著母性的關係，她滿心歡喜地在臺打造經營屬於她自己的蘇澳家園，而後雖然因丈夫工作之緣故離開蘇澳後，多年來不斷地回顧她蘇澳的家和那裡單純自然的生活。她透露道：「蘇澳在我這流浪者的內心已種下了鄉土般的感情。」<sup>15</sup>

然而當初選擇到蘇澳來，並非是鍾梅音有意識地、或是主動期待來到這海角天涯，喜愛蘇澳是歷經了一段心路歷程的。鍾梅音曾在多年後，給小女兒書信內容中寫到她常是因為先生工作的需要，妻隨夫不斷遷徙，到臺灣蘇澳實屬於被動性的搬遷，她告訴女兒：「媽曾為爸爸的理想和事業，屢屢追隨他到荒涼的山區與海濱。初去時，我常有一種欲哭無淚之感。」<sup>16</sup>後來才發現自己得面對現實，培養興趣，好好地生活，這時驚喜地發現，在台灣她可自己作主，依照內心藍圖來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因心境的轉變才逐漸接受，甚至到了後來竟變成是滿懷喜悅地享受自然樸實的鄉間生活。「覺得自己的生活實在非常豐富，充滿快樂，最後竟愛上了這種生活，對於『心為形役』的熱鬧繁華的都市生活，反而不慣了。」<sup>17</sup>當時鍾梅音或許沒有久留臺灣的心思，但卻隨著時間對臺灣竟產生了非常特殊的情感。

## 二、颱風初體驗

鍾梅音全家渡海來臺後，雖說兩岸處隔絕狀態，然而戰爭並未結束，金門、馬祖等前線，仍處於相當緊張局勢。鍾梅音為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的一員，經常與官方文藝團體，在危急時刻前往前線以鼓舞士氣，並寫下了無數為安撫民心的文章。然而，她表明自己並非膽大之人。她懼高，而且雖為主婦，但若見人宰雞，便要躲得遠遠的。閃電、

<sup>15</sup> 鍾梅音，〈病中小記〉，《小樓聽雨集》（臺北市：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1958年6月），頁35。

<sup>16</sup> 鍾梅音，〈興趣－是平衡情緒的良藥〉，《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162。

<sup>17</sup> 同前註，頁162。



打雷當然也怕，出生於北平的鍾梅音更因沒經歷過颱風，坦言她只是聽說颱風要來，就已神經緊繃，提心吊膽，極為緊張不安。

鍾梅音在剛來臺灣不久，就因身體不適而住院，丈夫體貼安排她住單人頭等病房，讓她能不受外人打擾，安心養病。然而，住院期間，適逢颱風襲臺，鍾梅音身體虛弱，加上颱風夜裡單人病房中又只有她一人，體弱、孤單、恐懼，把她嚇得心驚膽顫地直發抖。1949年寫下〈颱風〉一文，鍾梅音生動地描繪出她的可怕遭遇，人在面對未知的事物，心中的恐懼往往會被加乘放大，反應會更加慌亂，這是她的熱帶島嶼颱風初體驗。節錄如下：

提到颱風，我可以說是驚弓之鳥，去年最初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颱風，我適在臺北醫院躬逢其盛，也許和身體虛弱有關，那時不但對於尚未領教過的颱風感到惶惑，連閃電雷聲都怕；怨只怨丈夫多事，當初一定要強迫我住進孤零零的頭等病房，外面風雨交加，室內高高在上的一隻綠燈泡，鬼火似地放著幽暗的青光，愈顯得陰氣逼人。……突然，那盞鬼火也滅了，恐怖的黑暗中，牆上的兩扇氣窗被風吹開，砰砰澎澎地旋轉起來，一聲巨響，玻璃豁朗朗砸下來，彷彿在我頭上，又像在我心裏重重地敲了一頓，帳子隨被掀開了，天！我連喊救命的本領都沒有，慌忙拉起身上的被單把頭也包進去，兩排牙齒兀自不住地碰擊著。<sup>18</sup>

對於從未有過的颱風經驗，在〈颱風〉一文當中，鍾梅音說她將遭遇到的第一個颱風，竟也是那一年最大的颱風，本來就不是個膽大的人，又生了病，意志上也為之虛弱，竟又被丈夫體貼地安排在單獨一人的頭等病房。病房裡的綠燈泡，高高地掛著，風雨欲來的黑夜裡，像極了一團飄浮的鬼火：「突然，那盞鬼火也滅了，恐怖的黑暗中，牆上的兩扇氣窗被風吹開，砰砰澎澎地旋轉起來，一聲巨響，玻璃豁朗朗砸下來，……帳子隨被掀開了，天！我連喊救命的本領都沒有」<sup>19</sup>，鍾梅音先是營造了恐怖氣氛，並且運用節奏快的描述了她面對這樣不明確的、無法掌握的天然災害，心中所產生的焦慮與恐慌。

<sup>18</sup> 鍾梅音，〈颱風〉，《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頁40~41。

<sup>19</sup> 鍾梅音，〈颱風〉，《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頁41。

### 三、多年後，面臨颱風，綽有餘裕

然而，在臺多年，經歷數次颱風後，鍾梅音的另一篇文章〈假使我有三百六十五元〉寫於 1966 年間亦提到了颱風，但對於颱風鍾梅音卻有了全然不同的描述，颱風在她筆下儼然屬於另一種熱帶島嶼風情，她以恬適心情來迎接，那時她已居住在臺灣近二十年期間，經歷過無數次颱風的洗禮後，竟已達到了餘裕灑脫的境界。她說颱風天正是最好的睡覺天。人在颱風天，不需在外面東奔西跑，大可待在家裡，輕輕鬆鬆，吃吃喝喝，或大睡一覺。鍾梅音感恩地說：「謝謝你，『可愛的』颱風天。」<sup>20</sup>她還為颱風的到來所意外獲得的自由，由衷感謝颱風。雖然這篇散文題材是颱風，卻是道地的文宣產物，鍾梅音配合著官方文藝政策，也就是當時文風，免不了要提到反共主題，文末收尾時，特意描寫中華民國在臺灣，即使遇上了自然力量產生的狂風暴雨，僅需關起門來，還能趁此享受難得的悠閒安適，放個颱風假。反觀大陸，卻因錯誤的政體，造就出比自然力量更具摧毀性的紅衛兵。鍾梅音要傳達的是，人禍往往比天災更為可怕，紅衛兵之亂使得關在共產鐵幕下的大陸人民，面臨的是生死掙扎，痛苦不堪的悲慘境地。

寇拉颱風進襲。窗外暗沉沉地，雨點斜斜地灑在玻璃上，密一陣，疏一陣，涼涼地氣候，正是最好的「睡覺天」，加上一個多月積下來的疲倦，一睡竟不想醒來。……想不透是甚麼原因，颱風天令人如此貪吃又貪睡？貪吃可能是心理作用，因為人在這時，既不必掛念著還有甚麼事情要辦，也不會在馬路上遇見緊急煞車而餘悸猶存，滿懷輕鬆，可以全神貫注地欣賞味覺。至於貪睡，可能是低氣壓使人精神振奮不起來，於是慫慫欲眠了。想想大陸上這幾天正被所謂紅衛兵攪得天翻地覆，鬼哭神號，能在臺灣的颱風天裏關門睡大覺，就更是一種難得的福氣。<sup>21</sup>

鍾梅音的兩篇文章〈颱風〉、〈假使我有三百六十五元〉都分別提到了颱風，1949 年〈颱風〉一文當中，鍾梅音寫的是自然災害颱風，以及她的體驗，屬於去政治化的文章。用緊湊的節奏，紀錄了她面對這樣未知的、無法掌控的天然災害，心中所產生的恐懼心理。

<sup>20</sup> 鍾梅音，〈假使我有三百六十五元〉，《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169。

<sup>21</sup> 鍾梅音，〈假使我有三百六十五元〉，《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165~166。

然而，對比 1949 年〈颱風〉一文的緊張氣氛，1966 年寫的〈假使我有三百六十五元〉提到的颱風，若用文學組織架構來分析，後者則顯得語氣舒緩了許多，我們不難發現，這時意識形態就滲入文中，描寫颱風卻刻意地提到了人禍紅衛兵的可怕。事實上，鍾梅音本來就參與官方文藝組織，反共意識鮮明，〈假使我有三百六十五元〉文末來句反共宣傳口號，從颱風說到紅衛兵，應當也不足為奇了。

#### 四、夫婦坐擁湖岸美景，憶當年初婚時

時間能讓人轉化、淡化、美化許多事物，並對其事產生全新不同的觀看角度。1961 年鍾梅音來臺將近 13 年後，有一日與丈夫余伯祺到日月潭涵碧樓，夫妻倆甜蜜悠閒地憶從前，因為這年是他倆結婚第十九年，丈夫在湖畔美好風光中，回憶起當年新婚時期，夫妻倆重逢時，在昆明吳家壩機場接妻子，然當時帶著大兒子的鍾梅音，卻認不出她眼前的這位男士是她的丈夫，險些鬧了笑話，余伯祺對此事耿耿於懷，在多年後與妻笑提此事，他說：「我怕你到今天也還沒把夫君大人的面孔認清楚。」<sup>22</sup>鍾梅音這才對丈夫吐露其心聲，那時她年齡輕，剛結了婚，夫婦卻又分隔兩地，的確還不怎麼懂什麼是愛，雖然鍾梅音是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女性，但她的婚姻仍是依循傳統舊式婚俗，嫁入傳統家庭的鍾梅音描述面對大家族大陣仗的規矩時，她是順從的。但如今以中年之齡回想起來說：「我從沒想到抱怨和反抗，好像我生來就該如此。」<sup>23</sup>大約才悟到當初因為還很年輕稚嫩，且慶幸自己生性糊裏糊塗的，否則怎麼受得了夫家傳統大家庭的規矩，甚至得學會抽菸，方能紓解緊張情緒，她述說在婆家請安的日常：

我連跟你訴苦的精神都沒有，還跟你談戀愛？我一天要請六遍安，你爸三遍，你媽三遍，時間都錯開的。你知你爸抽大煙黃昏六點才起床，半夜十二點才吃午飯，我要等你爸吃過午飯才敢睡覺。可是你媽不抽大煙，早上六點就起來了，你可記得？我那陪嫁的劉媽總是天沒亮就守在窗戶底下瞄着，一見老太太的房門動了，就沒命地敲我窗戶：新少奶快起來啲！我瞌睡矇矓，連滾帶跌走下床來，好像地皮都沒踩着，梳洗整齊，到晚了一點，你媽還要說：沒睡醒吧？回去休息休息好

<sup>22</sup> 鍾梅音，〈湖畔〉，《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 年 2 月），頁 16。

<sup>23</sup> 同前註，頁 16。

了。<sup>24</sup>

余伯祺好奇問道：「每次請安，一去個把鐘點，你倒在那兒做些甚麼？」鍾梅音：「甚麼也不做，那麼多佣人，那用得着我？但我得在旁邊像站班似的伺候着，直到她看膩了。下赦令。」<sup>25</sup>向公婆請安，是傳統必須遵從的禮數，即使無實際的功用，仍得做的無謂功夫，接著又說：「剛嫁你時，你屬於父母，要盡孝，於是我過的那種日子。久別之後，你又要愛國，要盡忠，於是一愛就愛了十幾年，把結婚戒指都賠下去了。若不退役，我還不得超生，又那有這福氣跟你坐在涵碧樓上想當年？」<sup>26</sup>鍾梅音感慨地回應她丈夫的疑問。亦透過書寫這段夫妻間的回憶，在那時她也許慶幸自己因來臺才能過這隨心所欲的現代核心家庭生活，更感受到自己得來不易的幸福。

鍾梅音常提及自己因為健忘，才能忍受很多的磨練，她的適應力強，但傳統規矩當中，僅是請安，對於體弱的她來說，仍是格外地辛苦，但她在那樣的環境氛圍下，恐怕若沒有自覺，並不會想到要抱怨或是反抗，就如她說的她覺得自己好像是生來就該如此。因為在長久由傳統禮教羅織的社會秩序裡，每個人都被教化且順從了。在鍾梅音的散文中也描述了那個年代，女人想拋頭露面在外連騎個單車和夫婿去溜冰都不許，一次被大伯瞧見，公公知道後不便說什麼，但余伯祺卻得罰一天不能吃飯。而余伯祺回想此事，反而驕傲地認為人生中做對了一件事，就是娶了鍾梅音。他感念妻的包容對愛妻心疼地說：「在這過渡的時代，只你這大學生才肯接受我那大家庭的老規矩；在這苦難的時代，只你這少奶奶才肯為丈夫愛國而貶作灶下婢。」<sup>27</sup>有了先生的理解及感念，鍾梅音再苦，恐怕也沒怨言了。

原生長居住在中國大陸各省的部分人民及公教人員，或許因著其政治傾向及意識形態的選擇，而離開了故土，隨國民政府前後遷移來臺。有些女性卻因此反而脫離中國大陸傳統封建文化中父權的綑綁，兩岸隔絕也隔出建立自由家園的契機，鍾梅音來臺十多年後，恍然悟到自己是福氣的。因為若留在上海公婆家，留在傳統老規矩裡，恐怕還得盡少奶奶的一日六請安之責，終日深居簡出，尊貴地杵在大宅院裡，而跨海來臺才有

<sup>24</sup> 鍾梅音，〈湖畔〉，《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17。

<sup>25</sup> 同前註，頁17。

<sup>26</sup> 鍾梅音，〈湖畔〉，《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18。

<sup>27</sup> 同前註，頁18。

機會，主婦成作家，揮灑寫作才能，與男性競爭文壇空間，並親手創建自己的家園。

鍾梅音在臺的家，家庭佈置、格局設置、生活動線，甚至全由她來主張作主，「我的故居曾經全部依照我的需要裝修，樓梯的下面作了儲藏室，樓梯頂上的空間則利用為『被臥櫥』。却把櫥門開在我女兒的臥室裏，被臥拿進拿出，非常方便，這是我的『得意之筆』」<sup>28</sup>鍾梅音對自己設計頗為滿意，因而她有一個朋友打算在臺南興建國民住宅，就去過經她設計過的故居參觀。就如范銘如所言「在尚未被建構完全的空間中，她們得以建立一個允許她們用不同角度觀察和體驗現實的新家園。」<sup>29</sup>王鈺婷也提出女作家的作品主題經過時間也產生變化：「徐鍾珮、鍾梅音等新移民女作家的作品中刻畫的主題，從離鄉背井的漂泊失所，到生活空間家園的誕生。」<sup>30</sup>

中國在傳統文化，不管家族輩份，長幼有序，男女尊卑，活動空間，都有著難以鬆動的既定規矩，外省族群遷臺後，對於女性，家的想像有個重新打造的契機。女性長期以來，大多未能參與公共領域事務，就算可以，也常僅是處於邊緣位置，但是現代小家庭制度當中，作為家庭主婦，在自己的家中空間環境逐漸有了掌握權，因為家務是女性在操持，生活的動線，由女性來規劃，家裡的擺設，經常是由女性來放置或移動，有時，我們拜訪他人家庭，也有那個家的設計風格是女主人的生活經營及運用的巧思的刻板印象。相較於女性，男性對於家的擺設，物品經常傾向是暫用心態，少有心思花費在家庭瑣碎的空間使用的思考上。理想的家庭住宅，應該不能只是個漂亮的空殼子，棉被的放置位置，以及拿取的方便性，對於存有男主外女主內概念的男性，相信是很難理解到底有何重要性，鍾梅音不禁表示，並且細緻地敘述說：

臺灣氣候多變，熱的時候，看着床上堆了厚厚的棉被，去之惟恐不速；可是送進壁櫥之後不到三天，又要再請出來。而現在的住宅，可以放被臥的壁櫥太高，雖然做了一架四腳小梯，但是端來端去，其重無比；又況舉重登高，並非人人皆能，萬一摔下來可不是玩兒的。<sup>31</sup>

<sup>28</sup> 鍾梅音，〈中國人的生活〉，《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35。

<sup>29</sup>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年8月），頁31。

<sup>30</sup> 王鈺婷，〈第六章：結論〉，《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2年12月初版），頁170。

<sup>31</sup> 鍾梅音，〈中國人的生活〉，《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35。

日本研究者天神裕子客觀且清楚地指出，鍾梅音來臺始得以掌握家的主導權「這裡也能讓我們想見了大陸——傳統舊社會，和臺灣——新天地小家庭的兩極機制中，遷臺女性重新思索家的意義和形構。臺灣的小家庭，對鍾梅音來說是一自己能管理的幸福家庭，具有正面空間政治的意涵。」<sup>32</sup>在臺灣所建立的家成了幸福的小天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依照自己想要的藍圖，設計實踐於住所的空間場域中，蘇澳亦或是臺灣，成了鍾梅音一生都難以忘懷的家的標記。

王鈺婷也認為：「鍾梅音在五〇年代提出『兩處鄉愁』，顯示出認同是處於不斷流變，亦是空間主題的實踐」<sup>33</sup>她研究考察戰後台灣女性作者群的崛起，據王鈺婷的研究指出：

由於女作家擁有在臺灣具體的生活經驗，透過具體而微的地誌書寫，生動地描繪出生活於其中的家園，家雛形的建立，含融著日常性的生活經驗，橫錯交疊的族群互動，空間記憶與個人生命交織，彰顯出兩者相互銘記的印記，也逐漸產生情感依附，使得做為一種空間記憶的感覺結構與地方感逐步形成，此時鍾梅音定居的蘇澳與徐鍾珮居處的台北，不再只是記憶中中國家園的投影，而是成為一種新的土地認同的趨向。此一濃厚的地方感與感覺結構，在中國原鄉的血脈認同之外，建構出新生的身分認同，也促進土地認同概念之形構。<sup>34</sup>

## 第二節 懷鄉書寫的心境轉折

在臺灣努力經營自己的當下生活的鍾梅音，其實也和許多外省族群一樣，相信並希望著國民政府能戰勝共產黨政權，早日能返鄉見她的親人們，可是「誰料一陣暴風雨，便把我們的希望都粉碎了，一家人弄得七零八落，而且此後，我們將忍受長期的隔絕與磨難。」<sup>35</sup>鍾梅音的父母以及她的大女兒等至親仍在大陸，因此她當然也期盼著早日與大陸親人再度相聚。張瑞芬論鍾梅音散文時，說明「鍾梅音的散文創作以亂離時代與懷鄉

<sup>32</sup> 天神裕子，〈賢慧·智慧·使命感——鍾梅音散文中的家庭主婦形象〉，《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263。

<sup>33</sup> 王鈺婷，〈第六章：結論〉，《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2年12月初版），頁170。

<sup>34</sup> 王鈺婷，〈第六章：結論〉，《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2年12月初版），頁170。

<sup>35</sup> 鍾梅音，〈遙寄〉，《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年），頁80。

思親為起點，在《冷泉心影》中，她憶雙親、念弟妹、寫吾兒、記友人，完全是懷鄉文學的典型。」<sup>36</sup>

《冷泉心影》是鍾梅音選錄 1949~1951 年初到臺灣三年間，發表於各大報的文章。文章寫於國共對峙初期時，雖然知道局勢困難需要忍耐，但鍾梅音仍對政府反攻回中國的口號，抱持著堅定的信念，國民政府退守來台，可是總有一天會反攻大陸，將來定能隨政府返鄉與親友團聚，在等待的煎熬中，寫下了無數對親人的思念，及對過往發生的人事物的想念等懷鄉作品，根據學者侯如綺的解釋：

在嚴峻的戒嚴政治下，他們與對岸故鄉隔阻，禁絕返鄉之外，還被迫隔絕音訊。許多與親人密友的關係，因此硬生生的被切斷，一水天涯，只能在心理上不斷的望鄉，渴望親人重逢，期盼落葉歸根回歸故鄉。在異鄉之中，他們不斷追憶大陸，縱使身不在故鄉，但是靈魂卻隸屬於那個地方。<sup>37</sup>

在剛到臺灣的好幾年間，鍾梅音相信總有一天能返回故鄉，在等待的同時收拾起心情，在臺經營起自己的家園，料理著家人的日常生活中，也積極地參與文藝組織，配合官方文藝活動，不時訪問前線官兵，寫下了許多為國、為民，希望能凝聚國族力量，團結一致為反攻大陸做準備，同時也穩定民心的文章。鍾梅音亦書寫了些讚揚國民政府建設臺灣德政，在〈臺灣橫貫公路一瞥〉一文中，道盡開路工程的艱辛及政府部門的堅持：

橫貫公路的地形既如此險峻，那由水成岩組成的地質，不但可說是遠東最惡劣的，甚至可說是世界上最惡劣的，我們在山邊隨便可以用手挖一塊岩石下來，地質之鬆可以想見。而且颱風迎面括，施工之中山崩不斷，坍方更是家常便飯……橫貫公路施工之初根本連立足之點也沒有，當日每隔二十公里佈置一批員工，深入不毛，常是用繩子從山頂縋岩而下，然後先從半山之中鑿出人行道來。我想那些攀上阿爾卑斯山的探險家們，如果看到橫貫公路的成就，只怕要神奇不起來了吧？(1959)

38

<sup>36</sup> 張瑞芬，〈海天歸來－論鍾梅音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2006年)，頁89。

<sup>37</sup>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台北：聯經，2014年6月)，頁5。

<sup>38</sup> 鍾梅音，〈臺灣橫貫公路一瞥〉，《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228~229。

此類宣傳政府在臺的建設及肯定政府的做法也常見於鍾梅音的文中。這些文宣對於國民政府的政權鞏固亦有所幫助，更說明了鍾梅音對政府的向心力及強化在反攻口號的光明面。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演，官方文藝上越來越流於一種口號，推行文藝運動也不再持有持續的熱情，反而流於口號，大家齊聚在一起時，最後都要扯到反攻大陸，鍾梅音也點出了這樣浮濫的形式宣傳：

讀十二月十一日中華日報副刊專欄尹雪曼先生「文藝與太保」一文，大意說臺灣太保的猖獗，和武俠小說及美國的西部電影有關，認為推動一個新的文藝清潔運動，十分必要。讀者最怕聽甚麼運動，因為根據經驗，任何運動都只有五分鐘熱度。而運動之後，還留下掃不完的八股垃圾——猶憶某小鎮婦女會主辦的洋裁訓練班，開學典禮之日，從城裏請來一位女參議員致辭，開始時明明說的剪刀針線，不知怎麼到後來萬流歸宗，居然也扯上打回大陸，最後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對於她究竟說了些甚麼，我想連她自己也沒比我更明白些。<sup>39</sup>

跟隨著國民政府遷至台灣大部分的外省族群，一直以來，支持著政府的反攻政策，信念寄託在未來終究有一天會返回大陸的，現在的狀況只是暫時的，一切等到回到故鄉去都會變好的。然而，隨著時間的過去，官方政治宣傳，似乎試圖架空當下現實，用來對遲遲未行動來自圓其說，把希望都寄託在將來，作為無力解決現實困境的藉口，若是當下有問題無法解決，也沒關係，因為這種狀況都是暫時的，期待未來反攻大陸後，再來解決。對於這樣的官方說詞，剛開始大家也都接受了，然而，在虛耗時間等待的過程中，社會產生了很多問題，鍾梅音認為這種不當下面對並解決問題，把這些問題都當成是暫時的，忍耐就好，這並不是正常社會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這或許會產生忍受苟且推諉的惡習。鍾梅音舉出實例，有一天她搭公車時，遇到了一位不守規矩的插隊少婦，引文如下：

在衡陽路的三十四路巴士站上，已排了一條長龍，有一位衣着入時的少婦却後來居上，站在龍頭前面，抿起嘴唇笑咪咪作風度優美狀。

---

<sup>39</sup> 鍾梅音，〈自由不可濫用〉，《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8。



這種事本來司空見慣，不過有的還知道三分抱歉，只有這位「風度優美」的少婦，若非機關職員，至少也曾念過「守秩序、愛清潔。」的標語，還做出那種自命不凡、心安理得的樣子，格外不可原諒，我就上前跟她說：「你也剛到，應當站在我後面呢。」

「你算什麼？」不料「優美風度」變的這麼快，就像着了邪風，立即五官走樣，「你管得了嗎？」

可怪的是在她後面的乘客却也只知匆匆忙忙顧自上車，只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唸着：「算了算了，大家都是逃難在臺灣……」我至今不懂，不守秩序與「逃難在臺灣」有何關係？這「算了」又是對誰說的？我？她？難道我錯了？（1966）<sup>40</sup>

鍾梅音對於中國人的這樣不守規矩、明知故犯、自私相當不齒，排隊問題還算事小，當時居住在公寓住宅區的居民燃用生煤相當普遍，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鍾梅音說解決的方法不是沒有，只是政府不做：

其實，政府如真有意取締燃用生煤，依我看來，只要把生煤的來源控制在手，豈不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像這樣只喊不做，我總懷疑政府是「非不能也，乃不為也！」（1966）<sup>41</sup>

政府不但不管控空氣污染日益嚴重的問題，連基本的衛生管理，髒亂的問題，政府該處理的卻也不太管：「我不能忍受髒，所以一踏進龍山公園便又轉身出來，在大街上逛了一下，確是整個萬華都既舊且髒，昔日繁華已經無處追尋。迎面還遇見幾個洋人去逛龍山寺，既然這兒也與觀光活動有關，為何政府不多管管呢？（1963）」<sup>42</sup>政府漠視問題，

<sup>40</sup> 鍾梅音，〈新居二三事〉，《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32。

<sup>41</sup> 鍾梅音，〈新居二三事〉，《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28。

<sup>42</sup> 鍾梅音，〈新春遊踪〉，《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初版），頁250。

無作為不管事讓事情無法有效的解決，人民又都認為事不關己，或只喜歡看熱鬧，沒有人要仗義執言，鍾梅音不禁感慨地說：

我應當學習「發揚」我們中國人「寬容」的「美德」，寬容到煤烟滿天飛，蒼蠅滿天飛，嘈音滿天飛，公共汽車永遠在逃難，還要自誇是東南亞最進步的國家(1966)

43

現實生活有許多問題拖著不解決，然而，一年又一年地在虛耗等待中度過，悶在島內回不去對岸大陸家園，使得外省族群瀰漫在一種沈悶的氣氛中，提不起勁，在虛耗中度日。「我們都在臺灣這小盆景裡面蹲得太久太久了，天天看見這些人，天天聽見這些事，所有名勝已踏遍，所有土產已嘗遍，電影也千片一律，會固然懶得開了，連玩樂也不起勁了。(1962)」<sup>44</sup>沒想到兩岸隔絕竟成了長久的狀態。等過一年又一年，逐漸對這樣隔絕狀態有了清晰的現實感。睜開眼睛認清事實後，失望之餘產生了無法再忍受的不滿情緒。社會人心因而也產生了不少問題。鍾梅音也發表文章分析了這些光怪陸離的現象，她認為那是因為悶在臺灣太久了，又有家歸不得的痛苦表現。1967年出版的《摘星文選》中〈新年的願望〉披露了外省族群對於回家無望而產生出失落感，茫然中導致部份人士心態扭曲的無奈心情。

令人不能置信的，在臺灣竟已度過第十七個新年了，這是我有生以來居留最久之地，……大致說來，人們如果在一個地方住得太久，活動的空間又極有限，再加上有家歸不得的苦悶，的確是會厭倦的。甚至有人說今日社會人心不大正常，譬如一、見不得別人有喜事。二、路見不平，非但沒人出來說句公道話，反而存心看熱鬧。……這些惡德織起來的低氣壓，使人感到表揚好人好事運動的呼聲是如此寂寞，微弱，而且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看來，近乎滑稽。(1965)<sup>45</sup>

遷臺女性作家鍾梅音把返家心切的外省族群的苦悶心態給描繪出來，原本將希望寄託在未來，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認清了現實，兩岸對峙成為一種長期隔絕的狀態，困在島內所做的反攻大夢初醒，信仰破滅後，頓時覺得無比煩躁，再也聽不進政府催眠

<sup>43</sup> 鍾梅音，〈新居二三事〉，《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33。

<sup>44</sup> 鍾梅音，〈四十歲〉，《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初版），頁25。

<sup>45</sup> 鍾梅音，〈新年的願望〉，《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22。

式的口號，人們已逐漸浮現出不能忍受的情緒，鍾梅音曾嗆辣地說：「我們在教育、政治方面，還得好好地自求多福。以前我們總說『明年此日在大陸如何如何』，假使只靠念咒能成事實，也不致今天還在臺灣過這個已不新鮮的新年。現在且莫再說大話，祇盼我們的社會能夠越變越可愛，假使回了大陸，固然對兒女有個交代，否則至少也留給他們一個可愛的生活環境。學駝鳥鑽沙堆，等而下之更去鑽牛角尖，那才教『空白了少年頭』。(1965)」<sup>46</sup>

鍾梅音在中年時期，在臺灣已有了安定的生活，也按照自己心中的藍圖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家。然而，閱讀鍾梅音在六〇年代初期所寫的幾篇文章，卻又呈現出濃濃的鄉愁，她沈浸在思鄉的情緒中，回不去的故鄉，找不回的過去，見不到的親友，揮之不去的鄉愁，使得思念的力量把那並不愉快的童年往事釀成一股濃得化不開的惆悵。「我居然患了懷鄉病——我從未回過所謂的故鄉，可是對於一個四十歲的人，她所認定的故鄉，便是她童年生活在那兒的所在，即使童年的回憶是痛苦的。(1962)」<sup>47</sup>、「春在故鄉的土地，春在我的心裡。……走遍臺灣，更添鄉愁，懷鄉病是一日比一日深了。(1963)」<sup>48</sup>

人在臺灣，精神意念卻在思念遙遠的過去，掛心在回不去的故鄉。在臺灣的風光，皆被故鄉的給比了下去，然而，這並不是自然景物的真實的評比勝負，而是人處在精神失落時，惆悵心情下看的視角所產生的落差。「板橋的天主堂再美些，美不過佘山；那沙漠似的藝專校舍，更令人深深懷念西湖。春天也是故鄉的好啊！(1963)」<sup>49</sup>鍾梅音這些大約寫於六〇年代初期的懷鄉寫法，和五〇年代早期仍抱持總有一天能回故鄉及信念所寫的懷鄉，感覺上鍾梅音的心境已大為不同，處理懷鄉文章的心境亦有所轉折。六〇年代這時的懷鄉情緒似乎轉化為追思，或許亦有可能是當人們知道所盼望的事物，已經難以實現時，從過去的否認到現在的接受，並且試著去處理的心理狀態，或許是一種在心理上逐漸沈澱後，對過往事物的追憶，處理了這樣的心事，才能往前邁進。

人的心思本來就是不斷地變動，內心深處存有的遺憾，不時地會浮現出來，尤其是經歷過大時代如此巨大變動的人們，為了適應當時的生活，為了生存下去，往往只能選擇相信，這一切的忍耐只是暫時的，終有一天能回到故鄉。然而，這些信念畢竟禁不起

<sup>46</sup> 鍾梅音，〈新年的願望〉，《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23。

<sup>47</sup> 鍾梅音，〈四十歲〉，《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26。

<sup>48</sup> 鍾梅音，〈板橋之春〉，《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255。

<sup>49</sup> 同前註，頁255。

時間的考驗，一年又一年，遷臺人們也漸漸地認清了現實，心理上存在的不滿，遺憾及恐懼，終究還是得面對處理的。

國共內戰使得兩岸政權對峙，國家始終未能正常化地發展，反攻口號已成了夢中呢喃，然而，懷鄉之情，卻愈釀愈濃，回顧童年，追憶往事。一般人活在世上，處在正常精神狀態時，傾向於重視當下現實，而且會為了美好的將來而努力奮鬥，甚少不斷回顧過往，然而，人們若是理解了某些過往已真正失去了，或被迫放棄尋回時，故鄉恐怕是回不去了，這時才會頻頻回顧過往，檢視過去的點點滴滴，回不去的故鄉，在心中只能化為濃濃的鄉愁。

人面對困境或是不願接受的事實時，在心理上，或許往往選擇否認，假裝沒這回事，沒事就不需處理。然而，這樣做對心靈並不健康，就像宗教人士往往會勸戒人們，如聖嚴法師就有句名言，或許能作為我們處世態度的參考，遇到事情時，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因此，人們遭遇難事，若能坦然面對，接受並處理，也許才有助於人們能夠繼續向未來前進。鍾梅音也說：「其實一切宗教，何嘗真要人們在儀注上下功夫？上帝也好，菩薩也好，只是教人別忙得像中風狂走，該時常停下來看看天候，認認方向。(1963)」<sup>50</sup>靜下心來，該面對的好好想想這困境怎麼突破，然後收拾心情，往正確的方向前進。

鍾梅音不斷地寫作，她說這也是醫療她心靈的一種方法，更是希望能給讀者一點力量，她在1966年12月所寫的〈逆水行舟〉中，寫了她寫作的心情，「十七年，不算短的時間，若非寫作，真不知如何度過這河山破碎流落異鄉的歲月，假使我的作品像一枚石頭投入深潭似的，曾給這人心麻木的社會一點小小的影響，就算歲月沒有虛度。(1966)」<sup>51</sup>或許鍾梅音靜下心來寫作的同時，也幫助她治療了她的思鄉症，讓她的歲月不致虛耗，對她所愛的人們有所貢獻。

### 第三節 女性文本的生活與日常性及對於時事的觀察

遷臺女作家為五〇年代文壇注入了現實感，在初期時，反共文學長篇小說正盛時，

<sup>50</sup> 鍾梅音，〈新春遊踪〉，《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初版），頁249。

<sup>51</sup> 鍾梅音，〈逆水行舟〉，《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105。

女性抒情散文書寫的內容常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等日常瑣事。當官方文藝政策架空了當下，把現實社會浮現問題的解決方案放置在未來時，女作家將之拉回希望能面對現實，務實解決。女作家關注的焦點和角度常不同於男性作家。據陳芳明觀察研究，對於這樣的性別差異做了以下的解釋：

以外省籍女性為主的作家，她們或是軍公教的工作者，或是軍公教的家眷，在那段經濟艱困的時期，最能感受到生活的重擔。當男性作家在高喊反共愛國之際，女性作家正在為每天的生計憂慮愁苦。反共文學的家園想像投射到遙遠的海峽對岸時，女性作家關心的是在台灣社會裡的升降浮沈。想像是空泛而虛構的，生活則是具體而實際。<sup>52</sup>

### 一、妻職與母職的實踐——女子教育 / 女作家傳統的保守性

五〇年代反共懷鄉年代，遷臺女作家適時地把聚焦放回當下現實，當時臺灣社會因為韓戰等種種歷史及國際局勢等因素，使得美國對臺的立場也有所轉變，美國提供國民政府經濟援助，美援的注入，經由時間發酵，臺灣社會也逐漸轉型，而後浮現了不少問題需要面對並解決。五〇年代官方高喊反攻口號，精神意念處於懷念遙遠故鄉時，遷臺外省作家書寫著反共懷鄉的作品，可是當人們在高昂的戰鬥情緒逐漸退卻後，回過神來，仍要解決當下基本的民生問題。

女性作家鍾梅音，同時也需承擔扮演其身為家庭主婦的責任。筆者從閱讀她所書寫的文本中，也讀到了鍾梅音對於現代婦女有所期許，她希望受過教育的女性也要看重家庭的經營，學習如何把家管理好，亦是一門學問。除此之外，鍾梅音在她的散文作品中，發表了幾篇她對於一些受過教育的現代女性的觀察，她發現那些女性當中，有些人陶醉於一種自我的優越感，鍾梅音似乎透露出她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持有的自我優越感是一種思想上的偏差。鍾梅音曾在 1950 年《大華晚報》中的第 3 版「瓜棚豆架閒話」專欄中發表多篇女子教育相關的文章，並收錄在 1954 年出版的《海濱隨筆》散文集中，筆者將針對鍾梅音所寫的女性相關議題之文章進行討論。

<sup>52</sup>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2011 年 12 月修訂二版二刷），頁 276。

鍾梅音〈女人與高等教育〉在 1950 年 2 月 20 日發表於《大華晚報》第三版，「瓜棚豆架閒話」專欄，全文內容如下：

在某次宴會中，曾有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士這麼說：「我最討厭人說我是女人，因為說我是女人的那個人一定多少帶着點憐憫或不屑的神氣，我不需要人憐憫，我沒有甚麼給人不屑的地方！」言次得意之色，溢於唇角眉梢，這位女士平日多以「矜持」自高，頗有鳳凰之於飛鳥，麒麟之於走獸之慨，那天甚至承認了「女人」的定義乃「憐憫與不屑」，不過眾濁我清耳。然則悲莫悲夫「女人」終究還是「女人」，「討厭」又如之何？

因此想起去年在火車上，看見一位「豐姿綽約」的女士，對一個坐着的丘八弟兄說：「喂，你應該站起來讓我坐，外國人的規矩是 Lady First。」丘八弟兄回答得很直率：「俺是中國人，俺不懂甚麼外國規矩。」誰知那位女士還要紅着脖子怒道：「你受過教育沒有？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嗚呼，高等教育！

同樣是陶醉於一種自我的優越感，只是後者比前者表現得更天真而已。

此女人自卑之過歟？抑高等教育之過歟？<sup>53</sup>

這篇文章中，鍾梅音舉了兩例說明受過高等教育女子的缺失，她直言這兩位女性因著其受過高等教育而表現出一種自我的優越感，鍾梅音並且提問這兩位女性過於天真的表現，到底是否是由於她們自卑，或者是高等教育的缺失？筆者將鍾梅音〈女人與高等教育〉全文引用，是因為想透過此文本來探索鍾梅音所想要表達的意思。

鍾梅音舉的第一例，似乎透露出她認為那位自命不凡的女士不應將女人分群，她形容那位女士是「平日多以『矜持』自高，頗有鳳凰之於飛鳥，麒麟之於走獸之慨」<sup>54</sup>。鍾

<sup>53</sup> 鍾梅音，〈女人與高等教育〉，《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 年 11 月），頁 5。

<sup>54</sup> 鍾梅音，〈女人與高等教育〉，《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 年 11 月），頁 5。

梅音或許想要傳達的是，受過教育的女性標榜自己優於其他人是過於天真，女人是女人，不需將自己從女人中抽離出來，或將女人定義成被憐憫或不屑的對象。

然而，鍾梅音透露出的女人為同群思想，或將那位女士的反應定位為或許是她自卑感作祟等評語。然而，對於鍾梅音這樣的解讀，筆著亦覺得也並非全然正確，更不能概括那位女士的對與錯。至於為何那位女士說：「我最討厭人說我是女人」<sup>55</sup>，對於別人說她是女人時，她會做出這般激進的回應呢？也許這都是事出有因。為何一位接受了高等教育且平時矜持自高的女性需要對於被別人指為女人時，產生如此程度的反感？

當時的婦女受了教育，或許也因為得到了智識的啟發，對於其籠罩在父權體制下，男性始終處於優位的這種不公平現象，女性所表達出一種不滿。「我不需要人憐憫，我沒有甚麼給人不屑的地方！」<sup>56</sup>她要求的是對方應該尊重她，而非將她視為弱者而同情之。

鍾梅音和那位不願被別人說她是個女人的女士，她們之間似乎存在著思想上的落差，鍾梅音認為那樣的反應是不必要的自卑感作祟，然而，今日讀者並非讀不出那種在傳統父權文化中，對於社會上男性優位的現實，女性發出的一種不平的憤慨言語。那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士將稱呼她為女人的人解釋成將她當成弱者來對待，「別叫我女人！」，她用這樣過度的詮釋，或許也是身在父權社會環境中，身為女性的她所發出深沉且痛心的抵抗。

在〈女人與高等教育〉中，鍾梅音認為受過教育的女性更為天真的行為表現則是她所舉的第二例。一位豐姿綽約的女士，要求華人男性依照外國禮儀中的「女士優先」，讓位給自己，鍾梅音文中隱約透露出她不認為外國規矩優位於中國傳統秩序。而那個被要求讓座的中國男人，對於自己不讓位給一個女人，他的反應是說：「俺是中國人，俺不懂甚麼外國規矩。」<sup>57</sup>有意思的是，鍾梅音評論此男人的說詞是屬於直率的回應。文中透露出鍾梅音的概念中，高等教育不應該是西方價值觀的輸出，因此高等教育應該要有所修正。言下之意，似乎傳達出高等教育應該要適合中華傳統文化，而非套用西方價值於中國社會中。

<sup>55</sup> 同前註，頁 5。

<sup>56</sup> 同前註，頁 5。

<sup>57</sup> 鍾梅音，〈女人與高等教育〉，《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 年 11 月），頁 5。

筆者接下來想引用鍾梅音的另一篇〈談今後的女子教育〉來做進一步的考察，〈談今後的女子教育〉是 1952 年 1 月 6 日刊載於《新生報》「自由婦女」上，此文後來收於鍾梅音 1954 年出版的《海濱隨筆》散文集中，文中提到：

家，原是組成一國的基本個體，故曰「家齊而後國治」。假如連家也管不好，又如何談得上貢獻社會？可惜許多現代婦女便有這樣的錯覺——假使在學校裏受了幾年的「高等教育」而不在社會上做幾年事情，便像非常冤枉似的；倘若再在灶下做幾年廚娘，那就更大才小用，怨天尤人，覺得這個世界未免太辜負了她。<sup>58</sup>

鍾梅音提及了中華悠久的儒家思想，齊家治國安邦的君子之道。這套邏輯本是傳統古代中國社會，儒家思想下教育男性成為君子的一種處世觀。歷史悠久古老的中國社會也逐漸進入了現代，女性也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鍾梅音在五〇年代觀察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發現女性雖有幸有了受教的機會，然而當時的中國社會並未提供讓她們可以發揮所學的空間，而且也並非有太多的機會能找到適合應用其所學的職場位置，鍾梅音表示實際的情況是，女性若是婚後生了孩子，也許為了照養孩子而退出職場後，很有可能立即面臨到難題，學校並未提供支持女性從事家庭管理的教育，而婚後，她們每天要張羅開門七件事，而且又要烹煮三餐、處理繁雜瑣碎的家務勞動，對於女性的教育，若是沒提早培養她們管理家庭的能力，她們要靠自己摸索，將會是非常辛苦的。

這些辛勞，對於身體不甚健康的鍾梅音更有所感，所以她書寫她在料理家務時，經常感到相當疲憊，有時她亦需要其他女性家務勞動者的幫忙協助，也就是她文章常提及的下女。因此，她認為女性在面對這樣主婦生活，實在非常需要提前做嚴格的家事訓練，不然就得像她一樣，耗費了許多年自己獨自辛苦地摸索，受盡不適任下女的氣，鍾梅音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對女子教育有自己獨特的一套建言。她在〈談今後的女子教育〉文中說道：

我以為今後的女子教育，不必再照男人的依樣畫葫蘆，老是跟在他們後面跑。當然在我們女同胞中，也不乏工程師與生物學家，那麼女子教育縱不能另成一個系統，至少也該提早分科，而在分科以後，儘量淘汰不必要的學科，代之以嚴格的

---

<sup>58</sup> 鍾梅音，〈談今後女子教育〉，《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 年 11 月），頁 107。



家事訓練。<sup>59</sup>

鍾梅音發現當時社會雖給了女性，和男性相同的學科教育，有些女性也因為受了高等教育而成為科學家，然而，這些大多是從西方的社會文化中所建立的學科知識，並非在中國社會中自然生成出來的，當然還未能提供女性，一個和男性一樣可發揮所學的職場位置。而女性若在結婚後，要面對的則是男主外，女主內，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觀念下，真實的家務勞動，若沒有經過訓練，往往茫然且不知所措。

鍾梅音〈談今後女子教育〉中提到她自己在閱讀中，也看到了有其他作家也書寫女性婚後對於家務不知所措的困境，她以《自由婦女》刊載的一篇〈生活的考驗〉作為佐證，這篇〈生活的考驗〉中提到：「一位主婦曾經受過高等教育，也曾希望在社會上作一番事業——至於以後又如何沒有做成，當然大家的原因都差不多。——而臨到持家時，這才發現莎士比亞的歌劇裏沒有食譜，杜甫的詩集裏也找不到褲樣……」<sup>60</sup>，鍾梅音認為：「這不能不歸咎於我國女子教育的失敗！」<sup>61</sup>

鍾梅音認為不需在教育過程中，花費時間教導女性學習一些她們未來派不上用場的學科，她說：「那些大小代數，平面幾何，立體幾何，解析幾何，真是折磨了多少活潑潑的青春，其實除非預備將來做工程師，數理教員，實在沒有強迫女生去讀牠的理由；至於貓的脊椎有多少個環節，細胞的顏色形狀又如何，假如不是打算將來專攻生物的，也不犯着叫她們死記，即使死記住了，考試一過，因為買物記賬用不上代數幾何，養貓種花也無須先要知道牠們的構造，於是又都交還先生。」<sup>62</sup>對於女性學生，鍾梅音認為學校至少應該要分科教育，淘汰一些不必要的科目，代之以嚴格的家事訓練，教導女性在家務上的管理與處理能力。

鍾梅音認為主婦若能在她們學生時代就受到更切合她們實際需要的教育，將是對她們更有幫助的。鍾梅音認為已婚婦女最基本的責任是管理好她的家庭，她說：「我總以為先把自己的家庭管好，行有餘力，才談得上其他。我希望我的丈夫兒女歸來時，我總在家，如果辦不到，至少桌上有香噴噴的飯菜等着他們。」<sup>63</sup>

<sup>59</sup> 鍾梅音，〈談今後女子教育〉，《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09。

<sup>60</sup> 鍾梅音，〈談今後女子教育〉，《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08。

<sup>61</sup> 同前註，頁108。

<sup>62</sup> 同前註，頁108。

<sup>63</sup> 鍾梅音，〈我祇追求一個「圓」〉，《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208。

筆著認為現代人應該不論男女，若都能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識，比如說食物的聰明採買、食材的應用、美味與營養的調配、烹飪的技巧等，對於自己或是家人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助益的。鍾梅音之所以認為男女應有不同系統的教學是有其現實的考量的。當時的環境並不像現在食品加工業、成衣業這麼發達，主婦要料理三餐、親自裁縫衣裳等，每日處理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繁瑣的家務雜事，實在是需要提前做好訓練。她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女性中依舊多的是傑出人才。但我更希望今後的女子教育所培植的女性，不必再像我們這一代似的，在社會上鮮有成就的可能，熬成賢妻良母也要靠自己暗中摸索，直到結婚十年以後，才能一切應付裕如。」<sup>64</sup>

婚姻、家庭生活、賢妻良母、家務管理這幾個題材常出現於鍾梅音文章中，因此，筆者也想探討為何鍾梅音認為家務是主婦的責任，筆者並嘗試從鍾梅音文本脈絡梳理出妻職的實踐。

西蒙·德·波娃曾言：「男人首先是公民、是生產者，其次才是丈夫；而女人則主要是妻子，而且這往往是她唯一的身分；她的工作無法讓她擺脫自己的景況；相反的，是她的景況賦予了她的工作或高或低的價值。如果她帶著愛意、心甘情願地付出，她便會滿心歡喜地操持家務；如果她帶著怨氣，家務事對她來說便是苦刑。」<sup>65</sup>

筆者閱讀鍾梅音所寫的文本中，觀察到鍾梅音對丈夫的愛，支撐著她處理日常生活當中種種瑣事的意願，她的文中常流露出她與余伯祺夫妻關係是平衡的，彼此相互尊重，鍾梅音的家庭關係，在筆者看來是屬於較平衡的男女關係，工作分配上是，男主外，女主內，但倒不是父權社會下，傳統的上下權力分配，而是偏向家庭分責，也就是丈夫余伯祺負責他有興趣的事業，身為眷屬的鍾梅音支持她的丈夫全力衝刺其事業，家務以及子女的教養權與責任則全權交由鍾梅音處理。鍾梅音雖然有些做法和當時接受現代新式教育的女性思想不同，但她卻有某種理直氣壯的自信，筆者認為這種自信來自於她與丈夫余伯祺夫妻之間屬於他們特有的包容與平衡。

鍾梅音 1950 年 3 月 11 日刊登於《大華晚報》「瓜棚豆架閒話」的〈斤斤計較〉，文中她說：「從前沒有雇傭人的日子，每當我忙忙碌碌地為丈夫絞面巾、擦皮鞋、端茶、添飯的時候，如被同學看見，便說我是『自甘墮落』、『封建餘孽』；如被長輩看見，則又詡

<sup>64</sup> 鍾梅音，〈談今後女子教育〉，《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09。

<sup>65</sup> 西蒙·德·波娃，〈第五章 已婚女人〉，《第二性》（臺北市：貓頭鷹出版，2013年10月），頁772。

為『有新思想而不失舊道德的女性』。」<sup>66</sup>她樂於服侍丈夫余伯祺，鍾梅音知道當她這麼做時，其實是會引來來自她的週邊同學、朋友等所謂的新女性的厭惡，但鍾梅音同時也發現她的行為卻是傳統保守的長輩們讚許樂見的。對於她的同學友人責怪她，批評她應有新時代女性追求自我的理想，而非把精力放在傳統守舊的服侍著丈夫，以及長輩對她的稱許，她的回應是：「其實，兩方面的話都是受之有愧，漫說夫婦之間不能沒有感情，即使一個朋友從外面回來，你豈有不上前去為他服務的嗎？不過話說回來，當然這也是相對的，如果丈夫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地奴役我，那可不幹，因為這麼一來，就失去了感情，於是也就失去了為他服務的意義。」<sup>67</sup>

鍾梅音對於她同學或長輩，想要把她定位或歸納在某類的女性這樣的做法，她認為「兩方面的話都是受之有愧」<sup>68</sup>，也是不必要的。她說她的體貼服務丈夫的舉動是出於她與丈夫夫妻間的感情自然地流露，不需斤斤計較，外人也不需在這當中做文章；而她認為自己也非長輩認為的那種接受了新思想卻仍保有舊道德的傳統女性，她直言那個要求婦女謹遵三從四德的父權傳統年代也已經過去了。

農業社會下所生成的父權社會，西蒙·德·波娃道出了女人的艱困處境：「在農業聚落中，農民非常需要農婦的助力；……社會群體有待男人的也是能讓生命不斷繁衍。然而並不是做為個體的男人直接呼召女人循此而行，而是透過由男性建立起來的社會要讓每個男人都成為丈夫、父親，從而要求女人據此而行；女人在由父兄掌權的家族中處境一如奴隸或附庸，她總是由家族中的男人作主嫁給另一個由男人掌控的家族。」<sup>69</sup>中西文化都經歷了長久的農業時代，中國更是以農業立國，根深蒂固的封建生活方式、觀念等，亦不是短時間內就能改變，就能現代化。

五〇年代的中國人的思想也逐漸有了改變，回到鍾梅音的文本中，雖然鍾梅音友人對於她那些體貼服務丈夫表達對丈夫的關愛的方式是「自甘墮落」、「封建餘孽」，她都予以反駁，因為她覺得自己給丈夫端杯茶，添碗飯這些做法並沒什麼問題，夫妻之間的互動本來就不需斤斤計較於這樣的細節，並說她與余伯祺在很多方面，夫妻之間都是彼此尊重的。

<sup>66</sup> 鍾梅音，〈斤斤較量〉，《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1。

<sup>67</sup> 鍾梅音，〈斤斤較量〉，《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2。

<sup>68</sup> 同前註，頁12。

<sup>69</sup> 西蒙·德·波娃，〈第五章 已婚女人〉，《第二性》（臺北市：貓頭鷹出版，2013年10月），頁708。

然而，在夫妻之間有意見相左時，她坦承經常是她放棄的多，她強調聽從丈夫的意見，並非盲目的服從，她解釋道：「雖然大致還是我放棄意見的時候多，但也只因為他的思考比我周密，他的見地比我卓越，然並非盲目的服從，三從四德的時代早已過去，所謂『服從』這一名詞，應已不復存在於夫婦之間，至於絞面巾、端茶水，我認為女人只要不做軟體動物，原不必矯情地在這些細情末節上去斤斤較量的。」<sup>70</sup>丈夫對於鍾梅音是有智識的男人，對於鍾梅音所存有的這種觀念，筆者接下來將引用鍾梅音〈聊天〉一文來說明。

鍾梅音〈聊天〉於1953年1月14日發表於《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每週漫談，文中大意是敘述聊天之樂，並給主婦們提議應多參與有智識的先生們的談話，以增廣見聞。內容摘錄如下：

其實在太太們裏面，我還算是比較好動，比較愛書的。我不大喜歡攪在女人淘裏研究時裝，說長道短。却寧願去聽先生們談公務，談法規，談時事。起初對有些地方不甚明白，也不求甚解，日後聽得多了，自然大致貫通。但和那些博學多才的先生們相形之下，我仍覺得自己孤陋寡聞得緊。

不過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條件，對於此時此地的主婦們畢竟已不容易辦到，然而參與能夠啓發智識的聊天，仍不失為惠而不費的有益之事。假如我們不願老是停在時裝皮鞋裏打滾，那麼，不妨把興趣先擴展到先生們的聊天上去。<sup>71</sup>

這些言論充分說明了為何鍾梅音在夫妻有意見相左時選擇放棄自己的意見，而採納丈夫的意見，就像筆著前頭所引用的，鍾梅音在〈斤斤計較〉文中所說的，她之所以會聽從她丈夫余伯祺的意見是因為：「他的思考比我周密，他的見地比我卓越，然並非盲目的服從」<sup>72</sup>。鍾梅音打從心裡認為丈夫是比自己更有判斷力的博學多才的男人。甚至提到自己若和丈夫或丈夫友人比較的話，自己是多麼地「孤陋寡聞」<sup>73</sup>。所以她說明自己是心

<sup>70</sup> 鍾梅音，〈斤斤較量〉，《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2。

<sup>71</sup> 鍾梅音，〈聊天〉，《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35。

<sup>72</sup> 鍾梅音，〈斤斤較量〉，《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2。

<sup>73</sup> 鍾梅音，〈聊天〉，《海濱隨筆》（台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11月），頁135。

甘情願地，打從心裡佩服，並且接受比自己更高明的丈夫的意見，而非像傳統婦女僅是順從丈夫。

談了許多鍾梅音的想法，至於余伯祺怎麼想呢？或許也可以對照來看看。接下來筆者將引用余伯祺所寫的文章來探討鍾梅音的另一半，她的丈夫余伯祺的看法。

余伯祺當然感受到他的妻子鍾梅音的賢慧。長年在外面工作的他，相較於鍾梅音，余伯祺或許是更了解當時社會上，有許多女性的想法做法，已有了很大的改變。余伯祺在工作多年退休後，也寫了篇〈我的老婆大人〉收錄於1982年7月所出版的《我的另一半》，他在〈我的老婆大人〉一文中回憶過往，對於他賢妻鍾梅音，是這樣描述的：

她把我伺候得紅光滿面，健康更勝當年，閑來只想往外跑；而她自己原已食少事繁，這時只累得連陪我逛逛都有心無力。若我比她先入天堂，也不必擔心；若先入天堂的竟是她，屆時滔滔天下皆新女性也，我對鰥居既乏信心，再婚更是如何得了？這真是愛之適足害之，唯恐真把老婆累死，從現在起，我也幫忙榨榨橘汁、洗洗碗盪了。<sup>74</sup>

當時已屆中年的余伯祺愈見發福，原因是妻子鍾梅音廚藝精湛，常烹飪豐盛佳餚，兼顧營養及美味可口，讓丈夫和孩子愛不釋口。在鍾梅音的細心地調養照料下，身體精神都很健康，可是，鍾梅音自己卻因家務繁瑣，身體虛弱，讓丈夫擔心若是妻子因操勞過度，先走一步，他可再也找不著像鍾梅音這樣全心全意以家庭為第一優先的傳統優秀賢妻了，在他身旁伺候著他的鍾梅音和他口中所謂的新女性思想概念上是大為不同了。

鍾梅音寫了不少她對於妻子角色該怎麼扮演，夫妻應該這麼互動，亦教導女兒她的這種觀念，傳達出要維持保守傳統的美德。連丈夫看了，都怕讀者誤會鍾梅音未免太重男輕女，而一度想寫文章平衡報導，余伯祺多年在職場上或許對於時代的脈動比鍾梅音有更深刻的體會，他讀出了鍾梅音文章的保守性和當時社會中的新觀念，已有了相當深的抵觸及落差。余伯祺甚至認為他妻子的理念沒引起新時代女性的訕笑，也許僅是因為運氣好。余伯祺在〈我的老婆大人〉一文中寫道：

記得她有一篇給女兒的文章，說她若有一天也成了甚麼家，但在家裡仍是妻子，

<sup>74</sup> 余伯祺，〈我的老婆大人〉，《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127。

切勿支使男人去做瑣務；男人做多了瑣務，就不再像男人了。為我自身利益著想，當然舉雙手贊成，這篇文章不曾引起新女性主義的恥笑，真是福星高照。雖然我知道她絕不是重男輕女，她只是覺得男女應當合作而不必競爭，何況在愛心裡，初無所謂尊卑之分。為免引起誤會，我原想發表一點意見，又覺天下那有敬酒不喝的傻瓜？<sup>75</sup>

據曾鈴月的《女性、鄉土與國族－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三位女作家小說作品之女性書寫及其社會意義初探》碩論中研究觀察了戰後遷臺女作家的小說作品，她認為女作家們雖接受過新式教育的啟發，但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還是深深地影響著她們。

戰後初期大陸來台女作家因其在中國大陸的教育成長背景及時代風潮，啟發她們女性自知自覺的意識，在小說創作上可見其女性特質的書寫方式，但不可忽略的是傳統封建思想觀念的根深存在。<sup>76</sup>

或許這也反映出華人長久以來在傳統中華文化的影響下，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存有男尊女卑的這種概念，家庭角色也有句話可概括，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內」。西蒙·德·波娃指出「男人對家中事物不甚感興趣，因為 he 可以和整個世界接觸，也因為 he 可以有各種計畫、目標以確立自我。而女人被囚禁在家庭領域裡，她能做的就是將監牢變成王國。」<sup>77</sup>

父權社會中，女性的生活空間，常受限於傳統文化的觀念裡，被綑綁在家庭事務當中。雖然近代這樣的傳統認知已被撼動，女性不但也有了受教育的機會，更有些女性積極地爭取在職場上發揮自己能力的空間。然而，中國社會，男女之間上下尊卑的地位，還需要長時間的醞釀，才能形成轉變為合作平等的關係。

筆者所研究的對象鍾梅音原是個家庭主婦，在種種的契機下，她幸運地有了在臺灣文壇上取得了發表的舞台，1956年更曾任《婦友》月刊的主編，工作能力受到了王文漪等人的肯定，然而，鍾梅音在1965年寫的〈我的財富〉收於1967年出版的《摘星文選》，

<sup>75</sup> 余伯祺，〈我的老婆大人〉，《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127。

<sup>76</sup> 曾鈴月，《女性、鄉土與國族－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三位女作家小說作品之女性書寫及其社會意義初探》，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0，1月，頁29。

<sup>77</sup> 西蒙·德·波娃，〈第五章 已婚女人〉，《第二性》（臺北市：貓頭鷹出版，2013年10月），頁752。

在〈我的財富〉文中，她卻坦言，她個人若不是想為家裡增加一些收入經濟上好過點，並沒那麼想當職業婦女，假使能有選擇她願意只當家庭主婦，把家裡管理好才是她的志向，但若想當個稱職的主婦，並不簡單。比如說烹飪倒能容易掌握，但很多繁雜的家務的管理更是門重要的學問。因此鍾梅音若有選擇的話，她或許更願意將自己的精力貢獻在她的家庭，為她的家人料理三餐，她認為能管理好家務，也是件極其重要的事。

我一向笨拙，也沒大志——至少從結婚以後，就只想做個給丈夫「煮飯」的平凡妻子。雖然其間一度出任秘書、編輯、甚至電視節目製作兼主持人，除了電視是客串性質外，說句很不爭氣的話，其他都只為了餬口而已。所以當沒有這種必要時，我立刻回到家庭來了，「煮飯」也許用不著太多的學問，但「齊家」卻是孔夫子認為比治國更為重要的工作。<sup>78</sup>

然而，從以上脈絡梳理，筆者並不願定位鍾梅音屬於封建守舊保守思想的女性，因為鍾梅音在她生活的那個年代，她當然也不太可能有太前衛的女權運動的新穎概念，鍾梅音在婚姻當中，有著平衡的夫妻關係，再加上因為戰亂，她和丈夫帶著兒子來到了臺灣，兩岸隔絕再也不能回鄉，但也因而得以遠離了傳統父權文化下的中國社會，脫離了她的傳統少奶奶，有限生活方式的綑綁，來到了臺灣，從頭開始，一磚一瓦地建立起她想要的家。

生長在戰亂的年代，鍾梅音有著國族團結的意識型態，加入了官方文藝團體，曾不顧自身安危到前線訪問報導，寫下了許多宣傳及鼓舞人心的文章，並且試圖以傳統儒家溫文儒雅的正統文化來穩定民心，遷臺的國民政府亦用此正統確立其統領的位置，遷臺外省女性作家也得到了可以發揮其所能的廣大空間。

鍾梅音或許也因為她很幸運地嫁給了欣賞她的余伯祺，並用他們的方式，經營著屬於他們在臺灣的家。因此，鍾梅音也並不致力於打破傳統父權文化為爭取女性空間。她自然有她的一套邏輯，一種屬於她的處世觀。筆者也認為女性應當有權爭取自身的權利，女性要有職場發揮的空間，活出自己的生命價值，不再是只能男主外，女主內，或是侷限在男尊女卑的概念中。然而，若是女性就想要為她所愛的丈夫、孩子、家庭，貢獻她所有的心思，那也是屬於她自由的選擇，應無優劣之分別才是。如鍾梅音〈我祇追求一

<sup>78</sup> 鍾梅音，〈我的財富〉，《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70。

個「圓」)所願：

責任義務之外，各安所適就好，倘使現在要我為「幸福」下定義，那就是「能依照自己的愛好而生活」，假如紙面不夠大，何妨將直徑收小點兒，我祇追求一個「圓」。<sup>79</sup>

## 二、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反思——公寓生活擘畫的「現代人」想像

鍾梅音生長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難免受到傳統保守觀念的影響，她因著對丈夫和子女的愛而心甘情願地付出，盡心扮演她該做好的妻職、母職的責任及角色，這或許也是個人選擇的生活方式，她是丈夫、孩子心中的賢妻、良母，甚至也是官方文藝組織筆隊伍所倚仗的安定力量。然而，做為知識女性又是作家身分的鍾梅音，對於五、六〇年代所產生的公眾議題，以及當時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浮現出的一些問題，鍾梅音所提出的建言倒是頗為客觀，也相當有見地，並且值得關注的，其中她點出了中國人在面臨工業時代的來臨，對於都市化集中居住在公寓住宅的生活方式，顯得有些適應不良，她認為這些都是國人應該面對檢討及需要設法改善的。因此，接下來，筆者會先將臺灣戰後五、六〇年代現代化過程中，新式建築公寓住宅的形成做個簡單的回顧，然後，再試著從鍾梅音散文文本中整理出她的對此現象的觀察，以及所提出國人應如何調適的建言與改善方向。

公寓住宅，是當今世界各國都市住宅的縮影，也是戰後台灣最重要的住宅類型。……一般所稱的「公寓住宅」，或是較為正式的名稱「集合住宅」，原本是西方社會在 19 世紀之後，為了解決工業革命的工業化和都市化所帶來大量以工人階級為主的住宅需求，因而發展出的一種由多個住宅單元所組成的住宅形態。……公寓作為一種現代住宅設施的基本單元，主要是住宅空間標準化和大量生產的結果。……1960 年代之後，在美援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之下，國民政府開啟了以公寓集合住宅為核心的住宅政策。<sup>80</sup>

<sup>79</sup> 鍾梅音，〈我祇追求一個「圓」〉，《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 年 2 月），頁 209。

<sup>80</sup> 吳鄭重，〈公寓住宅的空間實踐：戰後台灣集合住宅發展簡史〉，《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臺北市：聯經，2010 年 11 月），頁 246~248。



民生大事，當然包括了人民的居住問題。然而，國民政府在這個人民住的方面的規劃則有很多不足之處，尤其是國宅政策有相當多需要檢討的地方。張秀雄曾直言：「我國政府處理國民住宅問題，是在問題發生之後，而非計劃在先，國宅政策為因應各時期環境之需要迭有變更，致使政策缺乏完整性，法規宥於片面性，種下日後發展之敗因。」

<sup>81</sup>張秀雄《論民生主義國民住宅之建設》也梳理了歷史的脈絡，引文如下：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陷匪，其後短短數年內，數以百萬計的軍民同胞遷徙來台，當時由於情況特殊，營建管理難免鬆弛，不易嚴格執行，復由於實際生活需要，乃隨處搭建臨時住宅，致使原有的公共設施不足供應，土地利用難以有效控制，住宅問題於焉濫觴。

民國四十三年，由於克蒂風災所引起的國民住宅問題，啟發了政府對國民居住問題的注視，並導致翌年由內政部設置興建都市住宅技術小組，負責籌劃與推動事宜，並於民國四十四年二月議定運用美援相對基金興建國民住宅計畫。<sup>82</sup>

吳鄭重整理戰後臺灣住宅現代化的研究指出：「1955年，在台北三張犁光復南路附近興建了第一批市民公寓，成為政府興建國民住宅的先河，也奠定了台灣現代公寓住宅的雛形。」<sup>83</sup>

社會形態轉變下，公寓建築的居住環境中，知識女性鍾梅音思考著中國人需要建立起新的道德觀及生活規範，公寓生活帶來的是人們集中化居住的改變所產生的公共空間的議題，提倡培養公德心，要修正中國人的生活、思考方式以建立新的規範，除此之外，她也觀察到了電視媒體傳播和麻將，對人們生活所造成的副作用以及產生的問題等。

我曾說過公寓乃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使用的人必須接受二十世紀的公德觀念，才能使公寓住宅的生活趨於完美。不但公寓如此，對於一切二十世紀的文明，我們

<sup>81</sup> 張秀雄，〈第五章：民生主義國宅政策之研訂〉，《論民生主義國民住宅之建設》（臺北市：臺灣商務，1980年8月），頁128。

<sup>82</sup> 張秀雄，〈第四章：我國國民住宅建設之檢討〉，《論民生主義國民住宅之建設》（臺北市：臺灣商務，1980年8月），頁74~75。

<sup>83</sup> 吳鄭重，〈公寓住宅的空間實踐：戰後台灣集合住宅發展簡史〉，《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臺北市：聯經，2010年11月），頁255。

都必須連同這文明的道德一同接受，否則未見其利，先蒙其弊。一隻猴子可以學會騎單車，却不知人行道上行不得也；一隻狗也可以學會抽煙，却不知公共場所只有吸煙室內才能吞雲吐霧。這些聽起來似乎是笑話，但如出現在我們的社會裏，就令人笑不起來了。<sup>84</sup>

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工業社會所產生的生活型態與過去農業社會大為不同，短時間內迅速且大幅度的改變，很多問題也應運而生。公寓住宅人們密集化的居住使得生活空間被限縮又彼此相互牽扯，公德心的觀念急需建立，鍾梅音舉抽菸為例，像抽菸這樣原屬於個人的習慣，然而吸煙者必須要認知到在公眾空間不能想抽菸就拿起菸來抽，要到能吸菸的區域去抽菸，以及尊重周遭人也有拒絕吸二手菸的權利，對於公私領域也應當有所區分，這樣的觀念形成不易，直到現今二十一世紀也還有吸菸者抗拒或無視這種的作法，甚至很多人還沒有這樣的概念。然而，在當時還處於戰亂戒嚴的年代，鍾梅音約莫在六〇年代就已拋出這類公共議題的檢討。

事實上，在更早以前，鍾梅音還居住在宜蘭蘇澳時，她寫的〈鄉居閑情〉於1949年7月17日，發表於《中央日報》第6版，文中便點出了人們在現代生活中的盲點，鍾梅音指出一般人以為城市生活才是現代的、繁華的、進步的，而鄉間生活相較之下則顯得步調慢，簡單卻也無聊，因此人們趕忙著到都市去工作生活，忙著學習吸收現代各種新事物，因而遠離了鄉間，也脫離了自然，以至於看不見鍾梅音眼中的鄉間自然環境裡，這個純樸又可愛的世界，她感慨地說：

人們都太忙了，從忙著吃奶、長牙、到忙著學走路、學說話、學念書……以至於忙著魂牽夢縈地戀愛、氣急敗壞地賺錢，因此忘了他們的周遭，還有這麼一個可愛的世界，而我，卻從一般人以為枯燥貧乏的鄉居生活裏，認識了它們。<sup>85</sup>

1955年4月鍾梅音一家遷居至臺北，在那之前，鍾梅音住在宜蘭蘇澳大約六年之久，搬到臺北，生活在這城市中的鍾梅音其實更愛鄉間生活，忙碌的都市生活，她認為是傷害心靈的，她亦有些適應不良，她的生活過得很匆忙，也曾讓她感到茫然：「我就是一直

<sup>84</sup> 鍾梅音，〈公寓生活與打牌〉，《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55。

<sup>85</sup> 鍾梅音，〈鄉居閑情〉，《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1951），頁33。

徬徨在這生活夾縫中的人，常常茫然不記得昨天的事，只覺台北的日子飛快。」<sup>86</sup>丈夫余伯祺也是忙得不得了，1959年8月〈神聖試驗〉一文中描述他們的生活是：

都市生活的確太緊張了，這種生活的壓力，常不是個人可以抗拒的，時間也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曾有一陣，我與妻忙得昏天黑地，半月未交一語——這話有些誇張，所謂未交一語，是不能談談屬於自己的「體己話」，像她的健康啊、我的工作啊，諸如此類。<sup>87</sup>

然而，鍾梅音一家為何會選擇住在都會區的公寓住宅裡呢？她坦言那是為了生活、為了工作、為了孩子，她說：

我也喜歡「中國生活」，喜歡那好的一面，譬如悠閑的趣味、山水的怡情，這却是都市生活所無法獲致的，也是我不擬長住公寓的原因。……年輕時為兒女與職業，不得不擠在城裏，老了再搬出郊外，希望有一小塊土地可以種花養雞。<sup>88</sup>

鍾梅音一家曾住在臺北的南京公寓，後來為了女兒就讀方便而搬家。遷入的新居是當時人們所謂的高級住宅區，鍾梅音的朋友也住在那一帶，她朋友頗為坦承地提醒她說：

你住到這兒來，我們當然歡迎，但說真的，你來了可能要後悔，因為你是個愛清淨的人。你可知道能買下這種住宅的大多不是等閒之輩？我對面就是些權貴之流，走進走出張牙舞爪地且不理它，只三更半夜擻喇叭就教你心驚膽裂，還有叫牛肉麵，買裹蒸粽，好像若不嗓門兒張大些就不夠派頭。<sup>89</sup>

鍾梅音慶幸他們只是打算在那高級住宅區暫住，所以並不打算在那買房子。余家將原先已經住了四年零兩個月的南京公寓的房子給出售了，賣了以後，鍾梅音卻相當懷念她的故居——那個便利小市民生活的南京公寓，因此她在1966年9月寫了篇〈回憶故居〉，文中道：

<sup>86</sup> 鍾梅音，〈過河卒子〉，《塞上行》（臺中：光啟，1964年2月），頁110。

<sup>87</sup> 鍾梅音，〈神聖試驗〉，《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2月），頁126。

<sup>88</sup> 鍾梅音，〈中國人的生活〉，《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34。

<sup>89</sup> 鍾梅音，〈新居二三事〉，《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27。

我的房子賣掉了。

那是座落在南京公寓的一幢甲種市民住宅，四十坪地，樓上樓下連同加出去的廚房共有廿七建坪，當我離去時，已經花開滿院，桂子飄香，都是我親手所植，頗有依依之感。

我初來時，屋外一片綠地，據說是都市計劃藍圖中的公園預定地，不准築屋，因此我才買下了它。……當然它仍有缺點，譬如烟塵、污穢，尤其丙種住宅的陽溝裏經常塞滿了垃圾，可是當我發現我這所謂「高級住宅區」的烟塵更厚，蒼蠅更多時，便覺南京公寓這些現象又已不成其為「缺點」了。<sup>90</sup>

鍾梅音在南京公寓住的時間有四年之久，住久了也發現南京公寓也算是具有適合小市民生活便利的條件，比如說，附近除了有那一片綠地外，交通也很方便，三十四路公車直達南京公寓，車子大且新，班次又多。南京公寓附近也有個相當完備的菜市場，能常買到新鮮的魚蝦。另外還有一所郵局支局，可以辦儲匯業務，還可寄遞國際包裹，手續還比總局快捷簡便。南京公寓附近的早點店，既方便，選擇也多，喜歡西點的，有三家西點麵包廠早晚不斷供應，喜歡中式的，賣油條燒餅的店也到處都有，符合小市民生活需求的店家，比如說包飯作、燒臘店、裁縫店、電器行、五金店、鍾錶店、中、西藥房、診所、百貨店、鞋店、修鞋店等也漸漸聚攏，供需平衡，可說是滿足小市民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應有盡有，難怪日趨繁榮。

鍾梅音也把她南京公寓的家用心且仔細地裝修起來，她房子的牆壁顏色，每間不同，連窗外鐵柵也是由她親自打圖樣設計的，她滿意地說：「凡是來訪過我家的隣人，都說我家裝修即使不敢說是全南京公寓『第一』，至少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甚至油漆工人說，漆了一個松山，有比我家大的房子，也有比我家好的房子，但還沒看見比我家更『漂亮』的房子。」<sup>91</sup>，可見她有多麼不捨她那親手設計且精心佈置的家，她有幾位鄰居還勸她別賣掉南京公寓的房子，因為就一般小市民生活機能來說，「還是南京公寓比較上軌道。」

92

<sup>90</sup> 鍾梅音，〈回憶故居〉，《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34~138。

<sup>91</sup> 鍾梅音，〈回憶故居〉，《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34。

<sup>92</sup> 鍾梅音，〈新居二三事〉，《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27。

鍾梅音在 1966 年 9 月寫的兩篇散文〈新居二三事〉和〈回憶故居〉，可對照來看她對於公寓生活的看法，以及市民住宅與居民組成和周邊環境的觀察，她提過她搬家是為了女兒就讀方便，才把那南京公寓給賣掉了的，在鍾梅音散文中未透露她後來的新住所的名字，她只說住在那新居只是暫時的，因此她不打算在那兒買房子，但文中仍難免失望地說：「遷入之後，才發現這兒的環境真是比我的舊居差多了。」<sup>93</sup>她發現她的新居雖然是所謂的「高級住宅區」，居民有些是較有錢的階級，然而，她住的這片公寓住宅區，比起南京公寓，建案只不過是晚個兩、三年，居住環境所提供給市民的生活機能，相較於南京公寓，簡直像是個未開發的地方，據鍾梅音的觀察是：

現址並非沒有「小市民階級」，據我所知，一半以上的住戶沒有女僕，……除了這些各自為政的小市民，剩下的多為有車階級，連同那些豪華公寓裏的主人們，買菜寄信等等，自有僕人代勞，所以近處的菜場發達與否，無人關心<sup>94</sup>

在搬到這高級住宅區前，鍾梅音就知道新家不比故居南京公寓生活便利，但是她搬家後，才深深地體會到一件事，那就是：「一個地區的發展，是有其社會背景的，與組成的份子也有密切關係。」<sup>95</sup>，因此，她更是懷念起故居南京公寓的好，南京公寓生活上的便利，乃是因為那一帶的居民就是道道地地「小市民階級」，公車路線的規劃，及設立郵局等因著小市民階級的生活需要，更因為有些熱心人士積極爭取，才發展而來的，因為「一切設備都為小市民服務，若干營生，自然而然地近悅遠來，日趨繁榮。」<sup>96</sup>

或許是鍾梅音有其經濟資本優勢，閱讀她所寫的這幾篇文章，大約了解她居住的公寓所在地，都是在不錯的地段，且都有足夠的居住坪數，因此居住合宜舒適，然而，她文中也紀錄了她的原住宅南京公寓附近的綠地，那片屬於她的「心靈之窗」。她房子前面的那片綠地，原本是規劃為公園的預定地，不准築屋的，鍾梅音也是為了這未來的公園，這來日美景的美好想像，而買下的房子，並花心思仔細裝潢設計。然而，她沒想到的是後來那片未來的公園預定地上卻蓋起了一排高樓。

後來那片公園預定地不知如何又成了私地，蓋起一排高樓，賣給某公用事業機構

<sup>93</sup> 同前註，頁 127。

<sup>94</sup> 鍾梅音，〈回憶故居〉，《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137~138。

<sup>95</sup> 鍾梅音，〈回憶故居〉，《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136。

<sup>96</sup> 鍾梅音，〈回憶故居〉，《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 年 4 月再版），頁 137。

作為宿舍。從那時起，我的「心靈之窗」被遮住了，而且因為是員工宿舍，每幢只有廿幾建坪的樓房能夠擠上三家人——樓上一家，樓下一家，院內塑膠屋頂的違章建築裏還塞了一家……又因員工有日班夜班之分，孩子們的休息時間也跟着反常<sup>97</sup>

鍾梅音在〈回憶故居〉一文中隱約透露了她的故居南京公寓屋外的那一片綠地，本來是都市計劃藍圖中所設計提供給人們休閒，以及活動空間的公園預定地，卻被「變更」了。而在那公園預定地上頭蓋好的公寓高樓是供員工居住之用，空間設計也被切割地頗為狹小，住戶所居住空間就顯得相當擁擠不堪，甚至違章建築內還住了一戶人家。員工上班時間有早、晚班，因此，有的住戶孩子的作息還得日夜顛倒地配合父母的工作時間，鍾梅音看了也是很心疼這些孩子。

透過鍾梅音的文字紀錄，使我們可窺見臺灣六〇年代現代化過程中，普羅大眾的公寓生活縮影，生活空間擁擠、居住環境髒亂、空氣品質污濁，人們在都市討生活的權衡與犧牲。

當時人們對於住在公寓的生活到底有些怎麼樣的感受呢？葉慶炳在 1977 年 4 月 19 日於《中華副刊》上發表了〈公寓生涯〉，文中也可呼應鍾梅音的說法，值得參考，當時發表此文時，葉慶炳已經住了十年公寓，他回憶道：「十年前剛遷入學校新蓋成的公寓宿舍三樓，初嘗公寓生涯，心裏有說不出的興奮。潔白的牆壁，寬大的壁櫥，開窗可以遠眺，到陽臺可以做體操，在在都逗人喜歡。」<sup>98</sup>然而，過沒幾天，住在公寓的新鮮感都還未消失前，他就覺察到公寓生活的缺點。他越來越覺得公寓不是理想的居住環境。公寓的設計、建造的技術、人們的生活習性、道德觀念的缺乏等，這些都在在顯示人們還沒準備好進入這樣的現代公寓生活。葉慶炳文中舉例說明，他提到了供水的問題、鄰居養狗的問題等，並且直言：

一般公寓談不上什麼隔音設備，而住戶多數擁有收音機、電視機、洗衣機，甚至冷暖氣機，機機有聲，往往擾得左鄰右舍不得安寧。所以住公寓是對個人修養的

<sup>97</sup> 鍾梅音，〈回憶故居〉，《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34~135。

<sup>98</sup> 葉慶炳，〈公寓生涯〉，《文學的臺北》（臺北市：洪範，1980年5月初版），頁91。

一種考驗，修養差的莫住公寓。<sup>99</sup>

鍾梅音認為人們需要建立及培養新的觀念，進入現代社會，住進公寓，我們的教育需要教會人們知道什麼是公共道德，尊重他人耳根清靜的自由，她認為：

公寓住宅確有不少可取之處，譬如省力——主婦永遠在平面上工作，不必像日式住宅那樣上下迴旋。即使住在四層樓上，只要有冰箱，三四天不下樓也不覺有何不便。而且耗子芳踪止於陽臺，不能進屋，因為水泥鋼筋建築，無隙可乘。它所以給人上海「衙堂房子」的感覺，只因巷街太窄與住戶流品之雜，這種流品不是以地位和財富區分，而是以教育和行為區別。……總之，公寓住宅如果令人不太滿意，其咎不在公寓本身，而在使用的人。<sup>100</sup>

當時人們的種種適應不良，鍾梅音曾直言批評，對於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居住型態，或許住戶自身也得多努力：「公寓住宅根本不是中國的文化，要住公寓，就不得不放棄若干『中國人的生活』。但如中國人真能把『生活過得又衛生、又方便、又舒適、又不妨礙市容』還須賴住戶自己的振作、自愛。」<sup>101</sup>

集合式住宅對中國人來說，本就不是中國土地上生成的，有適應上的問題，那是現代工商業社會，屬於一種新的西式建築類型，這樣西方國家的工業社會形態下所形成的新式建築，移植到臺灣來，事實上，也產生了相當多的缺失，包括缺乏專業且整體的都市計畫、營造工程的技術、建造的經費、相關的法令條文、空間規劃設計及配套措施、坪數大小等樣樣都存在著大小問題，其中，有個相當大的缺失是面積規劃的問題，造成公寓生活空間的壓縮，使得很多國人難以適應。1975年5月號《房屋市場月刊》的評論值得參考，引文如下：

目前，臺北市平均每戶人口將近五人，而根據經設會都市計劃小組的研究，認為在符合國情的情況下，每一個人和家庭中的居住空間，至少應該有十二·八平方公尺（約四坪）。換句話說，一般五口之家，至少要有廿坪以上的居住面積。

<sup>99</sup> 葉慶炳，〈公寓生涯〉，《文學的臺北》（臺北市：洪範，1980年5月初版），頁94。

<sup>100</sup> 鍾梅音，〈公寓生活與打牌〉，《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154。

<sup>101</sup> 鍾梅音，〈理髮師的梳子〉，《摘星文選》（臺北市：三民，1969年4月再版），頁32。

但政府這幾年所興建的國民住宅或平價住宅，每每為了多容納幾戶人家，把原本應該是二、三十坪的居住空間，分割成八坪、十坪、十二坪等超小型的「國民住宅」，根本不敷生活之需要。<sup>102</sup>

臺灣社會隨著時空的推演，逐漸也轉變成工商業社會型態，許多人成為分工細緻化後的螺絲釘，一成不變的單調生活，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出了工廠，下了班，回到公寓大樓，生活在那狹窄的居住空間裡，鍾梅音比喻說那好似鴿籠的家，把人們生活空間、想像力都給限制住了，「住在那鴿籠裏，似乎除了看電視，也沒有更好的消遣。」<sup>103</sup>，人們下班後，回到家，將鐵門一關，工作一日後，紓解壓力的方法常是把電視轉開，遙控器握在手上，思緒時間都投注在電視節目上，享受著聲光娛樂效果，連廣告詞都能朗朗上口地整晚盯著那機器盒子看，看得兩眼無神，然後累了睡覺。日復一日，週復一週，年復一年，過著這般忙、盲、茫的現代化生活。

創造力是需要活動空間的，而且心靈需要休息，正如我們不能總是讓胃袋塞滿——何況這些食物幾乎全是辣椒。照這樣下去，一個年輕人奮鬥了半輩子，即使已成百萬富翁（假如他的目標不過如此），若他的欣賞力只止於螢光幕上那些打鬥場面和愛情老套，而無感於春花的燦爛，秋林的蕭疏，樹梢的風聲，海洋的波濤，那麼，他仍只能算是人的原料。<sup>104</sup>

當時除了看電視作為公寓生活方便的消遣以外，或有些人投入另一戰場，幾天幾夜陷於麻將當中無法自拔，鍾梅音感慨地說：「我不大能欣賞用雀戰和電視去填滿人生，也不能預料在公寓裏長大的孩子會有甚麼樣的影響。」<sup>105</sup>，葉慶炳也說：「公寓住戶的孩子是不幸的，再多的玩具也補償不了孩子被禁閉在『空中樓閣』的損失。想想自己小時候在老家大院子裏玩泥巴、捉蟋蟀的樂趣，我不禁對兩個孩子感到歉然。」<sup>106</sup>，孩子受限

---

<sup>102</sup> 唐學斌等著，〈國民住宅設計應考慮的質與量〉，《國民住宅問題論叢》（台北市：北屋，1978年），頁138~139。

<sup>103</sup> 鍾梅音，〈夢與希望〉，《夢與希望》（臺北市：三民，1969年2月），頁5。

<sup>104</sup> 鍾梅音，〈夢與希望〉，《夢與希望》（臺北市：三民，1969年2月），頁5。

<sup>105</sup> 鍾梅音，〈夢與希望〉，《夢與希望》（臺北市：三民，1969年2月），頁6~7。

<sup>106</sup> 葉慶炳，〈公寓生涯〉，《文學的臺北》（臺北市：洪範，1980年5月初版），頁94。



在這活動範圍小的公寓生活空間中，大人們則為了生活整天忙、盲、茫地過著，於是寄託在方便消遣的電視節目中，投身於麻將遊戲中，然而，賭博會成癮，電視螢光幕上刺激的打鬥畫面，以及愛得你死我活的老套劇情，讓人麻木無感那自然的美麗，這些都市工商業生活方式，讓鍾梅音不禁憂心說：

晚飯以後的閒暇都被填滿，人們沒有時間思想，漸漸地也懶得思想，每天只忙着工作，然後忙着吃飯，然後忙着看電視，各種節目包括風濕痛和心臟病的賣藥廣告一同「照單全收」不誤，第二天起來仍是第一天的翻版，永遠去為分期付款的物質享受作奴隸。<sup>107</sup>

鍾梅音看到了人們的茫然，單調的生活，貢獻僅是螺絲釘般的功能，鳥籠似的活動空間，電視的確在平淡無奇的日子中，提供了極佳的聲光娛樂效果，麻將也暫時地讓人集中精神，忘卻煩惱，但她試圖提醒人們看看自然的存在，聞聞花香，聽聽四季變化中的美麗而動人的聲音，「春花的燦爛，秋林的蕭疏，樹梢的風聲，海洋的波濤」<sup>108</sup>感覺自然的脈動，自然的力量能醫治受傷人們的心靈，重新賦予人們生命力的，她因宿疾裹創而戰的人生，依舊充滿著正面能量，拼命活著，努力生活，專注學習，擁抱自然，而且不斷地從事筆耕，在流離失所茫然失措的五、六〇年代中安撫著人們的心靈，發揮了柔性細水涓滴般的影響，透過抒情散文書寫與讀者溝通交流，鍾梅音文中常透露出愛的力量，並衷心祝福人們和她愛的這塊自由土地。摘錄她的祝福並作為本章的結尾：

願我們仍能飛越空間的藩籬，保持時間的空隙，為自己留下一片可以讓心智自由活動的土地，這土地將載滿著夢與希望。<sup>109</sup>

<sup>107</sup> 鍾梅音，〈夢與希望〉，《夢與希望》（臺北市：三民，1969年2月），頁5。

<sup>108</sup> 同前註，頁5。

<sup>109</sup> 鍾梅音，〈夢與希望〉，《夢與希望》（臺北市：三民，1969年2月），頁6~7。



## 第五章 結論

五〇年代臺灣文壇常被概括為反共文學，有其形成的歷史背景與諸多原因，開出的花朵在後來的評價上是白色且荒涼。然而女性抒情散文多少為其注入了一些養分，開始散發出些許的香氣。隨著政府渡海來臺的大批軍民，身家性命與國民政府休戚與共，生成出彼此為生命共同體的國族意識。許多公務人員眷屬也紛紛加入婦女團體，配合著政府官方政策，應是極其自然的現象。主婦作家鍾梅音也不例外，她不但在危急時刻參與前線勞軍、譜曲、廣播，亦加入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積極地在各大報章雜誌發表作品。她的文章似乎流露出發自內心的反共意識，相信領導人的口號並支持政府的文藝政策。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中，這樣的心境也能被理解。而她有更多的作品書寫在地情感，由流亡意識而至移民文學，在臺灣營造了屬於她的家園，相夫教子的傳統主婦。先生身邊蘭花般的賢妻，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書寫著日常生活。同時也為自己開闢了一塊抒發已見、滋潤心靈的寫作場域。發表作品多，尤其是散文，集結出版的散文集有 18 本之多。最後生病期間，甚至經由先生的手，於 1983 年 5 月 16 日在美國《世界日報》發表了最後一篇散文〈何處是歸程〉，令人感佩其「裹傷而戰」的精神。

時過境遷，經歲月洗鍊，當時擁有眾多讀者的作家，不斷有報刊雜誌邀稿出版的鍾梅音也逐漸塵封而讓世人給淡忘了。圖書館館藏的絕版書，已殘破不堪，乏人問津，借閱者多半為研究人士。在現實的商業考量下，再出版的機會應不高。分析其文本，鍾梅音所發表的經常性平台為報紙的副刊，內容有她對時事的看法及省思、批評與建議。另外曾經主持過藝文節目的鍾梅音也針對藝文消息寫了許多專業的評論。可見鍾梅音，不但讀者多且具有影響力。然而當時她所評論的藝術家隨著個人藝術成就浮沈最終退場，至於其評論也不再受到關注。因為對一般民眾來說，新聞性的資訊，過了時效就失去了閱讀價值。其次是她的立場和思想，不一定再符合現在讀者的觀念及消費大眾的閱讀趣味，例如，她針對改善女性教育的提議是應該給女性大量的家事訓練，雖說鍾梅音所反映的是當時社會並未提供女性好的就業機會，但現今女性就業人口比例已和過去環境不同，雖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在這逐漸爭取兩性平權的社會，鍾梅音的反思及建議則

難以被採納。

然而就研究者來說，鍾梅音的散文相當有研究開發的領域。針對上述兩點，第一，副刊上所記錄下的，正好提供了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知識女性對這樣的事又有怎樣的回應，不論是社會氛圍、官方宣導及女性視角等都是很好的研究素材。第二，女性必須學做家事，即切實地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環境、人們的價值觀及權力的分配等，縱使給予女性和男性同樣的科目教育，但卻未提供就業的位置，所以女性最終得面對的還是以家務為主的生活。援用鍾梅音文友艾雯的一段話，「主婦們成年累月周旋在單調瑣碎的家務中，起膩、起煩……連早日所學的也因為沒有機會致用或溫習而生疏淡忘了一一沒有機會，是的，有很多事情和願望都被機會限制了。」<sup>1</sup>所以亦被繁瑣家務所纏的鍾梅音書寫了聘用許多臺籍家務勞動者的甘苦談，這又別於男性作家所能處理的在地化題材。這些著實提供研究人員更多值得切入的觀察點。

鍾梅音認為既然社會現實是如此，女性婚後得承擔起該有的家務管理之責，因此就得提前教育她們。然而，相對於鍾梅音的處世觀，一九四九年，正值二戰後的西方世界，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巴黎出版的《第二性》。西蒙·德·波娃在此書論述了在這父權文化下，兩性皆受綑綁，如何解套，在這本書的結語中，作者提出了建言，她說：「小女孩要是從小就和她的哥哥弟弟受同樣的教育、玩同樣的遊戲，對她的要求、獎懲、讓她享有的自由、對她許諾的未來都和她哥哥弟弟一樣，而且身邊的男男女女都享有平等的地位，那麼『閹割情節』、『戀母情結』的意義就會和現在完全不同。只要母親和父親一樣承擔起物質上、精神上的責任，她也能和父親一樣長久享有威望；小女孩就會覺得自己是置身於兩性世界中，而不是處於男性世界裡」<sup>2</sup>西蒙·德·波娃的建言，即使到今日還尚能實現，甚至還有重重的困難，但是，不論鍾梅音或是西蒙·德·波娃等，東、西方女性都試圖提出願景，而兩性之間彼此能和諧共處的社會，雖然還難以達成，但卻已是可接受的概念，或許能一步一步地邁向兩性關係平衡協調的方向前進。

終身被氣喘宿疾所困的鍾梅音，書寫了相當多有關病與人生、理想與現實中的掙扎與妥協，有不同於一般健康身體的人所能提煉出的領悟。對於人生的正面思考，不斷地

<sup>1</sup> 艾雯，〈生活小品·再版小言〉，《艾雯全集·散文2》（臺北市：文訊雜誌社，2012.08），頁111。

<sup>2</sup>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邱瑞鑾譯，〈結語〉，《第二性》（臺北市：貓頭鷹出版，2013年10月），頁1180。

與病痛對抗，女性及母性的強韌意志在她的文中處處可見。她跟先生之間鶼鶼情深及對孩子的關愛與照顧，以家為題材寫下清新而雋永的小品散文，就如同讀朱自清描述父愛的〈背影〉一樣，不受限於時空，仍感人至深，耐人咀嚼。

鍾梅音不論是書寫日常瑣事，或是遊記，善於運用其文筆，清楚地描繪、捕捉，當時外省移民的那種面臨離散困境的內心掙扎，壓抑心思，窒息的苦悶境地，同時又有為適應環境而激發出的屬於人的精神意志，當時的社會氛圍，一再延宕的反攻政策，也使得有些外省族群在茫然之下，轉而投身於麻將的現象，鍾梅音也將此紀錄了下來。閱讀鍾梅音的文本，也可見其透過外省人眼光下，是用怎麼樣的角度投射於臺灣。由於鍾梅音持續不斷地寫，也把工業化，都會化，社會轉型下，人們逐漸脫離原本的生活型態，比方電視帶來的影響，社會住宅公寓大樓對於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等，都提供了很好的史料。女性在這樣的大時代裡適應環境的能力也透過鍾梅音的筆下展現出來。鍾梅音的人生已成功地畫出自己所追求的一個圓。

本論文試圖從歷史脈絡及文學史觀點整理出更有溫度、味道的，屬於人的氣息。關注的是鍾梅音在那個殘破的年代所拼拾出的生命景象，一個飽受病痛的女性，如何適應，又怎樣安頓，從而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家園，並對於官方的文藝路線及方針，觀察出其實女性作家的配合度是時而接近，又時而疏離的，用女性特質拓展出發言的空間。在文學史概括性地認定為反共懷鄉文學的五〇年代，梳理出鍾梅音的生命圖像，透過她的書寫來理解五〇年代的複雜，及所刻畫出的時代印記。筆者期望能藉著本研究來引起對鍾梅音有更多的關注及多元的評價。



## 參考書目

### 一、文本（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 王琰如，《我在利比亞》，臺北市：三民書局，1969年9月。
- 王文漪編選，《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台北市：天視，1979年8月初版。
- 艾雯，《艾雯全集·散文2》，臺北市：文訊雜誌社，2012年8月。
- 言曦等著，《我的另一半（第一集）》，臺北市：中華日報社，1978年3月五版。
- 徐鍾珮，《英倫歸來》，臺北市：重光文藝，1954年，台灣重版。
- 張裘麗，《我在尼羅河上游》，臺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69年2月。
- 葉慶炳，〈公寓生涯〉，《文學的臺北》，臺北市：洪範，1980年5月，初版。
- 鍾梅音，《冷泉心影》，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51年。
- 鍾梅音，《母親的憶念》，臺北：復興書局，1954年。
- 鍾梅音，《海濱隨筆》，臺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
- 鍾梅音，《遲開的茉莉》，臺北：三民書局，1957年。
- 鍾梅音，《小樓聽雨集》，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58年。
- 鍾梅音，《塞上行》，臺中：光啟出版社，1964年。
- 鍾梅音，《十月小陽春》，臺北：文星書店，1964年。
- 鍾梅音，《海天遊蹤（第一集）》，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6年。
- 鍾梅音，《海天遊蹤（第二集）》，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6年。
- 鍾梅音，《摘星文選》，臺北：三民書局，1967年。
- 鍾梅音，《我祇追求一個「圓」》，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
- 鍾梅音，《夢與希望》，臺北：三民書局，1969年。
- 鍾梅音，《風樓隨筆》，臺北：三民書局，1969年。
- 鍾梅音，《蘭苑隨筆》，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
- 鍾梅音，《啼笑人間》，香港：小草出版社，1972年。
- 鍾梅音，《春天是你們的》，臺北：三民書局，1973年。
- 鍾梅音，《旅人的故事》，臺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

鍾梅音，《昨日在湄江》，香港：立兩公司，1975年。

鍾梅音，《這就是春天》，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年。

鍾梅音，《天堂歲月》，臺北：皇冠出版社，1980年。

## 二、專書（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王鈺婷，《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2年12月，初版。

王鈺婷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31，艾雯》，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11月，初版。

王鈺婷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4，鍾梅音》，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初版。

司徒衛，《五十年代文學評論》，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9年7月，初版。

朱嘉雯，《追尋，漂泊的靈魂：女作家的離散文學》，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9年2月，一版。

吳鄭重，《廚房之舞：身體和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臺北市：聯經，2010年11月，初版。

林香伶，《南社文學綜論》，臺北市：里仁，2009年10月，初版。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臺北市：遊目族文化出版，2000年5月，初版。

林淇養，《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市：麥田，2001年。

范銘如，《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市：麥田，2008年8月。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年。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台北市：聯經，2014年6月，初版。

唐學斌等著，《國民住宅問題論叢》，台北市：北屋，1978年。

孫如陵，《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臺北市：文史哲，2008年6月，初版。

徐學，《地母與瘋婦：台灣女性半世紀》，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1年8月，一版。

張秀雄，《論民生主義國民住宅之建設》，臺北市：臺灣商務，1980年8月。



- 張誦聖，《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市：麥田出版，2000年10月。
- 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市：麥田出版，2006年2月，初版。
- 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臺北市：麥田出版，2007年4月，初版。
- 陶英惠，《民國教育學術史論集》，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8年。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12月，修訂二版。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市：麥田，2007年12月，初版。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7年10月20日，再版。
-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臺北市：巨流，2001年11月。
- 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市：遠見天下，2014年1月，第二版。
- 趙友培，《文藝書簡》，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52年3月，初版。
- 劉心皇編著，《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台北市：天視出版，1981年8月，初版。
- 鄭貞銘，《百年報人3：一代新聞宗師》，臺北市：遠流，2001年9月，初版。
- 應鳳凰，《文學風華—戰後初期13著名女作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5月，一版。
- 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7，陳紀滢》，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初版。
- 應鳳凰，《文學起步101：101位作家的第一本書》，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6年12月，初版。
- 應鳳凰，《畫說1950年代台灣文學》，新北市：遠景出版，2017年2月。

### 三、學位論文（依發表時間排序）

- 曾鈴月，《女性、鄉土與國族—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三位女作家小說作品之女性書寫及其社會意義初探》，（私立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1月）。
- 張詩宜，《反共文學之外的另類書寫——以五、六〇年代三位女作家為分析對象》（台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 黃瑞真，《五〇年代的孟瑤》（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6年）。
- 王彥玲，《鍾梅音散文題材研究》（新北市：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6月）。
- 邱吉汝，《鍾梅音及其散文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7月）。
- 李雅情，《徐鍾珮、鍾梅音遊記散文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 許婉婷，《五〇年代女作家的異鄉寫作——林海音、徐鍾珮、鍾梅音、張漱菡與艾雯》（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12月）。
- 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2月）。

#### 四、翻譯書

-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邱瑞鑾譯：《第二性》，臺北市：貓頭鷹出版，2013年10月，初版。

#### 五、期刊論文與報紙（依發表時間排序）

- 王文漪，〈懷思梅音〉，《中央日報》第12版，1984年2月18日。
- 陳紀滢，〈憶梅音〉，《傳記文學》第44卷第3期，1984年3月。
- 鐘麗慧，〈鍾梅音卷（一）〉，《文訊雜誌（雙月刊）》第32期，1987年10月。
- 鐘麗慧，〈鍾梅音卷（四）〉，《文訊雜誌（雙月刊）》第35期，1988年4月。
- 衣若芬，〈文筆·譯筆·畫筆——鍾梅音在南洋〉，《華文文學》第127期，2015年2月。

#### 六、網路資料

1. 應鳳凰，〈【作家第一本書】53 鍾梅音／冷泉心影〉，《人間福報》，2012年12月31日。  
<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288740>，查詢日期：2018年10月20日。
2. 令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令（1949-02）。[臺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4f/b6/0d.html>，查詢日期：2018年7月19日。
3. 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資料，將移民署組織演變分為四個時期。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5388/7169/15869/>，查詢日期：2019年1月2日。
4. 三民網路書店在《我在利比亞》介紹文中寫道：「環遊世界八十天」，畢竟是走馬看花的。王琰如女士旅居非洲好幾年，寫的是非洲數十個國家極北的一國——利比亞王國，當然深刻，實感多了。  
<http://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0091461>，查詢日期：2019年1月2日。
5. 張明（姚葳）曾獨資創辦《今日婦女》半月刊，有今日婦女半月刊社（臺北）曾出版《今日婦女叢書》。  
[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934](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934)，查詢日期：2019年1月12日。
6. 謝文瑄，〈搶救中華兒童叢書 盼設典藏館〉，《中時電子報》，2013年7月30日。  
台灣省教育廳曾於民國五十四年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推動「兒童讀物出版計畫」，由台灣書店出版《中華兒童叢書》，供全國國小學童閱讀。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730000553-260107>，查詢日期：2019年2月10日。



# 附錄 1

鍾梅音第一本散文集《冷泉心影》各篇篇名、內容概述及搜尋關鍵字一覽表

書名	1. 《冷泉心影》： 1951 年 7 月由重光文藝出版社出版 選輯 1949 年至 1951 年間所寫的 30 篇文章		
序號	篇名	內容概述	關鍵字
	陳紀滢先生序	陳紀滢為《冷泉心影》作序 介紹此書為： 感情迸流下產生的作品 故事全是人人可體驗的生活 平凡生活反應著真實的感情 真實感情又呼喚出時代吼聲	自由中國文壇 女作家 身邊瑣事
	自序	鍾梅音為冷泉心影自序 說明寫作來由 書名贈與蘇澳名勝——冷泉	鄉居無俚 書寫 對知己傾訴 蘇澳
1.	父親的悲哀	鍾梅音細訴自己對父親的愛 與怨，也悔恨自己曾對父親 的再娶表現出的不諒解行徑	父親再娶 棄婦 姨太太 重慶
2.	未寄的信札	鍾梅音寫了一封信欲回答她 的二妹一些做人處事及男女 相處的建議，但她認為自己 尚未將這些事釐清，因此未 將信寄出。	二妹 宿疾 男女關係 心靈富足 臺灣海島氣候 蘇澳
3.	有朋自遠方來	紀錄臺北友人來訪	知己 鄉居生活 臺灣

4.	雞的故事	童話故事，敘述一女主人為過節買了一隻小母雞，後來無意間發現鄰家公雞安慰自家母雞說雞只要能下蛋就能保命的故事	夫妻關係 生兒育女
5.	鄉居閑情	寫鄉間美景與生活的悠閒	碧藍如黛的海 蒼翠如濯的山 忙碌的人們 鄉間的美與閒
6.	再婚	寫在上海工作時所認識的一位湖南女同事的一段婚姻波折	緊張婆媳關係 婚變／職場 耳語 祖孫情 上海
7.	颱風	寫病弱住院卻遭遇到來臺第一場颱風時的惶恐不安	颱風 住院 孤單 臺灣東北沿海
8.	十月小陽春	寫入秋後，久別的太陽，和煦的十月小陽春，帶給人們春天會再來的盼望	閏月 故鄉／種麥 這裡／捕魚 挺起腰桿過冬 勇敢
9.	給	寫晚秋撩起秋思，盼人們珍惜盛年的時光，也寫欣慰夫妻能廝守相伴	夫妻之情 人生旅途上的 伴侶 島上的晚秋
10.	賣蛋記	寫家中鴨生產力旺盛，生產的最高紀錄達到每天七個蛋，只好想辦法料理，甚至做蛋的買賣	料理鴨蛋 鴨蛋買賣 生意人的精明
11.	我的生活	寫生活要有秩序，居家環境要打掃清潔，但別忙得像機器，收拾乾淨地像樣品屋	亞熱帶臺灣夜 蟲鳴聲和雨聲 寫作的好時光

12.	阿蘭走了以後	寫辭退下女阿蘭的緣由及好的下女難尋	下女 傭人的現實
13.	雨	寫雨令人沉思反省，鍾梅音說有騷人墨客將雨比做傷感與悲哀的象徵，更有詩道出了亡國之恨，在遠離大陸，投向寶島而居的今日讀來，感到切膚之痛。	細雨朦朧 隱秘之美 故鄉 詩的意境 春雨催生綠意 懷鄉 在臺雨中沉思
14.	十年	寫請舊情人將自己忘了吧，不要再打探她的消息，愛情不能保證永恆，時間卻能種下感情種子，讓夫妻雙方在相處的過程中，逐漸互相瞭解，進而感情能開花結果	舊情人 戀人與家族間的矛盾 愛情 時間 瞭解 夫妻相處
15.	弟弟	寫弟弟的興趣	憶舊 海濱／臺北 臺灣廣播電台
16.	飯桌上的童話	藉由飯桌上菜餚的對話，諷刺酒家等風化場所的骯髒	酒家
17.	遙寄	寫給二妹的信，希望很快能和家人團聚	重慶 赤禍／鐵幕 親友隔絕
18.	吾兒	寫信給兒子，在春節期間買了本貼像簿，祝福兒子成長茁壯	大陸沈淪 異鄉作客 鄉愁
19.	友情	記臺北訪友人事宜，拜訪了「婦女與家庭」編輯武小姐；中央日報副刊茹茵先生、孫先生；琰如女士；時代婦女社許社長；新生報編	副刊寫稿 文友 異鄉

		輯馮先生；「兒童週刊」編輯陳約小姐；最後特別寫了想去拜訪海音女士，可惜漏記了她的通訊地址	
20.	無題	寫在臺北僅逗留五日，竟夢到蘇澳的家，及人在大陸的大女兒小安，兩處鄉愁讓鍾梅音歸心如箭急著想回蘇澳家	臺北 兩處鄉愁 宜蘭縣快車及風景 三貂嶺 龜山 下女阿菊
21.	家鄉味	記孩子從臺北帶回豆腐干給鍾梅音，使她回想起家鄉土產	家鄉味 重慶／上海 人民政府 鄉愁
22.	閒話臺灣	寫坐中興輪初抵臺灣基隆的美好印象，雖對基隆住所經濟的設計有些失望，然而卻漸漸地習慣了，在住所對面的山上感受到了鳥語花香，美好的風景，豐饒的物產，讓鍾梅音說如何教人不喜愛臺灣呢？然而，對於有些本省同胞吃不起水果，鍾梅音希望政府能更造福本省同胞	基隆 臺灣美麗風光 豐饒物產 光復節 赤焰漫天 三七五減租 農、漁、鹽民 吃不起水果 剝削階級
23.	人間有味是清歡	寫鍾梅音十歲生日收到父親送的一套國畫，鍾梅音非常喜愛國畫的空靈情趣，以及恬適，悠閑的畫風，並記小時常與父親賞畫，論畫，在這樣的長久熏染陶冶中，養成了鍾梅音澹泊寧靜性格，使她能從容不迫地度過物質上的貧困，並能安於並樂於	十歲生日禮物 國畫／家學 任伯年獻歲圖 父女情誼 澹泊寧靜性格 臺灣小鎮



		在臺的鄉村生活	
24.	瓊尼	擬人化故事，小狗瓊尼的視角來描繪一家和樂景象，最後收尾時，瓊尼提到自己的長相漂亮，常被比作像共產黨的靠攏份子，牠深感冤枉並抗議地表示，自己雖然有張饞嘴，就好似那些靠攏份子，但自己的忠誠之心，和真摯的愛，卻是那些靠攏份子所缺少的，所以牠要人們別侮辱牠。	養狗 看門 饞嘴 共產黨 靠攏份子 真摯／忠誠 下女阿菊
25.	阿冬的小情人	同學的弟弟阿冬，是個聰明、活潑卻不太愛念書的 14 歲孩子，當時正值上海學潮打著反飢餓，反迫害的口號，鍾梅音擔心孩子有時不滿現實，且容易被人煽動，於是把阿冬從學校接了回來，留在家中一個禮拜。後來，阿冬和他的姐姐比鍾梅音先到臺灣，並且急著要找工作，而鍾梅音幾次想勸阿冬應該設法充實自己而非忙著賺錢，然而，後來阿冬因為認識一個在陸軍醫院當護士的女孩，鍾梅音深感慶幸阿冬認識這麼個女孩，而且阿冬在生命裡燃起了愛正義，愛自由的火炬，報名從軍去了。	上海學潮 年輕人 有時不滿現實 易受人煽動 陸軍醫院護士 離鄉背井 孤獨伶仃 苦悶 愛正義 愛自由 從軍 男女戀愛 力量 臺灣 前方受傷健兒

26.	遙寄我父	得知曾做過國民政府官吏的父親被共產黨逮捕了後，鍾梅音極為驚恐，祈禱父親能無恙平安。 在臺灣說要到草山看櫻花，便回憶起與父親在南京玄武湖看櫻花的往事	靠筆桿賺錢 父親遭捕 共產黨／赤禍 禍國殃民 國家多難 草山／南京 憶父
27.	嫂嫂	寫嫂嫂在故鄉做了五年的媳婦後，由哥哥接到關外去組織小家庭，而後鍾梅音再見她時，嫂嫂已兒女繞膝，忙得青春都枯萎了，所幸子女成材，嫂嫂把一切最好的都奉獻與她的丈夫兒女，以及周邊的人，鍾梅音很是敬佩。	小家庭制度 憶親友 女人婚後 犧牲奉獻
28.	礁溪半日	寫到宜蘭線上的礁溪作半日遊，訪礁溪邊的蜜柑菓園，以及到鐵路招待所沐溫泉。愉快又滿足的半日遊	遊記 宜蘭礁溪 蜜柑 溫泉
29.	孩子的朋友	孩子的朋友是一位在馬隊裏的大兵，灌輸他許多智識與國家觀念，那位大兵說待秋天到來，就要反攻大陸。	反攻大陸 戰爭 孩子的國家觀念
30.	冷泉	鍾梅音記原本她對冷泉沐浴處感到有些失望，然而後來造訪了利用冷泉製造的白鶴汽水廠，進而了解冷泉的水質，及附近的自然景觀，便喜愛上樸實寧靜的冷泉	冷泉 冷泉橋 冷泉鄉 白鶴汽水 知音

## 附錄 2

鍾梅音在臺書寫 10 本散文集：1951 年《冷泉心影》（參見附錄 1）、1954 年《母親的憶念》、1954 年《海濱隨筆》、1958 年《小樓聽雨集》、1964 年《塞上行》、1964 年《十月小陽春》、1967 年《摘星文選》、1968 年《我祇追求一個「圓」》、1969 年《夢與希望》、1969 年《風樓隨筆》，各篇篇名一覽表

書名 序號	2. 《母親的憶念》：1954 年 4 月由 復興書局 出版 選輯 1950 年至 1953 年間所寫的 26 篇文章 篇名
	蘇雪林先生序 （1954 年 4 月 17 日於臺北師院）
1.	夾竹桃的新生 （1950 年 11 月 16 日載「暢流半月刊」）
2.	滇西憶舊 （1950 年 9 月 1 日載「暢流半月刊」）
3.	基隆一夕 （1951 年 5 月 28 日載「中國一周」）
4.	鐘樓 （1952 年 7 月 5 日載「文藝報旬刊」）
5.	蘇花之旅 （1951 年 9 月 1 日載「暢流半月刊」）
6.	母親的憶念 （1952 年 7 月 7 日載「中央日報副刊」）
7.	阿土哥 （1952 年 2 月 3 日載「中華日報文藝版」）
8.	表舅 （1952 年 4 月 30 日載「中華日報副刊」）
9.	憑君傳語報平安（1952 年 3 月 23 日載「散文佳作選」）
10.	我的手 （1951 年 7 月 10 日載「中央日報副刊」）
11.	醫手記 （1952 年 1 月 5 日載「國語日報週末版」）

12.	某夜	(1951年1月13日載「中華日報副刊」)
13.	兒童夏令營	(1952年8月28日載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
14.	母子之間	(1953年5月1日載「中華婦女月刊」)
15.	畫像記	(1951年6月13日載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
16.	畫裏乾坤	(1953年2月1日載「讀書半月刊」)
17.	病中閑情	(1952年4月載「中國語文月刊」)
18.	年終獎金	(1952年3月28日載「中華日報副刊」)
19.	煤渣盆景	(1950年10月27日載「中央日報副刊」)
20.	春天的小花	(1951年4月1日載自由談「童年彩色版專輯」)
21.	養鼠記	(1953年11月3日載「中央日報副刊」)
22.	喜訊	(1952年12月1日載「國風半月刊」)
23.	祝福	(1951年4月18日載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
24.	拜拜紀盛	(1951年9月5日載「中央日報副刊」)
25.	小白流浪記	(1951年10月1日載新生報「兒童之頁」)
26.	我的寫作生活	(1952年12月31日載「自由中國女作家寫作生活」)
	作者附記	

書名	3. 《海濱隨筆》： 1954 年 11 月由 大華晚報社 出版 收錄 1949 年至 1954 年間所寫的 96 篇文章
序號	篇名
	海濱之夜（代序）
	《大華晚報》「瓜棚豆架閒話」專欄
1.	女人與高等教育
2.	半瓶醋
3.	統統滾開
4.	木炭簍子
5.	血氣之剛
6.	記憶的捉狹
7.	三過家門而不入
8.	跳舞
9.	斤斤較量
10.	鞠躬盡瘁
11.	高調的悲哀
12.	勞軍
13.	關於平劇
14.	耳朵開關

15.	答默冰先生
16.	音樂走向普羅
17.	朋友不必太瞭解論
18.	先要接收人心
19.	面子
20.	弟弟的小天地
21.	我愛唐納
22.	幻想曲
23.	牛步
24.	背道而馳
25.	研究室的喬遷
	以上文章選錄自 1950 年《大華晚報》「瓜棚豆架閑話」專欄
26.	七七聽廣播
27.	我們需要的聲音
28.	軍歌不宜輕鬆
29.	論修養
30.	肉食
31.	自尊心
32.	我對懼內的想法

33.	愛情的泥淖
34.	女人不是鋼鐵鑄的
35.	夜闌人語
36.	睡眠
37.	論宣傳
38.	再論宣傳
39.	喜聞中醫科學化
40.	克難的演出
41.	云云
42.	關於喊口號
43.	工筆與漫畫
44.	文學語言的再創造讀後
45.	漫談詩歌
46.	我是毛澤東的女秘書
47.	出乎意外的故事
48.	我看傻常順兒
49.	關於愛與船
50.	少女狂想曲
51.	溫莎公爵的悲劇

52.	悔罪女
53.	茹茵散文集讀後
54.	珍妮畫像
55.	談今後的女子教育
56.	賢妻良母需要智慧
57.	漫談健康與教育
	《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每週漫談」專欄
58.	祝壽
59.	運動
60.	理智
61.	背書
62.	興趣
63.	理解與記憶（孟瑤作）
64.	二年後再答孟瑤（鍾梅音 1954 年 7 月 1 日寫於整理舊作時）
65.	器量
66.	私德
67.	寂寞
68.	聊天
69.	談話



70.	最後防線
71.	總務官
72.	木瓜之喻
73.	三八書感
74.	戀愛自由
75.	一部電影
76.	主人翁
77.	給新娘
78.	給新郎
79.	婆太太
80.	丈母娘
81.	大拼盤
82.	保留三分
83.	人不如禽
84.	軍事學
85.	老嬰兒
86.	含飴弄孫
87.	夫婦之間
88.	借箸代籌

89.	情之所鍾
90.	保持距離
91.	不平之鳴
92.	戀愛與事業
93.	為了下一代
94.	哀樂中年
95.	婚姻佳話
	以上文章選自 1952 年 10 月至 1953 年 9 月 《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每週漫談」專欄
96.	漂亮與美

書名	4. 《小樓聽雨集》： 1958 年 6 月由 大中國圖書公司 出版 選錄 1954 年下半年至 1958 年間所寫的 44 篇文章
序號	篇名
	自序
	第一輯（純散文）
1.	小鎮溫情
2.	母親的淚珠
3.	南遊瑣憶
4.	愛之鳥
5.	讀書之樂
6.	樓
7.	可愛的小包袱
8.	病中小記
9.	哀瓊尼
10.	福隆之遊
11.	吾家右隣
12.	勝利者
	第二輯（隨筆）
13.	詩人的畫

14.	金勤伯先生的畫
15.	白色的畫家
16.	從遊記想起
17.	「冬青樹」讀後
18.	讀「普雷姜德小說集」
19.	溫莎公爵夫人回憶錄綴語
20.	松窗憶語跋
21.	「善」與「美」的結合
22.	讀霍桑的「人面石」
23.	請帶我們再打一仗
	第三輯（說理的散文）
24.	中庸之道
25.	婚禮
26.	再談婚禮
27.	城與鄉
28.	留出空間
29.	娛樂與休閒
30.	有奴不知奴心苦
31.	美的新釋

32.	鑽石夫人
33.	勤務兵
34.	老
35.	同情
36.	漸
37.	如何消愁？
38.	誰能拯救他們？
39.	我要永結善緣
40.	說話的藝術
41.	迎接「劃時代的三八」
42.	智慧的鎖鑰
43.	寫作甘苦談
44.	放手寫去！

書名	5. 《塞上行》： 1964 年 2 月由 光啟出版社 出版 選錄 1952 年至 1963 年間所寫的 35 篇文章
序號	篇名
	散文
1.	童年
2.	今之芸娘
3.	湖畔
4.	賃屋記
5.	四十歲
6.	孩子不會永遠幼小
7.	我的童年
8.	我的中學生活
9.	寄
10.	病中祭父親
11.	父親瞑目否
12.	送病文
13.	自求多福
14.	啼笑人間
15.	異鄉人

16.	續異鄉人
17.	過河卒子
	<b>隨筆</b>
18.	新年試筆
19.	談「吃」
20.	小瀨的日記（九篇）
21.	寫給女兒（十篇）
22.	青春誠可貴
23.	現代畫的欣賞
24.	繪畫應往何處去？
25.	評「兇手」
26.	「華夏八年」讀後
	<b>遊記</b>
27.	旅途隨筆
28.	台灣橫貫公路一瞥
29.	七寶樓台棲蘭山
30.	新春遊踪
31.	板橋之春
32.	接受金門炮火洗禮

33.	戰雲瀾漫訪馬祖
34.	塞上行
35.	金門二度行



書名	6. 《十月小陽春》：1964年4月由 文星書店 出版 選錄 1949 年至 1964 年間所寫的 40 篇（舊作+新作）	
序號	篇名	
	自序	（1964年3月23日）
1.	詩人的畫	（1954年11月6日）
2.	白色的畫家	（1958年4月23日）
3.	歡樂童年	（ <u>1963</u> 年雙十節）（新作）
4.	藝術的陶冶	（ <u>1964</u> 年1月18日）（新作）
5.	評聯合彩色影展	（ <u>1964</u> 年3月6日）（新作）
6.	讀書之樂	（1955年12月1日）
7.	樓	（1956年4月21日）
8.	「松窗憶語」跋	（1957年9月）
9.	木瓜之喻	（1953年8月16日）
10.	「善」與「美」的結合	（1956年10月1日）
11.	談今後的女子教育	（1951年12月31日）
12.	漫談健康與教育	（1952年1月6日）
13.	說話的藝術	（1956年1月13日）
14.	迎接「劃時代的三八」	（1957年3月8日）
15.	智慧的鎖鑰	（1954年11月10日）

16.	珍妮的畫像	(1954年9月)
17.	悔罪女	(1952年11月16日)
18.	母親	(1952年7月7日)
19.	鄉居閑情	(1949年7月17日)
20.	礁溪半日	(1951年3月3日)
21.	十月小陽春	(1949年11月8日)
22.	嫂嫂	(1951年3月5日)
23.	冷泉	(1951年5月20日)
24.	年終獎金	(1952年3月28日)
25.	煤渣盆景	(1950年10月27日)
26.	養鼠記	(1953年11月3日)
27.	滇西憶舊	(1950年9月1日)
28.	蘇花之旅	(1951年9月1日)
29.	醫手記	(1952年1月5日)
30.	拜拜紀盛	(1951年9月5日)
31.	春天的小花	(1951年4月1日)
32.	祝福	(1951年4月18日)
33.	母子之間	(1953年5月1日)
34.	畫像記	(1951年6月13日)

35.	玩具的糾紛	(1956年5月)
36.	哀瓊尼	(1956年9月21日)
37.	福隆之遊	(1956年10月1日)
38.	南遊瑣憶	(1955年5月27日)
39.	勝利者	(1958年1月8日)
40.	電視與我	( <u>1964</u> 年3月27日)(新作)

書名 序號	7. 《摘星文選》：1967年1月由三民書局出版 選錄1964年至1966年間所寫的文章，加上 1966年10月寫的〈耳朵、素描、及其他——代序〉，以及 1959年所寫的一篇舊作〈赴馬祖途中〉，共40篇	
	篇名	
1.	耳朵、素描、及其他——代序	(1966年10月於臺北)
2.	半帆風順	(1966年2月)
3.	聰明之累	
4.	圍城之喻	
5.	襪爛怪靴	
6.	我的禱文	
7.	我們與我	
8.	仁者之勇	
9.	愛與理想	
10.	自由不可濫用	
11.	唐寶雲的哭	
12.	新年的願望	
13.	俗得可愛	
14.	從爵士談起	
15.	忙碌的首長	(1965年3月)

16.	理髮師的梳子——談理想住宅之一	
17.	中國人的生活——談理想住宅之二	(1965年9月)
18.	寫生與臨摹——談林玉山教授畫展	(1964年6月)
19.	國際兒童畫展	(1964年11月)
20.	畫的趣味——談心象畫會的作品	(1964年12月)
21.	自己的路——談王藍旅美畫展	(1965年5月)
22.	色調之美——看「師大師生聯合美展」	(1966年2月)
23.	黃君璧國畫欣賞會——兼談國畫教學	(1966年5月)
24.	從米變成酒——席德進其人其畫	(1966年9月)
25.	馬白水的水彩畫	(1966年2月)
26.	遊中山博物館	(1965年12月)
27.	赴馬祖途中	(1959年6月)
28.	穿在國外	(1964年11月)
29.	兩位德國朋友	(1964年11月)
30.	圍城之戰	(1964年11月)
31.	新居二三事	(1966年9月)
32.	回憶故居	(1966年9月)
33.	靜靜的日午	(1966年9月)
34.	大「鏟」一揮	(1965年10月)

35.	從孩子的家庭作業談起	(1965 年 10 月)
36.	公寓生活與打牌	(1966 年 2 月)
37.	天台的鬧劇	(1966 年 8 月)
38.	假使我有三百六十五元	(1966 年 9 月 6 日颱風夜)
39.	我的財富	(1965 年 10 月初稿)
40.	與造化抗爭——我與氣喘病	(1965 年 12 月)

書名 序號	8. 《我祇追求一個圓》：1968年2月由三民書局出版 選錄1963年至1968年間所寫的文章，以及 1959年8月〈神聖的試驗〉一文，共31篇	
	篇名	
	神祕的礦藏——代序	(1968年2月於泰國曼谷)
1.	訪麥克辛米倫宮	(1964年10月)
2.	兒女	(1964年9月)
3.	生活與生存——在士林中學講演	(1964年10月)
4.	夜上成功嶺	(1965年8月)
5.	臺中快遊	(1966年9月)
6.	福隆的海濱	(1965年8月)
7.	南行散記	(1967年12月)
8.	一粒種子	(1967年12月)
9.	讀「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有感	(1967年6月)
10.	「紅衛兵」與「義人」	(1966年11月)
11.	丈夫不可轉贈	(1967年5月)
12.	寂寞的一行	(1965年1月)
13.	禮帽下的兔子	(1966年10月)
14.	逆水行舟	(1966年12月)
15.	談抽象畫——兼論胡奇中作品	(1967年11月)

16.	急流勇退談創作——看劉國松作品預展	(1968年1月)
17.	神聖的試驗	(1959年8月)
18.	在廟裏	(1965年3月)
19.	美滿人生	(1965年2月)
20.	母親與子女教育——聽自己的廣播有感	(1963年6月)
21.	考執照	(1967年7月)
22.	火車之戀	(1966年9月)
23.	啊！這麼多燈	(1967年1月)
24.	希望之光	(1967年1月)
25.	自然的趣味	
26.	圓夢記	(1967年12月)
27.	艱辛又快樂的歲月——我的女兒	(1968年1月)
28.	健忘頌及其他——外二章	(1967年10月)
29.	夜窗書簡	(1967年11月)
30.	與吾兒書	(1967年9月)
31.	我祇追求一個「圓」	(1967年4月)



書名 序號	9. 《夢與希望》：1969年2月由三民書局出版 選錄1949年至1968年間所寫的28篇文章 除了〈夢與希望〉及〈「夢與希望」後記〉，皆為舊作
	篇名
1.	新年試筆 (1962年元旦)
2.	夢與希望 (1968年9月)
3.	讀書之樂 (1955年12月)
4.	樓 (1956年4月)
5.	童年 (1959年9月)
6.	今之芸娘 (1959年8月)
7.	春天的小花 (1951年4月)
8.	四十歲 (1962年元月)
9.	湖畔 (1961年2月)
10.	鄉居閑情 (1949年7月)
11.	礁溪半日 (1951年3月)
12.	十月小陽春 (1949年11月)
13.	冷泉 (1951年5月)
14.	煤渣盆景 (1950年10月)
15.	滇西憶舊 (1950年9月)
16.	蘇花之旅 (1951年9月)

17.	拜拜紀盛	(1951年9月)
18.	福隆之遊	(1956年10月)
19.	南遊瑣憶	(1955年5月)
20.	旅途隨筆	(1963年1月)
21.	臺灣橫貫公路一瞥	(1959年4月)
22.	七寶樓台棲蘭山	(1961年12月)
23.	新春遊蹤	(1963年2月)
24.	板橋之春	(1963年4月)
25.	接受金門炮火洗禮	(1958年10月22日)
26.	戰雲瀾漫訪馬祖	(1959年5月)
27.	塞上行	(1958年11月補寫於臺大醫院)
28.	金門二度行	(1963年8月23日)
	夢與希望後記	(1968年聖誕節於小女令恬練琴聲中)

書名	10. 《風樓隨筆》： 1969 年 8 月由 三民書局 出版 選錄 1951 年至 1969 年間所寫的 25 篇文章	
	序號	篇名
	前記	(1969 年 6 月 29 於泰京曼谷)
1.	詩人的畫	(1954 年 11 月)
2.	白色的畫家	(1958 年 4 月)
3.	歡樂童年——韓國兒童畫展觀後	(1963 年雙十節)
4.	藝術的陶冶——談蓮韻合唱團與師大美展	(1964 年 1 月)
5.	評聯合彩色影展	(1964 年 3 月)
6.	現代畫的欣賞——從席德進先生的畫想起	(1962 年 3 月)
7.	繪畫應往何處去？	(1963 年 1 月)
8.	評「兇手」	(1961 年 4 月)
9.	「松窗憶語」跋	(1957 年 9 月)
10.	「善」與「美」的結合	(1956 年 10 月)
11.	珍妮畫像	(1954 年 9 月)
12.	悔罪女	(1952 年 11 月)
13.	論華嚴女士「智慧的燈」	(1969 年 4 月)
14.	寫給女兒	
	第一封 贈你們一支慧劍	(1960 年 4 月 28 日)
	第二封 青春——是世上最大的財富	(1960 年 5 月 20 日)

	第三封 健康——是美滿幸福的鎖鑰	(1960年6月2日)
	第四封 愛美——是端正品格的潛力	(1960年6月17日)
	第五封 興趣——是平衡情緒的良藥	(1960年7月1日)
	第六封 書籍——是啟迪智慧的泉源	(1960年7月15日)
	第七封 毅力——是邁向成功的礎石	(1960年8月1日)
	第八封 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	(1960年8月12日)
	第九封 感情——是善惡之間的火種	(1960年7月27日)
	第十封 漫長的路	(1963年3月5日)
15.	教吾兒作文	(1954年11月)
16.	談「吃」	(1962年11月)
17.	木瓜之喻	(1953年8月)
18.	談今後的女子教育	( <u>1951</u> 年12月)
19.	漫談健康與教育	(1952年1月)
20.	迎接「劃時代的三八」	(1957年3月8日)
21.	戀愛與結婚	(1968年11月)
22.	我看婚姻制度	(1968年10月)
23.	女明星為甚麼要自殺	( <u>1969</u> 年4月)
24.	永恆的目標	(1968年9月)
25.	顧曲餘談	( <u>1969</u> 年1月)

### 附錄 3

鍾梅音唯一一本短篇小說集：《遲開的茉莉》1957年12月由三民書局出版

書名	《遲開的茉莉》：1957年12月由三民書局出版 鍾梅音唯一一本短篇小說集，共收錄10篇
序號	篇名
	再版序言（2008年三民書局編輯部）
	序言（1957年羅家倫作）
1.	好日子
2.	路
3.	湯餅會
4.	新生南路的憂鬱
5.	邱比特的箭鏃
6.	失去的婚禮
7.	玫瑰的傳奇
8.	玩具的糾紛
9.	遲開的茉莉
10.	完
	後記（1957年鍾梅音作）
	小說創作話艱辛（再版後記）（1959年鍾梅音作）

## 附錄 4

鍾梅音：《海天遊蹤》1966年4月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

書名 序號	8. 《海天遊蹤》二集：1966年4月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 1964年6月24日至9月2日，隨丈夫業務旅行出國，環遊世界80天，先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而後集為兩冊自資出版，作為與丈夫的銀婚紀念。第一集收錄24篇，圖片20張，第二集為27篇，圖片20張。 《海天遊蹤》二集，共收錄51篇，照片40張。
	篇名
	第一集 目錄
	序
	海天祝福（張佛千著）
	海天行歌（張佛千作）
1.	漫談觀光
2.	香江屐痕
3.	臥榻之旁的人物
4.	我看世界博覽會
5.	屬於詩人的
6.	在芝城的日子
7.	小城婚禮
8.	葛麗絲的家

9.	探親記
10.	春天永在
11.	好萊塢影城一瞥
12.	狄氏樂園一日遊
13.	夏威夷，ALOHA！
14.	倫敦人的思古幽情
15.	關於倫敦塔
16.	塔橋與倫敦塔
17.	溫莎古堡與漢普頓宮
18.	大英博物館
19.	巴黎與倫敦的蠟人館
20.	拿破崙與約瑟芬
21.	路易十四與凡爾賽宮
22.	羅浮宮的一鱗半爪
23.	畫家天堂蒙馬特
24.	閑話巴黎
	第二集 目錄
1.	滑鐵盧之行
2.	「小人尿」及其他

3.	比京漫步
4.	挪威的「白夜」
5.	北歐的土風舞
6.	我與奧斯陸
7.	我們在慕尼黑
8.	德意志博物館
9.	靜靜的紐芬堡
10.	羅安格林的婚禮
11.	西柏林·這孤島
12.	杜城瑣記
13.	一塵不染的日內瓦
14.	瑞士的漁人節
15.	蘇立克與瑞士鄉村
16.	走馬永恒之城
17.	聖彼得大教堂
18.	關於梵諦岡
19.	卿本佳人
20.	我在米蘭
21.	神仙的故鄉



22.	上帝創造亞當的地方
23.	第四古國腓尼基的化身
24.	星馬行腳
25.	泰國的音樂和舞蹈
26.	水上市場與曼谷寺廟
27.	幸福樂土·人間天堂